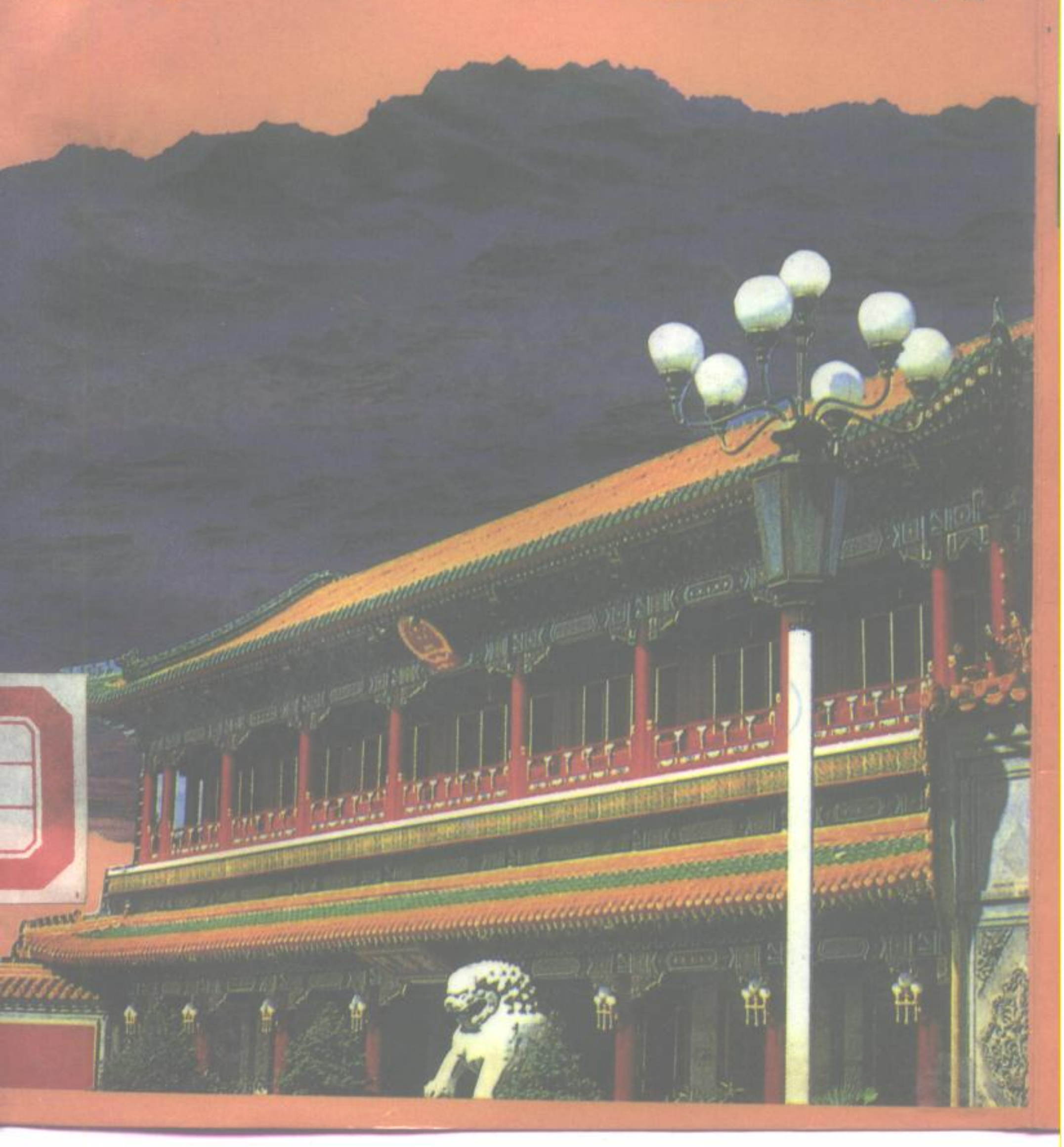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大跃进 1958—1960

第二卷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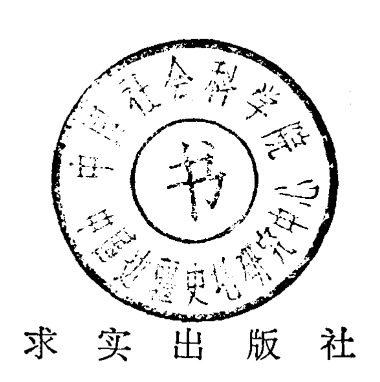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第二卷　大跃进

1958—1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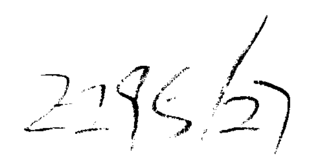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著

魏海生　艾　平　等译



求　实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张克敏
封面设计　张志明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第二卷　大跃进
1958—1960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著
魏海生　艾　平　等译
求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民族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2.375　印张　310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0 册
ISBN　7-80033-170-9/D·64
定价：5.85 元

本卷译者：

魏海生　艾　平　郭小立　孟力梅
孔庆榛　彭平阶　董椿英　刘颖丽
谢维和　陈嘉明　郑禄山　刘金山

校　　订：

杨立文　朱立人

统　　稿：

魏海生

自由不是在于想象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是在于认识这些规律，并且在这种认识所给与的可能性之上，有计划地使得自然规律为着一定目的服务。对于外部自然界的规律，以及对于人们本身的，支配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规律，都是如此——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思想上、而绝不能在现实中予以分开。所以意志的自由，不是别的，只是由于认识事物而能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

——恩格斯：《反杜林论》

前 言

本人预定对文化大革命起源三部曲研究的第二卷，在头卷问世之后很久才与读者见面，因而或许有必要重述我的初衷：考察1956—1965年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行为、相互作用的影响，以便理解毛泽东为何决心推翻并重建他曾呕心沥血创立的政权。

对我来说，本卷推迟问世是令人灰心丧气的，然而也是幸运的。在1974—1979年这5年任议员期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部分地赞助下，并且有段时间利用我在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旧办公室，我设法继续了一些研究和写作；但活跃而又紧张的政治生涯，实在不允许我从容不迫地对中国以往20年间的事件，进行象牙塔式的深思。另一方面，议会生活却给了我一系列有关政治问题及过程的直接经验：领导的作用；领袖与同僚的关系；政治家与官僚的相互作用，政策制定到实施的曲折道路；乡村中党的实际工作者对首都的政治家的重要性；政治家在事关紧迫的国家利益的压力下的行为；良心和妥协、个人信念和政党团结、自尊心和野心之间的不断冲突；以及时机、偶然性和运气所常起的关键

作用。英国不同于中国，议会有别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英国工党不是中国共产党，20世纪70年代温和的英国社会主义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跃进时代的共产主义也相去甚远。但我希望由于从事相同的职业，我能以更大程度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去考察北京政治家们的行动。

本书推迟写作所获得的第二个意外收益，乃是1979年初开始收到来自中国的新材料，此时恰好在我失去议员席位几个月之前。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大跃进的认识。

1980年初，我在利华休姆托拉斯的慷慨赞助下，开始用全部时间研究这些新资料。该托拉斯董事罗纳德·特雷斯十分友好地按照预定计划提供资金，使我得以利用各种机会在国外从事研究工作。

通过富布赖特旅行补助金的帮助，我移居到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作为研究员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令人兴奋的气氛中，度过了1980—1981学年。詹姆斯·比林顿，他的副主任普罗瑟·吉福德，以及他们友好而能干的同事们给人提供了午餐讨论、午后学术讨论会和夜晚对话的饶有兴趣的精神享受。然而，当时间消耗必须让位于执笔写作时，他们又是能体谅别人的。在那里，我撰写了本书的最后几章。在这一工作中帮助过我的威尔逊中心的其他诸多同事中，尤其要提出的是：东亚研究计划基金的首任干事哈里·哈丁和他的助手莉莎·威尔逊；兹德涅克·戴维和他的职员，他们是我与华盛顿地区藏书资源的纽带；埃洛伊塞·杜恩教会我使用文字处理机的方法和照看各章的编排；弗朗西兹·亨特坐在聚会中心地点，遇有必要时，保证外界不会干扰我的工作。我的研究助手邦尼·格拉泽和杰弗里·王慷慨地利用他们自己的研究时间对大量有关材料进行研究并提出报告，因而我的第三卷也将从他们的努力中得益。

我将本书第十章草稿作为我在威尔逊中心学术讨论会的论

文，从与会的主要参加者哈里·哈丁和托马斯·鲁宾逊的敏锐批评中获益匪浅，并从下列诸君的评论中得到很大的教益，他们是：多克·巴尼特、西里尔·布里奇、亨利·布雷德舍、菲利普·布里奇姆、莫里斯·迈斯纳、莱曼·米勒、查尔斯·纽豪泽和姚伟（音译）。汤姆·伯恩斯坦、朱利·多姆斯、菲利普·埃默森、汤姆·费希尔、默尔·戈德曼以及戴维·巴克曼也给我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费正清曾激励我将第一卷变成一份迟交的博士论文，并阅读了本书的各章节，不断提出大量独到的勉励和建议。

在华盛顿逗留期间，王冀曾引导我遍览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藏书；菲利普·埃默森借给我大量资料，使我得以节省许多时间；在余秉权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奈伦·周和卢国孙（音译）殷勤地向我提供了他们最新的出版物，其中包括一套尽管令人心碎但颇有价值的8卷迄今尚不为人知的红卫兵资料集。罗伯特·巴雷德森、罗伯特·迈克尔·菲尔德、查尔斯·弗里曼、爱德华·弗里德曼、詹姆斯·格雷厄姆、卡罗尔·哈姆林、薛君度、保罗·克里斯伯格、尼古拉斯·拉迪、肯尼思·利伯特赫、利奥·奥林斯、罗伯特·奥克斯南、卢西恩·派伊、罗伯特·萨特和理查德·威奇与我的谈话，也使我受益匪浅。对最初几章的初稿曾提出犀利批评的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则经常提出各种见解和忠告。

返回英国后，我根据新的资料修改了前面的章节。巴兹尔·克拉克主持的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小组与我仔细讨论了某些观点。沃纳·克拉特曾对前几章作过评论，现在又以其惯有的一丝不苟精神检查我后来的大部分章节；早在大跃进年代，当我为伦敦《每日电讯报》编写大跃进大事记时，克拉特的忠告使我避免了接受当时出现的虚假产量的危险。几年以来，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的斯图尔特·施拉姆、肯尼思·沃克和克里斯托弗·豪，通过讨论和他们的著述，帮助我加深了对这一时期的理解。

在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伊恩、斯马特和他的继

任者威廉·华莱士、无视那些对我的书稿能否最终完成持怀疑态度的人而始终保持他们的自信。当全书脱稿时，波林·威克姆有力地负起责任，安排经验丰富和耐心细致的朱迪思、雷文斯克罗夫特作本书的编辑，后者早些时候曾在《中国季刊》工作。在回答编辑的疑问的日子里，我有幸与本杰明·施瓦茨在哈佛大学共执教鞭。与他和其他同事的交谈，以及学生们的提问和评论，都帮助我推敲了某些问题，而哈佛燕京学社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图书馆使我能迅速地解决各种问题的细节。然而，出版前的定稿过程，由于两位慷慨大方的美国学者，向我提供了他们最近得到的一些重要的中国“内部”出版物而不得不延缓了；幸运的是，这些资料足以加强我的论证，而不是迫使我把论证来一番改造。不消说，在此我向他们致以热情的感谢，不过他们之中谁都不必为本书的任何错误和遗漏负责。

在本书多年的酝酿期间，我的妻子埃米莉对这一计划始终充满信心，一贯对它的内容提出有见解的批评，并努力保证我不过分曲解我们共用的语言。我们的孩子拉里萨和罗里忍受了因我长时间在打字机上工作而造成的孤独，但更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学会了编档保存《人民日报》。谨将此书献给他们。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1982年3月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目　次

第二部分　退　却

第三部分　冲　　突

第四部分 失 败

引 言

自从大跃进席卷中国以来，转眼已过去25年了，但它的回响仍余音绕梁。大跃进是产生中苏争端的催化剂：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分裂至今还决定着中国外交的模式；大跃进表明放弃平衡的发展战略，今天，中国人仍把他们的经济问题追溯到这个决策。大跃进是以密集人力的动员为前提的，从而又导致了计划生育的忽略，当13年后恢复计划生育政策时，中国又增加了2亿人口；大跃进触发了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国家老资格的现役军人国防部长彭德怀之间的对抗，党和军队之间的紧张局面现在依然萦绕于中国政治制度；大跃进产生了新的社会组织——人民公社，尽管它的职能在短短的几年内消亡了，但直到1981年中国的经济改革者才开始讨论彻底废除它。

大跃进是逐步形成的，1957年秋天，中国领导人的幻想破灭了。继反斯大林运动和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试图“放宽”党的统治方法，然而，“百花齐放”方针的试验又彻底失败了。他的讲话引发了对党始料不及的潮水般严厉批评，使像刘少奇副主席这样的曾为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过贡献的

中共老资格领导人蒙受屈辱。反右运动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击，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为首的5人小组领导了这场运动，知识分子为之胆战心惊。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卓越成就还不足以消除日益增长的要求摆脱这个计划所依据的苏联模式的情绪。许多中国领导人感到，中国如果要摆脱经济落后状态，就必须采取新的方法。关键问题是落后的农业不能保证工业的原料需求，不能使迅猛增长的人口获得温饱。令人吃惊的是，中国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从明朝1368年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的6个世纪中，中国的人口似乎已从约8000万增加到5.8亿。尽管1588年和1642年发生严重瘟疫，14世纪到18世纪，人口增长率平均每年为0.4—0.5%，然而在18世纪的太平盛世又增加到高达1%。19世纪的太平天国起义和其他政治动乱曾造成人口急剧下降。但在20世纪，人口又开始以1%的比率增长。

在这600年间，中国的粮食产量大致与人口同步增长。中国农民依靠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亩产而提高产量。产量提高的大部分原因在于劳动力和有机肥料投入的增加（人口的增长使这两者成为可能）。技术改良(例如从美洲引进甘薯)不过是产量增加的微小因素。

尽管这6个世纪中缺乏重大的技术革新，尽管20世纪上半叶人口继续增长，中国农业还是提供了适当的维持人口生存所需要的最低限度食物。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水稻产量约为印度同期的两倍，而且比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其工业化世纪开始时的大米产量稍高一些。正是这种相对有利的局面，使中国人能够抽出少量盈余，以负担第一个五年工业计划的费用。

但中国人的参照系并不是日本或印度，而是他们试图仿效其经济发展方式的苏联。中国在这一点上与苏联相比并不占优势。在他们各自的五年计划的前夕，苏联人均粮食产量为中国的一

倍。1932年，在斯大林集体化计划打击之后，苏联的粮食产量比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减少25%，但通过使用强制手段，苏联农民被迫出售了几乎等量的粮食。即使这样，在1932年伤痕累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人均粮食产量仍高达60%以上。与苏联相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农民却得到了相对温和的待遇。总之，苏联粮食产量与人口的平衡使斯大林能够对农业实行必要的榨取政策，吸收大量的粮食以负担机器的费用和养活日益增长的城市工人，另一方面实际上却忽视了农业发展。而中国人不得不同步发展农业与工业，故仅能获得极少的盈余。

1949年，中国恢复了安宁和统一，以及随后在土改中没收地主土地，使中国农业开始出现转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量增加约3%，粮食产量年增长率约在0.92%（依据外国高级分析家的最低估计）到3.78%（从中国统计数字产生的最高比率）。以增加肥料和农药为主的农业投资，每年增加5%，促进了较高的增长率。但产量增长主要依靠传统技术：更多的投入劳力，通过双作对土地更加精耕细作，以及更广泛的利用灌溉。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根据官方数字，粮食产量的增加仅有1.3%，工业增长率——与苏联相比，与农业增长率的关系更加密切——是中共掌权以来的第二个最低点。此外，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以及公共卫生措施，也使人口的年增长率由本世纪上半叶的1%提高到20世纪50年代的2%以上。在人口成倍增长和大规模工业化计划的双重负担下，中国农业正在失去满足国家的全部需求的能力。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领导人没有掌握使他们能够认识自身困境的历史特性的数据。但是1957年夏末的粮食短缺必定足以清楚地表明：有必要从根本上对他们的发展战略进行重新估价。

他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是他们可以开始一个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计划，把资源投向直接促进农业发展的工业上，这便是20世纪

70年代后期所采用的策略。另一条路是力求通过大力利用传统方法、尤其是加强水利建设，以增加农业产量。正是采取后一种策略的灾难性决策才导致了大跃进发生。

中国领导人的希望是经济腾飞，由此使中国走上一条自立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及其拥护者无视自然和经济条件，以过分自负的雄心和急躁的行为酿成了祸患。但是，大跃进策略的基本构想是正确的。广泛动员农民被经济学家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试图把剩余劳动力变成资本的一种合理办法。创办小规模的“土”式工业项目——大跃进的又一特点——可以看作是土洋双重技术的合理利用。

也许1957年秋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并没有提出这样精明的分析，实际上，它没有提出总体战略。但情绪显然是不满和急躁的，重提1956年生产“高潮”的内容便是一个象征。毛泽东在全会的讲话中要求高速度发展，农业更加精耕细作，以及提高钢铁产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他仅设想中国到1967年或稍后一些时间将年产2000万吨钢，而同年，他又设想到1959年把钢产量至少提高到3000万吨。还在1957年，毛泽东坚决倡导计划生育，中国宣传人员在大跃进期间叫喊的“劳动力短缺”还没有看出来。毛泽东的雄心和挫折体现在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① 不过，它仍只是一个问题。产量的迅速提高至今也没有兑现。还没有提出鼓舞人心的挑战以刺激全国行动起来。

说来稀奇的是，恰恰是日益反目的俄国人为毛泽东提供了这种挑战的想法。正是在莫斯科，而不是在北京，毛泽东宣布了第一个导致大跃进灾难的设想。

---

①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3页。——译者注

第一部分

冲　锋

第 一 章

毛泽东在莫斯科

1957年11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云集莫斯科，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40周年。在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引起的创伤之后，这是一个重申团结和原则的机会。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此会，并在会议上支持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以便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除南斯拉夫的党之外，所有执政的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对国际形势、和平与战争问题、共产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准则之共同立场的联合宣言。但是，在统一阵线的背后，中苏之间存在着如下的严重分歧：如何评价国际阵营之间的力量对比，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用和平方法，还是通过暴力。根据这些分歧，毛早些时候便告诫他的同事不可与苏联顽固分子维持"不正当的"关系。然而，毛对共产党团结事业承担的义务，加上苏联关于军事和科学合作的许诺，促使他支持赫鲁晓夫，并得以使行将达成的妥协成为可能。

奇怪的是，整个1956年使中国人烦恼的斯大林

问题，似乎并未成为中苏代表团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争论的内容。随后，中国人对此次会议情况的透露也没有提到毛在这一问题上再次指责苏联人。的确，毛在11月6日对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中，说苏联共产党克服个人崇拜的措施是"明智的"。也许，在毛滞留莫斯科时，俄国人使他确信，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抨击是必要的，是不可避免的。在毛回国之后不久，据说赫鲁晓夫便告诉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毛如今已理解苏联对个人崇拜的抨击，并完全支持这种抨击。较有可能的是，毛已经感觉到：既然造成了损害，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反责，因为赫鲁晓夫自己已在否定反斯大林运动。最重要的是要显示团结，以防止出现更多的灾难。

根据北京后来的说法，中苏代表团之间的"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应如何取得政权，即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正式报告中，赫鲁晓夫论证共产党可以通过议会方式执政。随后，中国人私下告诉俄国人，他们不同意赫鲁晓夫对这一问题的提法，并用回顾的方式声称，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报告中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是通过类推的方法指出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是错误的，行不通的。

在莫斯科，毛和他的同事们"做了大量工作"，与俄国人进行磋商和斗争，并与其他代表团建立联系。据中国人说《莫斯科宣言》的苏联原稿仅仅提到和平过渡。因此，中国代表团于11月10日向俄国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在这份文件中，他们接受谈论和平过渡在策略上的好处，但坚持主张也要提及暴力革命，因为"这种〔和平过渡〕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① 在对这一问题的"反复讨论"中，俄国人提出了两个宣言草案，中国人提出了一个修正稿，然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第112页。——译者注

后，他们双方共同拟定了一份联合稿，提交给其他党。最后的宣言明确地首先提及和平过渡，但在中国人的坚持下，补充了一句，“应牢记社会主义的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毛泽东觉得这个宣言虽经修改但仍不能令人满意，这是不足为怪的。后来中国人对这一作法的解释表明，正是出于一种不使俄国人为难的同志般的愿望，毛泽东才没有坚持去掉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提出的论点。

但是，不管中国人怎样对“和平过渡”抱有明确的态度，这个问题毕竟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因为非共产主义国家的革命过程可以由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决定。但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就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的新论点相联系的另一个争论问题，却直接与中国人有关。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即美国的问题。这将成为1960年中苏争论中第一次公开论战的焦点，而且它已使中国领导人感到不安。因此，中国人在莫斯科未曾更加有说服力地把这一争论继续进行下去，似乎令人不解。

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赫鲁晓夫承认，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又论证道，自这一理论提出以来，情况已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阵营，中立国家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运动已成为争取和平的强大力量，所以，尽管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经济基础依然存在，但“战争并非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在苏共二十大的日子里，《人民日报》曾支持这一“深刻的”分析，并称之为“对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巨大鼓舞力量”。赫鲁晓夫的论点与现时中国人的和平共处以及他们认为紧张局势缓和是国际形势的关键因素的信念颇为协调。但到了1957年秋天，在北京向美国人和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和平建议遭到失败之后，毛寄托在对西方友好政策上的所有希望便成泡影。加之，新显示出来的苏联火箭之优势——8月份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

10、11月份头两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也使毛确信，对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不仅是可取的，而且从实力地位出发这样做也是可能的。11月18日，这位主席在向聚首在一起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讲话时，对全球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作了乐观评价：

>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和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正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①

除了引证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就外，毛还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遭受的十大失败，以证明他的关于国际形势已出现"新的转折点"的论点。中国人宣称，毛还进一步论证，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增强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制止世界大战。但是，使许多听众大为震惊的是，他已经准备去考虑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并冷静地估计如果发生核战争可能带来的结果。在11月6日向最高苏维埃会议发表公开讲话时，他断言西方会灭亡，而社会主义阵营则会幸存：

> "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②

而在私下，毛用数字详细说明了他的见解：

> "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

① 《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团中央编印，1967年3月，第531页。——译者注

② 《毛泽东著作》第522页。——译者注

人口，可能损失1/3；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①

在12年后莫斯科的另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会议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曾说道：“显然，在座的许多同志都记得毛泽东在这个大厅里，在1957年会议上的讲话。他以惊人的轻率和蛮横的口气谈到一旦发生原子战争人类可能死去一半。”②当时，使俄国人忧虑的显然不是毛所谓的蛮横，而是他的轻率，因为他们认为毛关于社会主义阵营之优势的论断是不真实的。俄国人并没有宣称他们在火箭方面的成就已经造成东方的总体“优势”，而仅仅认为东方如今“更加强大”，而西方却比过去更加衰弱；俄国人甚至也没有自称他们已经获得完全的军事优势。他们承认，在一场核战争中，苏联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对毛把拥有核武装的美国视为“纸老虎”的说法感到吃惊。为此，赫鲁晓夫必定已经开始怀疑过去对毛的支持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过高。

第一节　中苏秘密防务协定

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容忍赫鲁晓夫对美政策的最重要原因，无疑是苏联领导人表示了帮助中国人获得核武器的新意向。10月15日，双方签订了一个有关“国防新技术”的秘密协定。8年之后这个协定的存在才公诸于世，但即使25年后的现在，它的准确性质和签订前形成的过程仍然是一个谜。在中国方面后来指

① 《毛泽东著作》，第531页。——译者注

② 《在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国际会议上的讲话》，《勃列日涅夫言论》第5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第51页。——译者注

责俄国人“单方面”撕毁协定时，他们也没有透露是哪一方提出这一协定的，通过什么谈判导致该协定的缔结，以及谁代表双方签字的。当俄国人回首中方的指控时，他们唯一的辩解也只是说提出的“事实”是“有倾向性的，被歪曲了”。他们坦率地承认存在此种协定，谴责中国无视作为盟国的义务和滥用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它已经走上泄露有关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防务的机密文件和情报的道路……基于这种考虑，俄国人显然不像中国人那样热衷于泄漏这一协定的任何细节。

这个协定包括给予中国核武器计划以某种程度的帮助，似乎是确信无疑的。它也许只包括有关该领域的科学技术的转让，而不涉及关于武器制造的直接合作。它或许也包括导弹技术的帮助。中国人用“新”字描述这种技术一事表明，他们在这些领域里还缺乏诸如核武器和导弹这些方面的专门知识。自1955年以来，苏联在原子核物理学领域一直帮助中国，并在1958年履行了一项研究反应堆的诺言。很可能这个秘密协定把这种合作扩大到武器领域。

毛长期以来就立志要生产中国的原子弹。1957年秋，在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后，大概是北京的好战情绪导致中国人向莫斯科施加压力，要求分享一些苏联的新技术。至于赫鲁晓夫，他必定急于要得到毛的支持：对他本人清洗“反党集团”的支持，和对苏联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党最高级会议上反对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的支持。他不可能靠提供经济援助指望得到这种支持，因为苏联经济为应付东欧骚乱后果已极度吃紧。但是赫鲁晓夫肯定知道毛决心要得到核武器，因此，“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似乎是以获得中国支持的适当的方式，同时监视以及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中国核武器的发展。

在协定签订3天之后，中国一个最高级的大型科学代表团抵达苏联，举行为期3个月的谈判。最终于1958年1月18日签订了

一些协议。这个代表团的公开目的便是获得苏联对中国12年科技规划的全面援助。但后来的报道表明，为共同研究所设想的关键领域乃是物理学及和平利用原子能。或许中国科学代表团的赴苏之行是早些时候安排的，但中国人可能预先就向苏联人施加了压力以签署包括先进武器在内的某种防务协定。

对这个秘密协定的大多数分析不仅把它与中国科学代表团的访苏联系起来，而且还把它与11月6日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联系起来。但是，这并不能解释后者恰恰是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前夕最后一刻才到达的。当国防部长彭德怀在11月2日作为毛赴苏代表团的成员离开北京时，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明，在几天之内他将另外担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这一角色。当时，秘密防务协定已签订两周之久，中国科学代表团的名单也早已公布。没有事先预示还需要中国的将领到莫斯科去。当然，不论任何地方，让高级将领立刻组成一班人马出任大型外交代表团都不是正常的事。

此外，中国军事领导人在代表团派出之前的讲话中，也没有暗示即将出现的事情。在10月30日的广播讲话中，叶剑英元帅指出，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10月31日，刘伯承元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 "现在，苏军已成为高度现代化的军队，它拥有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最新式的战斗武器……我军在现代化建设中，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一定要学会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①

11月4日，彭德怀元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

① 《苏联军队是世界各国人民军队的榜样》，《人民日报》1957年10月31日。——译者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军〕在军事技术科学上，又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洲际弹道导弹的成功，显示了苏军技术科学无可争辩的优越性……〔苏军〕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榜样……〔向苏联军队学习，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学习。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学习态度，〕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就可以少走许多弯路。"①

这三段话最醒目的特征并非是强调向苏联学习，甚至也不是强调使中国人欢欣鼓舞、并使毛确信社会主义集团对西方拥有优势的苏联导弹技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三位元帅在讲话中都没有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军事力量发展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成就——粉碎了美国在核武器领域中的垄断地位。

由于中国已明显确信，即使在核武器领域，苏联已在某些方面走在美国前面，这种忽略看来更加反常。另一篇出自科学家而并非军人的周年颂词也透露了这一点：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在10月31日的一次科学家聚会上指出，苏联是第一个生产可以运载的氢弹的国家。一位著名的中国科学家把苏联的氢弹发展列入苏联诸多科学成就的首位，这也许反映了北京科学界因期待根据新协定在这一领域与苏联同事合作而引起的兴奋情绪。元帅们不提此事一举表明，在协定签署两周之后，他们并没有预见到这与他们自身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可以这样推断，军事代表团的派出是在毛和彭德怀抵达莫斯科之后决定的。是他们在那里与苏联人最初商谈的结果。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和中国的论战中我们知道，苏联领导人在某个时候

① 《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节，向英勇的苏联军队学习》，《人民日报》1957年11月4日。——译者注

答应给予中国原子弹样品。①中国方面的争辩还附带指出，原子弹样品的提供虽不是秘密协定的一部分，但与秘密协定有关系。因此，看来很有可能毛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第一次会谈时，苏联领导人便提出除了防务协定中已提出的技术合作外，还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

以一种对方无法拒绝的慷慨提议欢迎来访政治家的光临，当然是一种惯用的外交手腕，旨在保证随后的交易获得成功。大家知道，赫鲁晓夫在即将举行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最高级会议中需要毛的支持。而且，在秘密协定签署与毛抵达莫斯科期间，赫鲁晓夫已解除他在夏季清洗"反党集团"斗争中最重要的盟友朱可夫元帅国防部长的职务。这一行动必定使北京再次对赫鲁晓夫靠频频清洗其同事以维持其领导地位的持久性表示怀疑。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建议也许对毛是一种强烈的诱惑，使他将对赫鲁晓夫及其政策的怀疑搁置一旁。

然而，大概当中国统帅部对"迈向核武器"的前景高兴时，赫鲁晓夫的慷慨却可能加剧了毛与彭德怀之间对于中国武装力量模式的持续分歧。这一分歧产生于两方面：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及中国国防费用短缺的不同看法。毛似乎认为，中国应拥有核武器，因为有了它，中国便能够在世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还能够削减常规武器现代化的费用。而彭德怀，如果被迫进行选择的话，他显然宁愿要现代化的常规部队，并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他大概认为，中国应该作为苏联集团的一员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

11月27日，在中国军事代表团回国前夕为苏联领导人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彭德怀元帅再次强调了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的重要性：

---

① 参考《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译者注

"在二十多天的访问中，英雄的苏联军队给了我们极其深刻的印象。苏联军队是拥有最新现代技术设备、有着良好的军事训练和高度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军队……〔苏联军队〕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良好榜样。我们一定把这次访问所学到的东西带回国去，认真研究，根据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①

朱可夫元帅的继任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致答词时强调，共产主义军队的强大不仅在于他们是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而且首先在于他们同党和人民的联系。这是朱可夫事件之后所采取的一条不足惊奇的路线，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红军的重申。毕竟，马利诺夫斯基拥有的新职务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表面上愿意在这项政策上与赫鲁晓夫合作。或许更有意义的是，马利诺夫斯基的讲话表明，俄国人愿意将他们军队建设的"经验"传授给中国人。这也可能暗示，俄国人将不会向中国提供大量现代化常规武器。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原因可能在于毛的反对。

莫斯科之行也许是毛与彭德怀之间关系的转折点。赫鲁晓夫迅雷不及掩耳地和轻而易举地解除朱可夫职务一举，无疑地给予中国党的领袖和国防部长之间早已紧张的同志关系以一个心理震颤。毛在确信已得到他所需的苏联防御援助的许诺之后，便把他的注意力转向按照他更喜欢的路线去重建人民解放军，而彭德怀却不得不或者服从或者离职。

第二节 赫鲁晓夫策励毛泽东

无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对外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如

①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9日，第5版。——译者注

何严重，他们必然发现他们对于经济的态度却有着令人满意的类似。甚至在莫斯科之行前，毛就可能已经对赫鲁晓夫把苏联经济权力彻底下放的做法感到高兴，这促进了毛试图在中国搞类似权力下放的念头。但是，比他们在理想的共产主义经济结构形态上的一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有类似之处。

毛和赫鲁晓夫在气质上同属于豪放的乐观主义者。1957年5月，赫鲁晓夫曾号召"在不久的将来"，最迟在1961年之前，在肉、黄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方面追上美国；他嘲笑那些谨慎的苏联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对依靠若干集体农庄的这些产品的惊人增加来达到这个目标表示怀疑，他又用仿佛毛的气概（即使不是他的话）说，"所有这些怎么能用数字计算呢？这是个政治奇迹"。①

在毛于11月抵达莫斯科时，赫鲁晓夫越来越相信肉、黄油和牛奶的目标将会实现，并打算宣布一个与美国进行经济竞赛的更雄心勃勃的目标。在11月6日对最高苏维埃会议所作的重要讲话中，赫鲁晓夫说：

> "同志们！我们的计划工作人员的计算表明，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维埃国家在今后15年内不仅能赶上并且能超过目前的美国。"②

正如他在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重要产品"指的是：铁矿石、生铁、钢、煤、石油、电力、水泥，以及诸如糖、毛纺织品和皮鞋之类的消费品。在与毛的私下交谈中，赫鲁晓夫

---

① 哈里·施瓦茨：《斯大林后的苏联经济》，伦敦戈兰兹公司，1965年出版，第109—110页。——译者注

②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年——在最高苏维埃庆祝会上的报告》，《赫鲁晓夫言论》第7集第221页。——译者注

可能已经打算透露他的信念，即在最近宣布的7年计划基础上，苏联到1970年，将在主要工农业总产量及人均产量方面赶上美国。

其实，早在听取赫鲁晓夫11月6日报告之前，毛已就关于开展一个新的经济运动获得了其同事们的同意。这一运动的象征就是在短期内恢复不切合实际的《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多、快、好、省”的口号。在9—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说，做事情，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1]他的选择显然是后者，在次年5月大跃进已开始时，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详细论述了这一论点。面临毛和刘少奇要通过大跃进改变中国经济萧条状态的共同决心，比较谨慎的政治局委员，如周恩来总理和负责经济的副总理——商业部部长陈云、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和财政部长李先念——都放弃了他们对“冒进”的反对。

毛的莫斯科之行对于开展1958年“大跃进”的重要性在于，他不仅个人为赫鲁晓夫的浮夸计划——1964年这位苏联领导人下台后，这些计划被称为“轻率的计划”——所激励，而且还获悉，苏联的经济计划部门此时准备开展他们的中国信徒前年迫使毛放弃的那种工农业跃进运动。他正是带着这种心情回国的。赫鲁晓夫的冒险主义使周恩来及其同事们节制新的“高潮”——此刻拟议中的经济跃进运动仍用1956年的名称——的希望破灭。在逗留苏联时，毛修改了《人民日报》一篇关于1956年“跃进”中提出的“多、快、好、省”口号的社论，并致信北京，警告财政部谨慎的官员们：中央领导将不会支持他们。更加重要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们面前，他或许根据他个人的倡议，保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2—473页。——译者注

证中国将在15年之内在经济上赶上英国。12月 2 日，在毛从莫斯科回国后不到两周，刘少奇便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会议上公开详述了毛的新的经济目标：

"在15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①

5天以后，国家计划的主要制订者李富春在向全国总工会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表示同意毛的新目标。李富春预测，在15年结束时，中国的钢产量将达到4000万吨，而且他确信，英国当时的钢产量只有2000多万吨，将来不可能达到4000万吨这个数字。他还自信地表示，15年内，中国在煤、金属切削机床、水泥和化肥等方面的产量也将超过英国。

然而，尽管李富春也承认计划部门未能充分注意执行"多、快、好、省"政策，并保证将来会有所完善，但他所宣布的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目标，除一个例外，并没有大幅度超过一年前中共八大所认可的指标。钢——李富春的新指标：1200万吨，八大提出的指标：1050万吨到1200万吨；煤——李富春的新指标：2.3亿吨，八大提出的指标：1.9亿吨到2.1亿吨；电力——李富春的新指标：440亿千瓦小时，八大提出的指标：400—430亿千瓦小时；水泥——李富春的新指标：1250万吨，八大提出的指标：1250到1450万吨。石油产量由于开采困难而低于1956年的计划。在这些增长不多的目标中，化肥是一个例外，这大概是由于它在《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划的重要性使然：李富春把1962年的目标由八大认可的300—320万吨提高到700万吨。达到修改后的《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最高目标（500到700

① 《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号，第2页。——原注

万吨）。

比李富春为1962年制定的工业目标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农业目标。当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在党的八大上盛行，而“急躁和冒进主义”遭到指责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曾包括2.5亿吨粮食、24 万吨棉花和2.5万头生猪的目标。然而，14个月之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宣告了经济保守主义的失败，在《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多、快、好、省”的口号恢复之后，李富春在新的五年计划中提出的目标却都比从前的低：粮食2.4亿吨，棉花215万吨，生猪 2 亿头。

显然，无论毛和刘少奇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带来了怎样的情绪和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仍未自动变成国家计委的具体数字。毛后来说道，全会所作出的唯一具体决定只与水利和积肥有关。①计划部门当时关切的也许只是：如果没有苏联大量的新援助，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不能实现的。而这一援助在苏联作出保证帮助东欧防止进一步动乱的决定后已不再可能指望得到。所以，如果要实现“高潮”的话，动员劳动力成为必不可免，因为劳动力是中国唯一的大量过剩的资源。同时，如果要制定可称之为高潮的全面目标的话，毛本人也不得不做大量的工作。这就需要时间和对全国的巡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仅仅 2 个月前预定1957年底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便悄悄地推迟了。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55页。——原注

第 二 章

政治局委员巡视全国

毛泽东一直对视察基层的重要性深信不疑，他认为这是避免官僚主义的一种手段。这次，他提议在京的高级官员每年要有 4 个月的时间离开北京去收集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原始材料，其理由是中央部门不过是个材料加工厂。他说：“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觉得脑子空了，一出北京又有了东西。”①

到12月中旬，毛泽东、陈云、邓小平（党的总书记）、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中央书记处邓小平的副手）和薄一波（国家经委主任）都已先后离开北京城。12月底，政治局其他重要成员也离开首都。在1958年的头 4 个月里，尽管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常常返回北京，但他们主要是在外地进行视察并交换看法。此次视察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分析基层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然后在研究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起草跃进计划。中央先是在同年 2 月初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初步提出大跃进的计划，接着又在 5 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实实在在地发起了大跃进运动。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56页。——原注

毛本人的行程大概与其他领导人不相上下，即使不比他们多的话。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使人们对政治局视察工作的范围略见一斑。毛在其喜爱的地方——浙江省中部临海的杭州——住了近一个月，时间大概是从1957年12月初到1958年1月初。也是在1月初，毛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中央和地方最高领导人参加的会议的首次会议。1月6日，他乘飞机到达中国最南端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在这里召集了另一次会议，并在1月11日和12日两天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不顾工作繁忙和略高于华氏60度（摄氏零上17度）的水温，两次畅游邕江。1月23日，他到达广州。28日他已返回北京，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第14次会议和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月11日，毛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13日，他又去东北参观了靠近辽宁省会沈阳的抚顺煤矿。毛可能在东北度过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因为此地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区。但在3月5日已到了西南，在人口最稠密的四川省度过了3月份大部分的时间。他用了很多时间参加在四川省会成都举行的又一个高级会议。会议至少从10日开到22日。但在会议期间和会后毛仍设法抽空走访了8个地方。3月28日，在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3人的陪同下，毛由重庆乘船，用3天时间通过三峡，做了一次颇为壮观的旅行。在湖北省会武汉，毛结束了长江之行，在这里一直逗留到4月11日；逗留期间，他于4月6日在汉口（武汉三镇中最重要的一个）召开的会议上作了讲话。12日，他到了故乡湖南省会长沙。4月15日，他抵达广州。4月30日，我们从这个城市得到了有关他的行踪的最后报道。大约在5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体会议，为即将在5月5日召开的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做准备。

第一节　杭州会议和除四害运动

杭州会议是在1958年1月的头10天召开的，外界对此一无所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一时期，毛把他的个人威信作全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后盾。这项运动的重点是除四害，即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曾作为一项特别条款写入《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①。

长期以来，毛一直强调公共卫生的重要性。早在1944年12月，他写道：

> “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②

1957年10月，毛将自己对《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列入除四害条款的特殊兴趣告知最高国务会议。诚然，纲要的死而复生对各地政府开展除四害运动起到了鼓舞作用。拿四川来说，11月30日的省报上登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社论，紧接着省委和省政府机关在12月25日联合发出了除四害的正式“通知”。1月初，毛参观了杭州一条被誉为卫生先进单位的小巷，询问了四害盛行的情况。随后毛在1月中旬召开的南宁会议的幕后发出了一项指示：

> “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好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③

几天之内，北京城兴起了一场推动除四害运动的大竞赛。1

① 见《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6日。——原注

②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25日），《毛泽东思想万岁》。——译者注

③ 《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第156页。——译者注

月27日，《四川日报》发表了该省第一张评比表，说明本省各地区消灭四害的数目。在这之前，新华社来自重庆的一篇报道透露说，在这个有200万人口的城市里，平均每天有近半数的人参加了除四害的战斗。自1957年12月24日以来，他们已消灭老鼠23万多只，挖出近2吨重的蝇蛹，还清除了600多吨垃圾。

新华社另一篇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如何足智多谋的报道更使这项运动平添几分情趣：

> “许多部队的官兵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了老鼠和麻雀的活动习性。根据手头掌握的情况，他们制订了捕捉它们的战术和作战方案。上海驻军某部队官兵发现麻雀夜间躲在村林里，难以捕捉。于是他们想了个新方法，他们摇树把麻雀从窝里吓出来，用手电筒搅乱麻雀的视觉，最后用竹竿打麻雀。这个方法很灵。副排长王树华（译音）用他的竹竿一举就打中四只麻雀。”①

一位被派往中国担任顾问的苏联科学家目睹了另外一种捕捉倒霉的麻雀的技术，他后来，他后来回忆道：

> “一清早，我被一个女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惊醒，于是急忙走到窗口，只见一个年轻妇女正在隔壁房顶上一边来回奔跑，一边拼命摇着一根系着一条大床单的竹竿。突然，她停止叫喊，显然是想歇一口气，可是没过一会儿，房子下面的街道上有人敲起了鼓，因此她也叫喊起来，发疯似地摇着她那奇形的旗子……我这才注意到在旅馆所有楼房上层穿白大褂的女服务员全都忙着摇床单、晃毛巾，不让麻雀飞落在房顶上。”②

---

①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722号第14页。——原注

② 科洛契克：《一位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蒙特利尔，国际出版局代理人，1964年，第68页。——原注

当然，这个政府自掌权之后，一直重视采取各种公共卫生措施，并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以致一位前往访问的英国记者①给他后来出版的书题名为《中国没有苍蝇》。使1958年的这场除四害运动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其规模巨大、态度认真。一位加拿大科学家目睹了下面的事件：

“当我们穿过一条据说是通往某煤矿的铁路支线时，看见了一场非常令人吃惊的情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沿着铁轨发疯似地跑来跑去，显而易见在用衣服扑打着地面。‘唉呀，她是在追杀一只苍蝇！’田先生解释道。这个例子极为生动地说明了中国人为消灭苍蝇、臭虫和麻雀所做的认真努力。我在中国住了近一个月，没看见一只麻雀。我统计了苍蝇出现的数目，只有15回见过一两只。在其中许多情况下，一个中国人追赶着一只可怜的苍蝇。只有一回，在接近西安的火车站的站台上，我看到一群苍蝇围着竹筐嗡嗡叫，每个筐里都装着4头待运的小猪。”②

在来访的外国人看来，这种运动可能有些稀奇古怪，然而正是人民在1957年末至1958年初开展的除四害运动中的献身精神，激励了中国领导人开展一场全国范围的公共卫生运动，并非常希望取得给人深刻印象的效果。为了强调毛个人对除四害的关心，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关这位主席在杭州视察卫生情况的报道。随后在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正式开展除四害运动的指示。后来被认为是毛所作的这项指示透露，11个省和6个大城市计划5年内消灭四害。其中南京市计划在1958年完成任务，北京市计划在1959年完成任务。这场运动主

① 乔治·盖尔。他曾在1954年随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原注

② J·T·威尔森：《在中国的一月》，纽约，希尔—王公司，1959年出版，第207页。——原注

要致力于除四害，但也包括与各种主要疾病做斗争。这些疾病中最顽固的一种是血吸虫病或吸虫病（即埃及血吸虫病）。1958年6月，传来了江西省某县首先消灭了这种可怕疾病的消息，① 毛兴奋不已，夜不成寐，欣然写下他在大跃进第一年里唯一的一首诗：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②

“文化大革命”中，1958年被说成是毛的卫生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在这一年，他们除了大搞除四害的群众运动以外，还进行了医学教育的改革，开展了对中医的进一步研究。事实上，情况雄辩地证明，这些改革远不是那么蔚为壮观的，政治形势也远不像兰普顿先生的文章中所回顾的那么简单。③

第二节　南宁会议和对财政部的抨击

毛虽然在南宁会议上发出了有关公共卫生的指示，可这不是他在1月11日和12日的讲话里所表达的主要关注的事。人们从这

---

① 《人民日报》1958年6月30日——原注

② 《七律·送瘟神》（1958年7月1日）见《毛主席诗词讲解》，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出版，第172页。——译者注

③ 贝兰普顿：《大跃进时期的卫生政策》，《中国季刊》1974年10—12月第60号第668—698页。——原注

些讲话和他在31日签署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在大跃进第一年开始的目标乃是改变党和政府内的风气，动员官员投入到计划中的生产高潮中去，尤其强调政治领导作用以克服官僚主义。正是在南宁，毛首先采纳了大干3年，实现经济突破的主张。“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最初是由安徽省提出来的。开始，毛对此还持保留态度，但该省领导人通过给毛看了他们的水利计划，从而说服了这位主席。然而毛以他特有的谨慎措词，加了一个人们熟悉的副词“基本上”来修饰动词“改变”。毛本人后来曾这样评价南宁会议和随后的成都会议：

> “〔南宁、成都会议——译者注〕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了以后不准再反冒进。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如无南宁会议就搞不出总路线来。”①

毛的突然袭击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样南宁会议与早些时候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就成为毛击败反冒进的标志。在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周恩来总理，政治局常务委员及这个政权初期的经济界最高权威、商业部长陈云，以及财政部长李先念。毛批评了商业部，说它“剥削、欺骗”人民，但他的主要火力是对着经济保守主义的堡垒——财政部的。

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国家的财政部不主张在经济上谨慎从事。在中国，更有充分的理由采取这种态度。仅在10年前，在国民党政权濒于灭亡的时代里，中国曾经历了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国民党未能控制物价，使得在此之前他们最忠诚的支持者——城市资产阶级疏远了。共产党最初的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便是使物价恢复了稳定。财政部的官员们不想眼睁睁地看着

①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157页。——译者注

冒进的经济政策把这一成就毁于一旦。至少在毛看来，正是这些官员在早些时候阻止了1956年的跃进。

财政部的作用似乎曾在杭州会议上讨论过，在周恩来的提议下，财政部许多高级官员被召去出席南宁会议。会上，他们受到了毛的训斥，毛的这一举动显然是为了鼓励另外一些人。在会议过程中，毛透露说，自从1956年的跃进停止以来，他一直拒绝审阅财政部的文件。他解释道，他对《人民日报》在一篇为停止跃进辩解的重要社论中滥用他本人语录的行为特别感到愤慨，他说这是"用毛泽东的话反对毛泽东。[①] 毛采取上述态度的一个原因显然是出于愤怒，但还有一个原因则包含着更深的含义：毛指责大多数政府部门向政治局呈送极其冗长的、学究式的、技术艰深的文件，而财政部又总是很晚才呈送文件，这更是错上加错。结果，按照毛的话说，政治局成了一枚"橡皮图章"，就如"杜勒斯的联合国"。[②]

毛对上述问题的一部分解决办法在这个月晚些时候载入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在该条例第32和33条中，他谈到上报情况和文件的有关问题：

> "一旦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材料……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
> "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46、第151—152页。——原注

② 同上，第149页。

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①

当然，尽早呈报内容较为简单的文件只是处理毛所指出的基本问题——如何确保对政府机构的政治控制——的辅助手段。《工作方法六十条》也许暗示出毛对政府机构官员的责备比他对那些政治局委员（如他们的代言人、财政部长李先念）的责备更多。第33条规定："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②这句话虽有些含糊不清，但很可能指的就是李先念。人们知道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国务院办公室。在这里，他除了掌管财政部外，还监督粮食部、商业部、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他不在时，财政部的日常工作由副部长吴波负责。这位副部长自该政权创始以来一直在三任财政部长手下任高级官员。那么李先念是否可能把政治局的观点强加给吴波和财政部呢？或者李先念是否更可能相信作为政府部门官员主流观点的旗手将必然要行使更大的权力，所以充当起他的政府部门干部在政治局内的代言人？

对任何一个具有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政府都可以提出相似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简直难以回答，即使在那里比在中国更加容易找到证据。对于毛来说，重要的是应该用正确的方式向政治领导人提供信息，以便就如何发展经济这个问题得出集体观点，然后将它下达于政府机构。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提议对预算应该进行3轮讨论，以便使并非专家的领导人能够充分熟悉财政事务，并对专家们的提议提出有见地的意见。当时在南宁，毛明确表示，为实现对经济部门的必要的政治统帅，他准备利用他个人的威望促成即将到来的跃进。

---

① 《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第152—15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53页。

毛在会议上提到了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所写的序言，这使听众们回想起“序言”对开展1956年的跃进所起的巨大作用。他向人们表示自己并不介意那篇“序言”可能被说成是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他认为重要的是它所起的效果。① 这暗示出，如果有必要，他会在1958年再次这样去做。

在1月底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试图寻求知识分子对他宣称的向自然界开战的支持。② 他认为，前一年的“大鸣、大放、大辩论”使各地都焕发出了积极性。“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可以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事，现在也有办法了。”毛还补充了一句，这句话在8个月后发表时便成了名言：中国是一穷二白，穷就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做文章。③

毛对他的非共产党的听众采取了抚慰态度。他说值得高兴的是，民主党派的高级官员成为右派的不多，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人成为右派的只有10人。中国共产党犯了路线错误；民主党派也不怎么高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旧社会的产物，因此中国共产党内出了高岗和饶漱石，而民主党派也出了同样的货色——右派分子。

毛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贯要求，那就是他们应该进行改造。他在强调这一点时采用了最近几个月流行的一个用语：必须又红又专：

> “红是政治，专是业务。不红只专是白色专家。搞政治的，如只红不专，不熟悉业务，不懂得实际，红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搞政治的要钻业务，搞科技的，要红起来。15年赶上英国，要有成百万、上千万忠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49页。——原注

② 同上，第57页。

③ 同上，第154页。

子。”①

这种劝告的有趣的一个方面是，毛似乎已经决定再次努力获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专门知识。6个月前，他一直谈论急需培养一大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而不仅仅是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知识分子。②很有可能，在1958年1月大跃进初期，毛暂时对苏联的模式恢复了往日的热情，这是因为赫鲁晓夫本人对大跃进表示了偏爱，加之1月中旬又签署了中苏科学合作协定。这位主席开始草率地考虑促使国家机关干部和资产阶级专家们从传统的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中获得更多的动力，以重新实施1956年的跃进方案。杭州会议期间，毛将3名上海知识分子急速召来，重点讨论中国的科学发展前景。③只是直到该年晚些时候，毛才认识到了缩短这条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转而开始强调运用小、土技术，这种技术不需要懂得什么专业知识。

当人们对1956年跃进的失败仍记忆犹新的时候，为了把知识分子争取到迅速发展经济的思想上来，毛向他们强调不断革命的必要性，他说不断革命就是要趁热打铁。他指出他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有区别，他认为托洛茨基想超越历史进程，即在民主革命未完成前就想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毛断言：

> “劲可鼓，而不可泄。有了缺点错误，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④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54页。——原注

② 参考本书第一卷第三章。——译者注

③ 《怀念毛泽东同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208—213页。——原注

④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56—157页。——译者注

第三节 《工作方法六十条》

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这次会议上公布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不过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即《六十条》最初是党的内部文件。还有一点也很清楚，即《六十条》首先是在一个会议上提出的，人们一定会猜测这个会可能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时间可能在1月下旬或2月初。

《六十条》的大部分条文是毛在杭州和南宁会议上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有些条文他只是记录了别人的观点。其中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在和地方干部商量的基础上起草的。正如毛自己指出的那样，并非所有的条文都涉及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这个文件先发下传阅，征求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①

毛试图在新的"生产高潮"或"大跃进"中，将《六十条》作为一本随身携带的小册子提供给全体干部，"大跃进"这个词是在第16条中首次出现的。此前它只用于有关水利运动。在新的跃进可能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困难面前，如果没有《六十条》的指引，广大干部们就会再度畏缩不前。第13条综合了毛希望以安徽为榜样，灌输和确认大跃进的时间表的态度和方法：

> "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②

大跃进的确从1958年到1960年持续了3年。

在最长的两个条文（第21、22条）中，毛详尽阐述了关于不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第141—142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44页。

断革命和“又红又专”的观点，这两个观点是大跃进哲学的核心内容。第三个内容——“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则被刘少奇写入“重要的”条文里。① 有趣的是，这一条文之内存在矛盾。因为听起来像是对行政上的卢德主义的那种鼓励，事实上显然被设想作为严密的受控过程。这可能反映了刘少奇态度上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对跃进的热情和对秩序与组织的偏爱之间的冲突。然而，该条中表述的“总路线”表明，赞成跃进的领导人还不准备或者会全然忽视周恩来及其同事们的警告，因为大跃进的口号“多、快……”是以计划部门所喜爱的“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来修饰的：

> “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②

但是当年的情况说明，这种谨慎的平衡发展方针却被同样写入《六十条》里的毛的格言所代替：“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③

刘少奇在第23条中对政府的作用作了唯一的实质性的说明，以便与党的部门区别开：政府部门要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批准新的规章制度。但在地方一级，主动权则赋予党的部门，只有党有权调查及废除旧的制度。其他条文还表明，从现在起党应该在管理经济方面起干预作用。也许最重要的是，第2条规定党委要抓14项工业工作。该条还说，这些工作项目将成为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基础。④ 其目的显然是要草拟一个工业发展的“四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第149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4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142页。

十条”纲要，和《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相匹配。假如这样一个纲要出笼的话，它本来会导致取代政府各部辛勤编制的五年计划。尽管此刻《六十条》已经根据上述计划起草出来。

虽然五年计划制度没有被抛开，但《六十条》中的第9条却播下了削弱周密计划（即统计制度）的种子。此前，中央当局已经习惯于制定单独一组需要各省一年完成的国家目标。在第9条中，毛介绍了一个生产计划3本帐的新制度。中央当局有两本帐：一本是必须完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希望完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须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①]事实上，这种双重计划制度并不限于中央和各省，它还往下推广到县级，因此又多了生产计划第四本帐。该制度的直接结果就是不断把目标提高。首先，当国家指标向乡村下达时，总是不断向上调整，然后，当接到来自基层的、乐观的预测时，中央当局再次将他们的指标提高，从而又产生层层加码的浪潮。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指标大跃进。[②]这种公布最低指标和对最高指标保密的制度在整个跃进过程中都坚持着——如同我们见到的那样，即使当公开的生产产量预测在人们看来似乎是非常乐观的时候，毛自己还秘密地制定甚至更加欣快的目标——这就直接导致了1959年的统计数字大失败。

大跃进的许多关键内容都规定在《六十条》中：高积累率（第16条）；大集体主义（第17条）；试验田（第18条）；广泛推广先进经验（第19—20条）；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办农场和工厂（第48—50条）；地方兴建化肥工厂和农具研究所（第52—53条）；推广高产良种（第54条）；鼓励种植薯类（第56条）。但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第143页。——译者注

② 李卓敏：《共产党中国的统计制度》，第72页。——原注

大跃进的两个最重要的产物：人民公社和土法炼钢却没有预料到。

由于"六十条"未提及上述两种产物，对于不知内情的人来说，《六十条》真正带来的巨大震动与大跃进毫无关系：在最后一条中，毛私下正式宣布他打算从现任的两个主席职位之一即国家主席职位上退下来。他解释说，专任党中央主席，可以集中更多时间做党的工作；同时这对他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这个建议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的首肯，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干部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这个建议现在准备向各级干部传达，征求他们的意见；对于那些不赞成这个建议的人，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毛仍可以出任国家主席职务的。①

我曾在本书第一卷中论证，毛从两个岗位之一退出的决定是他退居到他所称的政治局常委"第二线"的第一步。② 毛对近来苏联发生的争夺权力的斗争深为震惊，并把此事部分地归咎于斯大林的一些继承人，尤其是他选出的法定继承人马林科夫没有威望。为防止在中国发生同样的事件，毛希望使他的同事们靠自己的能力逐渐成长为可靠的国家领导人，这样在他百年之后，他们就有资格治理国家了。他提出要在他活着的时候逐渐移交统治权，让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第一线"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总理、陈云和邓小平——掌握越来越多的决定权。我认为人们经过深入地探讨后也会推断，毛精明地想先发制人地拿自己的地位与斯大林的地位加以比较。

毛的计划早在1956年就开始了。因此他宣布辞去国家首脑职务，并不意味着他对1957年整风运动越轨的情况做自我批评。然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第157—158页。——译者注

② 见本书第一卷第二部分。——译者注

而，有些干部可能对这方面进行推测，特别是在毛签署《六十条》之后不到两周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另一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中国共产党进攻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周恩来，也辞去了他的职务之一——外交部长。① 我将在后面考察周去职的意义，并说明在考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时毛是如何保护他的。

第四节　1958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8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分水岭，因为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大跃进的诺言的掩盖下，似乎仍致力于比较适度的经济指标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公开场合。两个主要的经济发言人财政部长李先念和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都对1956年至1957年间那个冬天他们各自部门的保守思想做了检讨。但李在赞扬他的新预算时所能说的也仅仅是它“是一个反对保守倾向的预算”。② 薄一波宣布的1958年农业产量指标也并不过分：粮食——1.96亿吨，比1957年提高5.9%；棉花——175万吨，比1957年提高6.7%；对这两个增长率，薄一波只能形容说“相当高”。1958年的工业指标也不是令人振奋的：钢——624.8万吨，比1957年提高19.2%，而1957年只比1956年提高17%；原煤——15072.4万吨，比1957年提高17.2%，而1957年只比1956年增长16.6%；电力——224.5亿千瓦/小时，比1957年提高18%，而1957年则比1956年提高14%。而且，大可预测，钢和发电量会有较高的增长率，这与其说是靠额外的努力，不如说是因为前一年新建成了许多工厂。

不过，在向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经济报告中的确

① 有关周恩来在整风运动中的作用，见本书第一卷有关部分。——原注

② 《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5号第3页。——译者注

出现了两个意义重大的数字：李先念宣布，1958年国家对农业的资助将大大增加，特别是国家对农业的支出（主要是基本建设）将比1957年提高40.78%。[①]大约1年后，毛论证说：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②]增加农业投入是执行这个政策的第一步。

另一个更重要的、影响1958年其余时间发展进程的事，是自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出有关指示后，中国在水利运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原来制定的1957年10月到1958年9月的灌溉计划面积为4390万亩。1957年10月，把灌溉面积增加到6180万亩，然后又增加到9200万亩。薄一波宣布，由于每天有1亿男女劳动力紧张劳动，结果最近的指标在4个月之内超额完成；[③]截止1958年1月31日，已灌溉了1.17亿亩农田。后来透露，由于1958年和1959年过分强调蓄水，结果造成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土地大面积增加了盐碱量，使农业遭受了严重损失。[④]但在1958年初，这个靠大规模利用有纪律的农民劳动大军来完成任务的有力实例表明，1958年的"大跃进"——周恩来在全国人大闭幕时公开提出的作为号召全国的口号[⑤]——能够以完全不同于

---

① 《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5号第7页。——译者注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0页。——译者注

③ 《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5号第12页。——译者注

④ 《人民的好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续编之三，第40—41页。原注

⑤ 《人民日报》1958年2月12日社论《掀起跃进的会议》。薄一波在周恩来逝世后透露说，"大跃进"的口号是由周总理提出的。当毛询问包括周在内的一群同事，这个词来自何处时，总理谦逊地保持沉默，而让其他人告诉主席。（《人民的好总理》第3期第33页。）但是，不清楚是周本人提出这个口号的，还是周采用了别人提出的口号……。——原注

1956年“跃进”的原则组织起来。在对此胸有成竹的情况下，毛再次开始了他的旅行。到了月初，当他到达四川参加成都会议时，他已准备扫除全力以赴的生产高潮的残余障碍。

第 三 章

成都会议

四川省省会成都位于一片广阔平原的中心，自古以来，这片平原就因纵横交错的灌溉系统而被称之为“陆上水乡”。城市的发展也带来了周围乡村的繁荣。半个世纪前，这座西南部的“北京城”中那“宽阔清洁的马路，金碧辉煌的招牌，以及无数的饭馆、酒店、药铺和摆满了珍贵的四川丝绸、外国商品的大商店”曾激起年轻朱德的无限想象。①

50年代后期，成都只有100多万人口。但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的省会和最重要的产粮地区之一的中心，成都在政治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这种政治上的重要性因下述情况而进一步增强了：四川人在中央委员会所占的比例很高，在政治局正式成员中，由四川代表朱德、邓小平、陈毅和刘伯承形成了以省份划分的第二个人数最多的圈子。②虽然成都实际上是由湖南人贺龙解放的，而分别担任

①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4月出版，第82页。——译者注

② 另一个为湖南，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个政治局最杰出的代表就出生在这里。——原注

共产党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的刘伯承、邓小平则在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四川的斗争中起了关键作用。这3位人物在共产党执政的初期继续留任并管辖着中国整个西南地区——四川、贵州和云南。邓小平和贺龙在离开四川后仍与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58年，四川的关键人物是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他系江西人，曾在贺龙和刘伯承的部队里工作过。四川解放后，他一直就在那里。有迹象表明，在1956—1957年间，李井泉并不是毛的"自由化"政策试验的支持者，但他显然对毛在1956年发起的"跃进"作出了较为积极的反应。就在《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颁布后，四川就制订了本省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①。李井泉似乎对1958年的"大跃进"给予同样积极的支持，尽管"文化大革命"中对此作了相反的描述。在成都会议上，毛赞扬李井泉在"生产高潮"中能够保持冷静。② 在四川访问期间，毛曾对城乡作了多次视察。3月28日，毛在会议结束后，由重庆乘船开始了为期3天的水上旅行，途经长江的几个峡谷到达武汉。陪同毛进行这次旅行的为李井泉、柯庆施以及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显然，要想在权力分散的情况下使跃进获得成功，省委第一书记的大力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于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省份召开"大跃进"前的党的重要会议以及毛对该省领导人表现出特别的偏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节　毛反对模仿俄国人

毛在成都会议上发表的3篇著名的讲话中，再次对束缚中国干部思想的枷锁发起进攻。其目的在于解放干部，使他们能够在

---

① 《四川日报》1957年12月5日。在《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改后，四川省也公布了本省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原注

② 毛泽东1958年3月20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60页。书中用"×××"表示的四川领导人，显然是指李井泉。——原注

即将开始的“大跃进”中大胆工作。他的抨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盲目照搬苏联模式；二是反对过分崇拜专家。毛在其3月10日发表的第一篇讲话里，对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直接进行了抨击：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①

毛简短地以中国革命中一段令人不快的历史提醒他的听众。这即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或受到其影响的教条主义者领导中国革命的时期。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和军事都受到来自苏联的恶劣影响。经济上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和计划工作领域，同时也反映在银行和统计工作方面。在商业、轻工业、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中国受苏联的影响则小些。这是由于党中央对这些领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控制。

毛解释说，苏联人之所以对我们造成这种占支配地位的影响，是“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②他回忆自己3年来是如何被迫禁食鸡蛋和鸡汤的，“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③甚至在教育方面，也不

---

①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59—160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61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61页。——译者注

考虑1949年以前解放区的经验，一味地照抄苏联的模式。① 毛应该补充一点，他的许多观点只是重复了前一年“资产阶级右派”提出的批评。

另一个问题是，虽然中国确有一些自己的经济专家，但他们的影响与苏联的经验是相抵触的。此外，他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② 不过，毛证实说：“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③

如果毛只是想削弱对苏联模式的过分依赖，他是完全可以提供一系列与鸡蛋和鸡汤的故事类似或比之更为严重的例子，以说明盲目照搬的危险。例如，周恩来就曾在几年前对外交事务上过于模仿苏联的情况，对外交部提出过警告。④ 但毛的警告更进了一步，他的讲话的大部分都是用来分析自1949年以来中苏政策的差异。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曾作过几点有趣的评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⑤ 毛对“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作了区分，正确的个人崇拜意味着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所提出的真理的崇拜，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则只是不加分析，盲目服从。毛指出：

“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61页。——译者注。毛泽东对模仿苏联教育经验的批评，后来被说成是针对刘少奇和陆定一的。见《十七年教育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教育革命》1967年5月6日)。——原注

②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62页。——译者注

④ 《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之三，第59页。——原注

⑤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62页。——译者注

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①

毛攻击赫鲁晓夫以突然诋毁斯大林的作法对中国施加压力。他虽然断定多数中共党员对此表示不满，但却又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有些人屈服于苏联的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② 这里，人们感觉到毛对他的一些同事，特别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利用非斯大林化来削弱自己的地位的作法大为愤怒。

毛关于赫鲁晓夫粗暴地搞非斯大林化的讲话表明，他对这一事件在中国的影响是极为敏感的。但实际上他只举一例反映解放后的中苏争端。毛提醒他的听众说：“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③ 他告诉他们，解放后不久，在他访问莫斯科期间，他和斯大林吵了两个月。他还承认，在互助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上，他作了重大让步：

> “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④

结果是，中国被迫存在了东北（前满洲）和新疆（中国的土耳其斯坦）这两块“殖民地”。只有中国人和俄国人可以住在那里。⑤ 当考虑指责刘少奇等人在1960年的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上与赫鲁晓夫“勾结”一事时，人们应该记住毛曾坦率地承认他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6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62页。

③④ 同上，第164页。

⑤ 同上。有关毛讲话中所说的“殖民地”，是指在1950年签订的关于在东北和新疆创办中苏联合股份公司、中苏联合管理中长铁路以及中苏联合使用由苏军管辖的大连（旅顺口）海军基地的共同协定。毛讲话中最有意义的材料是，他第一次透露俄国人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原注

在苏联压力面前被迫作出让步的事实。

尽管中苏签署了莫斯科条约，但斯大林仍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假的”。直到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他才改变了主意。毛暗示说，即使在这以后，斯大林还与高岗勾勾搭搭，高在斯大林去世的那年受到谴责。接着就是中苏双方在非斯大林化上的分歧。当毛于1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时，俄国人还在私下说这是“搞自由主义”，并拒绝接受毛关于在共产党国家内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存在矛盾的观点。①

人们在接受毛的追忆往事的嗜好时，很容易从他在成都会议上所讲的有关中苏关系的字里行间推断出这样的结论：毛认为让中共高级干部记住中苏关系中的某些事实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此时已预见到60年代发生的中苏论战了。毛只是根据过去两年来中苏关系的情况，感到今后的冲突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也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干部们应在精神上有所准备。毛的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作为这一步骤的一个部分，据说在成都会议结束后的几周内，中苏间的文化合作大大减少了。

但是，当务之急是把中国从苏联经济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毛说明这一步骤始于1956年4月他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谭震林（大跃进时期农业方面的主管人）在1958年底发表的一个讲话中谈到赫鲁晓夫1956年2月打破斯大林的神话，把人们从对苏联经济发展经验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这一点时，也间接地证实了这一点。这一解放进程随着毛1957年2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而继续下去。在这个讲话中，毛提出“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和控制生育”的建议。毛有关控制生育的论述——官方出版的文本中已将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65页。——译者注

此节删去——是引人注目的，因为这意味着毛对这一新政策表示支持，而正在兴起的"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特征，则是对中国拥有庞大人口的赞美。因为人口越多，生产就越多。就在3月份，毛似乎还在探索跃进的战略，但他对苏联模式的攻击表明，在周游3个月之后，他对赫鲁晓夫式的经济已失去兴趣。毛所到之处都深深感到，尽管他与赫鲁晓夫在经济发展方面有许多相同的看法，但中苏两国的经济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必须走自己的路。

第二节 毛指责专家

毛泽东抨击的第二个目标是专家，这对大跃进战略的形成是至关重大的。由于失去了对专家的尊敬，就为完全依靠群众性的劳动动员打下了基础。直到1月底，毛还在奉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就在成都会议上他还说，整风使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拥护中国共产党。4月，他在汉口还声称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要"冷一冷"。[①] 甚至到了7月，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彭真、陈毅、柯庆施——还被安排作工作，以便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新的政治气氛感到放心，在政府的领导下发挥自己的作用。作为回报，知识分子也向党"交心"，在新的一轮自我批评中暴露自己的思想。

尽管持续存在着这种对知识分子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但成都会议的主要意图与有效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是水火不相容的。在3月22日的成都会议最后一次讲话中，毛猛烈抨击了对"教授们"过分尊敬的行为：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

①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4月6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80页。——译者注

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①

毛指出，自古以来，世界上大多数有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孔子、耶稣、释迦牟尼、马丁·路德、马克思、达尔文、孙中山等——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都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闹革命时，也都是20多岁的青年人。〔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琪端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②

毛的意思就是，真理比知识、红比专更重要。他并没有说有真理或红本身就行了。作为一位居领导地位的受过教育的辩证法学家，毛始终能够抓住潜在或实际存在的矛盾的两个方面。但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真理”懂得不少，知识却很贫乏。由于受到毛的鼓励，所以他们在大跃进时期忽视专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成都会议对统计工作中教条主义的批评，损害了经济运转的监督机构——国家统计局的地位，并为此后3年荒唐的浮夸风铺平了道路。

毛提倡的一个贬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可行办法就是办刊物。他透露说，陈伯达近来正忙于向科学家们宣传：“厚今薄古”，并且转变了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的态度，同意当年就办一个党的理论性刊物。毛鼓励各省都办类似的刊物，具体的组织工作由各省自己去做。只是要求每年向中央刊物发稿6篇。毛具体提了一个问题，即“搞点民歌好不好？”③现在的“新诗”不成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74—17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77页。

③ 同上，第180页。

形，没有人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好的新诗，只能在民歌传统的基础上产生。毛提议：

> “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①

毛作为一个诗人，显然被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名义创作出来的诗歌吓坏了。但同时他又希望现代诗人不要效仿他去写古体诗。毛也企图击败那些在“百花齐放”时期拆他台的专业诗人和作家。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这一愿望在大跃进期间必然地实现了，在这个时期收集和创作的民歌有上千万首。

第三节　河南做出榜样

除了诗歌以外，毛并没有在成都会议上发动大跃进运动。两个月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则是大跃进的策源地。不过，毛在 3 月20日的成都会议上的讲话确定了大跃进的总路线的最后形式，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②他透露说，河南省已经制订了宏伟的规划，别的省都不得不加以效仿。

河南的规划是，保证《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主要目标在一年内完成：粮食产量要提高100%或更多，水利化，除四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80页。——译者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66页。“多快好省”是毛在1956年的跃进中就已认可的口号……“力争上游”，据毛说，是在1958年大跃进之前就已提出的。口号中只有“鼓足干劲”是专门为1958年的大跃进而提出来的……。——原注

害，消灭文盲。① 单从除四害的目标来说，就可看出河南的领导人特别是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他在20年代中期广州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是毛的学生。）对不断升温的大跃进表现出了何种程度的热情。仅在一个月之前，河南省发出的关于开展全民除四害的指示中，只提出了这样一项保证：河南省的5个市县将在1958年完成除四害任务。而现在，省委领导人则准备在100多个市、县中完成除四害的目标。河南省的全部提议都异想天开，显然不能实现，并将毛置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他不能指责河南领导人搞“急躁冒进”，因为那样将会有阻滞大跃进热情的危险，而这正是他所谴责过的那些计划部门的人曾犯过的错误，这种错误导致了1956年跃进的夭折。同时，他也不能将河南省的经验全部推荐给其他省的领导人。他指示说，不要登报，并告诫其他各省不要一阵风去制订河南那样的高指标。如果10年、8年完成《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不会开除党籍。毛已预见到，这样高的指标可能“缺点很大”，会使得群众“过分紧张”。② 他说：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③

毛的这番告诫性的话显然起了作用。河南的计划意味着要在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66页。——原注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67页。

1958年实现粮食产量增长100%的目标。但成都会议制订的基准目标则是增长10—20%，而将增长18—27%的提议明显地看作为“左倾”。可是3个月后，这后一种提议开始被视为不左不右，甚至是“右倾”。此外，毛虽然公开告诫要谨慎行事，但他却又建议在秋收后对各省的粮食增产情况进行评比，这明显地鼓励了各省的第一书记之间展开紧张激烈的竞争。

第四节 农业机械化问题

即便成都会议之后人们对会议提出的指标的可行性仍有怀疑，但有关大幅度提高农业产量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且在会上明显地讨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问题。其中关键性的话题是农业机械化，并就此制订了题为《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的文件，随后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①由于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毛和他的一些同事之间的不和，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对这一问题的背景作一概述。

按一位学者的说法，从15到20世纪之间，中国的农业工具技术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在20世纪的华北平原上，人们使用的大部分工具早在北魏时期（公元5世纪）甚至更早的汉代（公元3世纪灭亡）就已普遍使用了。”②这种技术上的停滞不前，不能归因于农民的保守思想。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没有内燃机和发电机，因而使得农业工具技术的发展停步不前。

中国共产党人掌权后曾天真地认为，机械化是值得搞的，因为苏联和美国都已广泛实行机械化了。毛和刘少奇之间唯一的分

① 《彻底清算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同伙破坏农业机械化的滔天罪行》，《农业机械技术》1967年8月第5期。——原注

② 德怀特·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芝加哥：奥尔丁公司，1969年出版，第59—60页。——原注

歧在于，机械化是否要象苏联那样优先于农业集体化的发展。刘赞成苏联的模式；毛则持相反意见，并以1955年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功事实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毛并不是藐视机械化，相反，他对此是重视的。他在1955年7月31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

> "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①

显然，毛这里也犯了马克思的一个基本错误，即认为农业生产率与生产规模之间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因此，他强调了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但在50年代中期，一些中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中苏两国在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生产要素上有着很大的差别。1956年，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明确指出："中国农村拥有如此巨大的人力资源和如此复杂的耕作制度，因此推行农业机械化是不可能的……如果搞机械化，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就会非常突出，以致难以解决。"②

1957年春，一份看来经过实际调查研究而形成的报告被呈送给毛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报告认为：

> "从任何一个国家的情况来看，发展农业机械化通常是劳动力短缺的结果。农业机械化的重要作用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就每一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来看，它的作用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1—182页。——译者注

② 作者原引自国外出版的《中国大陆杂志选》；未查到中文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不大的……因此，鉴于我国有着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农业机械化政策的正确与否就成为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①

农业部长廖鲁言表明了同样的看法。

虽然上述观点表面上看来令人信服，但它还是有缺陷的。在农忙季节，劳力不足是普遍的现象，毛不会忘记这个当年在农村家乡时就已存在的事实。而且，中国共产党在《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倡采用复种的方法来增加产量之后，从1956年开始鼓励农民推行这种耕作制度，这样就进一步造成了劳动力供应的紧张。1955年，毛曾模棱两可地表示，他相信农业机械化不会使数百万的农民失业。但面对那些在农业机械化问题上持消极态度的人所提出的观点，毛也许觉得有必要委托一个坚决支持机械化的人——康生为他作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毛的论点以及他本人威望的影响，看来导致了双方的妥协。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在1957年底曾撰文指出，外国的农业机械常常不适用于中国的农业地形，而且总是耗费珍贵的汽油。但他批评了那种认为提高单产的目标与机械化有直接矛盾的“偏见”。他补充说：

“近来，我们组织了一批干部和技术人员去农村进行土地考察。我们还和农业部、水利部的同志进行了交谈。我们开始认识到农村的真实情况，它与我们所想象的大不一样。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指示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清楚的理解，同时我们认识到自己原先的想法是错误的。”②

---

① 这份报告是在1957年3月12日呈送中央的。引文出自《中国大陆杂志选》第633号第10页。——原注

② 赵冈：《共产党中国的农业生产》第96页。黄敬于1958年去世，据说他是毛泽东妻子江青的前夫……。——原注

在这篇文章以及在1958年早些时候所写的另一篇文章中，黄敬说，他已清楚地认识到机械化能够帮助解决复种和农忙季节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成都会议制订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的文件体现了这样的妥协意见：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是改善农业工具。毛在成都会议上讲话时就这个问题指出：

> "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全机械化。"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成都大会制订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的文件完全赞成毛的这一指示。值得指出的是，毛的这个指示并不想在农业机械化方面搞跃进。仅有的一项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具体命令，出现在毛于8月发出的一指示中，毛要求讨论哪些农具可以安装滚珠轴承。"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表的一篇实际上拥护毛关于机械化问题的思想的文章曾透露说，1962年9月和1966年2月，这位主席曾发出号召，要在25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假如在这3年半的时间内没有使毛改变他的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的时间长度的话，人们就不难推断，毛在规划中所提的25年只不过是一种不很严格的估计罢了。

在成都会议上，毛没有就农业机械化问题作任何较为具体的论述，人们一定会猜想，后来被说成是毛的农业机械化战略思想的其他要点，包括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负责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管理，分散由地方工业研制农业机械等，仅仅体现在这次大会所制

---

①《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65页。——译者注

订的有关农业机械化的文件中。

关于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掌管农业机械化的可行性，明显是在1956年夏天由康生调查研究后提出来的。在这一年，拖拉机的使用数量几乎上升了150%。但当年全国仅有大约11%的拖拉机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有，近37%为国营农场所有，仿效苏联模式建立的农机站，则拥有50%多的拖拉机。对于斯大林来说，苏联的拖拉机站一直是确保党控制农民和向国家上交公粮的关键性因素。①但康生可能并不象"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所暗示的那样，敢于打破苏联模式，要求大胆改革。很有可能是，当康生1956年春访问东欧时，苏联领导层中已就拖拉机站的作用问题秘密地展开了一场辩论。

康生的调查研究促使黑龙江和北京于1957年开始了有关农业机械管理上的试验。邻近北京的南苑农机站把它的机械转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管理，但仍保留所有权（国家所有，合作社管理），而黑龙江省的百泉农机站则将它的农业机械全部转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所有和管理）。1958年1月，即赫鲁晓夫宣布将取消拖拉机站的那一月，中国的农业部召开了全国农机站站长会议，会上批准了有关农机站试验的报告。刘少奇也赞同这项政策，显然是因为他也感到拖拉机站经济上划不来。但中国的做法远比苏联的谨慎。该报告重申，"目前，我国的国有拖拉机站依然是农业机械化的主要形式"，并反对拖拉机站放弃控制，推卸包袱的倾向。3月，成都会议提出"农业合作社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农业机械化。"② 5月，当国务院第7办公室（监督农业部及其有关部的机构）在谈到1月份召开的农机站站长会议的报告时指出"把农业机械置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辖之下，

① 施瓦茨：《斯大林后的苏联经济》，第115—116页。——原注

② 《中国大陆杂志选》第600号第3页。——原注

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①但是，第7办公室的谈话叫人难以捉摸，因为它一方面要求农业部就农业机械移交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并上报，另一方面又同意农业部有关1月农机站站长会议的情况报告。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该报告强调继续发挥农机站的作用。所以，尽管在1958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后为人民公社）拥有的拖拉机数量增长了7倍，但这显然是由于将大幅度进口的拖拉机转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所造成的，因为在同年农机站所拥有的拖拉机数量下降不到10%。这与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联到1958年底，已将拖拉机站的“大部分”机器移交给了集体农庄。赫鲁晓夫远比中国人敢干。

中国人在成都会议上作出的由地方工业制造农具和农业机械的决定，其用词也是比较谨慎的。决定说：

> “农业机械的制造（包括机引农具、新式畜力农具和改良农具），除了大型的和技术要求较高的农业机械以外，一般的应该以地方工业为主。由各个地方或者经过各个协作区，根据当地的条件和需要，自行安排；中央有关部门在技术和经验交流方面予以帮助。对于地方工业基础较差的地方，在协作区内省间调剂仍然不能解决的，中央有关部门应当组织调剂。”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当人们考虑到去年苏联的赫鲁晓夫已决定对几十年来由斯大林建立的庞大经济结构进行彻底地分权时，中国人在农业机械生产方面的这些措施——“文化大革命”中回顾这段历史时曾对此大肆吹捧——比较起来却显得犹豫不决。

---

① 《中国大陆杂志摘要》第147号第16页。——原注

②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1958—1981），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7页。——译者注

对于新的农业机械化政策的另外两个方面（研究农业机械；使用双轮双铧犁），毛也亲自出面来抓。1958年1月，他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应建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以及中、小型机械农具。① 精明的毛并没有建议由省一级来完成研制先进农业机器的任务。在同一个月里，毛还带头为一种在1956年跃进时被视为蠢货的双轮双铧犁恢复名誉。他视察了浙江农业研究所，1月2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他正在观看如何使用双轮双铧犁的照片。耐人寻味的是，照片上的田地属于南方某省，而正是该省在1956年曾证明双轮双铧犁难于在泥浆地里使用。3天后，该省省报发表了一篇赞美这种犁的社论。② 2月底，可能也是在浙江举行了一个会议，交流南方使用双轮双铧犁的经验。农业部长廖鲁言在会上讲了话。据说在一年前，廖鲁言曾批评有人把双轮双铧犁的作用夸大，他认为这种犁实际上如同是“猪鼻子里插葱——装象”。

廖鲁言的这种观点并不像后来断言的那样是反毛的，因为就在1957年10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农业纲要四十条〔即《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译者〕里头有一个600万双铧犁，是“主观主义的”，我们现在把它去掉了。③ 但不管怎么说，廖鲁言在1958年2月已考虑为这种他曾反对过的双轮双铧犁恢复名誉。很有可能毛坚持要把这一行动作为给1956年的跃进恢复名誉的一个象征。据说，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在研究问题时必须注意搞清思想，因为有些事情的性质是思想问题。曾经被看

---

① 《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第157页。——译者注

② 《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论推广双轮双铧犁》，《浙江日报》社论，1958年1月31日。——译者注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42页。在毛的讲话正式出版时，这句话被删去了。——原注

成是废弃物而堆积如山的双轮双铧犁，此时又供不应求了，这就是一个思想问题。

另一种可能是，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农业战线要开始一个大的冲锋，国家就不能丢掉1957年以来积压在仓库的80万个双轮双铧犁。①特别正如几个部在3月10日的联合指示②里所说的那样，如果对这些农具加以改进，它们甚至可以在水田里使用。但是，虽有许多领导人准备推动这种犁的使用，但反对的人也为数不少。在1956年1月提出的《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曾提到了这种犁，但提交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讨论的《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正草案却没有提到它。有材料表明，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讨论通过的《纲要》第2次修正草案，仍没有提及有关双轮双铧犁的事。

尽管毛和他的高级同事对待农业机械化问题就象对待生产指标那样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但成都会议的气氛却并没有限制那些参加会议的省级领导人的意思。③毛泽东通过批判苏联经济模式和资产阶级专家，冲破了稳重的经济政策所依据的这两个重要因素。同时，通过在成都会议上再次批评周恩来和陈云，毛削弱了坚持稳健经济政策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的影响。此外，毛甚至还通过提出允许反对他的意见存在而缓和了他过去曾发出的严厉警告。

---

① 《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4月16日。——译者注

② 指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商业部、农业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协作，作好1958年农具工作的指示。——译者注

③ 并不是所有的中央和省的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见《人民日报》1959年8月29日社论。——原注

第四章

“大跃进”的发动

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标志着自刘少奇公开发出在15年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号召开始，历时5个月的动员工作已接近完成。在这一时期，毛及其同僚们视察各地，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发表指示。现在，发动大跃进的时机已趋于成熟，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郑重宣告了大跃进运动的开始。

1958年的党代表大会，表明了毛、刘在中国发展政策上的高度一致。他们都积极投身于动员5亿农民群众，全面推动经济跃进的工作中去。刘是公开地进行，毛则是秘密进行。然而，即使在他们的联盟最为巩固的时候，仍然明显地暴露出两人在思想上存在的分歧。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最终走向分裂的原因。

第一节　刘：有组织地动员群众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

作了主要报告。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因为在18个月前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他也充当了同样的角色。但是，鉴于1958年的情况，刘充当的这个角色有着更重要的政治意义。

尽管刘少奇1956年的报告揭示出他与毛之间的重要分歧，但该报告基本上是一个反映革命和统治11年的情况并对未来前景给予展望的报告。与此相反，刘少奇1958年的报告则专门是为了发起一场新的运动。将这次运动与1957年的整风运动加以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在整风运动时，毛不得不唱主角，他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在两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主要讲话。刘显然既没有在这两次会议上讲话，也没有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而毛却在后一个会议上发表了另一篇重要的讲话。刘仅限于向省级党的机构发表讲话，而且这些讲话的内容多少有点不同于毛的路线。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并不完全赞同整风运动。

现在，刘成了毛的支持者。于是，大跃进运动就可以在党的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场合公开发动，而不像整风运动那样在国务会议这样一个较为逊色的场合秘密发动。① 这次，毛确信将不会出现去年的情况了，他将得到绝大多数党的高、中级干部对他的政策的支持。② 尽管毛喜欢直接地将自己的主张下达于基层，然而他也会乐于“通过正当途径”来推行自己的主张。

此外，刘在阐述大会通过的政策时，体现了对毛的新态度，这与他在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的报告的调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1956年的报告中，刘只在几处提到毛，并且意图似乎在于贬低这位主席的作用。而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刘提到

① 整风运动是自1957年4月30日的最高国务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未公开报道。毛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至今仍所知甚少……。——原注

② 关于1957年各省党的官员抵制毛发动的整风运动的情况，见本书第1卷第16章。——原注

毛时又回到了他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那种颂扬的调子。在回顾过去3年的工作时，他赞扬了毛的各项政策的创造性。当然，刘谨慎地区分了曾得到和没有得到党中央正式支持的政策。他尤其赞扬了毛以更快的速度推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主张，其中包括：毛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序言，他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口号，《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篇讲话的基本内容是由刘少奇的报告首次公开的）等。在综述他对这几方面所作的说明时，刘说：“由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方针和各项政策，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巨大的作用。”① 在论述经济建设速度问题时，刘宣称，从1949年以来，党中央和毛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历来的主张同样是很明确的，即应该采取快些好些的方法，拒绝慢些差些的方法。”②

根据刘的说法，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胜利，导致了一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革命运动”的到来，而毛关于加快经济发展的号召已“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③

结果，大跃进运动于1958年春天在各条战线展开了。在1958年的头4个月里，工业总产值与1957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6%，4月份增长了42%。据估算，1958年钢产量将达到710万吨，煤产量将达到1.8亿吨。增长率远远高于原计划规定的指标，而且将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何一年。在农业方面，最突出的跃进是兴修水利运动，证明了人民群众“征服自然界的威力。”④

在简述了其他领域内的巨大进步之后，刘以下面这段表述大跃进精神的话作了总结：

---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1号第6页。——译者注

②③④ 同上。

"事情是这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人们精神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人们精神的解放，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跃进；这种生产力的跃进，又继续刺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进和人们思想的前进。人们在不断地改造自然界的斗争中，不断地改造社会和改造人们自己。

马克思预言过，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如果说我们过去在革命中经历过这样的伟大时期，那末，我们现在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不又是在经历着这样的伟大时期吗？在这里，人们看见了：勇敢勤劳的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怎样涌现出自己创造历史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①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刘少奇设想的大跃进将是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干劲相结合的产物。在另一段话中，刘强调了经济建设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

"要知道，机器是要人来创造和发动的，物质资料生产是要经过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事在人为，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伟大的动力。"②

毛本人恐怕也不会比这表白得更好了。

然而，比较一下两人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就可以看出，在进行大跃进的方式方法上，毛、刘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异。只不过这个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被他们之间的相同点——都相信人比机器更重要——掩盖了。

---

① 《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1号第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0页。

就刘少奇来说，发挥和组织群众的干劲是大跃进的基础。党的领导是大跃进的关键，刘在报告中的确有一整段话是专门谈这个问题的。① 在其他地方，他还讲到必须"动员"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大军，讲到"组织"中国革命农民以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甚至在强调敢想敢说敢做的革新创造者时，他仍然说，只有依靠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第二节 毛：解放群众的能量

虽然毛并不否认党的领导的必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5篇著名讲话中都没有提及党的领导问题。除了这一否定性的证据外，我们还可从他的讲话中找到明显的暗示，在他看来，大跃进的基础是解放群众的能量，而不是组织群众的能量。在5月8日第一次向大会发表的讲话中，毛说了一段极为重要的话：

> "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③（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在他5月17日的第二次讲话和5月20日的第三次讲话中，毛批判了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他问道，如果干部决定一切，那么"群众呢？"④ 在5月23日大会最后一天的第四次讲

① 《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1号第10—11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1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92页。——原注

④ 同上，第204页。

话中，毛更为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头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我们。首先是理论来自于实践，然后理论来指导实践。”①

在另一段揭露性的论述中，毛讨论了一位与会代表的建议。这位代表说，跟着毛主席走，就不会犯错误。毛说：

> “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这段话确实反映了毛比较谦虚的姿态。但其中丝毫看不到对刘所赞同的正统观念——是党而不是任何个人掌握真理！——的暗示。

还有明显的一点，在成都会议和此次党的代表会议上，毛都极力鼓动干部们破除“迷信”，极力说服他们只要敢想、敢说、敢干，就可以干成任何事情，毛所引证的几乎全是有关个人成就的先例。这一切很容易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把成功的大跃进看作是6亿中国人同心同力努力的产物，而不是共产党努力的产物。

当然，如果有人在会议期间向毛挑战，他会毫无疑问地表明对党的领导作用的信念；他会引证自己多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③。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18—219页。——原注

② 同上，第206页。

③ 参考毛泽东1949年的论述：“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如果没有一个革命党……。”——原注

然而尽管毛明显地意识到党动员和组织中国人的能力，但上面的引文无疑表明，这位主席把大跃进设想为一个觉悟分子的能量爆发，而不是群众动员的极端例子。

显然，一个起解放群众的能量的作用而不是领导作用的党，归根到底不是不可替代的。但毛直到10年以后才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此时，他与刘的分歧只是哲学意义上的，是不公开的，也许两人谁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因为两人都有这样的意愿：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大跃进中起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毛泽东保护经济计划制订者

毛和刘大概比较清楚他们在对待大跃进的反对者上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即使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这种分歧已引起严重的摩擦。

早在1957年11月，即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同意恢复1956年的高潮政策之后，刘就提出并发挥了毛在全会上特别论述的实现经济政策的两种方法，但他强调说，这两种方法代表了两部分人之间的分歧：

> "实现这个任务〔经济建设——作者注〕，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使事情做得快一些、好一些，另一种方法是使事情做得慢一些、差一些。我们应当采取哪一种方法呢？党中央认为应当采取前一种方法，拒绝后一种方法……两年来的事实，证明了有些人笼统地怀疑和反对这个口号的结果，是妨碍事业发展的，是损害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各方面潜在力量的发挥的，这样就不但不能够多快，而且也不能够好省，反而要造成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更大浪费。"①

① 《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7年11月7日。——译者注

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刘再次谈到了这个问题，这次他赞同毛关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方法的观点。他详细引用了毛两年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序言。在这个序言中，毛批评了那些反对高速发展经济的右倾保守思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刘较深入地论述了毛在前两年中有关加速经济发展的各项建议，并完全赞同这些建议。在结束这段话时，刘谈及了那些怀疑大跃进方针的人：

> “曾经对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表示怀疑的同志，许多人已经从这样一次反复中得到了教训；有些人却还没有得到教训，他们说：‘到秋后再同你们算帐。’让他们等着算帐吧，他们总是要输的。”①

这里提到秋后是不难领悟的，因为秋后收成的好坏将表明农业方面的跃进是否取得了成功。显然，大跃进政策的反对者曾预料这样做会把农业搞乱，导致粮食收成减少。

刘对这场争论的系统而详细的论述，无疑使人们对他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的基本分歧有一个印象。② 刘的目的可能是利用他与主席的联盟，以削弱国务院那些可能对党在大跃进中的领导作用发出挑战的人的地位，并加强他的地位。

毛在讲话中也提到了“秋后算帐派”，但他又加了“观潮派”的范畴，即那种对大跃进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但当“帐”算完后就站到赢者一方的骑墙派。而且，当刘预先下赌注将战胜“秋后算帐派”时，毛却认为要对他们进行斗争，但“目的是要团结，不是不叫革命”。③

---

① 《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1号第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7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05页。——原注

毛的态度同邓小平在成都会议上的态度一样，似乎自始至终反对那种认为加速经济发展是错误的观点，毛曾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所写的序言中，将这种错误观点称之为“右派保守思想”。但这并不是政治路线上的根本错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路线上的不同将会引起严重的党内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它被称之为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缩小了“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的错误的严重性，认为这些人正如10个指头，9个指头是光明的，但有一个指头是阴暗面。只要通过反复说明国内经济发展的成就就可以把他们争取过来。

毛所处的困境在于：他希望压制政府部门中那些反对大跃进的潜在势力，同时又希望保护政府官员中的政治领导人物，这类人中包括毛的一些最年长的、最忠诚的朋友。在1956年，反对那年跃进政策的人中曾包括周恩来总理，第一副总理陈云、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财政部是毛重点批评的对象）、副总理兼国务院农业办公室主任邓子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

到1958年时，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看到，他们不可能再抵制新的跃进了。周恩来作为1956年反冒进的主要责任人，已作了自我批评。李富春和李先念在八大二次会议之后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薄一波作为刘的长期盟友，从周恩来那儿接过了经济政策的决策权，他应该是大跃进政策的支持者。如果上述人中有“算帐派”或“观潮派”的话，那最有可能的人选就是邓子恢，他如同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那样，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没有在这次的大跃进中有效地管辖农业战线。另一位可能是陈云，从他过去的行为判断，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选登了一张政治局常委们的照片，但其中没有陈云。

然而对毛来说，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没有谁（也许薄

一波除外）会因政策上的不一致而与他发生重大的政治上的对抗。鉴于他在大跃进中的同盟者刘少奇去年曾透露说，他和他的盟友（如彭真）准备采取在整风运动的争论中所采取的方式来对待大跃进运动，毛不会轻易地抛弃他的那些比较忠诚的支持者，也不会允许他所依赖的同盟者最后成为那种与他个人关系不密切或不大信赖他的人。因此，当刘暗示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意味着"路线"上的分歧时——没有毛的支持，他不可能这样明确说的——毛却竭力降低分歧的严重性。（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支持毛的做法，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抨击了他的态度！①）

最意味深长的是，毛极尽努力地替周恩来辩护，赞扬他在1957年6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反右讲话，并明确暗示周是在放弃了反对跃进政策的态度之后作这个讲话的。②毛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要向人们证明，在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周可能在这次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之前，周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而不致使这位总理在党的会议上作为一个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失败的一方的领袖形象出现。但另一方面，甚至在毛已承认八届三中全会是公开转变政策的一个场合的情况下，刘却从未提到他本人的观点在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有任何变化。

毛还以党内会出现分裂的危险性为由阻止对周以及他的同事的批判。在八大二次会议的两次讲话中，他把党内分裂看作是同世界大战一样的大灾难。他指出：

> "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高岗那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就会出现不平衡，虽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中央委员更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要跌跟斗……凡不顾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

① 《进军报》1967年3月26日第4版。——原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01页。——译者注

结果？”①

“防止可能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②

第四节　党维护自身对政府的领导

如果说毛能够保护国务院的领导成员的话，那么对于他们领导下的官僚机构，毛则不想给予维护。在南宁会议上，他抨击了财政部。这表明他认为中央政府机构是保守力量，必须促使其服从于更为激进的党的领导。自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来，毛一直提倡分权，希望以此作为他达到上述主张的手段。经过某些方面的推动和历时18个月的酝酿之后，国务院终于在1957年11月制订了一项法令，决定将工业、商业和财政方面的很大部分权力下放给省一级机关，实际上即下放给省委。后来在税收、价格管理、粮食管理、计划和物资分配管理领域经过仔细的修改而增补的3个主要法令，促使中央政府到1959年6月时已将80%的企业移交给地方管理。扩大省级权限的一个成效就是“省和省属机构管辖的企业所创造的工业总产值比例，从1957年的54%上升到1958年的73%左右”，③而在财政方面，1958年中央政府的开支下降了14%，省里的开支增加了几乎150%，占去了整个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

据最近的材料透露，当时曾规定，在3年之内，地方财政分成不超过30亿至36亿元，外汇分成不超过4500万到5000万美元。这看来证实了早先所作的分析，表明不为毛喜欢的财政部尽管表

---

①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08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14页。

③ N.R.拉迪：《中国财政管理的集权和分权》，《中国季刊》1975年1—3月号，第29页。——译者注

面上大规模地进行权力下放，但它却保住了自己以前的影响。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制订权力下放计划的陈云（在财政方面得到李先念的帮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被指责为歪曲毛的思想，搞形“左”实右，其理由是他推行新的财政体制，使国家丧失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他不得不在一年后进行改变。②事实上，陈云在1957年9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权力下放措施实行一年后，将总结经验，进行修改。他预见到权力下放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因此在全会上提出必须相应地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总之，虽然国务院和各部委确实失去了许多职权，而且部委的数量由1957年的41个减少到1958年的33个，1959年进一步减到30个。但中央对经济的整个监督工作并没有放弃。其意图似乎在于将这种监督权转交给与地方党的委员会有紧密联系的中央书记处，使其处于核心地位，起到监督作用。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书记处的这一突出任务被体现了出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和财政部长李先念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大概就是使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党的组织来从事经济领导工作。全面负责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从苏联进口工业设备工作的陈云未被选入书记处③：因为他比总书记邓小平的级别高，如果选入书记处的话，那将带来排名问题。同时，在书记处排名第四的谭震林（他自从去年秋天以来，一直在农业政策上起主要作用），成了政治局正式委员。谭的提升使他的地位高于副总理邓子恢，并使他在大跃进时期名正言顺地扮演农业总管的角色。

---

① 这个数字见陈云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59页。——原注

②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对陈云的指责，见《北京公社》1967年1月28日，第2页。——原注

③ 《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之三第32页。——原注

这些变动不仅使书记处在经济方面起核心作用，而且还提高了它在整个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过去，它只有两位书记——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①]——进入政治局。现在，9位书记中有5位成为政治局委员，即邓、彭、李富春、李先念和谭震林。

然而，中共中央书记处与此时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共中央书记处有着重要的区别。赫鲁晓夫曾把他自己的支持者安排进书记处，并且当他在1957年夏粉碎“反党集团”后，就直接将书记处成员提升进主席团，代替那些他已清洗掉的成员。而在邓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内，5个政治局成员的政治背景是如此的各不相同，所以不可能设想这个机构会迅速地变成为邓小平领导下的一个“政治上团结一致的严密组织”。邓与谭都与毛有直接联系。彭真与刘少奇的关系最为亲密。李富春和李先念尽管在邓小平手下兼了新职，但他们可能仍忠于周总理。此外，周谨慎地列席书记处会议，大概就是为了亲自监督书记处的活动。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处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大可能取得支配地位，但是，有许多迹象表明，党的这个机构在1958年却显示了新的、强有力的作用。在1957年底以前，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联合颁布的法令一直是比较少的，1955年，两方共同颁布的法令为1个，1956年为4个，1957年为7个。在1958年，这个数字跃升到17个，内容主要涉及到农业和商业。随着国务院再次取得它在经济指导中的权威地位，两方共同颁布的法令就迅速减少了。1959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2个，接着在1960年急剧下降到5个，1961年为零，1962年为2个，1963年为零。[②]

1958年政府机构的作用降低的另一个迹象是，国务院全体会

① 很有可能彭真实际上是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原注

② 张王山（音译）：《共产党中国的国务院：结构和功能分析》，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第57页。——原注

议的次数减少了。1957年，国务院曾召开全体会议26次，1958年却只有16次。到1959年，这个数字下降到9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次数也下降了，从1957年的37次降到1958年的13次。这些数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跃进时期实行的那种互不一致的"游击式"领导。党的高级官员们花费很多的时间视察全国，在现场给予劝勉和指导。因此，他们很少有时间和兴趣返回首都举行正式的会议，然后将会议的指示按步就班地层层传达下去。

在八大二次会议之后的五中全会上，另有两人得到了提升，这进一步提供了权力下放后党组织的作用得到加强的证据。提升的两人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邓小平过去在四川任职时的副手李井泉，他们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这突出说明了省级党委的重要性。很有可能，这两个省级领导人被选中，大部分原因是他们所管辖的地区比较重要：上海是中央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占中央政府经费的17.6%，1958年上升到33.2%；四川是全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也是一个最为富饶的产粮区之一。就柯庆施来说，毛的干预也许是必要的，而且看来也是可能的，因为他在1957年对毛的整风政策的支持使他疏远了许多同事。在八届五中全会结束后登载的一张不同寻常的照片中，柯庆施、李井泉和另一位省委第一书记——内蒙古的乌兰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坐在一起，这更加突出了他们两人提升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说大跃进是省级党的干部的权力达到高潮的标志；那么，全会对几个月来工作出现失误的干部的惩罚则也是对他们的警告。在这次会议上，审议并决定撤销了11个省的高级领导人。其中大部分人除别的一些问题外，主要被指控在农村中执行保守政策，是大跃进的拥护者所厌恶的人物。毛本人似乎曾认为，这些干部被撤职实际上仅仅是省内权力斗争达到高峰的反

映。[1]但由于这一切显然是他10个月前在青岛会议上批判党内右派干部的结果，所以他很难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到全会举行时，毛事实上已接受了这个决定，并指责那些清洗的牺牲品为分裂分子。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以温和的手段对待这些不幸者。

第五节　党维护自身对人民解放军的领导

如果说八大二次会议以及在这之后的八届五中全会证明了党的组织对政府机构的监督权的加强，那么，紧接着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召开的历时 2 个月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则意味着党对军队的领导权的加强。更具体地说，军委会议标志着毛为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抛弃苏联模式，恢复其延安游击传统而进行的斗争已经拉开了序幕。

毛在争取赫鲁晓夫给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领域的援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他的上述目标的实现应该说是容易多了。早在两年前，毛就承诺中国将拥有核武器，基于这一承诺，他的绝大部分同事都同意他的主张，即削减现代常规武器方面的国防费用，以支援经济建设。毛的承诺似乎能由于苏联的援助而很快得以实现，将领们提出的常规武器方面的任何要求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结果，过去曾主张中国应大力使常规力量现代化，而在核武器方面靠苏联的彭德怀，到1958年初时也不得不承认毛在这方面的胜利。在 1 月22日的一个讲话中，彭赞同毛关于“我军的

---

① 毛在成都会议上的一个讲话中，当谈到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时说，浙江的权力之争已结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战胜了省长沙文汉，毛反问道：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这样的说法显然不利于胜利者江华。但毛又说，另外 7 个省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除两个省外，其他 5 省的结果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得到证实。——原注

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上”的立场，① 因此也就含蓄地放弃了通过全部从苏联购置武器来便捷地实现军事现代化的任何希望。

代之而来的行动是，彭似乎已决定致力于抵制任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加强政治工作，并进而对其加以控制的企图。1月份，一个带有和解味道的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大纲颁布了。一方面，今后训练的目标应该是“继续提高现代军事技术，学会在原子、化学、导弹等现代条件及其他复杂情况下的诸兵种合同作战，以便随时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

但另一方面，在训练的基本任务中，“把提高全体人员的政治觉悟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列为首要的两项。”② 同时还要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这就是说，延安经验仍是适用的，不应偏爱苏联现代战争的理论而将其摒弃。这些让步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个训练大纲好像再也没有提到过。

2月22日，彭德怀在苏联红军建军40周年之际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通过阐述苏联红军正确处理3个重要关系——军队与党的关系，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军官与士兵的关系——的经验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使之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做法，既为向苏联人学习进行辩护，又为解放军在政治工作方面存在的不足开脱。彭的另一个调和式的姿态是，他劝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使用整风方法来进一步改善军队与党之间、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关系，而在去年的整风运动中他却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过，他显然没有强调必须学习毛的军事著作。

从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个讲话也没有实现它的明显的目

---

① 《把我军建设成为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在总后勤部召集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608页。——译者注

② 《解放军报》1958年1月16日。——译者注

的。不过，这个讲话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提一下。在讨论国防战略问题时，彭德怀元帅对与会者说，用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势力就在中国的大门口，同时我们必须解放台湾，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苏两国军队必须联合起来，保卫远东和世界的和平。第二天，《人民日报》社论空洞而乏味地讲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套话，大意是中苏两国的人民和军队必须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以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和平。①彭是不是在就中苏共同防御安排试探一下反应？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主意是不是彭访问莫斯科期间马利诺夫斯基向他建议的？我们将会看到俄国人在1958年下半年正式提出了某些共同防御安排，而毛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如果中国国防部长打算支持苏联的建议，这肯定会加深他与党的主席之间的不和。

毛无疑清楚，他力图加强对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控制的做法将会遇到抵制，因为除了工作上的原因外，他与彭德怀个人之间近年来越来越疏远了。

因此，毛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提升了一位彭德怀潜在的对手——林彪元帅，让他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林彪的晋升是八届五中全会最为重要的人事变动。这位相对来说比较年轻（51岁）但通常很少露面，大概有病的元帅就这样成了中国7位最高领导人之一。林彪的政治地位自1954年以来逐渐加强，现在已明显突出于彭德怀之上。林、彭之间长期存在的嫌隙尽管不很明显，但中国领导人对此大概是知道的。②虽然毛并未预料到大跃进会遇到挫折以及彭德怀会对此大作文章，但似乎很有可能他已准备将自己的助手林彪置于能左右国防部长的位置上。

① 社论题名为《英雄的苏联军队是世界和平的支柱》——译者注

② 在一篇与周恩来谈话的报道中，周证实了彭德怀和林彪之间的不和。见《美国的对外关系，1949年》第3卷第359页。——原注

维护这种控制权的唯一可行的组织方式是通过中央军委。自1935年以来，毛一直是这个机构的最高负责人。自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央军委显然已不大起作用了，这可能是因为毛忙于新政权的建立而无暇顾及。看来在彭德怀从朝鲜战争中返回并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中央军委的工作实际上由他负责，在该机构中他可能担任副主席。但是，尽管他以及他的来自总参谋部的部下也许能够控制中央军委，可据说彭却十分反感党对军队进行监督的主张，他宁愿看到中央军委被撤销或被一个权威不高、不直接对中央负责的机构代替。林彪的提升意味着中央军委将会出现一个政治地位比彭德怀高、具有必要的不亚于彭德怀的革命声望和专业知识、并有时间从事于人民解放军的日常事务——对此毛既没有时间，同时也不愿去干——的副主席。

不过，看来毛并没有采取什么引人注意的措施使林彪从彭德怀那里接过对中央军委的领导权。①而是代之以别的方式。从5月27日到7月22日，毛召集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000多名高级官员，中国10大元帅中的9位元帅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其中彭德怀在最后作了总结发言。在会上讲话的还有两位文官，即毛泽东和邓小平。事实上，仅安排主席和总书记两位党的文官在会上讲话，是毛的一个手腕。因为由与会军官们的老首长提出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那些部下们或许会比较容易地接受。不过，这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从所能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自1935年以来，中央军委——它的职能就是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显然一直差不多是由军人组成的，只有毛本人例外，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鉴于毛的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信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似乎有理由得出这样的假设：毛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以保

① 我们不能完全肯定林彪此时是中央军委委员，虽然这种可能性极大。目前有的传记书籍说他于1951年成为军委委员。——原注

证他的高级文官同事中没人能直接插手这个控制军队的机构。①

这次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并继续坚持延安传统和毛的军事思想。在会议召开前4天，林彪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空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最为现代化的部队之一）司令员刘亚楼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章，这并非巧合。刘在文章中不仅赞扬了主席的著作，而且还称赞了工农出身的飞行员，批评外国（即苏联）顾问（这种批评来自于一个曾在苏联学习过的人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批评外国那种通过过分的安全预防措施将士兵与人民群众隔开的做法，重申了党委制和政治委员在现代化军队中的重要性。刘亚楼的文章也许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个具有先进武器装备的军种的司令员，他赞成毛的信条，即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这句话是人定胜天的大跃进精神在军事战线上的反映。

鉴于刘亚楼的文章，对毛在中央军委会议期间指名对他进行表扬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没有能得到毛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讲话的全文，但从所了解的情况看，有一点是清楚的：毛希望这次会议能导致一种对苏联军事模式的更为批判性的倾向。②刘亚楼的文章和其他不少的证据表明，党和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进一步发展，毛在这次会议上肯定会对此提出自己的主张。而首要的就是关于政治委员的作用，会议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争论。如同在苏联一样，中国的司令员们曾企图削弱政委的作用，降低党委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在现代武装力量中和现代化战争条件下，对军队的政治控制会妨碍军事效率的发挥。军委扩大会议尽力扭转这

① 毛自1935年开始接手领导军队，周恩来担任副主席。到1949年后，周似乎已辞去了这个职务……。——原注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权威著作是乔非著的《党与军队》。以下的研究主要依据这部专著。——原注

种倾向，它特别强调必须学习毛的军事著作——有些军官们认为这些著作已经过时了。苏联在朱可夫下台后重新加强党对红军的控制的做法，很可能在道义上助毛一臂之力。

中央军委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官兵之间的关系问题。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49年以来的正规化和等级更为严格的苏联式的军衔制的采用，使游击队的指挥员和他们的战士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同志式的关系消失了。在实行征兵制的同时，那些阅历与自己的首长相似，有着丰富经验的老游击队员开始复员。另外，一批新型的“资产阶级军官”已通过1949年后的军事院校培养出来，而不再是从士兵中选拔。这类军官自认为高人一等，轻视应征的农民士兵。

据推测，参加会议的军官们听取并讨论了党关于纠正这种状况的建议。在会议结束2个月后，即9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指示，命令所有的军官（年老、体弱以及身体有病的除外）都要以普通士兵的身份，每年在连队生活一个月；那些非经连队提升上来的年轻军官在头一年要像许多老兵一样，作为士兵在连队锻炼6个月。到1959年2月，约有15万军官，其中包括160位将军，经历了这种由军官到士兵的过程。

中央军委会议之后采取的这些措施表明了毛对等级制度、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的深恶痛绝——就是这种不满态度后来将促使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这些措施反映了毛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回到延安传统上来的真诚愿望，但也可以看出毛极力想防止有内聚力的中国军官阶层的发展——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这种军官阶层可能会对党构成某种长期威胁。同时，毛采取这些措施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即他对彭德怀在1956年到1957年的事件中反对他而产生的不满。① 双方个人之间

① 例如，彭曾建议从1956年的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见本书第1卷，第8章。——原注

的嫌隙与两人在国防政策和中国所需要的军事力量的类型上的分歧加在一起，就足以解释在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上，彭为什么对毛进行抨击，以及毛为什么在反击时对彭不给予宽恕的原因。

在与彭的斗争中，毛可以从中苏军事关系正、反两方面祈求帮助。赫鲁晓夫承诺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重要性——正的方面——已在前面论及到了。然而，从1958年年初开始，苏联人的行动使毛对赫鲁晓夫如何遵守这一承诺有理由感到怀疑。

1958年3月14日，赫鲁晓夫在加里宁市暗示说，苏联也许将宣布单方面废除核试验。两周之后，即3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停止一切核试验。4月4日，赫鲁晓夫致函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以及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

给周恩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肯定会使中国领导人踌躇的话：

> “现在，还只有苏联、美国和英国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所以比较容易就核武器的试验达成协议。如果现在不停止试验，再过若干时候，其他国家也会拥有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要达成停止试验的协议自然就更复杂了。”①

如果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已在最高苏维埃取代了布尔加宁，现在是党政两方面的领袖——希望在中国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之前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议，那么他承诺帮助中国发展这类武器的诚意究竟有多大？赫鲁晓夫的倡议会失败吗？如果这样的话，按照苏联总理给周恩来的信，俄国人就会恢复他们的核试验。

对于赫鲁晓夫的建议，西方最初反应冷淡，部分原因是美国人正打算进行一系列新的核试验。杜勒斯显然认为，苏联的行动是企图阻止这些试验或使其丧失信誉。但是，美国人并不会贸然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8集，第385页。——译者注

拒绝这个建议。4月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给赫鲁晓夫的复信中，建议美苏两国技术人员应共同研究监督试验的办法。4月22日，赫鲁晓夫在复信中拒绝了这个建议，但随后在5月9日的信中又出人意料地赞同这个建议。

中国人对赫鲁晓夫最初的倡议的公开反应自然是积极的。4月13日，周恩来致函赫鲁晓夫，答应中国政府全力支持他的建议，虽然正如一位西方学者①所指出的那样，周恩来并没有提及更多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危险性。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可能研究了美国人的反应并想当然地得出结论：赫鲁晓夫的建议将因东西方在核监督问题上世所周知的分歧而告失败。但是，赫鲁晓夫在5月9日的信中作了让步，使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突破，同时也使中国人面临一个新的形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也许可以达成，而这将会把中国排斥在核俱乐部之外。

我们不知道莫斯科是否就赫鲁晓夫5月9日信中的让步一事提前通报了北京。不过到了5月初，中国人就开始对赫鲁晓夫的倡议产生怀疑，发觉它不只是为了取得宣传上的胜利，而是表明了一种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的真诚愿望。似乎差不多可以肯定，正是这种疑虑导致中国人第一次公开表示了他们要制造核武器的决心。至少，外交部长陈毅是这样说的。5月10日上午，他在接见两位西德记者时说，中国将在“将来”或“不久的将来”拥有自己的核武器②。两星期之后，即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召开前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一篇文章中警告苏联，中国将利用自己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在“为期不远的将来”制造出自己的核武

① 这位学者是谢兰莉。此处引自她的著作《共产党中国在核时代的战略》。——译者注

② 谢兰莉：《共产党中国在核时代的战略》第107—108页。——原注

器。[1]科学计划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证实了这一点。[2]在私下，毛认为10年时间足以制造出中国的核武器（这一次主席低估了中国的发展速度），这表明他不再指望苏联的帮助了。

刘亚楼的断言可谓一箭双雕，它不仅是对赫鲁晓夫的警告，而且实质上还在于维护毛的发展具有核武器装备的延安式军队，以避免在现代常规武器方面进行大量投资的计划的可信性。毛幸运的是，虽然赫鲁晓夫近来的外交行动，在某些方面冲淡了他有关中国将获得一枚原子弹样品的承诺的意义，但彭德怀却无法利用这一局势。彭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作用的设想是以人民解放军和苏军之间的分工为依据的，而这种分工又反过来依赖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亲密的合作和信任。如果在赫鲁晓夫禁止核试验的建议上大作文章，以说明俄国人对帮助中国获得核能力没有诚意以及那个秘密协议是个骗局，只能促使中国军队对与苏联伙伴的合作失去信心。事实上，虽然毛对赫鲁晓夫的建议在开始时肯定感到失望，但和彭德怀不同的是，他可以利用这种局面来重申自己的主张，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依靠本国的资源，走自己的路。

在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不久，发表的一篇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文章暗示，无论彭德怀的态度怎样，至少他的一些身为元帅的战友准备附和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老、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肯定了继续坚持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毛的军事思想的现实意义，并主张在此基础上有选择地学习苏联的经验。贺龙元帅在谈到1927年南昌起义（中国人将这次起义的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时，对苏联的军事理论或经验避而不谈，只是断言30多年

①《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解放军报》1958年5月23日。——译者注

②《全党抓科学技术工作，实现技术革命》，《人民日报》1958年8月2日。——译者注

来，“我们的武装力量是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和军事行动原则的。”尽管毛本人的观点没有发表，但在8月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上，登出了一张他在刘亚楼陪同下视察某个空军基地的照片，这就表明了他的赞同态度。①

第六节　党维护自身对外交事务的领导

赫鲁晓夫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倡议，除了对中国领导层内部有关中国军事的总体发展战略和理论教义的争论产生影响外，还肯定会引起毛对苏联外交政策动向的忧虑。在1958年2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外交事务方面采取了比1955年夏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强硬的态度。他重申了毛关于全球权力中心由西向东转移的分析，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以及联盟内部所面临的问题，并谴责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行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拒绝了外交界宣扬的“两个中国”的主张，重申了中国决心解放台湾的立场，但没有像过去两年通常的做法那样限定一个条件，即这一切将采用“和平的方式”来实现。②

尽管如此，周的报告仍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南斯拉夫问题上表现出温和的态度。俄国人发起了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以表明他们对铁托拒绝参加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和拒绝重新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自搞一套的不满。但是，周只是在谈到匈牙利事件时笼统地提了一下“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他在提到南斯拉夫时是比较友好的，将其称之为社会主义国

① 由于《人民日报》没有登出两位陪同者的名字，并且很少有刘亚楼的其他照片来作比较，所以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照片上的人就是刘亚楼。照片上的第3个人差不多可以肯定是吴法宪，为空军政委，后继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原注

② 《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人民日报》1958年2月11日。——译者注

家，而且一并列举了南斯拉夫副总统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如匈牙利的卡达尔和保加利亚的于哥夫对中国的访问。①

也许是赫鲁晓夫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建议，导致中国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在随后几个月中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赫鲁晓夫的建议是对毛所提倡的富于战斗性的、不妥协的态度的一种反动，而中国人无法用直接的手段迫使赫鲁晓夫接受他们的观点，所以南斯拉夫问题就成为他们影响苏联政策的十分有用而又比较婉转的方式。

1958年4月5日，俄国人宣布他们将不派代表团参加即将召开的南斯拉夫党代表大会。4月19日，即大会召开的前3天，苏联共产党的刊物《共产党人》攻击南斯拉夫新的党纲草案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它提倡社会主义国家的中立和不结盟；认为非共产党的党派可以代表非共产主义世界的进步；主张所有共产党应相互平等和自主。然而，尽管苏联的谴责是严厉的，但该刊在谈到两国关系时，仍把南斯拉夫人称为朋友，在谈到两党关系时，仍将他们称之为同志。②

5月5日，在南斯拉夫党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中国人对南斯拉夫人发起了不留情面的攻击。铁托和他的同事被简单地称之为南斯拉夫党的"领导集团"，并暗示他们迎合美帝国主义的需要，提出了自己"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新纲领。苏联的攻击考虑到了和解的可能性，而中国人似乎只对南斯拉夫方面的"投降"感兴趣。但是，由于他们所期望的东西不大可能实现，人们必然会推测到他们将决心切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个"毒瘤"，因为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团结越是巩固与增强，我们的力量就越加强大。"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也许想以一个社会

---

① 《目前国际形式和我国外交政策》，《人民日报》1958年2月11日。——译者注

② 参见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第178—180页。——原注

③ 《光明日报》1958年2月2日。——原注

主义阵营的国家身份对南斯拉夫发起宣传攻势，以此损害当时出现的和平共处的气氛，削弱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基础。

但是，尽管中国对南斯拉夫的攻击似乎曾促使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政策，但苏联领导人并不赞成中国人的所有主张和行动。而且，在中国对南斯拉夫发动攻击之后召开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阵营领导人会议（即5月底召开的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赫鲁晓夫表示，他不会改变对美国的政策。中国观察团团长陈云在会上讲到有关世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时重申了毛、周的观点。他断言，过高地估计西方的力量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并发问道，一个具有优势的社会主义阵营怎能会害怕帝国主义。相比之下，赫鲁晓夫则描绘了一幅新的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将带来的凄凉景象，并满怀希望地指出了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已意识到这种危险的证据，以此说明找到一个处理国际事务的新方法的必要性。当陈云极力主张应该加强华沙条约组织时，该组织发表的宣言却强调减少华约国家军事力量，并从罗马尼亚撤出苏联的军队。

中国人的行动所取得的胜利就是使南斯拉夫打算和解的意图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了。6月15日，铁托有力地驳斥了对他的批评，特别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批评。但这只能引起北京的更进一步的谴责。南斯拉夫领导人被称之为“叛徒”，认为必须把他们赶到帝国主义那边去。① 事情发展到最后，导致两国之间断绝了外交关系。6月底，中国人拒绝接受南斯拉夫大使，同年9月，他们召回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

后来的这些发展是值得注意的预兆，表明中国在未来的一些年月里，为了促进与帝国主义阵营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军事阵营的团结，其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将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在2月

① 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第183—188页。——原注

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放弃了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由陈毅将军来接替。这种变动可能是周在1956—1957年的两个重大政策争论中败北的一种反映，它也标志着"万隆时期"——在这一时期，以迷人、温和的总理为代表的中国，似乎能够与意识形态不同的绝大多数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开始走向结束。

随着意识形态开始占居首位，影响外交政策的重要观点开始来自别的方面，而不是来自总理和新任外交部长。例如，陈伯达1958年夏天在他任主编的党刊《红旗》第一期上，发表了对南斯拉夫进行攻击的主要文章。① 署名于兆力的有关外交事务的重要评论是由一个3人小组写作的，包括两名党的宣传工作者，只有另一名是外交部官员。② 这表明在周恩来的国务院和外交部的核心圈子之外，还有一些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起着更大的作用，同时，中共中央联络部（负责与其他共产党保持关系）也越来越介入外交政策的形成。

然而，如果由此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党的机构将取代国务院的职能，或者认为周恩来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影响将变得微不足道，这都是错误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一结束，周恩来就与陈毅立即动身到北朝鲜，就朝鲜战争结束后仍留在那里的中国军队（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撤退问题进行谈判。可见，周并未失去权威。

尽管周恩来不得不遵循毛的强硬的外交姿态，如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所表明的那样，但这种姿态此时并没有真正影响中国对南亚和东南亚中立国家的基本政策。当然，一些中立国家在1958年已经感到，中国的态度正在从亲切变为好战，而在这种好战态度面前首当其冲的正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日本。

---

① 《红旗》1958年第1期第11—18页。——原注

② 党的宣传工作者指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为左派首领的王力和姚溱，外交部官员是指乔冠华……。——原注

1957到1958年的秋天和冬天，日本代表团在北京进行贸易谈判。中国人曾试图坚持他们的国旗应当悬挂在他们建立于日本的任何商务代表机构，但面对着东京在这个问题的不妥协态度，他们放弃了这一要求，这样，两国便于1958年3月5日签署了一个贸易协定。然而，当一个日本青年在5月2日将悬挂于长崎市中国邮票和剪纸展览会会场上一面很小的中国国旗扯下撕毁时，引起中国人强烈的反应。外交部长陈毅发表声明，指出这一事件表明日本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态度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①第2天，即5月10日，在东京的中国贸易代表团通知日本，中止两国的一切贸易业务。

中国人对国旗事件作出异常反应是有许多原因的。这包括：对岸信介提出的贸易往来不会影响日本不承认北京政府的政策的愤怒；东京方面再次向台湾蒋介石作出承诺；未来日美防务协定的谈判以及甚至希望岸信介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受挫等。据一位学者说，"消息灵通的日本人士普遍认为，这个决定完全是政治性的，是由陈毅个人作出并提交政治局通过的。"②

我们不能肯定"消息灵通的日本人士"的说法是否正确。但有关中国的新任外交部长在气质上非常适合于中国推行新的外交政策的说法，也许是公平的。根据一个权威性的传记资料的评价，"绝大部分报道表明，陈毅是一个说话直率、相当聪明和有才智的人……"③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位国内战争中的杰出将领和诗人，在国内外事务中表现出了不少直率的实例：1959年10月威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1960年4月在加德满都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就中印边境争端问题大发雷霆；1961年在关于老挝问题的

①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就中日关系发表谈话，揭露日本政府的帝国主义面目》，《人民日报》1958年5月10日 ——译者注

② A.M.哈尔彭：《战后世界中的共产主义中国》，第6章。——原注

③ 科林和克拉克：《中共人物传记辞典——1921—1965年》。——原注

日内瓦会议上所表现的坦率的谈判风度；“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审问”时表现出的无所畏惧的自我辩护。

选择陈毅将军而不是其他同样能干的人担任外交部长的原因，现在并不明白。不过，陈很早就与中国的4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邓小平等有着亲密的关系，并且看来在政治上没有野心。如果他是大家的朋友而又没有敌人，他就可以被看作一个合适的中立的候选人，在一个可以充分发挥自己个性的职位上工作。就陈毅来说，他似乎满足于继续接受周恩来在外交事务方面的领导。但是，由于在大跃进时期周忙于到全国各地视察，留在北京的陈毅就能从他的言行使中国的外交政策显露出率直的形象。“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恢复了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并进入了一个广泛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展更为友好的关系的时期。但遗憾的是，陈毅则由于政治受挫和身体多病而不能充分展现他那乐天派的性格了。

第七节　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

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紧接着于25日又召开了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会上通过了林彪和其他一些人的晋升。同一天，毛率领他的大部分高级同事赴首都附近的十三陵水库，参加建设工作。6月，周恩来带领一支由中共中央及国家政府机关500名官员组成的队伍来到这里参加劳动，他们在此逗留了5天，住在附近的一所学校里，每天从下午3点一直干到11点。周的密友叶剑英元帅还忙里偷闲写诗抒怀。这支“远征队”所体现的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毛决心要在领导和群众中恢复延安时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同时也意味着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体力劳动问题将摆到重要的地位上来。而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劳动的任务将赋予一个全新的农村组织形式：人民公社。

第五章

人民公社的出现

1958年夏天在中国农村出现人民公社的原因，即使到今天仍然是不很清楚的。官方政治上的一时需要似乎使得这一过程模糊不清。毛泽东甚至事先未经政治局正式批准就提前行动，催促建立人民公社，这是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此外，曾经有个时期，似乎为了解释人民公社出现的困难，官方强调采取这一行动的突然性，而后来为了应付所谓人民公社的建立缺乏客观条件的批评，则又强调采取这一行动的孕育过程。①

人民公社是在1957至1958年间的那个冬天所展开的兴修水利运动中自然萌发的，这一点看来无可怀疑。当时，毛依然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将是建立国营农场。但大搞水利运动要求投入大量的劳力，要求在一定规模上组织人力，这就大大超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所能提供的人力资源。因为

① 参见毛于1958年12月19日在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毛在讲话中曾说直到8月"才发现"公社的出现。而在彭德怀批判人民公社后，1959年8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则强调了1958年8月以前人民公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原注

1957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平均规模已下降至每社164户。尽管事实上中共中央就在1957年9月还发布指示，赞扬了规模较小、权力分散的农业生产合作社①，但到了冬季，为了兴修水利运动的需要，开始出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合并情况。②这种合并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得到了认可，从而促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进一步合并。然而，根据毛在成都会议上所做的冗长讲话中并未提及这一问题来看，合作社的合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引起人们的重视。的确，后来被树立为典型的河南27个合作社合并为1个拥有9369户的大社这件事，是这年4月才发生的。③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是谁并怎样做出决定，将合作社扩大为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全新的规模，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中兼管农业、工业、文化、商业以及军事的无所不包的基层单位。在一年以后党内出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的危机中，出现了这样的说法：公社是少数人凭他们自己的主观愿望搞的，它建立得"太早太快……。"④

第一节　陈伯达的作用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文件中，都没有出现"人民公社"这一提法。显然，无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当时都不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合并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意义，所以，他们在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均未提及这件事。毛在讲话中不提及这件事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的

---

①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9号第135—138页。——原注

②④ 参考《人民日报》1959年8月29日的社论《人民公社万岁》。——原注

③ 《中国共产党党史讲义》，广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卷，第345页。——原注

讲话并不公开发表，他不需要回避谈及这个问题。人们由此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后来出现的将扩大的合作社变成为人民公社的事情，在5月时政治局仍没有加以讨论。

后来的材料表明，开始时人们对这种扩大了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叫法各种各样。但到了6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才选择了‘人民公社’这样一个比较最能表现这一组织的内容和最能受到群众欢迎的名称。”①

事实上，第一次公开提到“人民公社”一词的是陈伯达在7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3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陈在介绍该刊本期的两篇关于湖北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就的通讯时引证说，这个合作社变成了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②

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天，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做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38周年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引述毛的话说，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③

这一证据表明，把扩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称为“人民公社”是陈伯达想出的主意，毛对此加以完善，使之包罗万象。并且也许在6月最后一个星期的某个时候，毛赞同将人民公社作为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模式。的确，毛后来虽然承认他同意搞人民公社，但否认这是他的发明。不过，人们令人信服地论证到，人民公社思想的来源——这里并非指名称本身的来源，该名称可能源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而是特指它的“一大二公”思想的来

① 《人民日报》1959年8月29日。参考《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刊登的谭震林一篇有关夏粮丰收的文章……。——原注

② 《红旗》1958年第3期第10页。——原注

③ 同上，第4期第8页。

源——可以追溯到毛早年对学者兼政治家康有为（1858—1927）在《大同书》中所表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向往。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不少疑点存在。为什么陈伯达以及后来谭震林在引用毛的话时，并没有在引语中出现“人民公社”这个词，但他们却都暗示毛曾使用过它呢？是不是因为毛在使用“大公社”这一名称时，仍想的只是“一大二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而非大（人民）公社？是不是因为毛宁愿使用“大公社”这种名称而不愿用“人民公社”这种名称？是不是因为毛不想在和他的同事们正式讨论之前公开表示对人民公社的支持态度？或者是不是因为陈伯达、谭震林所引用的毛的那段话——显然是6月底与一位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的谈话，毛曾在《红旗》杂志第一期赞扬了这位社长的精神——只不过说明毛正在考虑这个新概念，并鼓励他的听众（即那位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译者注）进行试验？①

看来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公社思想的提出、发展和采用，是在有限的试验的基础上和令人吃惊的短时间里发生的，特别是考虑到它将带来意识形态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时——对此毛、陈从一开始就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时间的仓促就更为明显了。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成就的那篇通讯——它曾启发陈伯达将该合作社称之为公社——标明的日期是1958年5月25日。②这就是说，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个县委的通讯，通过层层机构送达陈伯达手中，然后有人（不清楚是谁）作出决定，要把这个报告看作

---

① 陈伯达在文中引用的从“应该逐步地”到“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段话（《红旗》1958年第4期第3页），谭震林在文章中也引用了。这些话大概出自毛。毛还发表了更长的一段话，见《科技革命》1967年7月号第21页。关于毛与这位合作社社长的谈话的报道，并没有说明这位主席谈及“公社”一词。——原注

② 《红旗》1958年第3期第17页。——原注

是一个新的农村组织形式的信号，并为落实这个决定撰写了一篇文章（不清楚是否经过审批）。

那个曾启发陈伯达把它称为公社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它成功地将工农业合为一体——不过只有两个月的历史，其经验还不足以使它承受如此有分量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桂冠。然而，在陈伯达的文章问世仅两周后，由谭震林主持的华北六省市（包括河南）农业协作会议得出结论说，由于目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和分配制度不够完善，必须着手调查研究和准备建立尚在试点的“比较高级的公社性的形式”。①

尽管毛经常到各地视察，但对于人民公社的设想，却似乎未经他本人认为是非常重要并实地调查研究就给予了最初的赞同。当然他在各地巡视时可能看到过一些扩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一直到公社化运动已经开始，只等中央政治局给予认可之前，并没有任何毛到过河南省这个公认的人民公社诞生地进行视察的记载。

最后，人们还必须考虑到，在6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毛的注意力肯定集中在军事事务上，因为就在这个月他主持召开了重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所以，毛在对人民公社的设想给予最初的赞同之前，能有多少慎重周密的思考呢？

直到长达一个多月之久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于7月22日闭幕以及赫鲁晓夫从7月31日到8月3日访问北京之后，毛才又继续开始他的视察，第一次对人民公社进行实地考察。从8月4日到13日，他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天津以及首都郊区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②就是在这次视察中，他未经政治局正式同意，

① 《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5号第114页。——原注

② 中国报刊所报道的毛的行程是：8月4日在河北（《人民日报》8月11日），6—8日在河南（同上，8月12日），9日在山东（同上，8月13日），10—13日在天津（同上，8月16日），13日乘汽车由天津返京，途中视察了北京郊区的两个农业合作社。——原注

就对人民公社给予了认可。8月4日晚，毛刚刚视察并赞扬过的河北省徐水县大寺各庄宣告正式成立人民公社。在毛视察河南后4天，《人民日报》报道了他视察该省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的消息，指出这是一个按照毛主席指出的道路，从农业合作社过渡而成的人民公社。这里的措词也许是有意让人搞不清它的真正含意，但大概指的就是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中引用的那段话。

在七里营，毛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谈话时说，他希望七里营的生产成就能在全省推广。吴回答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毛听罢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① 这里的用词又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两个词中都有"社"这个字。而且，即使在毛明确谈论到人民公社的段落里，他仍然可以说他只是在提倡七里营的生产成就，并非提倡这种新的组织结构。

然而，8月9日，毛在山东公开表示了他对人民公社的偏爱。当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说到某个地方提议要办大农场时，毛告诉他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② 一年以后，毛意识到自己的表态过早了，他便以责怪报界的方式来为自己开脱。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毛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所说的那些过分热情的言论被记者报道出来而感到后悔的中国领导人。

8月17日，即《人民日报》报道毛赞扬人民公社的消息后4天，政治局在河北省海滨胜地北戴河召开了扩大会议。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人民公社好"这一态度鲜明的通栏标题下，宣布河南省信阳专区全部成立人民公社。报纸并未指明"人民公社

① 《人民日报》1958年8月12日。——原注

② 《人民日报》1958年8月3日。——原注

好”是毛的话，但当时绝大多数嗅觉敏锐的干部都一定知道了主席的态度。显然大局已定了。

虽然直到8月29日，政治局才作出了有关人民公社的决议，但毛此时很可能已争取到他的主要同僚们的支持。当然，刘少奇在7月中旬就已谈到了将工、商、学、兵、农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在公开场合，他仍然使用“合作社”这个词，但在私下却已开始使用“公社”这个名称了。他曾在石景山对工人说，工人一年要到乡下去劳动两个月，农民也可以到工厂里来做两个月工，互相交换。这一下子行不通，5年、10年就会搞通的，那样子就变成共产主义了。刘接着说：“工厂是农村的，农村也是工厂的，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农村的青年可以到工厂，工人的子女可以到农村，组织共产公社。”①

这个证据表明，在建立多方面的农村组织这一点上，毛泽东和陈伯达在一开始就得到了刘少奇的赞同。而且尽管刘少奇本人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以前，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使用“公社”这个名称，但他已置身于这个计划而不可能反对毛干这件事了。因此，毛只是在后来回顾这一过程，以驳斥彭德怀等人对自己的攻击时，才被迫对自己过早表现出的热情作了辩解。

第二节 北戴河会议

1958年8月17—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跃进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大跃进基本上仍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生产运动，夏粮产量比1957年增长69%已十拿九稳。②人民公社和土高炉已经出现，对此本应进行降温。对不现实的生产指标本应泼冷水。总而言之，北戴河会议本应是一次调整经济

① 《北京日报》1967年6月8日第5版。——原注

② 《人民日报》1958年7月23日。——原注

以确保大跃进运动健康发展的机会。相反，它却被用来作为进一步提高生产指标的催化剂和向共产主义跃进的思想发射台。在北戴河会议之前，中国看来能通过亿万有组织的民众在经济上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使全世界感到惊奇。但北戴河会议的结果却使1958年经济上取得的真正成就被中国领导人的灾难性的狂热搞得黯然失色了。

北戴河会议肯定是在一种由谭震林的两篇文章所带来的高度乐观主义气氛中召开的。这两篇文章发表的时机看来是精心选择好的，谭在文章中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描绘了一幅灿烂的图画。他根据夏粮的大丰收推算，这一年的粮食总产量至少能达到2.4亿吨，甚至可能达到3亿吨。① 增长率最低估计要比这年早些时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的指标提高25%，恰恰相当于1957年12月确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的指标。而较高的估计则要比当年提出的指标高50%以上。

谭震林——他以自本世纪20年代后期起就与毛有密切关系而自豪——早在前一年秋天就有效地从他的老战友邓子恢手中接管了农业工作。从1957年10月到12月，谭数次到河南视察，鼓励并指导该省声势浩大的兴修水利运动。他无疑和当地升起的新星吴芝圃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并与吴一起在这里首创了人民公社这一事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56岁的湖南人，早期的书籍印刷和装订工人，竟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中为数不多的城市工人阶级

---

① 我猜测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是为了影响会议的气氛，因为，文章于8月份发表在中共的主要报刊上，但内容却是有关华东农业协作会议和夏粮收成情况，这都是6、7月间的事，按说应在几星期前发表。参考《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红旗》1958年第6期；《论我国今年夏粮的空前大丰收》，《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原注

的典型代表之一。① 他早年跟随毛在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打游击的经验，使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无论是担任军事指挥员还是做为政治委员，都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干。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他一度在华东工作，1952年担任华东地区第三书记。在他的上级饶漱石和陈毅外出时经常主持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作为江苏省省长，同担任省委书记的柯庆施一道工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和柯一同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在大跃进时期，这两人的关系极为密切。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当谭鼓动农民去争取空前的农业成就时，柯则促使毛在钢铁战线不顾一切地突飞猛进。

即使谭在50年代中期调到北京，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以后，也很少有西方人士与他接触过。但是，研究中共高层军事人物的权威专家大概根据国民党将军和共产党背叛者提供的证据，将他描述成一个性格顽强的人，一个杰出的组织家，“倔强、有计谋、爱挖苦人、遇事能冷静地加以分析、事业心极强。”② 在大跃进期间，谭确实显露出了自己“事业心”强的一面。但即使是毛——他在大跃进之后谨慎多了——后来也不得不指出，谭遇事可能不够冷静：

> “谭老板，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些凄凄惨惨要好。”③

---

① 参考程林和克拉克编：《中共人物传记辞典》中关于谭的词条，该书对谭有详细介绍。——原注

② 威廉姆·惠特森：《中国最高指挥员》伦敦，麦克米兰公司，1973年出版，第204页。——原注

③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04页。——译者注

谭有关共产主义的看法使他适合于担任推动中国走向富裕的任务，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大跃进过程中他的热情总是那么高。当中共所有领导人无疑都希望他们的人民早日走向繁荣的时候，很少有人能比谭更生动地表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看法：

> “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呢？……
>
> 第一、要吃得好。不光是吃饱，每顿都有荤，或者吃鸡子，或者吃猪肉，或者吃鱼，或者吃鸡蛋……。当然，有些珍贵的食品，猴头、燕窝、银耳，作为“各取所需”还不能够……
>
> 第二、是穿。也应有尽有。各种花色、各种样式都有，不是乌鸦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蓝。将来的布是用来作工作服，工作之外，其他时间都是绫罗绸缎，都是毛料呢绒……要发展狐狸，人民公社都饲养狐狸……才有狐狸大衣。
>
> 第三、是住。要跟现代化城市比，谁是现代化？就是人民公社。北方有暖气，南方有冷气，都是高楼大厦，什么电灯、电话、自来水都不在话下，收音机、电视机也不在话下……。
>
> 第四、是交通。除了赛跑，凡是要走路的都有工具……飞机也是四通八达，每个县都有飞机场……每一个人都有一架飞机的时候，也不是太远……
>
> 第五、每个人都要受高等教育，要普及教育……
>
> 共产主义大体就这样几条：吃、穿、住加上文化娱乐、科学、体育，这些总起来叫共产主义！”①

这就是彻底的“吃喝共产主义”，但并没有迹象表明谭和时代不协调，或和毛不一致。根据谭的说法，毛描绘了消费方面的

---

① 《进军报》1967年3月15日第3版。——原注

幸福生活图景：短期目标是每人每年750公斤粮食，50公斤肉，10公斤植物油和10公斤皮棉。"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批判谭震林允许农民以大吃大喝来庆祝1958年的丰收，但在当时毛也赞成这种庆祝。

事实上，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外国，人们对大跃进的看法都存在着奇特的矛盾。一方面，逐步升级的有关粮食产量增长的报道，使宣传人员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已进入富裕时期，所有的人都能吃得好——而且是免费——所有的物质要求都能满足的国家。另一方面，劳动"军事化"，反对物质刺激，使宣传人员断言中国已处在进入真正共产主义时代的边缘。这一切都给人以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和禁欲主义的印象。这种矛盾现象是由于把人民公社嫁接在压力重重的生产运动上所造成的。这种嫁接就是北戴河会议的产物。

为了与大跃进的精神保持一致，北戴河会议做了特别多的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公社、农业、工业、教育、商业、民兵建设以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等各个方面。有关这些方面的决议及规定，大部分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都公布了出来[①]突出的几个决定是在全国范围推广人民公社和将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提高到1070万吨，比1957年的钢产量翻一番。中国在1958年前8个月中的钢产量已经与1957年的全年产量相等，新的指标将意味着在仅仅4个月的时间里再生产出相当于1957年全年产量的钢材。北戴河会议还预言粮食产量将达到3亿到3.5亿吨，比仅仅在3个星期前谭震林的估计数字又增加了25%。[②]

---

① 例如：《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关于农业问题的五项指示》（同上，9月11日）；《关于半工半读的指示》（同上，1958年9月20日）；《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同上，1958年9月30日）。——原注

②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原注

单纯做为一个规划来看，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与所有类似的中央文件一样是适度而稳健的。建立人民公社被说成是“必然趋势”，关于公社在全国范围的发展高潮也只是说“很有可能”，尽管也许会变成“不可阻挡之势。”人民公社发展的基础是大跃进的成功，因为大跃进已经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① 这里已出现了浮夸风的迹象：宣称粮食产量将增加“100%、百分之几百、百分之几千”——稍有常识的农村干部都知道，只要出现比100%少一些、也许少得多的增长，他们都可以夸耀了。

农业生产斗争导致农业生产合作社，甚至乡和县之间的区划被打破，导致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和农民“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此时，命令代替了说服：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多方面结合的人民公社的发展将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②

根据规定，典型的人民公社组织规模为一乡一社。每个公社包括2000户，或者说1万人。只要条件合适，公社包括6000户也允许。甚至两万户组成的公社也不要去反对。但是，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是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要实行政社合一，使人民公社成为农村权力机构的基层单位。建立人民公社的步骤分两步走，先把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然后再转为人民公社。如果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那当然更好，但不要勉强、性急，不能影响农业生产。在并社过程中，原来的各小社将改为耕作区或者生产队。

在人民公社内部，要通过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把

---

①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译者注

②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译者注

农民引向幸福的集体生活。"一般说"，自留地都应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这是一个重要的规定，因为尽管留给私人耕种的土地，无论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多于集体土地的5%，但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它对每个农民家庭来说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它：

（1）可以提供一般生活所需的各种食物——蔬菜、水果、猪肉、家禽；

（2）可以使许多家庭的生活标准从勉强糊口提高到稍有富裕的水平；

（3）可以通过出售农产品得到一些现金。

（4）可以给人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这是不稳定的集体收入所无法相比的。①

家庭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股份基金问题，一、二年内暂不变动。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人们觉悟的提高，将自然地变为公有。很有可能，政府不想使新生的人民公社由于购买社员手中的股份基金而背上负担，而是希望逐步说服农民把他们的财产捐赠给公社。在公社中仍采用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些地方需要3—6年的时间。原有的分配制度应当保留，但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决议的最后一段似乎是谨慎的。它指出，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但是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②

过去的经验表明，中共中央的惯常做法是把它的目标订得比

---

① 肯尼思·K·沃克：《中国的农业计划》，伦敦，卡斯公司，1965年出版，第23—41页。——原注

②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译者注

可能完成的要低一些，以便有可能超额完成它。这种做法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公开加以肯定。考虑到这一点，以上引自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的几段话，肯定具有极大的鼓动性，并且是有意这样做的。虽然后来断言狂热来自下面的基层部门，但中共中央的这个决议却明显地预示了要在一夜之间跃进到共产主义。后来，毛声称他曾说过，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也许需要10年到25年的时间。还说，虽然他可能考虑的不成熟，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很谨慎的。不过，他并不试图表明，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时间表是由于他的反对而放弃的。刘少奇——他后来像毛一样，对记者在大跃进期间过于急切地报道他的话表示不满——说的一席话也被《人民日报》引用来鼓动人民群众，他说："我们要一直往共产主义前进！现在不要认为共产主义是很慢的啊！只要我们好好干，实现共产主义就很快了。"①

遗憾的是，刘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毛有关同一问题的讲话）并未公开发表，不过从有关他在北戴河会议之后的言论的报道来看，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从上述预言后退。的确，从他1958年间视察各省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他的主要兴趣就在于"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并鼓励它的发展。②令人惊奇的是，尽管毛在形成和促进人民公社的理论上起了很大作用，但在北戴河会议之后的各地巡视中，这位党的主席却没有把精力集中于这类问题，而是转移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去了。

第三节 钢铁狂热

1958年下半年，毛对钢铁生产的着迷达到了令人惊奇的程

---

① 《人民日报》1958年7月30日。——原注

② 《光明日报》1958年8月4日。——原注

度。他承认自己的工业生产知识是很浅薄的。过去，正是由于他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走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正是由于他对农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促使中国共产党去寻找一条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但是到1958年 8 月，毛已欣慰地看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展开只是一个组织任务，基于 1955—1956 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它的胜利是可想而知的，同时，基于1958年夏粮的大丰收，秋后收成的规模也是不难设想的。所以，毛此时表现出了他特有的政治风格：提前宣布一项事业的胜利，接着便渴望着开始下一个战役，而把前一个尚未完成的工作留给自己的下级去进行。9月 9 日，他对最高国务会议说，人民公社大概 9 月份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充实这个架子，则要到今冬明春去进行。①

情况的确如此。8月份，毛的注意力就开始从农业战线转到他所不熟悉的钢铁生产上去了。北戴河会议的公报反映了他所关注的事项的新次序：

> “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因此，会议决定，全国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但是同时不应当放松农业的领导。……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根据当前全国人民对于钢铁的巨大需要和对于钢铁生产的巨大努力，根据钢铁冶炼设备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投入生产的情况，钢铁生产的飞跃发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②”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43页。——原注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今年宏伟目标，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译者注

1957年的钢产量为535万吨。在1958年2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该年的钢产量指标有节制地订为620万吨。这一指标在5月底的北戴河会议上增加到800至850万吨。但是到6月——可能是在6月17日审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时——毛决定将钢产量的指标提高为1070万吨，比1957年增加一倍，认为这是可以达到的。这个指标在北戴河会议上得到赞成。

毛去世后，中国的经济学家指出，大跃进期间偏高的钢产量指标造成了严重的比例失调①。毛承认他是使钢产量指标逐步升级的始作俑者，而他的出谋划策者则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一年以后，毛解释说，他没有考虑到全民炼钢运动要求把大量的生铁和煤运到不产铁和煤的地方，而这超出了中国铁路运输的负荷。他责备以李富春为首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说它在北戴河会议之后放弃了自身的职责，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

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本人在私下又流露出再次突破原有指标的打算。在9月5日、8日和9日向最高国务会议所作的3次讲话中，他设想1958年度钢的产量实际将达到1100万吨到1200万吨。②

这种浮夸风随着毛对未来的设想而愈演愈烈，即使好心的编辑尽力将这些设想中出现的数字删去不少，但依然能看出毛的狂热。他的设想包括：在1959年，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这一估计已得到北戴河会议的认可。到1960年，中国的钢产量将达到6000万吨，赶上苏联的水平，成为世界上第三大钢铁生产国。到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中国的钢产量将接近甚至赶上美国，达到8000万吨到1亿吨，③ 毛使自己的狂热更进一步升温了。后来，他承

---

① 柳随年：《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需要研究的一些问题》，《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5号第17页。——原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28、230、240页。——原注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40页。——原注

认自己私下对1962年的钢产量估计更高，达到1亿吨到1.2亿吨。①他认为美国将会由于经济恐慌而使其钢产量徘徊于1亿吨左右，这样中国就能赶上来并超过它，不要几年，钢产量就能达到1.5亿吨。②在15年或者稍长一些时间里，即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钢产量将会达到7亿吨，比英国的人均产量翻一番。③

早在两年以前，即1956年跃进的前夕，毛曾设想用50—75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超过美国④。到了狂热的1958年夏天，毛就明显地、大幅度地缩短了他确定的这一时间表。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64页。——原注

② 同上，第240页。

③ 同上，第235页。

④ 同上，第24、34页。

第六章

大跃进的高潮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后的两个月是大跃进运动的高潮时期，是一个在生产领域作出非凡努力并在以公社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组织中进行大胆试验的时期。毛泽东、刘少奇以及其他领导人，分赴全国各地巡视并大加鼓励。此后，在1958年11月开始恢复现实主义态度，并在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下令收缩。

在那狂热的两个月里，群众的大部分热情是由那些受到毛的鼓励，相信中国即将进入太平盛世的干部激发出来的。但是，如果不考虑国际背景，就不可能充分理解人们在那些秋天的日子里的精神状态。

中国领导人对1958年夏季发生的国际危机是没有责任的。实际上，恰好在这次危机开始时，邓小平总书记就曾向包括许多党外知名人士在内的听众保证，眼下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战争总的来看是可以避免的。中国当时的战略是进行经济竞赛，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强国家的实力，以向美国人、日本人以及铁托炫耀。但是，在随后那狂热的

几星期中，这种冷静的，长远的观点黯然失色了，中国人的行动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促使好战精神在中国内部增长。北京与莫斯科在这段时间里采取的不同路线，代表了中苏走向分裂道路的另一个里程碑。

第一节 台湾海峡危机

7月13日，伊拉克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亲西方的费萨尔国王和努里·赛义德的政权，国际局势迅即出现危机。西方的反应是迅速向其他温和的、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派遣部队，预防那里发生类似的政变；7月1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美国军队进入黎巴嫩，7月17日，英国军队到达约旦。

但是，西方关注的并不是约旦和黎巴嫩的近期前途。伊拉克发生的政变破坏了美国在苏联的南翼“遏制”苏联的政策，因为它使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改称中央条约组织）失去了一个关键成员。它也导致了伊拉克和约旦之间的温和的阿拉伯联邦的突然解体，该联邦作为一支抗衡1958年2月1日宣告成立的由埃及和叙利亚（以及稍晚一些的也门）组成的激进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力量，只不过在5个月以前才刚刚建立起来。因此并不奇怪，苏联领导人看来担心英美军队的登陆是伊拉克发生反革命行动——或者是直接使用英国和美国的部队，或者是用伊拉克过去的伙伴约旦作代理人——的前奏曲（他们也许想起了自己国家的早期历史），担心这种行动有可能使这一地区出现一场更大的冲突，将苏联陷入里面，然后为苏美之间的直接核对抗安排好舞台。

因此，7月19日赫鲁晓夫建议召开一次由联合国秘书长参加（尽管这次会议将在联合国范围之外举行）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印度政府首脑会议，“以便立即采取措施停止已经开始的

军事冲突……最主要的是不要拖延”。① 对赫鲁晓夫的强烈要求，英美两国的答复十分冷淡，并且直到7月22日（即赫鲁晓夫原先希望这次首脑会议召开的日子）才送出。他们表示只愿意选择联合国来作为任何可能举行的会议的场所。第二天，赫鲁晓夫作出答复，在会议的安排问题上作了让步，建议在7月28日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他重申了印度参加会议的必要性。这一次，英国回信对苏联的让步表示欢迎，但是美国仍很冷淡，并且宣称7月28日为时过早。确实，28日和29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将在伦敦参加巴格达条约国会议。但到7月28日，赫鲁晓夫不知何故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腔调。他在那天的一封信里指责美国政府背弃了原来想在安理会范围内召开一次会议的主张，并且暗示他现在情愿尊重法国的建议，在欧洲召开这次会议。这种变化无疑说明，莫斯科已宽慰地认识到西方列强并不打算推翻伊拉克的新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大概感到有必要倾听一下其他主要盟国对这一危机的看法及其处理意见。

中东危机是自从毛宣称现在是东风压倒了西风，社会主义阵营应该以强硬姿态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以来所爆发的第一次危机。赫鲁晓夫匆忙建议召开首脑会议，必然会被北京看成是胆怯的行为。当《真理报》社论以美苏双方都拥有核武器为由呼吁人们冷静和理智时，《人民日报》却反对对美国的侵略作任何让步，并鼓吹向中东派遣自愿军（显然是来自共产党阵营的）。北京的社论对通过联合国机构解决问题也表示了怀疑态度。考虑到国民党人在安理会中占据着中国的席位，北京采取这种态度并不奇怪。在这种做法的背后，还可能隐藏着北京对于赫鲁晓夫让印度参加首脑会议的建议的不满。只是到7月22日，《人民日报》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9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出版，第370—371页。——译者注

才最终认可了赫鲁晓夫召开紧急首脑会议的呼吁。① 9天之后，即7月31日下午，赫鲁晓夫在其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陪同下秘密到达北京。

赫鲁晓夫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清楚地表明，中东危机是双方讨论的主要问题。毛正式同意了苏联领导人提出的召开首脑会议的建议，虽然公报没有详细说明这次首脑会议应在何种条件下召开。毛后来说，会谈中没有讨论这次会议是否应该是一次四大国首脑会议的问题。② 这可能意味着他不想因赫鲁晓夫的建议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而责备他；或者意味着赫鲁晓夫已决定采取新的行动步骤，并向毛作了简要说明；或者意味着这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赫鲁晓夫在回到莫斯科后不久，就用一种毛不可能使用但已表示同意的措词，又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放弃了举行首脑会议的建议，理由是美国政府根本不考虑“在安理会程序之外举行政府首脑会议的可能性”。然而“大家都知道，在目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大多数理事国是参加侵略集团的国家，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没有代表，当然这个机构就不能够对外国武装干涉阿拉伯东方国家的问题作出客观的结论”。③ 他要求举行一次联合国特别会议。

即使苏联和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外交立场现在一致起来了，但是毛依然觉得赫鲁晓夫在西方面前表现软弱。《人民日报》在赫鲁晓夫离开北京以后，发表了一篇关于中苏首脑会议的社论，以最强硬的措词重申了毛富有战斗性的反对绥靖的政策，严厉驳斥了那种认为“仰承侵略者的鼻息，只有迁就侵略者，才能求得

① 这一段是根据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第195—199页的分析。——原注

② 毛说此话的时间是1958年11月30日。——原注

③ 《赫鲁晓夫言论》（第10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出版，第10页。——译者注

和平”的谬论。对那些天真地设想为了使局势和缓，就必须无论怎样也不刺激敌人的“软心肠的和平主义者”进行了尽情的嘲弄。①另一方面，在莫斯科，《真理报》关于中苏最高级会谈的社论则强调，“两个伟大的民族将毫不动摇地尽一切可能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防止新的战争灾难出现。”②

但是，毛对苏联领导人的怀疑甚至愤怒，显然更多地是由后者提出的军事合作的建议引起的。他们两人都曾指出，这个问题是他们会晤的主要原因。据赫鲁晓夫说，俄国人曾经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他们能同在太平洋活动的苏联潜艇舰队保持通讯联络。使他们惊奇的是，毛愤怒地拒绝了这一要求，宣称它是对中国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侮辱。③苏联驻北京大使尤金拍回的电报说，他同这位主席的会谈“就像一个晴天霹雳——他〔尤金〕是把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即将恶化这一信息带给我们的第一只燕子④。”这封吓人的电报使得苏联的领袖们确信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应当秘密飞往北京。⑤

毛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显然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游泳池旁进行的。这两位领导人躺在浴巾上面晒太阳，就象“海豹躺在温暖的沙滩上一样。”赫鲁晓夫自称曾为无线电台的建议辩护，坚持说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他说，毛提出了一个反建议，要是苏联提供贷款，中国愿意自己来建这个无线电台。赫鲁晓夫接受了

---

① 《只有坚决斗争才能保卫和平》，《人民日报》1958年8月8日社论。——译者注

② 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第203—205页。——原注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398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441—442页。

⑤ 同上，第399页。赫鲁晓夫的访问打乱了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空中交通达3天之久。见克罗契科《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105页。——原注

这项建议。但据他说，虽然这项协议定下来了，但中国人最终也没有建立无线电台。①

由于无线电台的问题表面已经解决了，赫鲁晓夫又提出了一个进一步的要求：希望中国同意让中国沿海港口能为苏联的潜水艇加油并让艇上人员上岸休假。他本人的记叙使人想到，他实际上是在要求一块十足的基地。毛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项在他看来是侵犯中国主权的建议。毛还同样拒绝了赫鲁晓夫提出的一项互惠安排的建议——苏联有权使用中国的太平洋港口，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可以在苏联的北冰洋沿岸建立潜水艇基地。②

毛对这次会谈所作的更加简短的描述将赫鲁晓夫的要求，看成为一种"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③。中国人写的另外一篇报道证实，苏联人还提出了一项在中国大陆上重建一个远程导航基地的要求。

很可能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里说得不够详尽和坦率，也许他提出过一项具体的舰队联合行动计划。国防部长彭德怀 2 月22日的讲话已暗示，他欢迎联合行动计划。不过，重要的、而且是已被双方证实了的事情是：不管这项建议的目的是什么，它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

中苏最高级会谈结束时发表的公报没有提到台湾问题，按照毛的说法，他和赫鲁晓夫没有讨论过即将开始的中国人炮轰国民党人占据的近海岛屿问题。赫鲁晓夫没有明确证实这一点，不过在有关他1958年同中国人打交道的记叙中确实包含有这层意

---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401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00页。

③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432页。——译者注

思。①但另一方面，赫鲁晓夫的确说过，在那一年的某个时候，中国人曾经"向我们要求数量相当大的军事援助，他们说他们要对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因此需要这些军援。他们要求得到飞机，远程大炮和空军顾问。"他自称俄国人向中国人提供了他们所要的那些东西，没有试图制止北京，因为"我们认为他们要统一全中国这是绝对正确的。"②苏联的这种援助慷慨到什么程度不很清楚。西方的资料表明，中国的空军力量在1957年年中到1958年年中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多大变化，当时它主要是由米格—15和若干米格—17战斗机以及IL—28轻型轰炸机组成。米格—15曾经是朝鲜战斗时期中国空军的主要武器，然而到此时"几乎已经废弃不用了"；米格—17在苏联也逐渐过时了。在金门危机时期，中国空军变化的唯一迹象是在近海岛屿对面的前沿基地上，米格—15被米格—17代替了。不管怎么说，米格—17优于国民党人的F—84佩刀式喷气战斗机。

赫鲁晓夫说苏方还提出过在中国的领土上驻扎苏联的歼击机中队的建议，并且承认他对中国人对这种"兄弟般的团结"的表示所做的"极端奇怪的"、愤怒的反应感到迷惑不解。③尽管他一再否认，但是提出在中国驻扎歼击机中队，在中国建立潜水艇通讯联络设备以及要求中国沿海港口为其海军提供方便，很可能是一种预谋，为的是在台湾海峡发生敌对行动时使莫斯科拥有对其盟国施加某种影响的能力。因为这个盟国的主席对核战争的作用问题发表过被苏联领导人看作是吓人的、过于简单化的言论。毫不奇怪，苏联想在中国谋求军事便利的3项要求引起了中国人的怀疑，这种怀疑可以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毛没有把已经计

---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400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03页。

③ 同上，第398页。

划好在他离开北京 3 周之后，将对国民党人进行炮击一事事先通知赫鲁晓夫。

在毛泽东——赫鲁晓夫最高级会晤之前，中央军委会议正好刚刚结束，此时，中国人中要求解放台湾的呼声“高涨”，包括在关于中东问题的群众集会上也是如此。但这种要求在赫鲁晓夫访问期间变弱了。我的推测是：在中苏最高领导人会晤之后，毛认为有必要单独干一下，以证明如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美国人将会让步，从而向赫鲁晓夫证明他对“绥靖”政策的批评是正确的。他能作这种尝试的唯一适宜的地点是台湾海峡，而且根据他自己的记叙，炮轰金门是他在北戴河会议上集中考虑的 3 个问题之一（另外两个问题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这使人联想到这次会议曾经讨论过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计划。

大规模的炮击是在 8 月23日开始的，当时北戴河会议仍在继续进行。① 大陆军队成功地用鱼雷艇阻止了对方把援军和物资运进金门。迹象表明，中国人的目的是迫使国民党人撤退，而不只是用一次攻击来削弱岛屿上的国民党守军的抵抗力和士气。从 8 月27日起，中国人通过沿海的无线电广播向金门播送广播节目，对金门进一步施加压力。广播用即将进行的登陆来威胁驻军，并敦促其投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警告从未被全国的无线电网重播过或提到过，所以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这次危机的明显的严重性质，因而也不清楚毛的冒险性及其失败的程度。

这次冒险行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毛对美国的决心估计错了。就在中国人炮击开始的那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评论前一段时间中国在沿海地区集结军队的问题时告诫人们，不要把中国对近海岛屿的进攻看作为一次有限的行动计划。在中国人的封

① 哈罗德·C·欣顿认为，选择这个日子是为了提醒法国人记住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危险性，因为这天正好是苏德条约的周年纪念日。见欣顿：《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第266—267页。——原注

锁日益奏效时，美国人开始准备为国民党的补给船队护航。可能是为了阻止美国的这种支持，中国人在9月4日公布了12海浬领海主权的声明，但立即遭到美国人的拒绝。同一天，杜勒斯表示，美国政府将不受约束地帮助国民党人防守这些近海岛屿。当时，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似乎是迫在眉睫了。

可是，在第二天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却向他的成员们保证，政府正想法缓和这种紧张局势，因为这样做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①他没有料到炮击近海岛屿会带来遍及全球的焦虑不安，但他声称只有南朝鲜和菲律宾（有条件地）支持美国。而且，危机并不是纯害无益，因为它可以调动落后阶层，使其紧张起来。②不久以后，他宣称中国同苏联一样，不希望战争，而且实际上是反对战争的，原因之一是核武器造成巨大的破坏，而且中国没有核武器。因此他的听众可以从他的讲话中作出推论：不能依赖苏联的核武器。假如另一方首先发起进攻的话，那就不能不打。但是中国并不害怕打仗。他暗示说，用手榴弹装备起来的中国不会对原子弹袭击造成的损失不在乎。但他试图像去年在莫斯科会议上那样，使他的听众相信，即使全世界人口的一半被原子弹消灭了，那也不会成为一次全面的灾难。他告诉与会者说，他跟尼赫鲁辩论过这个问题。不管中国人害怕不害怕，敌人都有可能打原子弹，不过为了在人民中鼓起一点劲，还是不怕好。这就是为什么在人民公社内大规模训练民兵的原因。③

毛9月5日的讲话直到现在还没有公开发表，也不清楚当时俄国人是否知道这个讲话。不过他们这时十分焦虑不安，因而派

---

① 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主要原因看来好像是要把北戴河会议的各项决定和经济计划通报给党外的高级官员。但是，有点不寻常的是，会议开幕的公报列举了与会者的名单，这可能是想在危机时期显示全国的团结。——原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33页。——原注

③ 同上，第236—237页。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秘密前往北京。① 据说葛罗米柯被邀参加了9月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的短暂访问显然是为了弄清中国人的目的。由于中国人事先没有同俄国人商量过金门行动计划，所以俄国人想知道自己可能要承担些什么义务。直到此刻为止，他们的宣传报道一直是非常犹豫的。这说明他们因中苏条约而卷入一场逐步升级的危机中去是相当勉强的。葛罗米柯由于听到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因为中国可以幸存下来而泰然自若地计划一场苏美核较量而感到惊恐，他坚定地陈述了莫斯科拒绝引起风险的立场。无论如何，大概是赫鲁晓夫的过分谨慎（就像毛后来形容的那样）和杜勒斯的不安结合在一起，迫使中国人果断地行动起来，使这次危机失去了爆炸性。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了一份同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只是到这个时候，赫鲁晓夫才在9月7日冒险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保证完全支持北京，宣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②

第二天，9月8日，毛再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不过现在用的显然是一种缓和的调子。他暗示美国政府内部在金门紧张局势的处理上存在着分歧意见，并认为美国人明智的办法是使近海岛屿上的11万国民党部队撤走。即使他们不撤走，中国也会继续搞大跃进。他承认他的听众中有些人并不认为这种紧张局势是有益的，但他重复了早些时候自己关于紧张局势的分析，认为紧张局势导致了全世界对美国的几乎是普遍的指责以及英国在支持美国上的动摇不定，而中国只是在华盛顿、台北和汉城才受到谴责。最意味深长的是，虽然毛是在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一封支持中国的信件发出不到24小时讲这番话的，但是他觉得苏联领

① 这次访问是前不久才由苏联外交部的主要中国问题专家贾丕才透露给西方的，他曾陪同葛罗米柯进行这次访问。——原注

② 《赫鲁晓夫言论》（第10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出版，第86页。——译者注

导人只是"基本上"是同中国人一致的，而且说：'他赞成台湾这些东西归我们，不过希望问题和平解决。'"① 显然，毛认为最高国务会议的成员不会被赫鲁晓夫的空洞大话所欺骗，并且打算充分利用这种形势，不过这时他也感到不得不签署一封中共中央的复信，对苏联承诺在发生侵犯中国的情况时支持中国表示"真诚的感谢"。但是几年以后，中国人却公开否认苏联在1958年金门危机期间曾同他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的说法：

"苏联领导人曾分别在9月7日和19日表示他们对中国的支持。虽然那时台湾海峡的局势是紧张的，但是并不存在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而且不需要苏联用它的核武器来支持中国。只是在弄清了这种形势后，苏联领导人才表示了他们对中国的支持……。"②

金门危机后来的发展还经历了一些戏剧性的阶段，不过像上面的引文所强调的那样，到9月的第一个周末时，苏联人已作出了重要决定。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种子已经播下了。本文所关心的是中国领导人试图用什么办法善处逆境，甚至利用这次危机来推进其国内政策。

10月份，北京出版了一本题名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毛语录选编，旨在含蓄地向中国人重申：不论他们可能会在国际事务中遭受什么样的挫折，他们终将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尽管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肯定过苏联的支持，这本语录中的不少引文还是谴责了那些过高估计敌人力量的共产党人，这显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38—240页。有关赫鲁晓夫的引论在第240页。——原注〔这里似有误，毛引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尼赫鲁说的，而不是赫鲁晓夫的。——译者注〕

② 吉廷斯：《中苏论战概观》，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出版，第92页。——原注

然同苏联人在最近金门危机期间的行为有关。但在私下，毛并不像他的纸老虎理论所说的那么乐观。中国驻伦敦的代办[1]显然曾在1958年秋天向北京送去过一份乐观的函件，断言西方盟国已分崩离析。毛对此评论说：

> 宦乡的论点是正确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的破裂当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2]（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10月2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宣布，中国军队从那一天起将只隔天一次炮轰近海岛屿。这种不寻常的安排，加上早些时候作出的对美国侵犯中国领空和领海的行动发布的一系列无尽头的、编号的“严重警告”的决定——不久就变得很清楚，这种警告决不会导致报复行动——必然在政治上敏感的中国人面前突出了大为丢脸的失败的程度。这次危机也在中国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之间引起了尖锐的冲突。不同意毛的炮轰命令的彭德怀曾拒绝同毛合作，周恩来不得不负起责任。[3]

9月5日，毛曾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美国人怕打仗，中国人也怕打仗。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他希望他的听众去客观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并且在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再来看看这个问题。他自己的看法是杜勒斯更怕中国而不是相反。[4]他的听众中是否有许多人从1958年初秋中国的行动中相信了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

① 指宦乡。——译者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45页。——译者注

③ 有关彭拒绝与毛合作的记述，参考《人民的好总理》（1977年），第197页。——原注

④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31页。——原注

第二节 “全民皆兵”

毛能够从这次金门挫折中获得的直接好处就是民兵师的迅速组建；能够在表面上维护人民的士气并减少对核打击的恐惧；能够使他的必须建立一支民兵武装的观点为那些难驾驶的将军们所接受。

民兵运动促进了公社内部的“劳动军事化”。因而有助于干部们在跃进的高潮中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并动员农民作出更大的努力。

在一个月内，几千万中国人正式成了民兵组织的成员。仅四川省（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就有3000万民兵，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家工厂中，工人们晚饭后用两小时的空闲时间进行军事训练；而在该省的一个乡村里，规定每天训练3小时。在军事训练中，人们养成了“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睡觉、统一上工和收工”的习惯。“这极大地加强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山东省的2500万民兵也是这样，他们除加紧民兵训练外，“还在大炼钢铁和粮食生产战线上积极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北京的民兵组织有这样一个座右铭：“农闲多练，农忙少练，农紧不练”。这个座右铭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目的可能是约束那些过分热心的业余民兵教练。被树为典范的河南省由于在步枪射击训练中取得好成绩而放了民兵训练的第一颗“卫星”。该省在每个公社都建立了自己的军事部门，民兵们还唱他们自己的歌：

“一把锄头一支枪，
田间地头当战场，
铁锹开动万斤亩，
持枪练武保国防。

如果美帝敢侵略，
坚决把它消灭光！”①

尽管已有了这一切活跃气象，但一个曾在1958年11—12月间访问过4个公社的一名印度学者②却发现北京附近的一个公社才刚刚计划建立自己的民兵组织。这位学者还报道说：他还没有弄清楚决定使这些公社军事化的原因，虽然他向公社主任以及一位见多识广的翻译提出这个问题：

“当我在农田附近漫步时，我看到地里到处都有几条步枪扎成一小堆竖立在那里。我看到一群群拿着老式步枪的农民排着军事队形，在操场上操练。我问公社主任，农民在参加实弹射击训练方面的进展程度如何，这位主任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向我指出，伟大的人民公社运动还处于开始阶段。实际上我是在整个国家正处于公社热之中而且狂热正在盛行的时候来访问的。”③

这位主任的含糊其词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到1959年1月为止已经有2.2亿男女加入了民兵组织，因此即使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要求配给几百万支甚至最后配给了几千万支枪，并且要求各省都制造轻型武器，但是要让他们全都参加实弹射击训练也是不可能的。普通民兵是由15岁到50岁之间的所有体格健全的公民组成的，同时还有一支从16岁到30岁之间的人中吸收的“基干”民兵，他们在生产和军事方面起带头作用。在河南省的2000万民兵中，到1959年夏天为止只有20万基干民兵接受过训练，而且他们

① 《全民皆兵，劳武结合》，《人民日报》1958年9月13日。——译者注

② 指钱德拉——塞卡尔。——译者注

③ 钱德拉——塞卡尔：《今日共产党中国》，伦敦，亚洲出版社，1961年出版，第51—52页。（着重号为原书所加）——原注

中间只有一半人练习过"实弹射击"。但是，甚至连数百万没有进行过实弹训练的民兵，也都由于新近在生产任务中使用军事术语而在心理上被动员起来了，这种术语把农民变成了"农业战线"上的"战士"，把农村地区变成了"战场"，把自然力变成了需要加以征服的"敌人"。

如同一位学者① 曾指出的那样，1958年的群众性民兵组织在军事战线上体现了大跃进所特有的抛弃传统方法和制度的特征。对于在9月底号召大办民兵师的毛来说，这是他的主张的一个胜利，因为他喜欢用防御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将敌人淹没在"由几亿民兵形成的汪洋大海"之中，② 这是一种任何现代化武器也不能摧毁的。这也是对他的"武器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③ 的原则的重新肯定。但是，许多职业军官对毛的胜利无疑是不满的。

第三节 生活集体化

随着劳动军事化而出现的生活集体化，很快就被狂热的干部们变成了试图向共产主义跃进的基础。一首流行诗句说：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

在这些美丽的词藻背后，存在着通过解放妇女参加劳动来满足由于大跃进的巨大任务而带来的对劳动力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公共食堂是使妇女摆脱家务的一种方式。《人民日报》在其10月25日的有关食堂问题的社论④ 中，引证了列宁的有关论述，

---

① 指约翰·吉廷斯。——译者注

② 约翰·吉廷斯：《中国军队的地位》，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出版，第211页。——原注

③ 引自埃丽斯·乔菲：《党与军队》，1965年出版，第90页。——原注

④ 指《办好公共食堂》。——译者注

并以河南省下述情况为例来反复说明这个问题，该省实现公共食堂化以后，每个社员一天可以多出 3 个钟头的时间来进行劳动或学习。提高劳动生产率30%左右，同时使600万个妇女劳动力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该报承认实行集体吃饭“是改变全体农民的几千年来的生活习惯的大问题”，但是它争辩说，如果把公共食堂办好，初期群众的不方便、不习惯就会被克服。但是，仅仅两周之后，该报不得不再次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篇社论①，因为有相当多的食堂管理不善，而且它们中间有的只管饭不管菜。这篇社论透露，食堂运动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将农民的小块自留地由公社接收过来进行统一经营。

被一种幻想的前景所支撑的公共食堂制为劳动力提供了实际上的好处。《人民日报》10月 1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曾指出，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许多公社已经实行粮食供给制，或者是生活基本需要供给制。其中：

> “有的〔人民公社〕实行‘七包’或者‘十包’：即包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发、看戏、烤火费和结婚费等等。这种供给制当然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但它完全冲破了‘按劳取酬’的法权界限，适合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在‘公’的方面向前发展了，因此它应该属于共产主义的范围，是共产主义的萌芽。”②

据报道，农民们对保证下一顿有饭吃这个老问题得到解决非常高兴。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毛指出：“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

---

① 指《饭好菜也好》，《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0日社论。——译者注

② 吴传启：《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1日。——译者注

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①

尽管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曾讨论过免费供应膳食的问题（这显然是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来的），但是政治局在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里仍没有提倡这种做法。刘少奇后来也确实承认，食堂制只是在10月1日才由中共中央强制推行的。撇开意识形态上的好处不谈，实行“免费供给”制似乎是想要解决由于在公社中比较富有的和比较贫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混合在一起，旧工分制度的破坏，小块自留地的收回，以及大跃进期间长时间体力劳动等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有些吃闲饭的人少而干活的人多的家庭反对这种制度，说它会降低劳动热情并且使“懒汉”人数增加。在批判这种“落后”思想的同时，有些公社曾经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半免费供应、半工资的制度来应付这种非议。刘少奇9月份在视察江苏时承认，懒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完全消失，但是他赞成粮食供给制：

> “列宁说：‘共产主义的劳动就是不要报酬的劳动，是没有定额的劳动。’不管你钱多钱少，不管你规定什么定额，总是作得那么多那么好。”②

毛本人对完全的免费供给制是非常热心的，为了搞清楚这种制度怎么样才能建立起来，他曾在陈伯达和上海的一名宣传官员张春桥（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迅速升到党的高位）的陪同下访问了河北省徐水公社。

另外一个解放妇女参加生产的办法是发展寄宿小学乃至寄宿托儿所。而且，这种公共机构也被看作是一种从早培养儿童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观念的手段。青年人的报纸《中国青年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曾经用这样一些话来描

① 田生：《从人民公社展望共产主义》，《政治学习》1958年第10期。——原注

② 《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4日）。——译者注

绘儿童教育的社会化进程：

> “孩子们从小就在托儿所、学校里长大，大家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玩、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什么玩具、糖果、教室、阿姨、老师，以至院子里的向日葵和其他劳动成果都是大家的。这样，孩子们的头脑中就只有‘我们大家的’集体观念，而不容易产生‘我的’私有观念。集体生活，要有规律，要互相帮助，这就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和互助友爱精神。”①

寄宿学校运动显然是从刘少奇那里得到它的最初动力的。刘声称自己对培育共产主义幼苗感兴趣，在9月视察河南省一些公社期间，他曾经评论说：

> “托儿所应当发展全托，小学也要向学生住校方面发展。对小孩子要强调社会教育，不能把重点放在家庭教育上，当然家庭教育还是要的。党委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领导……。”②

一位来访的印度客人曾在一所公社幼儿园里问一位教师，孩子们是否想他们的父母，对方回答说：“我想不会，因为我们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他们在这里可以得到必需品，甚至得到许多生活舒适用品，而他们在家里是决不会得到这些生活舒适用品的。当然我这里说的是在过去”。哺乳的母亲和重病儿童的母亲可以在托儿所和幼儿园里短期逗留，但由于孩子们有受过训练的保育员和教师照管，母亲的看望总被认为是多余的。父母们必须摒弃他们的资产阶级情调，不必为他们的孩子操心，把精力集

---

① 《中国青年报》1958年10月25日。——原注

② 同上。

中在工作上。① 为了使父母们放心，政府要求托儿所里的儿童必须得到最高质量的照顾。邓小平总书记断言：

“照料婴儿将会成为〔未来〕最重要的〔工种〕。全国需要有2000万人去做这项工作……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育人民和培养儿童关心别人……。他们应该得到比大学教授更高的工资。” ②

新的生活方式要求新的膳宿供应体制。由于老年人不再需要充当儿童的照管人了。如果他们自己需要照料的话，家里也无人留下来照顾他们。结果，供养老年人的幸福院建立起来了。这意味着现在主要需要的是提供仅供一对夫妻使用的宿舍。一位外国访问者看到田野上堆放的一堆堆砖头，人们告诉他说，农民们正在为公寓楼打地基，准备用这些公寓楼来代替他们过去分散住的小屋。每个家庭将有一套一居室或两居室的公寓，但没有厨房。③ 另一位来访者见到过一位公社主任，这位主任显然已被谭震林提出的所有农民都住高层楼房的设想吸引住了。他说：

“‘你已经看到了农民的小屋，这种不舒适的小房子杂乱无章地散布在村庄各处。但随着人民公社的逐步建立，所有这种小屋都将拆除。实际上，我们已经着手拆除它们了。我们准备修建几幢公寓大楼。其实，本村和所有划归本公社的邻村的全部居民最后都将住在村中的一幢摩天大楼里。几年之内，我们农村的摩天大楼将星罗棋布，并将有设备齐全的厨房、餐厅、服装店、学校，体育馆等配套设施’，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好让中国农村公社这种摩天大楼星罗

---

① 钱德拉-塞卡尔：《今日共产党中国》第55页，57页。——原注

② 《红卫兵》1967年第[illegible]期，——原注

③ 沃拉斯顿：《中国的早晨》，伦敦，卡伯公司，1960年出版，第48页。——原注

棋布的景象铭刻在我的头脑中。

他问我，‘他们告诉我说，你经常访问美国。美国人的村子里有摩天大楼吗？’我回答说：‘没有。’他信心十足地断言：‘我丝毫也不怀疑我们将在这方面超过他们。’”①

第四节 提倡共产主义道德

生活集体化必须有共产主义觉悟加以配合，使其互相滋养。宣传工作者王力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说：毛将大跃进的奇迹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巨大干劲和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王举出群众性的兴修水利和大炼钢铁运动作例子，将共产主义劳动解释为“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计较报酬条件的劳动。”② 这种自愿的劳动本身也形成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这以前，由于毛的亲自敦促，整个物质刺激的问题已经成了群众辩论的题目。

上海的宣传工作者张春桥大概受到陪同毛一道视察徐水一事的鼓舞并得到这位主席的鼓励，他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方式发动了这场辩论。他论述说，资产阶级法权是工资制的基础，他将此时的工资制同1949年以前解放区实行的“供给制”——这种制度下，食品和其他主要必需品是免费配给的——作了对比：

“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

① 钱德拉-塞卡尔：《今日共产党中国》，第51页。——原注

② 《发扬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红旗》1958年12期，第25页。——译者注

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①

这种对延安“作风”的怀念，在大跃进时期的许多作品中是很典型的。和张春桥一样，许多作者显然都把大跃进看成是恢复党在传奇般的延安时期那种纯真的革命热情的机会。张引用长征精神，轻蔑地批驳了那种认为劳动热情只能靠工资制来刺激的思想，他把这种思想说成是“用金钱挂帅代替政治挂帅”。他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采取“按劳取酬”的办法，但他争辩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应该使之制度化并加以发展。②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张无疑都是符合毛的看法的，毛曾把工资制看作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让步，并且宁愿依靠“提倡革命精神”而不是依靠物质刺激。

张春桥的文章由毛加上一个简短的、没有署名的、基本肯定但多少有点模棱两可的“编者按”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了。③这时，新闻界正在报导上海及其他地方的许多工厂取消计件工资的情况。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在一个产量迅速增长的时期维持一套让人满意的劳动定额无疑是困难的，并且确实也是不必要的。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是想要避免因工资的大幅度增长将会带来的成本的提高和通货膨胀的压力。除了这两个实际原因之外，还隐含着这样一种认识：大跃进的热情将会使物质刺激的效果大大降低。正如张春桥的谨慎评论所主张的那样，即使计时工资制作为仍然适宜的东西保留了下来，但不管怎么说，计件工资制在1958年间从全国各地消失了。

---

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译者注

②③ 同上。

第五节　新时期的教育问题

灌输新的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条件是革新教育制度。而其中最主要的变革就是实行体力劳动和学习的有机结合。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对教育制度的改革给予了强有力的推动，尽管当时毛的论述远不如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论述那么明确。在第48至50条中，毛提倡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有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他只提倡这类学校的学生实行半工半读。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农业学校可以、而农村里的中小学则应当同当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生产劳动。但在城市，大学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①

在毛探索有关学生更多地参加体力劳动问题的同时，刘少奇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他主张努力为青少年提供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以满足他们对教育的强烈渴望。1957年他在外省视察期间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刘发现，在山东、江苏两省，有一半的农民家庭中的学龄儿童没有上学。一部分是因为那里没有学校，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负担不起供他们上学的费用。②

---

① 《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第[illegible]—75页。——译者注

② 参考陈道源等著：《替"两种教育制度"恢复名誉》，《新华文摘》1980年第6号第198页。——原注

在全国范围内，情况最为严重的大概要算13—16岁的初中年龄组的孩子了，他们有3700万人，其中只有大约700万人在上普通中学。早在1957年11月，刘就建议共青团中央研究一下美国大学的经验——美国大学生有2/3半工半读——看中国是否可以个别试办。① 接着，在1958年5月7日，他再次对共青团中央谈到这个问题。5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专门谈了自己对半工半读的看法。刘指出，学生们都想继续升学；而工厂中许多初、高中毕业的青年工人感到他们整天在工厂工作，没有希望进一步深造，因而闹情绪。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当地开办半工半读学校，这样可以满足青年们的升学要求，而又不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时也可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大量有文化的技术工人、技术员以及大学毕业生。② 除了满足青年人的升学要求外，刘强调开办半工半读学校的另一个理由是需要培养受过技术训练的青年人。在1957年，有将近130万中学毕业生，其中80万不能继续学习。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技能，因而不能胜任工作。他提出开办半工半读学校的第三个理由是需要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③

到刘少奇5月份批准开办半工半读学校时，这类学校已经有好几千所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大概根据3月7日中央书记处的讨论情况，于3月中旬为这类学校开了绿灯。这些“民办学校”的主要形式是农业中学。它们为那些仍很年幼而不宜整天参加田间劳动的青少年提供一些农业科学方面的知识，同时也为他们提供政府打算逐步引进和推广的现代化农具和机械的知识。另外还讲授语文和数学课程。学生们用一半时

① 《新华文摘》1980年第6号第198页第1行。——原注

② 《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换新天’红卫兵代表大会”编印，1967年5月，第34页。——原注

③ 《新华文摘》1980年第6号第199页。——原注

间从事生产劳动，一半时间上课学习。尽管他们的劳动所得用以办学，但有些学生还可以得到零花钱。到1960年，这类学校已达到30000所，学生差不多达300万。

负责推行以全日制学校和半日制学校为内容的“双轨制”教育制度的是刘少奇（他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负责主管整个文化领域）和陆定一。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没有预示到这种半工半读学校，尽管他已清楚地意识到有必要正视这个问题。他曾提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增加国家的负担。同时，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乎条件的人入学。不过，毛的这些建议并不能像刘少奇的建议那样有效地解决失学问题。考虑到这一点以及刘在推行双轨制教育制度上的开创性作用，人们可以部分地理解毛的不满情绪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对刘的指责。①

“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来指责教育“双轨制”，肯定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显然曾同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该指示在北戴河会议之前起草并经这次会议讨论后，于9月19日正式公布。指示中特别强调开办全日制和半日制学校是办学形式多样化的有效措施。②要是刘少奇和陆定一曾反对将体力劳动安排到全日制学校的课程表，这倒是有几分理由可以说在1958年的教育战线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点。相反，倒可以说，刘的观点比毛的表现得更为激进、更有系统性。此外，刘所关注

---

① “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在天津关于半工半读的讲话被指责为是反对毛的，是对毛关于武汉和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蔑视，并指责刘以半工半读的倡导者自居……。——原注

② 此联合指示见《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9号第1—4页。指示中提到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而非人民公社，这说明该指示是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起草的。——原注

的是政治问题——对教育的需求；而毛所关注的是意识形态问题——人人参加体力劳动。

在1958年初，毛、刘及其他领导人对在学校中引进生产劳动的问题都很谨慎，而且都希望确保全日制学校的教学质量。从春到夏，他们在推进半工半读学校的发展中都明确认识到，这类学校的教学质量显然比不上全日制学校①。但北戴河会议之后，毛、刘和陆定一都鼓励在全日制学校里逐步开展生产劳动，而且刘提出的建议比毛的更为具体。

8月13日，毛在视察天津时曾对一些高等学校兴办工厂的做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当时以及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都赞扬了这一举动，并且还嘲笑了把农学院建在城里的做法。②接着在9月9日，他向最高国务会议发表讲话时指出，教育的中心问题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在指出俄国人也在采取同样的方针后他继续说：

> "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③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毛在湖北视察时支持学生提出的半工半读以及学校普遍办工厂的要求。

刘少奇在9月份外出视察时，公开发表了他7月初在石景山所作的一次没有报道过的讲话中曾经表达的看法。在9月16日到18日视察河南期间，他向一些普通中学和大学推行半工半读制度。他说：

> "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

① 《陆定一反对毛泽东思想》第19页注19。——原注

② 《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1934—1966）》。——原注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41—242页。——原注

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半工半读，可搞到高中，也可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三小时上课，或者四小时劳动四小时上课，要比较稳定，搞他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①

在9月19日到28日视察江苏期间，刘的观点更进了一步。他声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把工厂同学校合并起来。过去，工厂和学校是分开办的，今后要逐步合为一体。一个新工厂就是一所新学校。工人们也是学生，而且他们将由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联合招收。他们在经过初步训练后，将实行半工半读制度，学习初中到大学水平的课程。这样就能更快地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培养真正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到这个时候，刘的主张看来已前进了一大步，从提倡双轨的教育制度发展到了设想不仅使两种教育制度而且使教育和工业都合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似乎并没有对刘少奇1958年9月间有关教育问题的言论进行攻击。

到这个时候，刘少奇的主张显然远远超越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联合指示所确立的路线。而作为一个地位较低的官员，陆定一所能做的只是在他那9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的文章中，阐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联合指示精神罢了。②"文化大革命"中极力攻击这篇文章的反毛情绪，这是站不住脚的，

① 《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人民日报》，1958年9月24日。——译者注

② 陆定一的文章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红旗》1958年第7期第1页。——译者注

只要将他的文章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来。对陆和其他人的最严厉的指责也许是说，他们决定在损害无产阶级政治的情况下来维护教育质量。然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联合指示中也强调了保证“全日制”学校的教育质量的重要性。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联合指示以及陆的文章可能是在7月或8月初以前起草好的，考虑到毛、刘此时的思想，它们的主张看来已过时了。

在教育部门，对新政策的公开反应正如预料的那样强烈。但是在私下，许多教师担心这将是教育战线上的大灾难。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师生在乡下呆了10个月，其效果使该校校长大为失望，而且据这位校长说，农民对此也很失望。福建农学院为了让学生参强生产劳动，曾停课达8个月之久。一位到昆明一所小学（安置在一座显然作过古代佛教庙宇的屋子里）访问的英国人，看到这样一条刷在陈旧的木门上边的标语：“我们是学生，同时也是工人；这是我们的教室，同时也是我们的车间。①”在重庆的一所小学里，他发现学生们的体力劳动包括割草、拔掉路上的杂草以及打扫教室。

> “或者离开学校到当地一家汽水厂去干些零活，使他们习惯工厂的环境。当我说到在英国，7岁的儿童在工厂里干活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那位一心只想着总路线的女校长却对此不以为然。她说：‘教育的宗旨是教会孩子们工作，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动手去做。’”②

这位访问者谈到了小孩子中普遍存在的收集废铁的热情。官方的报道还详细记述了他们在中学和大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将收集来的废铁炼成生铁和钢的情形。到8月底，据说已有11个城

① 沃拉斯顿：《中国的早晨》第91—92页。——原注

② 同上，第87页。

市的18所高等学校可以炼出近70万吨钢。在南京和广州，有34所中学拥有各式各样的土高炉。在济南，一些中学在7月份的一个星期里就安装了77座土高炉。到10月份，河南在这方面再次走到了前列。该省宣布洛阳12所小学联合建造了一座钢铁厂，开工后的第一个月就生产了130吨“优质”钢，并且现已达到日产40吨的生产能力。在这里，多半是由7岁到9岁的孩子收集原料，每天劳动2小时。而钢厂的大量实际操作则由教师和10岁以上的学生负责。“由于学习、劳动和休息的节奏安排得当，学生的身体更健康了，体重也增加了。”①洛阳的创举甚至受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的赞扬，而这也许导致儿童体力劳动时间的进一步增加。到第二年，当刘少奇的9岁儿子在长达8小时的紧张劳动后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时，他本人也肯定踌躇起来了。

第六节 土法炼钢运动

毫无疑问，中国的中小学生以及大学生们只不过是仿效他们的长辈罢了。自北戴河会议以后，全中国都投入到一场大炼钢铁的运动中，以努力实现1070万吨钢的新的国家指标。周恩来（据说他在北戴河会议上热情很高）被毛委派来负责这场炼钢运动②。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决定，因为在早些时候这位总理和他的同事曾反对搞“冒进”。但从他那充沛的精力和组织才能来说，这又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周担任了“钢铁大跃进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定期主持国务院的钢铁工作会议，并亲自组织各部之间的协作会议。他和8位副总理将全国分成地区，每人监督和视察一个地区的炼钢运动。周还动员科研机构的队伍上“前线”帮助群众炼钢。

① 《红领巾钢厂一片红》，《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7日。——译者注

② 《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之二，第287页。——原注

9月5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要求省报，要把宣传的中心从农业转到工业，特别是要转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上来。① 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要求全力保证钢铁生产。② 尽管毛本人仍继续讲农业和工业之间必须适当地保持平衡。但宣传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到9月中旬，已经有2000多万人在从事钢铁生产。据毛说，在炼钢运动的高峰，这个数字上升到了9000万。彭德怀后来断言，在1958年的最后4个月中，大炼钢炼运动共占用了900亿个劳动日。③

中国传统的钢铁工业中心辽宁，承担着占全国钢产量指标约44%以上的生产任务。在炼钢运动开始时，承担完成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钢产量指标的主要是中国的18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而土法冶炼主要用于铁的生产。但是到10月9日，可能是由于认识到依靠常规的途径不可能实现钢产量指标，《人民日报》便以社论的形式，号召开展群众性炼钢运动，与炼铁运动相配合。④ 结果，土高炉的钢产量在当月总的钢产量中所占的比例由9月份的14%上升到10月份的49%。在全国各地，农民、工人、职员、家庭妇女、学生甚至还有作家都响应了新的号召。《北京周报》的编辑对此作了如下报道：

"为了响应政府关于在全国开展大炼钢铁运动的号召，我们也着手在自己的院子里建土高炉。大家都纷纷出力。很快，有些人拿来了破锅、破盆和破壶，另外一些人捐献了旧砖和石灰石，还有些人交出各种零件杂物。就时间而言，一

---

① 《省报要首先抓工业宣传》，《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1958年9月5日2版。——译者注

② 《全力保证钢铁生产》，《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9月5日。——译者注

③ 《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原注

④ 《开展炼钢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10月4日。——译者注

座中国式的小转炉从开始建造到投入生产，在一天时间内就实现了。在这群人中，唯一能说是有些技术知识的是个年青人，他在我们的炉子投入运转以前曾参观过几座正式的高炉。我们最初试图使用'坩埚'炉炼钢，但失败了。现在我们使用自己建造的小转炉炼钢却一帆风顺。”

这篇报道说第一炉钢曾在实验室经过检验证明符合标准。①

在远离首都的中国最南端一个少数民族集聚的地区云南省，炼钢运动同样是热火朝天。一位英国访问者报道说：

“我们穿过稻田来到另一个村子，这里已经赶建了四座巨大的土高炉，到处人声鼎沸，一派忙乱的景象。有的人在搬运一筐筐矿石；有的在给炉子添燃料；有的驱赶着牛车；有的倾倒装有炽热溶液的大锅；有的站在摇摇晃晃的梯子上观察着炉子；还有的在用手推车装运冶炼过的料碴——虽然这些东西是从高炉底部倾泻下来的，但是在我看来这跟从炉口倒进去的原料没什么两样。”②

当我就此向公社主任询问时，他回答说，农民们已经“从报纸上”学会了建造高炉和冶炼矿石。接着他突然连珠炮似地愤怒声讨起来，以引人注意的方式突出反映了在1958年初秋那些狂热的日子里，中国干部是如何将生产运动和台湾海峡危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但除了从报纸上学会新的炼钢技术外，我们还从报纸上知道了美国的侵略行动。当帝国主义者在中东袭击阿拉伯国家时，我们中国正在进行着自己的和平建设。我们热爱和平……但是，如果美国人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将同他们作

① 《北京周报》1958年第34期第3页。——原注

② 沃拉斯顿：《中国的早晨》第115页。——原注

战。在这个公社，我们有1200名民兵整装待发，随时准备上前线同美国人作战。”①

那天晚上，在昆明的一个电影院里，银幕上打出了这样的口号：“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如同5年之后陈毅所承认的那样，在这种好战的、民族主义的狂热气氛中，没有谁敢对炼钢运动产生怀疑。②尽管邓小平至少可能已意识到这种土法炼钢的做法所带来的问题，③但甚至像彭真这样的实事求是的领导人，也曾赞扬了炼钢运动中采用的土办法。不过，虽然张春桥大力宣传，但即使在1958年，人们也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热情。根据彭德怀后来的记述，中央政府不得不为长时间的额外劳动支付了20亿元的额外工分，各省、市、自治区也另外支付了20亿元的津贴。而这又突然增强了社会购买力，对市场造成了“猛烈的冲击”。当然，土法炼钢的措施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几千万中国人在高炉旁的日夜苦战，使“钢”的日产量迅速增长，并且在12月中旬完成了1070万吨的全年钢产量指标。但是在田野上，粮食、棉花以及其他农作物丰收在望，等待着人们去收割。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酝酿之中。

① 沃拉斯顿：《中国的早晨》第115页。——原注

② 《文革风云》1967年，第9期，第28页。——原注

③ 邓小平在10月中旬视察河北时，曾提倡把土法炼钢变成洋法炼钢。——原注

第二部分

退　　却

第 七 章

武汉退却

第一节　少种多收

早在春天时问题就已明朗化了。1958年3月，两名被派到中国科学院的苏联科学家乘火车在华中地区作了一次旅行。虽然当时正值春播时节，可稻田里不见农民劳动的情景引起了他们的议论，后来他们找到了原因："我们每天都看到成千上万的烟囱，每天晚上可见炉火冲天。农民们正在贯彻党的指示，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矿山和土高炉前，积极参加'全民炼钢运动'"。[①]甚至在农民投入全民炼钢运动之前，那种工农业同时跃进的尝试就已引起"城乡争夺劳动力的紧张局面"[②]。截止1958年底，工人数量已由1957年仅仅900多万增加到2500多万。其中绝大多数为临时工或合同工，不享受劳动保险或免费医疗待遇。仅在四川省，工人的数量就增加了200多万；河南增加了100万。结果，1958

① 科洛契科：《一位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82页。——原注

② 陶鲁笳（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论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新发展》，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16日。——原注

年农业生产缺工达 100 亿个工日，约相当于正常投入农业生产的1/3的时间，尽管据说所缺工日的一半可通过改良农具来解决。

为了解决工农业之间的劳动力竞争问题，政府曾采取了一个权宜之计，即在公社中组织后备劳动力，这显然是为在需要时及时地充实到工业战线上去。在农闲时，全国约有40%的农业劳动力在从事工业生产，尤其是从事炼铁。在其他省竞相“赶超”的河南省，务工人数似乎达到了50%。当大跃进之年的狂热渐近尾声时，需要“生产突击队”返回农田，以便尽可能地抢收丰收果实，从并事其他重要的农活。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达关于突击完成农产品收购调运任务的紧急指示①。为调动更多的劳动力，停止了非重点基建项目，并动员学校师生，机关干部以及店员等各方面力量参加抢收工作。据官方报道，农民们：

> “劳动不计报酬，不计时间。哪里需要他们，他们就去哪里；哪里需要他们工作多长时间，他们就工作多长时间。他们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劳动着。他们在哪里劳动，就在哪里吃哪里睡。在他们中，有年青人，也有老年人，有妇女，也有儿童。”②

那些理智的突击队只干到半夜；而那些愚笨的、过分积极的突击队可能实际上连续工作四、五天。刘少奇在 7 月初一次谈话中主张劳逸结合，免得人们“永久地休息”。从刘谈话的上下文来看，这只是一个随便的忠告，而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指控的那样有别的用意。直到11月 9 日，《人民日报》才发表社论告诫人们“要注意保证农民的休息”。社论以赞成的语调提倡每月突击性的生产时间一般不超过一星期，正常的生产时间应占全月的2/3，其余3天为政治、文娱和个人活动时间；突击性的生产

①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3日。——译者注

② 《要注意保证农民的休息》。《人民日报》，1958年11月9日社论。——原注

活动时间每次以不超过两昼夜为宜，突击的时期一般也要保证每天有6小时的睡眠时间，青少年以及孕妇的休息时间应更多些。①如果这种作息时间能保障农民的休息，那么，突击性生产运动的艰苦是不难想象的。然而，毛却继续鼓励这种突击劳动。

既使搞了突击劳动，许多地区还是丰产不丰收，当然，还是后来承认的。在山东，由于秋收搞得不彻底，加之后来的灾害和浪费，造成粮食产量低于原计划指标。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承认："由于注意力集中于大办钢铁，对秋收工作的精打细收抓得不紧，秋收比较粗糙，浪费了一些粮食。"②在四川，虽然粮食丰产，但由于"思想工作和组织管理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粮食方面发生了严重的抛撒和浪费现象"。③据报道，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在私下尖锐地指出："虽然工业产量增加了66%，但与千百万人上山给农业带来的损失相比，究竟得到了多少？而损失了多少？"④

这篇当事人的评论为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大跃进提供了重要背景材料。即使今天中国已允许公开、坦率地评论大跃进时，人们也难以确切地估计1958年粮食损失的程度。一些地区的干部由于担心将来集体食堂粮食供应不足，因而储备了远远超出他们所承认的或者实际需要量的粮食，结果，"免费"供给农民的粮食大大超出他们原来预计的数量。浪费和虚报现象使得

---

① 《中国大陆报刊便览》1698号第14页。在广东省，由于儿童缺少休息，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患上了麻疹，参见《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3集，第36页。——原注

② 见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工作报告《在总路线的旗帜下继续前进》，《安徽日报》，1959年2月12日。——原注

③ 见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在省人大会上的报告，《四川日报》，1959年6月24日。——原注

④ 《薄一波的四十条罪状》，《红卫兵报》1967年2月第8期。——原注

本来就由于统计工作的薄弱而难以正确评价丰收的情况变得愈加困难。由于气候条件无疑是十分适宜的，所以粮食产量确实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统计资料的缺乏使得那些政治上受到压力、相互竞争的党的干部愈加提出了夸大了的产量数字，并促使其充满幻想的上级领导相信他们。

1958年11月至12月间，中国领导人召开了3个主要会议：11月2日至10日，河南郑州会议；11月21日至27日，湖北武昌会议；11月28日至12月10日，再次在武昌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成为武汉三镇的一部分之后，这次会议常被称之为武汉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或者甚至在私下，毛似乎从未对1958年粮食丰收的规模表示出丝毫怀疑。虽然11月30日他将“报假”视为当时的主要问题，然而紧接着他又宣称，1958年的粮食产量为3.75亿吨，比在北戴河会议上估计的2.5亿吨的最高指标还要高，比1957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还多；为稳妥起见，他主张在公开场合只宣布增产90%，即总产量为3.5亿吨，相当于比估计产量减少了6%。在12月9日八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毛再次提到干部不讲实话和虚报产量的现象，而现在却主张公布的数字为3.75亿吨，主要因为在这10天之内，这个数字已不再是所承认的最高产量，而是新的总产量4.3亿吨（估计白薯约占1/4）的大约12%的折扣数字。如果这样的折扣在毛的听众看来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话，那仅仅是由于他们实际准备接受的是一个降低了的产量。而这完全不符合中国和外国的农业生产经验。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持这种态度，主要是因为中国许多地方的实验田获得了较大幅度的增产，他们错误地相信这个成功可在全国普遍推广。当时持怀疑态度者则认为，高产只能在小面积里实现，大面积推广并不一定能够高产。然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这种观点，指出大小之间并没有隔着一条“天河”：“既然在小面积上可以这样做〔即取得高产〕，为什么不可以在大面积

上这样做？”①

《人民日报》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是因为深信，在大跃进期间，农业当局已经找到了成功的妙方。1957年10月，即在大跃进前夕恢复的《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有12条被列为取得农业成功之关键。1958年1月末最后定稿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将这12条进一步增至14条，虽然谭震林在1958年5月向党代表大会提交《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时，重点强调了6条，但在6月份，则提到了7条。同在6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的一篇文章②，其中在一处提到6条，而在另一部分内容中则提到了8条。北戴河会议前几个星期，由主管农业的高级官员主持的各省农业会议上也出现了类似出入。

北戴河会议前夕，谭震林在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③，试图将各种建议加以归纳，列举了夺取粮食丰收的8项“土办法”：水利、肥料利用、改良土壤、推广良种、合理密植、防治病虫害、田间管理和工具改革。这些就是最后确定的保证农业丰收的全部措施，但在排列次序和强调程度上可能有所出入，也可能逐步有所变更。

谭的这些内容在北戴河会议上被减缩为5项：水利、肥料、土壤、种子和密植。土壤改良具有了新的含义，主要指深耕，现在被称为实现增产的“中心”技术手段。有关深耕的特别指示是北戴河会议后就农业问题发表的5项指示中的1项（其他几项指示包括社会主义教育、水利、肥料以及除四害运动）。《人民日报》10月1日的国庆节社论曾以同样次序列出了上述5项内容，

---

① 《农业生产上的一个革命措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4日。——原注

② 即《在农业战线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58年6月10日。——译者注

③ 即《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译者注

但一星期之后，该报刊登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文章中则提出了略为不同的5项：水利、肥料、土壤、密植和田间管理。①

10月中旬，另一轮由多省参加的农业协作会议一开始，谭的8项公式——现已归功于毛——以最后的次序再次出现，它们是：水、肥、土（即深耕）、种、密、防治病虫害、改良工具和加强田间管理。这个由华北及东北各省参加的西安会议可能充分显示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谭的影响的高峰，因为此后的报道将谭排列在政治局资历较深的李先念之前。后来，在10月18日至27日期间的某一天，8项内容被最后简化为八字方针——水、肥、土、种、密、害、工、管——并由西安会议所称的“农业生产的根本法”改称为“农业宪法”。②

经过认真酝酿而最终形成的神圣的八字宪法充分表明，大跃进的倡导者正在探索一套便于掌握、宣传和有效运用的简易明确的农业发展公式，促使全国干部们作为扩大农业生产的动力。但是，制订千篇一律的方法并强行实施可能有利于工业生产战线，但应用于农业生产战线，尤其像在中国这样各地区环境差异极大的大国里，就会阻碍生产。八字宪法仅就农业生产制定了八条基本原则，而对于诸如如何将其实施、实施的程度以及时间、地点等主要附属问题未作明确说明，虽然这样做更稳妥些，但无实际意义。当毛、谭震林及其同事意识到这个概括性的方针的弱点，并试图充实更为明确和详细的说明以利于广泛应用时，已为时过迟。

毛对深耕之所以兴趣浓厚是受了中共河南长葛县县委书记的一篇文章的启发，继而在5月17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深耕和密植问题，并提出如果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

①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6日。——原注

②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0日，11月10日、12日。——原注

难道不行吗？显然，这位主席是先进经验可以无限推广论的倡导者之一。党代表大会结束时，毛与谭震林两次长谈了这个问题，并要谭震林积极推广；毛还指示各省要抓3个深耕的典型地区。①结果，深耕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之前的多省农业会议上得到了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此后，中共中央及时下达了与密植有紧密关系的指示。

实行大面积深耕和密植势必造成土壤的损坏。同时，在中国，这样做还需要有额外的劳动力及财力资源。结果很快证实，中国的农田不宜全面实行深耕与密植。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提出了后来称之为"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1/3的耕地用于集中种粮，1/3用于种树，1/3用于休闲。毛的这个想法，可能是受了山西省为解决劳动力不足而在年初制定的所谓"基本农田制"的启发。在北戴河会议之后首次举行的由华北、东北各省（包括山西）参加的农业协作会议上，这个问题显然得到了较为详尽的研讨解决，因为一星期后，《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些省的一些专区和县夺得高产的成就，并就此发表社论。②尽管这次会议有山西参加，但有关新的耕作政策却被称之为"卫星田"运动。这个提法显然是华北另一个省河北创造的，即主张占耕种面积10%的农田要成为高额丰产卫星田。几天以后，《人民日报》又提到"高产片"、"丰产田"或"基本农田"，强调这些发明都是实行毛提出的"三三制"的耕作制度的重大步骤。接着召开的东部各省农业协作会议决定，以播种面积的10%至30%（福建计划50%）为卫星试验田和高额丰产田，并带动一般田向高产发展。③这一决定为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执行"少种、高产、多收"方针开辟了道

① 谭震林：《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红旗》1958年第6期第10—11页。——原注

②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0日、24日。——原注

③ 《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0日。——原注

路。西北各省在其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上确定建立基本农田制，并在10%到15%的播种面积上，创造高额丰产卫星田以推动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的贯彻执行。南部和西南各省的农业协作会议同意将10%的播种面积作为高产卫星田，并同其他各省一样，将此作为实行“少种、高产、多收”方针的一个具体步骤。①

此后，许多报道详细介绍了各省为执行会议决定而制订的计划。走在前面的山西，1958年的播种面积已经比1957年的数字有了减少，现在又计划在1959年进一步削弱1/3的播种面积，使其减少到210万公顷。相对而言，其他一些人口较少，农业不占主要地位的北部和西部各省，例如内蒙古和青海，计划减少耕地面积21%。而人口非常稠密的“米仓”四川省仅计划减少8%多一点，该省计划将大约15%的播种面积作为高产田，并期望，1959年每公顷高产田的粮食产量能达到1958年每公顷7.5吨的10倍！甚至一般粮田的产量指标也确定为每公顷22.5至37.5吨。虽然东北吉林省也制定了类似的指标，但由于那一地带比较适宜大面积耕种而未计划减少耕地面积。

由于统计资料零散，因而难以将各省的计划与实际执行情况加以比较，但后来的有关报道证实了上述四川省的计划所表明的情况：那些人口稠密，处于中心地带的省份并没有冒风险完全采纳毛的“三三制”，即不打算依赖其以往的1/3的耕地面积来供养其人口。安徽省1959年小麦播种面积减少了约16%，广东的播种面积仅减少了7%，辽宁减少了8%。实行大面积耕种的黑龙江，耕地面积实际上增加了10%。河北和湖南的数字表明，1958年耕地面积已有少量减少。1958年至1959年连续两年减少耕地面积给这些省带来的影响也许是很大的。例如河北，1959年耕地面积只减

① 《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2日。——原注

少了7%，但这只是1956年以来连续减少中的最新一个数字，3年期间该省耕地面积已减少了130万公顷，差不多占总耕地面积的14.5%。既便如此，这个数字也远远低于毛所提倡的1/3。此外，人们应该知道，如果实行复种，耕地面积的减少并非意味着必须减少播种面积。山东省，1957年至1959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10%以上，但1958年小麦播种面积减少了9%，1959年却上升为13%，使小麦的播种面积超过了1957年的数字。同样，安徽省1958年也出现了耕地面积减少，而播种面积增加的现象。

尽管有些省委书记在执行"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中非常谨慎，但1958年粮食播种面积还是减少了600万公顷，1959年继续减少了1160万公顷，两年来共减少了13%①。显然，参加1958年11月至12月间召开的几个会议的中国高级官员中，几乎没有人意识到统计错误的严重程度，而他们盲目乐观的跃进计划正是根据这些统计资料制定的。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毛再次提倡"三三制"，这表明尽管毛承认"农业宪法"只管地，不管天，管不了日照和空气，但他并未意识到放慢农业跃进步伐的必要性。他们这种对粮食产量的盲目自信，的确可以说明为什么八届六中全会在其他战线出现退却的情况下却仍表现得若无其事。正如后来一位外国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党的干部们：

> "倾向于将考虑诸如灌溉、排放、渗漏、地下水位、湿度保持能力、盐碱度、水流量、水污染以及防洪等诸类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看成为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在1958年至1959年的狂热年代里，很容易使中国共产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大自然是变化莫测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而转变的。动员千百万人民在短时间内建造

---

① 《中国农业年鉴》（1980年），第34页。——原注

出数量惊人的水利工程，这可能会感动其他的国家和人民，但却感动不了大自然。”①

到八届六中全会时，毛显然仍对去年水利建设方面的成就留有深刻的印象，这一点可以解释他对农业跃进依然保持乐观的原因。一位受过科学教育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曾说服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元帅带他去见毛，并送上一份报告，说如果将一个苹果放在南瓜里，这个苹果将会长得跟南瓜一样大。虽然无法考证主席的反应，但是，如果没有预料到那种令人鼓舞的接见的话，这位资历很浅的官员似乎不大可能如此轻率地去骗取与主席会见的机会的。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们后来为了替这位主席在大跃进期间的过火行为开脱，不公正地指责谭不断压省委书记们在农业中使用新的农具、夺取高产的做法是“左”倾。毛的态度完全可以为谭的这些做法辩护。在当时，毛所做的只是温和而适度地批评了西安农业协作会议（这间接地批评了谭震林，因为他是这个会议的主持者），说它过分强调粮食生产，而忽视了经济作物。10年后，刘少奇，时而连同邓小平一起也被指责对推行少种、多收的方针负有责任。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在这个方针的实行中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倘若指责大跃进的支持者对1958年下半年的过火行为负责的话，那么“有罪的人”当然包括刘少奇、谭震林以及其他的领导人，但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毛。②

---

① 安东尼·唐：《农业政策与实施》，载艾克斯坦，盖伦森和刘大中合编的《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势》（1968年出版），第497页。——原注

② 对刘少奇的批判见《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35页；《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33页；《刘少奇生平大事编年（1899—1967）》。在这些批判材料中，邓小平也受到攻击。——原注

第二节　重新考虑钢产量指标

当毛对过高估计的1958年粮食产量十分乐观的同时，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含蓄地承认了全民炼钢运动完全缺乏现实的可能性，并告诫其同事不要让“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在已生产的万吨钢中，好钢仅有900万吨。1959年秋，这个数字进一步减少到800万吨。开展土法炼铁运动后仅2个多月，毛就准备私下承认这是一个错误。这一退却行动可以从他对未来钢产量预测的修改上更加明显地看出来。9月份时，毛曾认为，中国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将达到3000万吨，1960年将达到6000万吨，1962年将达到8000万至1.2亿吨。而现在，毛意识到这些指标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因而提出要把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改为1800至2300万吨，1960—1961年改为3000万至4000万吨，1962年改为5000至6000万吨。尽管毛仍抱有幻想，但显然正在努力将这种幻想与现实结合起来。早些时候，毛曾承认，以前制订的1959年3000万吨钢产量指标中有1000万吨是“主观主义”，并补充道，事非经过不知难。①

毛似乎是在1958年11月上旬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开始觉察到钢产量问题的。毛抵达武昌后（即11月21日之后），即开始重新考虑钢产量指标。12月9日，毛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宣布，最近在郑州会议上制定的15年经济发展纲要至少需搁置到1962年，因为是否有可能及是否需要，都缺乏根据。②这显然引起了那些不了解整个暂缓计划原因、而且特别积极的干部们的惊恐。就毛本人而言，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他在前往武汉途中突然对钢铁问

① 《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52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65页。

题的看法发生转变。或许由于毛抵达武汉后，可以亲自现实地估计土法炼钢的实际意义；或许在中国主要的钢铁生产中心之一武汉，企业的领导们大胆地暗示了实际情况。毛肯定已意识到，由于向全国各地运输煤炭以满足全民炼钢运动所需的燃料，造成了交通运输的紧张局面。

在郑州时，毛可能仍然受大跃进的开路先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影响。至少，周恩来在郑州会议上并未积极提倡现实的目标。但在这之后，总理——早在8月份就指示对大跃进的进展至少进行一次重要的调查研究① ——和他的那些高级经济官员，可能向主席汇报了有关的实际情况。后来据说与毛有着特殊关系的王稼祥（中共中央委员，曾担任过政治局委员）对毛在武汉的思想有所影响。不管怎样，毛在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为可能被大跃进的积极鼓吹者指责为"机会主义者"的计划部门官员辩护。毛特别批评了在这之前被免职的商业部部长杨一辰想趁机而起，打倒周恩来以及另一位商业部部长陈云的企图。同时，毛还阻止对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现实主义的计划泼冷水。② 作为回报，周恩来则为毛的过热的做法给予辩护。不过毛在一段令人吃惊的讲话中不得不承认：

> "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2070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打炮三件事，别的事情没有想。北戴河会议决议现在要改，那时是热心，没有把革命热情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武昌会议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决议要改，两条腿走路，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实际精神。"③

最值得注意的是，毛现在开始强调计划工作者们所赞成的提

① 见习仲勋在《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之三的记述，第18—19页。——原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58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258页。

法——计划要积极可靠，放在稳妥的基础上，互相协调，顾全大局。主张全国一盘棋——这个提法在后来的几个月被反复强调。①此外，毛显然准备容忍计划部门官员就全民炼钢运动中的问题征求苏联人的意见。周恩来大胆地下令一个公社（这可能是一个示范公社，因为周恩来陪同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来这里参观过）停止炼钢。理由是这个公社既缺矿石、燃料，且又没有掌握炼钢技术。这是在一位外国领导人面前采取的一个异乎寻常的措施，表明这次参观可能令人十分窘迫。不过周的指示当时并没有公开。②

第三节 人民公社理论上的退却

早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时，毛就已意识到有必要抑制那些急于求成的干部们，这些干部曾受到刘少奇以及毛本人的讲话的鼓舞，认为中国可以在3至5年的短时间内由人民公社跃进到共产主义社会。毛告诫全党说："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即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即人民公社〕走向全民所有制〔即国营农场了；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③

毛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另一次讲话中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承认"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认为建成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包括在人民公社中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转变。④毛不赞成那种把人民公社看成像鞍钢一样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看法，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52页。——译者注

② 《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之三，第6页。——原注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47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250页。

并且指出，如果不讲这种所有制之间的区别，那么社会主义建设就没有实际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增加社会产品，加速向所有制的更高阶段发展。毛还认为，“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一是由社会主义目前到全面全民所有制，一是由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将来过渡完了，公社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机构。”①

陈伯达是毛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责的那些急于求成的“同志”中的一个，他曾提议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这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才透露出来的。令人奇怪的是，它并没有解释在大跃进期间始终与毛的思想保持一致的陈伯达，怎么会在郑州赶到毛的前面去了。② 很可能陈的提议至少得到了毛的默许。然而，由于郑州会议的讨论情况表明这个提议将会引起与会者思想上的混乱和反对，所以毛不得不对此加以否定。

毛在努力纠正思想上的急于求成方面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刘最初积极支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夏季时，他曾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近郊的人民公社参加劳动。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产“卫星”被宣布出来，刘评论道：“我们在受骗。”当徐水人民公社宣布已进入共产主义时，刘还亲自进行了调查。尽管他发现徐水的说法纯属愚蠢的胡言，但他没有明说，这显然是为了不挫伤干部的积极性③。刘的行为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反映，只有当毛表态了，他的同事们才能跟着采取行动。

毛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肯定已传达到随后参加武汉会议的代表中，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在武汉会议上过多地论述向共产主义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50—251页。——译者注

② 李锐：《怀念田家英》，载《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4期，第172页。——原注

③ 《红旗飘飘》第20集，第185—187页，242页；安子文：《把我们的党建设好——纪念刘少奇同志》，《人民日报》1980年5月8日。——原注

过渡的两个过程问题。①八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则详细地阐述了农村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两个过程以及最初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都是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将意识着普遍地建立县联社。正如北戴河会议所计划的那样，这个过程可能需要3至6年的时间。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仍需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有当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才有可能实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原则。建议人民公社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只能使共产主义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②。毛在私下曾大胆地规划了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15年至20年，或许更长一些时间。③而决议则相当谨慎，指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化国家将需要经历15年、20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毛逝世后，所有这些论点都被嘲笑为"穷过渡"，并把责任全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第四节　安抚莫斯科

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较为温和的观点，几乎可以肯定是为了安抚莫斯科。毛本人承认，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针对国际上那种尊重人民公社运动的热情，但又反对它操之过急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舆论。④显然，在过去几个月里，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国施加了压力，最后竟而发展到赫鲁晓夫决定召开一次党的非常代表大会⑤，以促使中国人的思想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62页。——译者注

②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译者注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57页。——原注

④ 同上，第261页。

⑤ 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译者注

观点能纳入苏联人的轨道。这种压力终于发生了作用。苏联的诱饵是许诺经济援助。此时，中国人已认识到，如果要保持他们的工业发展速度，这种经济援助是相当重要的。

尽管中共中央作了公开退却，但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人民公社化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在政治、外交以及思想领域都是极其重要的，他不可能停止自己的批评。不过，虽然他肯定知道毛在私下仍准备使人民公社化运动偏离公开的路线，但他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还是采取了适度的调和姿态。虽然他坚持社会主义阶段是不能"随意违反或超越的"，但实际上明确接受了中国关于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之间没有任何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观点。在关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速度问题上，他主张既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同时又不能"急于求成，草率地采取尚未成熟的措施。"

在对毛的态度上，赫鲁晓夫完全改变了苏联著名哲学家措·亚·斯捷潘尼扬先前提出的一个主张。在苏联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十分恼怒时，这位哲学家曾极力反对中国的观点，宣称欧洲的共产党国家将作为一个整体首先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其后，亚洲共产党国家也作为一个整体一起进入共产主义，即中国应该等待朝鲜和越南北方。大概是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解释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指出，即使在将来我们具备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时，也应由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这样做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利"。而且要看到，苏联现有物质基础比我们雄厚得多，他们有比我们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① 但一个月后，赫鲁晓夫一反斯捷潘尼扬所提出的上述观点，提出所有共产党国家都将"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这是

① 《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摘编》，北京，首都红代会人大三红批刘邓第一支队编印，1967年4月，第47页。——原注

唯一在后来被中国称之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创造性”贡献的观点。然而，引人注意的是，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言时也明确指出：

> “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是统一的经济体系。越往前发展，这些国家之间将越广泛地实行经济计划的协作，发展较快的国家将帮助发展较慢的国家，以便结成统一的阵线越来越快地向共产主义前进。”①

尤金应该比绝大多数苏联人更清楚，呼吁尽可能将中国的经济和苏联以及东欧的经济广泛地结合起来，对中国来说不过是白费力气而已。

毫无疑问，赫鲁晓夫能够在诸如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一类问题上显示出调和的姿态，是因为这些问题仅涉及到理论而不是现实，尤其是中国人在武汉会议上出现退却之后，更是如此。此外，赫鲁晓夫可能曾期望，毛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决定能在武汉会议得到最后批准，并在随后宣布，这样的话就将预示着毛本人以及他的那些使苏联人感到不舒服的思想观点的影响会有下降。然而，人民公社依然存在着，而这意味着对苏联传统的集体农庄的具体挑战，因此只得对此不指名地加以谴责。赫鲁晓夫宣称，集体农庄能够在今后的一个长时间里继续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过早地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搞平均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没有物质刺激，就谈不上引导千百万人走向共产主义。②

中国人暗示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赫鲁晓夫关于集体农庄的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文献》（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1月，第1046—1047页。——译者注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文献》（上册），第110—111页。——译者注

主张仅仅适用于苏联。他们不准备删去《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开头那引以为自豪的句子。决议充满诗意地描绘道：“1958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①]接着规定：“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②]决议准备承认的只是，有必要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的5个月时间里，“对本地区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教育、整顿和巩固的工作，即整社的工作”[③]。

此外，尽管毛在人民公社的问题上对苏联采取了和解的态度，但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却进一步采取措施，削弱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整个经济模式，尤其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推崇。毛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之一，主要就是针对斯大林在经济学方面的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毛提议省委、地委要研究这本书。虽然毛指出前三章的许多东西是正确的，却又认为“有些地方可能是斯大林自己没有搞清楚”。斯大林没有把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主要靠“一条腿走路”：只注意了重工业，而没有注意轻工业和农业。过分强调技术和技术干部，“只看重讲技术，讲技术干部，只要干部，不要政治，不要群众，这也是一条腿”[④]。毛还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后附的“答阿·弗·萨宁娜和弗·格·文热尔两同志的信”进行了批评。斯大林曾在信中拒绝了这两位经济学家提出的把集中在农机站的基本生产工具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作为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办法。毛认为这封信“差不多完全是错误的”，表明斯大林“很不放心和不

---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第110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12页。

③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第125页。——译者注

④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47—248页。——译者注

相信农民，对农业机械啃住不放”。斯大林的辩解只是自己骗自己，而且他没有找到实现两个过渡的很好的方法和道路。① 几天以后，彭真对北京的干部们说，赫鲁晓夫在向集体农庄转让拖拉机的问题上远比斯大林进步。②

毛的上述评论是对《论十大关系》讲话和成都会议上的讲话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不过，他一反迄今为止只对苏联经济政策进行一般性批评的做法，开始转向对具体人的批评。这种对斯大林经济思想的直接而又广泛的抨击，意味着毛已把这位苏联已故领导人看作是主要错误的责任者，他不仅在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上——这一点或许由于不了解中国情况而可以谅解——甚至在苏联国内这些重要的问题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实际上可以说，毛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标志着中国人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公开维护斯大林的立场发生了某些转变。在那篇文章中，中国人曾赞扬这位已故苏联领导人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③ 这种政策上的改变可能反映了毛此时对斯大林观点的认识。显然，毛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会令人大吃一惊：只是最近他才费心地认真研究了这部早在6年前就已出版、并被誉为以马克思主义分析现代经济问题的权威著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们从中就可以对毛和苏联现在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了解。但尽管如此，毛仍打算更多地批评斯大林，至少在党内如此。同时还决定准备编写体现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48页。——译者注

②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编印，1967年5月，第40页。——译者注

③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译者注

毛的思想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 这一切可能大多是由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的结果。

1958年底和1959年初，北京与莫斯科之间实现和解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提出的一项中苏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建议遭到周恩来的否决，也就不足为怪了。[2] 这表明，中苏和解是经过双方均能对对方的要求作出单方面让步的努力而达成的，而不是采取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那种暗中激烈地讨价还价的方式。毫无疑问，中国人对赫鲁晓夫向一个重要的"帝国主义"分子——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表露他对人民公社的蔑视这一不友好的举动非常恼火。中国人的怨恨情绪，不会由于周恩来1959年 1月至 2月参加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时，得到苏联为中国的工业化计划提供新的重要援助的许诺而消除。但是，周恩来与赫鲁晓夫之间达成的一个建设78个新企业的经济协定——价值50亿卢布，中国将通过出口方式偿还债务——看起来至少表明了恢复两国之间伙伴关系的共同愿望。此外，苏联于1959年初成功发射第一枚宇宙火箭，中国为此欢欣鼓舞。这一成就使毛的中苏联合起来，成为一股强劲的东风的愿望更为强烈了。但是，在这之后不到 8 个月，中苏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就开始走向破裂。

---

① 有关这一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见《北京周报》1958年第35期，第18页。——原注

② 《贺龙在登山运动方面的罪行》，《体育战线》1967年2月9日。贺龙自1959年9月起任国家体委主任，他曾在1958年主持中国登山协会的筹备会议。——原注

第 八 章

毛泽东转右

第一节 整　　社

人民公社理论上的退却部分是出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政治需要，同时也是针对中国当时的具体问题作出的反应。武汉会议作出的“检查”或“整顿”人民公社（即整社）的决定，正是为了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为期5个月的整社过程，也正是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召开的时期：1959年1月27日北京会议①；2月初省委书记会议；2月27日至3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25日至4月1日上海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接着于4月2日至5日仍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武汉会议（即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下同。——译者注）和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全国各地纷纷召开了省级党的干部会议和农村干

① ……北京会议大概是另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据我的考证，这次会议是在27日举行的，因为毛在一个讲话中曾说，1月27日曾详细讨论过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问题……7年后毛所说的只开了不到一天的会议可能就是指此次会议。对这次会议毛很不满意。——原注

部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明显暴露了基层存在的尖锐矛盾。这些矛盾同样反映在党的领导人的讨论中，并促使毛朝着正如他本人所说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方向转变。

整社工作在武汉会议的文件下达之前就已开始，并且由于官方的积极支持而深入到群众之中，他们以张贴大字报的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自由、坦率”地发表意见。然而，在没有进一步征求农民意见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就在武汉会议上作了一个有重大变化的决议：放松人民公社化初期提倡的军事化纪律。《红旗》杂志9月份提出的“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①]——此时被扩展为“四化”，增加了“管理民主化”。《红旗》杂志在提出“三化”时，曾否认“三化”可能导致命令主义。然而，武汉会议的决议[②]表明，党的领导人非常担心实行军事化制度将会妨碍“人民公社的民主生活”。所以增加了第四条“管理民主化”以鼓励农民大胆讲话，抵制这种倾向。

尽管整社过程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支持，但群众的热情并不很高。这是由于武汉会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语言表达上过于审慎的缘故，它以官方可以接受的方式，首先肯定人民公社的成绩，而将缺点错误列为次要的位置。这也正是基层党委所采取的方式。

武汉会议结束后不到一星期，各省纷纷召开党委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主持了有3000名干部参加的为期9天的秘密会议，提出的建议之一就是组织有3万人参加的整社检查团。其他省相继仿效。根据毛对钢铁生产的新的考虑，山东省禁止再建任何“土高炉”。其他省则要求改变钢

---

① 《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红旗》1958年9月第7期第15页。——译者注

② 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译者注

铁生产的方法，以国外的或者现代化的生产方法来取代土法炼钢。有关各省会议的报道，其共同特点是都对1959年更比1958年好而抱有十分乐观的态度。然而，下面这段河南省的新闻报道更现实地评价了当时农村的形势。据河南省委的整社计划①说：

"在干部和群众中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参差不齐，有些政策界限不清，还存在一些糊涂思想；在生产上虽然有了初步秩序，但尚未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注意了工农业生产，对发展多种经济有些忽视；在大跃进形势下，对群众生活关心不够，生产、生活缺乏同时安排等等。"②

第二节 广东省的"本位主义"

东南亚的华人通过其广东、福建的亲属，了解到华南地区人民公社出现的令人料想不到的局面。例如，他们强烈地抱怨财产被没收充公，说"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家庭所有的财产都成为政府的财产。公社可以为所欲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③"现在全部东西都属于人民公社所有，任何人都没有私人财物"。④"你知道吗？缝纫机必须归人民公社公用……我已同五爷、三妹和家里其他人商量好了，打算尽快把缝纫机卖掉，不过缝纫机的价格特别低，因为卖的人太多了。"⑤"现在，每个人都要拿个人财产去'投资'，似乎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懂得'投资'究竟是指什么意思。我

---

① 指《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今冬明春整顿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的方案》（1958年12月23日）。——译者注

② 《河南日报》1959年1月14日。——译者注

③ 理查德·L·沃克：《人民公社来信》，纽约，新领导者出版社，1959年，第16页。——原注

④ 同上，第18页。

⑤ 同上，第18—19页。

们被告知必须把个人的东西上交给政府，那就是‘投资’”。① “个人的银行存款全都用来投资，或被官方没收。从海外(如从东南亚的亲属)寄来的汇款，只给我们一小部分，其余的全都拿去作公共基金”。② 毛计划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食品问题是各省和中央关注的又一个主要问题，也是中共中央内部意见激烈分歧的焦点。福建省厦门市一位教师在10月28日的来信中预计明年将出现城市食品供应的危机，他抱怨说：“几个月来我们没有吃到一斤肉或一块鱼。每个人都生活在同样的处境下。我们什么吃的都弄不到。”③ 公社食堂仅供应以大米或白薯为主的基本膳食；而每天0.908公斤的大米对于那些每天工作18个小时的人们是根本不够的。据一封来信者说：“每次开饭时，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涌向饭桶，但米饭总是不够”④。此外，即使偶而发现了副食品，也几乎很少有人能买得起。“猪肉1元钱1斤。公家的市场上根本见不到鱼。而在黑市上，每斤鱼售价1.3元到1.4元。”⑤ “参加工作的人每人给两份副食品的定额，但要想真正买到副食品则是不可能的……虾油和其它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买不到。”⑥ “人们连蔬菜都吃不到，更不用说鱼和肉了。只有持诊断证明的病人才准许买这些东西。在黑市上，鸡蛋价格卖到1角8分到2角钱一个，小鸡每只售价3到4元。”⑦ “就拿猪肉来说，上个月我连一点点猪肉都没有买到。”⑧ “蔬菜价格很贵，这还不算，甚至也越来越难买到了。”⑨ 有一封来

① 沃克：《人民公社来信》，第39页。——原注

② 同上，第17页。

③ 同上，第18页。

④ 同上，第38页。

⑤ 同上，第30页。

⑥ 同上，第36—37页。

⑦ 同上，第41页。

⑧⑨ 同上，第42页。

信比绝大多数来信更集中地概括了人们普遍存在的绝望心情：“现在的局势是可怕的，因为什么也买不到。我们饿时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有的人担心会饿死，那样的话他们死也不会瞑目。有的人不想继续活下去了。大家都在受苦受难，一切都完了。”①然而，这一年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收成最好的一年，而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正是在这一年提出了“一天吃三顿干饭”的灾难性口号。②

这些信件对海外华侨产生的影响显然引起了广东省当局的重视。倘若华侨们普遍认为他们的汇款到了国内就会被没收或者平均分配掉，或者得到他们的国内亲属受到苛刻对待的消息，那么，作为中国主要外汇来源的东南亚的侨汇必将中断。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感到有必要对倾向共产主义的港澳记者和来访商人谈谈有关人民公社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主要的国际宣传喉舌《北京周报》转载了陶铸谈话的摘要，突出了这种公关活动的重要性。

陶主要对人们担忧的人民公社消灭家庭、人民公社军事化、丧失自由以及超负荷工作等问题作了解释，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都坚定有力地为中国的政策辩护，并且时而给以反驳。虽然他阐述了武汉会议增加的人民公社“管理民主化”的原则，但未暗示这条补充完全是出于担心实行军事化会导致走向另一个极端。显然他再次强调了农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但始终未承认这是由于中国领导人在武汉会议上已意识到过去使农民劳累过度的缘故。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未涉及食品短缺问题，而这个问题已开始使他本人和他的同事们十分困扰，同时也使上面谈到的广东的那些写信者忧心忡忡。不过，他明确保证，银行存款和海外

① 沃克：《人民公社来信》第19页。——原注

② 薛光军：《乾坤浩气存——深切怀念陶铸同志》，《红旗》，1979年第1期。——原注

华侨的汇款将受到政府的大力保护。①

尽管陶的保证很平淡，但广东省委同其他一些省一样，甚至在武汉会议结束之前就已开始着手纠正大跃进的偏激做法。1958年11月29日，陶的夫人曾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短文，强调必须保证人们有足够的休息时间。② 12月3日，在广东省干部电话会议上，该省最活跃的省委书记，陶“忠实的副手”、40岁的赵紫阳发出指示，应保证群众足够的休息时间，改善食堂伙食，尊重群众的房屋、衣物、家具等私人财产和储蓄存款。

从武汉会议回来一个月后，陶铸率领一个调查组到珠江口附近的东莞县虎门人民公社，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1959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调查报告。几乎同时，赵紫阳于1月中旬率领另一支高级调查组，对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进行了调研。他的调查报告显然毛曾阅读过，并被广泛传阅。③

陶铸的虎门公社调查报告非常详细，整整占了《人民日报》一个版面。报告的基调是比较乐观的，但也列举了虎门及广东各地人民公社普遍存在的6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是集中统一与反对本位主义的问题。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本位主义思想已经“比较突出”，实际上，有些干部已经腐化堕落。如果不纠正本位主义倾向，人民公社就有变成一个空架子的危险。④

本位主义指公社的下属单位生产队囤积和动用应由人民公社管理的粮食和资金。例如，当虎门寨生产队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时，那里的农民比较富裕，但是，由于合并入社造成的贫富拉平使部分家庭收入下降。生产队干部企图隐瞒应该上交公社的粮

---

① 《北京周报》1959年第9期，第6—9页。——原注

② 指《休息好和劳动好》。——译者注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39、41页。——原注

④ 《虎门公社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59年2月25日。——译者注

食、钱以及副食品以弥补社员的损失。经过长达一星期的会议之后，该生产队约有5588吨粮食和12000元钱被查出。另一个囤积粮食的生产队解释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万一公社管不起饭，自己队可以有饭吃，并且有余粮可以搞副食品。① 从1958年10月到11月间，被生产队隐瞒的资金几乎为公社基本投资的1/4。由于12月份公社的投资比前2个月增加了25倍，隐瞒现金可能是抵制公社吞占大队全部资金的一种措施。

陶铸的调查报告以及毛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陶和赵紫阳的批评，使人们能对实际发生的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但赵紫阳在徐闻县的活动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才从发表的一份充满敌意的报道中详细地了解到。② 赵在视察期间力图解答的问题是：“去年秋天是不是粮食大丰收？如果粮食取得了大丰收，为什么还会出现粮食短缺？”③ 在视察了徐闻县的田地以后，赵确信前一年这里的粮食确实丰收，足足有数吨的余粮。许多县干部汇报说，他们已发现有隐瞒、囤积粮食的现象。于是赵于1月23日召集了有4000名干部参加的会议，发起了反囤积粮食的运动。坦白承认的干部被准许为他们的公共食堂贮存粮食，而那些不承认错误的干部则不让回家。没有一个人说话，会议不得不很快结束。

徐闻县领导在个别调查时发现，有7个生产大队或小队的干部承认有瞒产私分的行为（据“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报道，这些都是胁迫之下的虚假供认），赵受到鼓舞，组织了另一次规模更大的会议，对与会者进行威胁，施加压力。在这次反瞒产私分的运动中，有1名生产队干部自杀，另1名干部自杀未遂，6名干

---

① 《人民日报》1959年2月25日。——译者注

② 徐闻县红联：《一起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案》，《红色造反者》1968年1月4日。——原注

③ 同上。

部被捕，其中2名被判刑，并死在狱中，109名干部被免职，将近一半的基层干部受到某种形式的批评。发现了大约38000吨囤积的粮食。①

就在徐闻县，赵紫阳主持召开了全省干部电话会议，公布了调查结果，并号召其他地方也开展揭露瞒产私分的运动。他估计整个广东省隐瞒的粮食可能超过300万吨。几乎是1958年公布的粮食产量的10%。② 1月25日，他发出一个指示，认为全省多数基层干部卷入了瞒产私分的活动，并指出粮食问题是"当前农村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之间斗争的焦点"，总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③

3个星期之后，陶铸在广东省党的代表大会上，把反对本位主义的斗争与毛在武汉提出的全国一盘棋方针紧密地联系了起来。陶指出，必须全省一盘棋，并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原则"。特别是人民公社，更应该强调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这实际上含蓄地强调了向国家上缴粮食的重要性。他不赞成把本位主义简单地看作为革命积极性的一种表现。④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赞同广东省委的态度。⑤很显然，陶鲁笳在思想上也认为本位主义是与全国一盘棋方针不相符的，必须加以克服。他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严厉地批评了某公社隐瞒了1958年粮食、棉花以及油料作物的实际产量，像徐闻县那样，只是在经过反复调查，并专门就公社对工业和城市应尽的义务、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

① 《红色造反者》1968年1月4日。——原注

② 同上，赵紫阳提出了一个查出隐藏粮食50—60亿斤的指标。1958年该省公布的粮食产量是620亿斤。

③ 同上。

④ 《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8号，第33页。——原注

⑤ 《红旗》1959年3月第5期第25—29页。——原注

和个人利益三方面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大辩论之后，许多干部才全盘供认了瞒产私分的问题。陶鲁笳还引用毛的语录（未提供这条语录的出处）作为他对本位主义进行严厉批评的依据："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①

第三节 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上述省级干部的观点与中央提出的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是否完全一致呢？《人民日报》在关于全国一盘棋思想的第一篇社论②中明确指出，必须反对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小局必须服从大局，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公社服从县，县服从省。必须善于分清轻重缓急，抓住重点，而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正好像一个人不能用10个手指头同时抓10只跳蚤一样，那样可能一只也捉不住。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安排全国基本建设项目，统一安排全国主要产品的生产，统一分配全国的原材料，统一调拨和收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主要物资。

毫无疑问，《人民日报》描述的全国一盘棋方针包含有生产队向公社、公社向县、县向省以及省向中央政府逐级上缴余粮和其他农产品的内容。否则，拿什么供应城市居民？食品加工厂和纺织厂用什么来作原材料？然而，社论的核心内容是强调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的重要意义，并说服各省以及下级行政机构，遏制1958年大跃进中各地一拥而上而造成的工业失调现象，以便缓和普遍存在的原材料紧张的困难，使大型国营企业，尤其是重工业领域的大型国营企业在原材料上得到保证。为了强调这一思想，《人民日报》还在第一版详细报道了安徽、福建、浙江、江西以

① 《红旗》1959年3月第5期第25—29页。——原注

② 《全国一盘棋》，《人民日报》1959年2月24日。——译者注

及河南等省是如何执行全国一盘棋方针的精神，将自己最好的铁运送给上海。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全国一盘棋”方针的重要文章。[①] 他在文章中强调，上海这个全国的重要工业基地和人口最为密集的大城市、必须依靠全国各地提供原材料和粮食供应。[②]

无论最初制定的“一盘棋”方针出于何种动机，但当柯庆施和《人民日报》开始考虑对其加以阐述时，瞒产问题的出现又使这个方针具有了新的含意。在提出“全国一盘棋”的概念之后，有关方面指责本位主义所选择的时机是值得注意的：

1月27日　北京（政治局？）关于整社的会议。

1月28日　陶铸完成《虎门公社调查报告》，批评本位主义。

2月16日　《红旗》杂志发表柯庆施的文章《论“全国一盘棋”》。

2月17日　陶铸在广东省党代表大会上讲话，在谈到“全国一盘棋”的方针时，批判了本位主义。

2月21日　毛在河南的一次会议上谈到“全国一盘棋”的方针时，为本位主义辩护。

2月24日　《人民日报》就“全国一盘棋”方针发表社论。

2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陶铸的《虎门公社调查报告》。

2月27日　毛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发表首次讲话，为本位主义和瞒产行为辩护。

3月1日　《红旗》杂志发表陶鲁笳的文章，在谈到“全国一盘棋”方针时批判了本位主义。

3月2日　《南方日报》发表陶铸在广东省党代表大会上的

① 《论“全国一盘棋”》，《红旗》1959年第4期第9—12页。——原注

② 同上，第12页。邓小平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上海市委2月20日召开的工业会议上对上海给予赞扬，进一步突出了上海所采取的方针的重要性。

报告。

3月5日　　毛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批评了陶铸和赵紫阳。

总之，到2月27日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时，广东省领导实际上已经开始反对基层干部的本位主义，并认为这是瞒产私分的主要根源，号召要根据“一盘棋”方针的精神克服本位主义。在郑州会议的初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山西省反对本位主义的文章①，语调类似广东省。毛对这些省（可能还有其他省）所持的立场极为不满，并带着这样的情绪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我们现在需要转向探讨毛对农村形势的看法。

第四节　毛泽东反思人民公社问题

武汉会议未能意识到粮食问题。直到12月下旬，毛和其他中央及省的领导才开始觉察到这一日趋严重的危机问题。尽管1958年粮食大丰收，但国家粮食收购指标却没有完成。城市开始出现粮食短缺。按照毛的说法：“只是到了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时，才引起注意。”②

毛对这个问题以及人民公社有关问题的想法，是以武汉返回北京后才逐渐形成的。他对此曾瞑思苦想，甚至睡不着觉。③ 1月27日，毛召集会议，讨论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2月2日，毛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之后，他绕行去郑州。途经天津时，他与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进行了讨论。在山东，他会见了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并参观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吕洪宾领导的爱国人民公社。2月21日，他在河南省四个地区的党委座

---

① 即陶鲁笳：《广泛地进行“全国一盘棋”的教育》，《红旗》1959年3月1日。——译者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78页。——原注

③ 同上，第39页。

谈会上发表讲话。①

在2月2日的全国省委书记会议上，毛讲话的主旨在于鼓励与会者鼓足干劲，继续努力。他认为压缩空气两个月来，已经出现了一些松懈现象，“松一点不足为奇”，但现在要“再鼓干劲”。他说，农业工作今年动手晚一些，所以担心积肥问题；总路线不能改变，每年都可以大跃进；必须保护广大干部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必须切记，整社期间发现的缺点错误，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②

然而，毛特别告诫人们要反对那种企图办实际上办不到的事的主观主义，要求进一步研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他列举了目前存在的缺点错误，如：“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等。他接着对大跃进期间中国领导人的工作特点作了如下描述：“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③毛似乎准备承担大跃进期间急于求成的责任，他拒绝别人以他早在成都会议就提出劳逸结合的理由为他开脱责任的善意作法，指出，尽管成都会议确实提出了劳逸结合，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作息时间表。④然而，他重申全党仍需鼓足干劲建设社会主义，取得更大、更快、更好、更多的经济效益。⑤

但过了不到3个星期，当毛在2月21日对河南干部讲话时，他已经完全改变了对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很显然，促使毛重新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3—7页。——原注

② 同上，第271—272页。

③ 同上，第278页。

④ 同上，第278页。

⑤ 同上，第279页。

思考的关键因素，是他在河北所取得的一系列汇报。正如他向河南的干部指出的那样，河北省委已经对实行的政策作了重大改变。可能他还事先收到了广东提供的赵紫阳的调查报告。几天之后，这份报告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印发给与会者。毛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他倾向于河北的做法。

毛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发表了6次讲话，头两次讲话是2月27日会议开始时发表的。毛的这些讲话相互重复，表明至少部分讲话是在不同的小型会议上发表的。这些讲话重申了他2月27日对河南干部的讲话主题，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所有这几次讲话可以总起来加以分析。

第五节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仍然强调人民公社的成绩是主要的，如同十个指头中的九个指头，强调必须反驳对人民公社的批评，并称赞了整社期间采取这种态度的一些省委。①毛逝世后，薄一波说，毛不想挫伤积极分子的热情的愿望阻碍了纠正"左"的错误的工作。②不过，至少毛意识到，武汉会议未能解决一系列与人民公社有关的重要问题，如：积累和分配问题，所有制的级别问题和管理体制问题。结果使得前3个月的整社工作收效不大：虽然公共食堂得到了改善，人们得到了较多的睡眠时间，但未取得实质性的成就。③尽管毛口头上讲成绩是主要的，但在他的整个讲话中却很少提到具体的成绩，相反大多是谈缺点的，一反武汉会议决议那种温和的调子。毛可能预感到，他只有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16，17，25，36页。——原注

②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献给党诞生的六十周年》，《红旗》1981年第13期。——原注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40页。——原注

采取严厉抨击的方式才能影响政策的改变。

毛批评当时党在执行农村政策时采取了"一平、二调、三提款"①的作法。据毛说，这个政策在农民当中引起了"很大恐慌"，发展下去会导致人民公社的"垮台"。因为它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否定按劳分配。如果继续实行这个政策，就不可能使公社干部从恐慌中镇静下来，战胜观潮派、地主分子以及坏分子。毛认为，这一政策表明"我们高层领导犯了冒险主义错误"。②

毛将穷富拉平的平均主义——同时还有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和"共"各种产——看作为去年秋天刮起的"共产风"的主要内容之一，并强调了反对平均主义的重要性。针对出现的当基层干部指责上级搞平均主义分配时，上级则往往以指责他们搞"本位主义"来进行报复的现象，提出要继续反"左"，把它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这表明了他对本位主义的同情。③毛指出，不许在公社范围内任意地将富队的财产转给穷队，这是无偿占有——甚至是"抢、偷"行为——或许这种办法对于处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比较合适，而对于国内的资本家，我们尚且实行赎买政策，而从未采取无偿剥夺的作法。④目前这种穷富拉平的作法意味着否定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穷队应该像王国藩社（该社是在1955—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由毛树立起来的样板社）那样，靠自己的双手，自立更生，赶上富裕的队。毛认为目前生产队搞平均主义分配（即"穷富拉平"）的问题已大体上得到纠正，但是"还有余波"。⑤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34，36，39，40，41，44页。——原注

② 同上，第19，40，44页。

③ 同上，第9页。

④ 同上，第14页，22—23页。

⑤ 同上，第14页。

事实上，北戴河会议决议已察觉到将穷、富不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入一个公社将会带来问题，并提醒人们反对平均主义。然而，这些问题却被看作为“小事”，乐观地认为“随着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将会在一、二年内得到解决。① 但实际上这种思想觉悟的提高始终没有实现。一对居住在中国的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夫妇，在河北省南部亲眼看到了实际发生的一切。在阳邑人民公社，一位负责人对他们介绍说，人民公社成立不久，就发现劳动热情开始减弱。由于这个山区较贫穷生产队的社员存在着依赖富队的思想，因而劳动松懈。按他们的党支部书记的话说：“我们大都百分之百地赞成由合作社并成人民公社。我们这里每人只有1亩石子很多的地。现在我们可以得到山下生产队的帮助”。然而，山下生产队的农民并不接受这种态度，也开始懒散起来。他们显然或者是对穷队躺在他们的背上达到富裕表示不满，或者是对穷富拉平表示不满。这种局势对于公社的党委书记来说是十分严重的。所以他的同事得出结论说，公社的主要矛盾是穷队与富队之间的矛盾。他们开展了教育运动，力图使穷队和富队相信公社是为大家谋利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力为公社的利益以及个人利益而努力奋斗。② 但是，百说不如一干。领导人继续将公社作为单一的管理机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收入的平均分配和粮食的免费供应。这就意味着“自动地提高了穷队的收入，降低了富队的收入，而不管两者的工作情况和环境条件如何。这样无论是在穷队还是在富队中，都无法鼓起干劲来。”③ 只是在武汉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这种做法才得到纠正。阳邑人民公社还犯了毛所列举的第二种错误：任意调拨财产。据该社一位

---

① 《人民手册》（1959年），第33页。——原注

② 大卫·克鲁克和伊莎贝尔·克鲁克：《阳邑人民公社的最初岁月》（1959年出版），第38—39页。——原注

③ 《阳邑人民公社的最初岁月》，第42—43页。——原注

党委成员说，第二种错误表现为：

> "无偿地将生产队的财产'调拨'到公社或从一个生产队'调拨'到另一个生产队。公社社委会就这样沿着公路接收了生产队的111辆马车和118辆毛驴车；那些绵羊和山羊就是这样从山区调拨给山下的生产队。而且全都是无偿的。这种错误的做法也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热情。"①

有关阳邑人民公社的报道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在于它是一个真实的例子，而且还在于该报道中的干部对人民公社所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完全符合毛的分类——一平、二调。因此，毫无疑问，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这些问题的干预是极为重要的。毛列举了"调"的类型——"物"和"人"。"物"不仅包括调拨生产队的财产，而且还包括征调个人自留地、猪、家禽、房屋以及家庭用品——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主要拿去用于公共食堂。毛认为，大部分自留地归社是正常的。同时承认部分房屋和生活用品是不得不借用的。但他批评了那种无偿将家畜家禽归社的做法，称这是"公开抢劫"②。毛的这番评论一定会使广东和福建侨属们稍稍感到欣慰。

毛指出，农民并不害怕收回土地，因为土地搬不走。他私下提出自留地归公社所有可能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但是，农民确实害怕财产和人力随便被调走。毛以河北一个公社为例加以说明，该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有1万多人由于对猪和家禽"共产"感到不满而离去，有些可能是"盲目"流入城市。他宣布，即使在公社所有制代替生产队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之后，家禽和家畜、宅边林木、小农具、小工具，甚至于房屋——在大规模建设公开住宅以前——仍然归社员个人所

① 《阳邑人民公社的最初岁月》，第43页。——原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40页。——原注

有。①

毛批评抽调劳动力，主要是担心随着行政管理人员数量的增加，会造成国民经济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人员的膨胀，损害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说，中央、省、地、县以至公社5级都办工业，这太多了。有必要给办工业的积极性泼点冷水②——这可能包括正如毛在另外一个场合所描述过的“大炼钢铁”运动。毛指出，从清代政治家、早期著名的现代化倡导者张之洞（1837—1909）的时代起，到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产业工人有400万。到1957年底增加到800万，差不多每年增长100万。而去年由于大跃进，一年又有2600万（毛将官方统计数字中的约1000万人作为水份未计算在内）涌入工业部门。再加上从行政及其他行业转过来的400万人，使得去年新增加人数一下达到约3000万。③

毛估计工业、行政和服务业的劳动力的浪费为20—40%不等，他提出必须坚持减下来，20%的工人应回农村，从事农、林、牧、副、渔5大重要农业生产活动。山西省的一个公社一下子就缩减了30%的工业劳动力。④毛还要求服务行业要大减，因为有的地方一个伙夫仅为10个人服务。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和体育队，因为这些单位会争去一些年轻劳动力（可能还是精力旺盛的劳动力）；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有些大的人民公社竟有成千人不劳而食。毛特别列举山西晋南一个公社为例，这个公社约有3000人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其中有180多人为脱产文工团员⑤。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不过，毛镇静地表示，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18页。——原注

② 同上，第11页。

③ 同上，第15页。

④ 同上，第32页。

⑤ 同上，第14页。

笑。①

毛还批评了让农民参加修水库、修公路、修铁路等“义务劳动”的做法，认为现在无代价的义务劳动量“太大了” 必须减少。毛赞赏11世纪的政治家王安石开创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作各种服役的事业。②

毛所担心的第3个问题是，财政部门正将租借给公社的贷款收回。这种只顾工业不顾农业的做法，使人民公社很难维持下去。毛指出要把这种做法扭转过来。③他建议目前还没有向农业投资的国家银行系统，在今后10年内，每年应提供10亿元的长期无息贷款，主要贷给穷困的生产队。贫民曾享受为期4年的贷款，到1960年才到期；如果现在就收回贷款，无疑意味着人民银行在破坏农业生产，反人民公社。毛指出，贷款到期的可以延长。④

在6个星期之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财政部长李先念透露，毛有关向人民公社大量投资的建议已被采纳。李宣布：

> “1959年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经济建设支出中增加了对人民公社的投资10亿元，作为国家对人民公社的财政补助。这笔资金主要地将分配给经济条件较差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使他们能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比较富裕的公社的水平。”⑤（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但如同毛一样，李先念坚持认为一切经济比较落后的公社和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41页。——原注

② 同上，第44页。

③ 同上，第9—10页。

④ 同上，第42页。

⑤ 《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1959年4月22日。——译者注

生产队，应当像王国藩社那样，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现在经济上落后的面貌。阳邑人民公社将“国家拨给的41000元贷款分配给大约1/3最贫困的生产队”，同时，这些穷队被告诫要“加劲地干”，赶上富队，而反过来又要求富队热情地帮助穷队。①

无论是毛、李的讲话还是阳邑人民公社的报道，均未说明10亿元贷款怎样才能支付未偿清的贷款。不过，李极力为财政部辩护，反驳“一些好心肠的人”所谓1958年财政收入增长得这么快，意味着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的批评。鉴于毛不久前对财政部的作法的批评，李先念虽然作了让步，但实际上仍坚持己见。毛的目的十分明确：将由国家承担以往由于支持穷队而给富队造成的负担，同时，以此抚慰穷队、富队的农民及其干部。

在批评目前人民公社内部所实行的政策以及国家对人民公社的政策时，毛不时向人们提起斯大林的幽灵，以突出表明形势的严峻性。他说，斯大林的积极性太多，对农民粗暴地剥夺，这是很不明智的。毛引用一句生动的成语，形容斯大林的这种做法是“竭泽而渔”。②毛还指出，从去年9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这个问题若不很好解决，是很危险的，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包括积累过多，使农业不能够发展。他说，斯大林30年代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70%的产品。③不过，毛未指出，在苏联农村出现危机的关键时刻，是斯大林自己阻止了这种局面的进一步发展，他指责他的官员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这正是毛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力求解决的问题！

局外人可能认为，毛将1959年初中国的形势同苏联30年代初

---

① 《阳邑人民公社的最初岁月》，第57页。——原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11页。——原注

③ 同上，第44页。

期的形势进行比较具有某种夸张成份。不过很清楚，毛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尽可能让人们注意，中国目前与过去以及与苏联历史上的相似之处，认识国内形势的紧迫性，这种紧迫性正如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以反诘语气所说的："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①

在中国，秋收后到第二年麦收之前这段时间，粮食供应往往都很紧张，尤其是农历新年过后更是如此。1959年的农历新年是在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末，按说在夺得粮食大丰收后，这个农历新年应该像1958年那样，不会出现多大的粮食问题。然而，毛指出，今年大闹食品不足的风潮较之1953年和1955年粮食歉收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短缺的食品包括粮食、油料、猪肉以及蔬菜。甚至国家规定的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的收购指标至今仍未完成。毛承认，"去年大丰收，使我们麻痹了。"②另一个原因是浪费。毛要求他的听众不要有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的自满情绪，因为旧的需要解决了，新的需要又产生了。③

然而，造成粮食短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浪费，而是农民自己"瞒产私分"。毛形象化地称农民"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为了不使上级领导发现，他们白天只吃萝卜缨儿，天黑之后才吃米饭。④当时，"瞒产私分"已成为普遍现象，这是农民的一种和平反抗。毛估计"瞒产私分"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15%，这就意味着农民保留着粮食总数的45%。有的地方发生了1956年的那种情况，老太婆挡住不叫拉粮食。⑤

毛对"瞒产私分"问题的态度显然考虑到它的普遍性。因为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26页。——原注

② 同上，第16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26、45页。

⑤ 同上，第4页。

一个人怎么能得罪5亿农民和生产大队、小队的1000—3000万干部呢？现在指责他们"本位主义"的只是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6级的干部们。而且，如果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因为部队的兵源主要来自农民。这是个大事。① 毛还批评有的公社没收军官给亲属的汇款。在一次讲话中，毛承认："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② 在另一次讲话中，毛严厉地警告说，现在有步两个臭名昭著的朝代——秦朝和隋朝的危险，这两个朝代曾经成功地统一了国家，但很快由于统治者的镇压措施而灭亡。③

毛的措词十分强硬，这清楚地表明了他在此次郑州会议上已多次坦率承认的"右"倾态度。他声称反对"左"倾、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统一的思想，支持"保守主义"和"本位主义"。他非常同情那些生产大队、小队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的行为，认为这种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而且是合法的。④ 他不认为这种态度是对农民的让步。认为应该将以往的优先次序倒过来，把安排个人生活放在公社积累和国家税收的前面。他以刻薄的口吻说："他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嘛，他懂得点马克思主义，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⑤ 在一次讲话中，他对与会者说，如果他们要左倾，他情愿右倾。就在这次讲话中他宣称：

> "我代表1000万队长级干部，5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个人贯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39页。——原注

② 同上，第41页。

③ 同上，第27页。

④ 同上，第13、38，45页。

⑤ 同上，第13页。

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①

第六节 毛泽东的解决办法

毛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全部指示与2月初对省委书记的告诫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现在认为需要调整今年的生产节奏，要适当放慢一些，人们应得到更多的休息。应尽量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银行卫星、诗歌卫星等。实际上，当他指出不是人人都能写诗时，就已动摇了群众诗歌运动的基础。②

毛有关解决人民公社问题的较为具体的办法隐含在他的批评中。为防止平均主义和任意征调，他要求坚决执行两个政策：第一，实行以生产队（相当于过去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第二，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管理和三级核算。③

毛认为如果从互助组过渡到高级社经过了4年时间，那么，由生产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向人民公社为基础的所有制过渡过程可能需要4至7年的时间，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毛对这一过程的时间推测从未超过7年，但有时也把所需的最短时间和最长时间减去1—2年，表明这种转变可能至少需要3年，至多需要5—6年。④毛大概希望尽可能不挫伤干部的积极性。在这之后，他还预测由社会主义公社所有制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公社所有制，直到最后使全体中国人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将可能需要15—20年。⑤尽管他在人民公社的问题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但并未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41页。——原注

② 同上，第35、36、441页。

③ 同上，第22页。

④ 同上，第12、20、28、30—31、37页。

⑤ 同上，第20页。

放弃在武汉会议上所作的乐观预测。而且同武汉会议决议一样，毛断言，实现两种所有制转变的主要先决条件是通过扩大社办企业来增加公社的财富。

关于三级管理和三级核算问题，毛指出，现在公社统得太多，至少有10项。① 公社应实行部分权力下放。现在公社和生产队之间争端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公社抓劳动力。另一个问题是公社积累过多。积累过多是共产风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出现瞒产私分的主要原因，应该减少这种现象。② 在阳邑人民公社，有些农民反映说："是的，我们种了很多粮食，但是粮食都到哪里去了？我们打的粮食越多，他们拿走的越多。"③ 这明显说明，广东、福建的侨眷在来信中所反映的情况，并不只是在中国南方才存在。毛还批评河南省强行征收了农业收入的70%，其中国家税收7%，公社积累26%，生产费用20%，管理费用、公益金17%，仅仅留下30%让农民消费。所以农民瞒产约15%，使消费比例增加到45%。为了阻止农民的瞒产私分行为，安定人心，毛提议就所有制问题以及作为消费和公社积累之间的产品分配问题出安民告示，作出保证，把公社积累由26%减少到18%。

在这次会议上的另一次讲话中，毛用14句短语归纳了他的指示：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制，等价交换。④

毛期望通过各省六级干部会议来传达他的指示，要在会议上讲明道理，争取人心，不要顶牛。⑤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26页。——原注

② 同上，第32页。

③ 《阳邑人民公社的最初岁月》，第59页。——原注

④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35页。——原注

⑤ 同上，第30、35、45页。

第七节　毛泽东制止陶铸的作法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毛多次以“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明确认为，5亿农民是全国一盘棋中的首要成份。但他们现在只是半盘棋。因为分配太少了，生产队的所有制得不到承认。只有把安排人民生活、公社积累和国家需要三者统筹兼顾，才算真正做到了全国一盘棋。过去，一盘棋只强调上面，现在，则要上下兼顾。①

毛有关一盘棋和本位主义问题的看法与陶铸、赵紫阳以及广东省委所持的观点完全相反。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最后一次重要讲话中无疑严厉地提到了陶铸和赵紫阳。他说，他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广东省会广州就座落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他抓住赵紫阳就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②毛提到长江流域可能是针对安徽。该省的领导人显然认为农民犯了本位主义的错误，但却采取了温和的办法，决定不以错误对待。同样，河南也决定对本位主义错误不予处分。③

出人意料的是毛没有提到陶鲁笳——陶对山西的本位主义问题采取了与陶铸同样的态度——却评述了山东农业劳动模范吕洪宾合作社社员的反抗行为，那里的群众抵制征调粮食，社领导命令搜查社员住宅、翻箱倒柜，甚至进行神经战。这一着最后也不灵。④毛以非常赞许的语调提到了刘子厚，他任职的河北省委在武汉会议后曾采取了搞“共产主义”的左倾路线，但5周以后，即2月13日，就感到有问题，因此完全改变了政策。然而，即使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36页。——原注

② 同上，第39页。

③ 同上，第40页。

④ 同上，第39—40页。

河北也没有解决所有制问题。①

毛的这番评论对陶铸起了决定性的影响。1959年4、5月间，广东省委常委在汕头举行扩大会议，陶铸以《总路线与工作方法》为题，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承认自己在许多问题上头脑发热，其中包括反瞒产。他明确承认的其他有关错误是：搞高估产，高征购，高密植，大炼钢铁，以及在广东刮"共产风"。据赵紫阳20年后的记述，陶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均主动承担了责任。②

毛对于反本位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取得了预期效果。在这方面打头阵的广东省已经开始退缩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本应作为全国性反瞒产运动的策源地，但终于被毛阻止于萌芽状态。

但是，郑州会议大多数的参加者回想起来，都确实感到毛和陶铸的对立存在着某种不现实的气氛。陶铸、赵紫阳、陶鲁笳以及显然还有其他省份的高级领导人的实地调查结果，应当受到尊重。虽然瞒产现象确实存在，但毛根据一些零散证据能否得出如此普遍性的推断，还是值得怀疑的。毛和陶铸都是在假定1958年公布的粮食产量是真实的情况下作出推断的。对赵紫阳在徐闻县调查时的第一个问题——"去年秋季粮食是否取得了大丰收？"——的回答不是"是"，正确的答案应该说是"是的，但是"——"是大丰收，但是并没有所说的那么好！"。赵紫阳、陶铸以及毛都仍然陶醉于这样的大跃进逻辑中：如果粮食产量翻了一番，那么某些地方就应该有大量的余粮存在。他们都认为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粮仓就是存这些余粮的地方。只是在如何处理这一"事实"上，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只是过了几个月，毛才准备承认"吃饭不要钱，把粮食和副食吃得紧张起来。"③）。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39页。——原注

② 赵紫阳：《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人民日报》1979年3月23日。——原注

③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57页。——译者注

陶铸和他的同事们承认毛的作法在政治上是稳妥的。如果强拿生产队仓库中瞒产的粮食，那将是愚蠢的行为，同时，如果过分指责农民隐瞒了实际上根本不属于他们的粮食，那就会犯下与斯大林同样的错误。不过，甚至到现在，在这一点上仍然存在着疑问：陶铸后来在5月中旬写的一篇题为《太阳的光辉》的文章——《人民日报》于同年6月3日予以转载——是不是想借机对毛进行猛烈攻击加以报复呢？一种推论认为，陶铸和毛两人比较起来，毛以"9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譬喻来看待大跃进，而陶则更多地强调大跃进的缺点，并声称虽然毛的比喻正确，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受伤的指头不值得重视。① 从毛当时的言行来看，上述推论不能成立。完全有理由说，毛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上是对"9个指头和1个指头"公式的戏弄，因为这些讲话除了批评性的内容外，没有别的东西。只是到了这年晚些时候的庐山会议上，由于受到彭德怀攻击的影响，毛才改变了态度。但是，陶铸当时的言论只不过重申了毛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所持的观点。此外，根据1959年初广东发生的事情，那种所谓陶铸比毛更早地从大跃进狂热中退却下来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赵紫阳后来在为陶铸的《太阳的光辉》一文辩护时说，陶的这篇文章反映出这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态度。陶铸曾引自孟子的一段话："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蚀，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赵特别指出陶铸的观点，共产党员一定能比"古之君子"做得更好，因为他们为群众工作之心，以及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不知比"古之君子"要高多少倍。②

但赵紫阳没有试图就姚文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陶铸这

①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国建设》增刊，1967年11月，第17—18页。——原注

② 《新华月报》，1979年4号，第57—58页。——原注

篇文章的另外一个更主要的攻击加以反驳，这也许是意味深长的。姚文元曾攻击陶铸说：

"他一面说，人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一面公然借攻击'太阳'的'过失'，指桑骂槐地说：'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还有黑点。'……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①

另一方面，从毛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来看，那种认为陶铸向党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的说法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与毛相比，陶铸的言论更为含蓄、适度。不过，有关陶铸曾暗示毛也犯了错误的说法可能较为可信，特别是1965年——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毛的个人崇拜正在建立起来——重新发表这篇文章时，陶铸曾谨慎地将文章中的"领袖"二字删去，就更能说明这个问题。②同时，鉴于陶铸曾迫于毛的压力而退却的事实，所谓陶铸企图将大跃进的全部错误都归罪于主席的说法，似乎不大可信。很有可能是，陶铸受到毛关于党的干部要敢于讲真话的指示的鼓舞，才在文章中暗示毛应该对过热的大跃进负有部分的责任，而不能简单地归罪于左倾的党员干部，试图以此方式弥补自己蒙受的耻辱。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陶铸可能已引起了其他一些省市领导人的同情，他们对毛强行让他们服从其政策的做法也大为不满。但毛在郑州会议上对陶铸本人的指责，也使另外一些缺乏陶铸那样的魅力和知名度的省委书记们感到幸灾乐祸。他们当时也受到指

①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第17页。——原注

② 同上。

责，而且作为毛的大跃进的忠实组织者，当毛站在另一边反对他们时，他们肯定有一种被背叛了的感觉。然而，即使是开玩笑，也没有人敢冒被指责为坚持反党立场的风险，并受到开除党籍的威胁。而毛则可以随意行使这样的权力，以推行他的政策。1958年大跃进正是在1957年整风运动出现分歧之后，毛与党的干部之间的联系得到重新加强的时期。但毛在郑州会议上向右转弯的态度，显然使这些省级党的干部与他离心，即使他们支持毛的政策。但陶铸这篇文章的不满情绪是否足以使彭德怀深受影响并在庐山会议上大加利用，目前仍不很清楚。当这篇文章发表时，彭德怀正在国外。

第九章

刘主席

第一节　从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主张后退

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后第4天，即3月9日凌晨，毛泽东向各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封信，①要求他们立即召开各省的省、地、县、公社、管理区和生产大队六级干部会议——这是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倡议的。这些会议大约需要开10天，讨论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河南省再一次抢先，其全省六级干部会议正在举行之中，此会定于3月10日结束，14日以前将会议的有关文件用飞机专门送达其他各省，以供参考。但毛表示他不想让各省第一书记们坐等这些文件的到来，他提议可以像湖北省那样在11日开始举行会议。这样，六级干部会议就可以按时结束，使省委第一书记们能于25日前赶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① 《党内通信——关于召开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六级干部大会问题》，载《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50页。——译者注

在各省领导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时，各县委领导人将举行县、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四级干部会议，这些会议一般有一、两千人参加，会期7天至10天，到3月底结束。接着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将召开各自的会议，在4月10日以前结束。毛对于有关这个日程安排太仓促的意见置之不理。他认为，为了击败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批评者，即“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速度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系列会议结束之后，与会者都将重抖精神投入生产中去，从而确保1959年再次出现大跃进。①

召开如此多的会议，显然是为了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的“一大堆糊涂思想”②，并为干部制定新的方针，同时也使农民放心。但尽管毛热衷于以这种群众会议为讨论问题的论坛，然而他也很快发现，照这样下去会议将没完没了。3月17日，他向各省委第一书记发出了另一封信③，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加上生产队（小队、生产组、作业组）——并且人数可以达到1万人。这样，公社及其下级单位可以免去自己的专门会议，或以后根据具体情况再举行。④

尽管第二次郑州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后起草了题为《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的文件草案，但中央有关人民公社的方针到此时仍然是不明确的。毛离开河南郑州，南下到达湖北武汉，在这里，他仔细研究了各地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汇报。他很快发现，各省在关于人民公社内部哪一级应该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河南赞成以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则赞成以生产队（即农业生产合作社）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104—106页。——原注

② 同上，第106页。

③ 《党内通信——关于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载《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第159页。——译者注

④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108—109页。——原注

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把邻省湖南的第一书记周小舟找来，加上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3人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周小舟赞成河南的办法。但在这次讨论之后，毛接到广东省委的报告，他们采取了与湖北省类似的方针。而在湖北省的六级干部会议上，曾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与会的县、社以及大队的干部愿意把生产大队作基本核算单位，而生产队的干部则要求把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

毛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封信① 表明，第2次郑州会议记录是有疏漏的，它们只简单地说“队为基础”。鉴于这个术语使用上的混乱（在后面的附录一将讨论这一点），会议记录应该明确说明这个“队”究竟指的是哪一级。不过，由于会议记录可能是根据毛的最初用法来写的②——而主席在谈到这一点时，显然用词不够严谨——后来也未认真地力求使会议记录准确无误。毛此时强调指出，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

农村中存在的贫富拉平问题曾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普遍关注和争论的主要问题。实行核算的基本单位层次越高，平均主义的程度也就越大，因为在同一地区的富队将不得不援助穷队。毛比较赞成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平均主义的范围就比较小。考虑到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他的这种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根据他有关这一问题的党内通信来看，他准备允许各省选择自己所适用的办法，这一点似乎是出人意料的。因为他费尽心机的努力和游说所力求达到的恰恰又是将他们的选择限制在自己的愿望中。

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大多数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刚开

① 《党内通信——关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载《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第157页。——译者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35页。——原注

了一半的情况下，毛已感到企图通过长时期的游说来指导各省的辩论，以达到用短时间的突击战术显然不能实现的目的，这是不现实的。此外，经过与周小舟、王任重的讨论以及看了广东省委的汇报，毛显然已注意到（或许是第一次）管理区和生产队规模大小有很大不同，有时管理区比生产队更相似于过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所以，在一个省也许适用的方法在另一个省就不一定适用。总而言之，尽管毛仍强调这个问题对三千多万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关系如何重大，但他已暗示准备认可河南的方法，只要河南（可能还有其他省）能在县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上确认这种办法得到基层群众的真正同意即可。[①]

第二次郑州会议记录中另一个显然让与会者感到迷惑的问题是，公社征调生产队的财产该不该作价付给补偿。在这方面，山西省似乎已在它的县五级干部会议上作出决定，不予补偿。但当毛看了该省第一书记陶鲁笳有关这个问题的汇报后，当即表示异议。他指出，如果一些公社可以付给补偿的话，所有的公社都肯定能做到这一点[②]。毛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赞同。

在毛致力于给各省委第一书记们发出指示，以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精神的同时，邓小平召集了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责成新华社收集有关人民公社问题的材料。邓小平感到有必要增加党了解农村情况的信息渠道，这有趣地暗示出高层领导对下面送来的汇报的不信任。从所能见到的有关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的零散材料看出，党的领导人这时已开始对生产问题和虚报产量的浮夸风感到担忧了。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106—107页。——原注

② 同上，第50页。

第二节 陈云再次出马

1959年最初几个月，在这种忧虑日益加剧的气氛下，中国领导人开始求教于他们的一位言语不多的同事——陈云。陈在党内排名第五——他是党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也是老资格的副总理。在大跃进运动以前，他一直负责全面经济工作，但是在1958年间，他似乎一声不吭地退居后排。他虔诚地出现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推手推车的领导人队伍里，但对于经济决策显然已没有多大影响了。毛虽然敬佩他从不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的精神，① 但在大跃进的狂热日子里，并不准备听取他那稳健的经济主张。

到1958年底，毛大概觉得需要一种强有力的论证去向茫然失措的党员干部说明他新近发起的反左运动的正确性。② 毛知道陈云可以提供这样的论证。更为重要的是，他需要陈云帮助开辟一个航向，使被他以及他的那些毫无主见的同事引入泥潭的国家走出困境。

陈云在1959年介入经济决策的第一个重要的、也是唯一公开的行动，是发表了一篇探讨关于工业化计划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3月1日的《红旗》杂志上③。在文章中，陈云特别重申了在制定工业发展政策的时候，要把国家的利益放在各省的利益之上。长期以来，他一直反对在每个省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这一点在他的权力下放计划中曾是许可的，并且是得到毛的"自力更生"方针的鼓励的。现在，为了尽力

---

① 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1页。——原注

② 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13页。—— 原注

③ 陈云：《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红旗》1959年第5期，第1—16页，《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70—92页。——原注

补救大跃进政策对经济带来的损失，他使用了“全国一盘棋”的譬喻，并坚持认为，如果不从全国的角度来安排利用中国有限的资源，经济建设成就就将付诸东流，建设速度将会减缓——这句话是有意对大跃进狂热信徒们的抚慰。

工业布局是经济建设中的战略问题。陈云重申并发展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观点（李曾在1956年有效地抵制了毛的主张），认为在已过度发展的大城市中建立新的企业是不经济的，最好把企业分散建设在中小城镇，接近原料和消费地区的地方。毛的方针，正如他最初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详细阐述的那样，则是有利于如上海那样的大的沿海工业城市的。似乎有理由设想，毛幕后的鼓动者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从各种说法（包括毛的说法）来估计，柯似乎曾是大跃进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①1958年初，上海曾透露它已有698家工业企业在建设或重建中，这样一个规划要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下是根本不能想象的。难怪陈云感到不得不旧题重谈。

在从战略问题转到他所说的战术问题时，陈云强调了对基本建设项目分别轻重加以排队，以避免延误重点项目的建设的重要性。关于新建工厂的设计，他认为中国必须量体裁衣，尽量优先安排中小型企业，而不是大型企业。他坚持认为，确保工程质量是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之一。②他恳切希望他的同事们要实事求是——这是毛在延安时强调的口号，陈云总是认真地加以执行——同时还寻求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得到支持，重申了恩格斯从黑格尔那儿借用的一句名言：“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毛采纳了这个概念，并将这句话的译文修改得更加符合原意，而且听起来更为明确：“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两个月之后，这句话

---

①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74—76页。——原注

② 同上，第77—89页。

被用来鼓励农村干部更加诚实、讲真话。①这个事例明显地说明，毛这里并不是表示对革命导师的尊敬，而是更愿意听取陈云的意见。

陈云介入经济决策的第二个行动是给中央财经小组——中国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机构，陈云曾担任过小组负责人，不过此时显然没有参与该小组的工作——写了一封信。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有关消费市场的紧张状态问题。这种紧张状态是如何造成的呢？陈云认为："去年夏收和秋收后，估产高了，吃用多了"。今年粮食销量继续增加——这一年度比上一年度要多销粮食900万吨——但库存下降。不管1959年粮食增产多少，省吃俭用、控制销量都是十分重要的。他断言，中国的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这与那些大跃进的宣传者们的乐观说法相反。

在城市市场上，猪、鸡、鸭、蛋、鱼等副食品以及工业品的供应也十分紧张，按货币计算，缺口约有四、五十亿元。(周恩来在这年晚些时候认为，这种紧张状态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农民生产得少了，而是因为他们吃得多了③。)陈云估计，要部分地缓和市场紧张状态，起码需要增加10亿元副食品供应，也就是大体上增加1000万头猪、2亿只鸡鸭、2亿斤蛋类和几万吨鱼类的供应。他首先建议，要"三条腿走路"，国营、集体、个人三种形式可以同时并行。但又指出，而在目前，唯有农户（他们的家畜家禽在1958年被公社强行接收了）才有足够的经验喂养家畜家禽，这是增加市场供应收效最快的办法。④陈云还认为，必须鼓励那些在

---

① 陈云的原文，见《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84页；毛泽东的原文，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94页。——原注

② 指《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载《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第93页。——译者注

③ 《北京周报》1959年第35期，第14页。——原注

④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93—94页。——原注

手工业合作社名义下的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以增加消费品的产量。在谈到购买力问题时，他建议精减工人，将他们安置到农村去。这将减轻城市市场供应的压力，同时增加了农村副食品生产者的数量。从毛两个月后在庐山会议前夕的表态意见来看，这位主席采纳了陈云关于市场问题的主张。而且他还更为迅速地接受了陈云关于压缩钢产量指标的建议。

第三节 陈云和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

根据毛后来的回忆，他曾建议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为3000万吨，并在1959年8月①的北戴河会议上得到认可。后来在1958年底召开的武汉会议上，这个指标减为2000万吨，在1959年3月底召开的上海会议上，又减为1650万吨②。这个说法存在的问题是，武汉会议后所宣布的钢产量指标曾是1800万吨，在上海会议以及紧接着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再次确认了这个数字。据“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攻击，负责制定年度计划的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曾在上海会议上提出了过高的钢产量指标。这种说法属实的话，也许意味着薄一波为避免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和士气的低落，在会上至少曾公开地坚持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放。如同我们后面将看到的那样，这个意见此时得到了冶金工业部强有力的支持。但是不到一个月，这个意见已站不住脚了。在4月29—30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与会者对于一个月前上海会议刚刚拟定的今年第二季度的钢材指标将不可避免地下降20%十分关注。事实上，书记处大概已意识到，1959年即将过去的头4个月中，将只能生产钢336万吨（能轧出227万吨钢材），在剩下

① 原文有误，应为1958年8月。——译者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244页。——原注

的8个月中，还有将近1500万吨已公布的指标需要完成。① 这一危机带来了3个问题：第一，1959年钢铁生产的指标是否应该分成两个，一是可靠的指标，另一个为争取的指标？第二，钢材的分配是否应该只按照本年度确实能够生产的可靠数字来进行？第三，如果钢材分配的数目减少了，是否应该削减一些建设项目？在书记处的一项提议里（这进一步证实书记处在大跃进期间的经济决策中起着关键作用），邓小平和他的同事责成中央财经小组对此作出回答。②

至此，陈云已对钢铁工业的问题独自进行了3个月的研究。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他被重新任命为中央财经小组成员，与李富春、薄一波以及资历较浅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他参加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肯定是为了维护国防工业的利益，因为他所在的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一起共事。这4个人听取了冶金工业部6次汇报，其中钢铁方面总的情况一次，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各一次。接着集中讨论了一次。此后，在5月份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讲了一个多钟头，详细汇报了中央财经小组的调查研究结果。③

陈云特有的细致而有逻辑的分析，与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所倡导的简洁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如果政治局熟悉钢铁工业的情况，那么，陈云所讲的许多细节应该说是多余的。显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毛发动大炼钢铁运动之前的北戴河会议上，并没有人对钢铁工业的情况作过如此详细的分析。陈云的发言提供了极为不利的证据，表明大炼钢铁运动已使国家工业体系超负荷运转，有关部门已陷入混乱状态。他列举了供财

①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97页、102页。——原注

② 同上，第97页。

③ 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116页；《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98页。——原注

经小组选择的几个钢产量指标（见表1）：①

表1　　　　单位：万吨

	可靠指标	争取指标
上海会议	1650(未公布)	1800（公布）
冶金工业部a	1600b	
	1500	
	1400	
	1300	
国家计委重工业计划局	1250-1300	1400
国家经委冶金局	1300	1500

a　没有具体说明哪个数字是可靠指标，哪个数字是争取指标。

b　冶金部还提出过1600万吨钢的数字，但是没有详细说明。

不清楚这些曾对钢产量指标提出过建议（上海会议的钢产量指标就是根据这些建议确定的）的官员们为何会同意对指标作如此大幅度的压缩，这与他们原来的估计相去甚远。人们一定会得出这样的假设：在时隔短暂的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已经觉察到现实主义的气氛正在弥漫。

中央财经小组同意的钢的可靠指标初步定为1300万吨（轧出钢材900万吨），至于争取指标，需待听取煤炭部、机械部以及铁道部等汇报后，再加以确定。由于钢的可靠指标定为1300万吨，这就要求削减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中央财经小组建议要特别注意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的建设项目。陈云警告说，即使这个指标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铁矿石供应紧张。陈云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令人佩服地表明，在财经小组的建议提出之前，他曾作过大量的分析。

要生产1300万吨钢，就需要2000万吨生铁，而生产这么多

①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98页。——原注

②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97—98页。——原注

铁反过来又需要7000万吨矿石。中国当时有14个有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的大型采矿企业，1958年曾采铁矿石3460万吨，1959年可采5300万吨。另外还有19个中型采矿企业，其中6个有半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其余13个原来是手工开采，也没有铁路。1958年这些中型采矿企业共采铁矿石680万吨，1959年可采800万吨。最后，还有214个小型土法生产的采矿点，1958年采铁矿石606万吨，1959年可采1000万吨。以上大、中、小三类企业合计，可以生产铁矿石7100万吨，能够运出的是7000万吨。即便如此，为着保证7000万吨矿石的开采，还需要增加空气压缩机、电铲、卷扬机、球磨机等设备和爆破材料。①

假定铁矿石能够保证的话，接着的问题就转到生铁的质量要求上来了。这一年生产2000万吨铁，有900万吨要靠小高炉。但是小高炉生产的生铁有40—50%质量不好，主要是因为使用不纯的焦炭而造成含硫过多。而这又是由于煤中的硫没有洗净的缘故。炼焦炭所需要的煤有一半，即2000万吨，要用土法生产洗煤。这部分土法洗煤，据估计需要60万个劳动力，从此时起连续生产200天才能完成，并且要有粉碎设备和其他必要的工具。陈云提供的数据表明，钢产量指标充分考虑到了生产中的不利因素，并留有很大的余地。而且，如果生铁的杂质不能除掉的话，那么将近500吨钢将不能用来轧成钢材。不过，倘若陈云所提到的上述这样那样的小障碍克服了，至于生产所提出的各项指标所需要的设备则是不成问题的。②然而，陈云告诫说，财经小组总的评估只限于以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为依据。所提建议现在还需通过对钢铁以外的其他工业进行进一步的全面调查研究来确定。陈云无疑清楚地意识到，大跃进期间，各个工业部门的负责

①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98页。——原注

② 同上，第101页。

人往往轻率地为本部门提出的指标打保票，而不考虑他们能否保证得到其他部门的必不可少的合作。①陈云还说道，将向主席、政治局和书记处作进一步的汇报。但明显没提向国务院汇报。这里，国务院在这一时期经济决策中的次要作用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尽管陈云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中央财经小组提出了第一流的报告，但中央政治局会议仍未能作出采纳财经小组所建议的1300吨钢指标和900吨钢材指标的决定。尽管薄一波显然已放弃了自己主张的过高指标，但冶金部仍然坚持认为，降低指标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失望，而且北京以及外省的许多领导人也赞同这种看法。大概是在毛缺席时主持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刘少奇否定了上述看法，认为指标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冶金部也许从陈云在大跃进期间被排斥在毛的决策圈子之外而威望大减这一点中受到鼓励，仍大胆地坚持1500万吨钢的指标不放，并估计毛必然会支持这个高指标。②

即使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了13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最后也必须征得毛的赞同才行。因为这位主席与大炼钢铁运动是息息相关的。但是鉴于出现的僵局，政治局甚至不能向毛提出意见，只好由陈云将财经小组的报告递交这位主席让他来作决定。在随报告送去的一封简短的附信中，陈云强调说，要完成指标，小高炉炼铁是个薄弱环节，洗煤去硫是关键因素。他坦率地承认，对于钢产量指标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并提议同持有异议的冶金部部长王鹤寿以及中央财经小组的人一起面见毛，使主席能听听争论双方的意见。

毛是否要他们当着他的面就此进行争辩，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后来说，1300万吨钢产量指标在6月份得以通过，这说明，

① 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83—84页。——原注

②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104、106页。——原注

他显然赞同中央财经小组的意见。接着，周恩来、邓小平派出了5个工作组去整顿大炼钢铁的工作：小高炉要定点，具备条件而又有发展前途的要坚持搞下去，其他一律撤掉；把劳力从钢铁方面尽量抽下来，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①

毛之所以比较容易地对钢的生产指标作出决定，其中的一个因素肯定是陈云的那份纯技术的、一点也不涉及政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中丝毫没有指责别人的意思——陈云尤其有理由这样做——即使在谈到小高炉时也是如此。所以，主席接受这个报告，并不会使人感到他是在作自我批评。只要将陈云在1959年上半年所作的报告与彭德怀在这年7月庐山会议上所提出的对大跃进的分析②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毛何以乐意容忍前者，而对后者却不能容忍。

第四节　农村政策趋于求实

北戴河会议之后不到10个月，毛就接受了将原定的1959年钢产量指标削减56%的意见。这一年，陈云的1300万吨钢的指标确实完成了，但也花了很大的代价。显然，这位主席同意陈云的主张，现在需要"稳住阵地再前进"。③而且甚至在他觉察到钢产量指标的不现实之前，他已发现来自农村的报告和预测存在着大量虚假的东西。4月29日，即中共中央书记处开始重新研究钢产量指标的当天，毛写了一封传达到生产队一级的"党内通信"，在这封信中，他强调说：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

① 《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之三（1979年），第19页。——原注

② 见本书第10章。——原注

③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97页。——原注

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那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①

毛接着谈论了由谭震林及其同事们提出的迅速提高粮食产量的一些具体措施。他认为在密植问题上所谓"越密越好"的说法"不对"，指示要在这方面多与老农仔细商量。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对的，但在10年内不可能全部实行。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机械化问题也至少需要10年时间才能解决。最近几年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② 毛还强调了节约粮食的重要性。最后，毛恳求人们要坦诚，他说："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必须诚实……"③ 毛承认他唱的是低调，甚至承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正是在这里他引用了陈云关于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的一段话——但说如果高指标达到了，他将谢天谢地。④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提议采用"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这个口号直到1960年才开始实行），周恩来建议加上"以工业为主导"。陈云同意这两句话。但他感到特别需要的是研究怎么样去贯彻执行这个方针。他亲自到农村去做调查，调查的地方自然也包括当时的开路先锋河南省。在该省，陈云发现第一书记吴芝圃仍然自信地声称河南省小麦产量一年就翻了一番还要多，全省不仅不需要再调进粮食，还可以调出一些。陈云显然不为所动，他像连珠炮似地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

①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100页。——译者注

③ 同上，作者引文有出入。

④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102页。——译者注

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河南省当时的生活水平，农村人口最低限度每人平均需要多少粮食？全年要吃掉多少？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这几笔帐加在一起，留在农村的粮食最低限度需要多少？根据这些问题和有关城市粮食需求的一系列类似的问题，陈云希望河南省的领导要对全省粮食供需的差额有全面的了解。如果河南省的干部们对这些数字不了如指掌的话——似乎情况正是如此，据说陈云曾反复问这些问题，这暗示他并没有得到回答——那么该省的工作就搞不好。

由于不能提供实际情况，吴芝圃和他的同事们干脆说谎。他们安然自得地向陈保证说，该省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是充足的，而事实上这些数量极小的粮食配额只是以农民瞒产私分为由，靠在农村搞高征购（如早些时候在广东那样）勉强维持的。① 毛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这种做法的批评显然被忽视了，所以在庐山会议开始时，他似乎本来准备再次对那些不切实际、急于求成的人发起猛烈攻击。

第五节　上海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在这些自春天起开始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仍没结果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于1959年3月底左右在上海召开，接着又于4月2日至5日召开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大概曾想借两个会议宣告，他于同年2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重新发起的整社工作圆满结束。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干部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全面听取有关中国经济的现状，所以，这两个会议只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决议，以及确定了后来证明是十分短命的1650万吨的钢产量指标。毛在会

---

① 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54—55页。——原注

议上仅限于就工作方法这个他一直感兴趣的话题谈了一点看法。与1958年1月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不同，这次他只限于16条，主要是想鼓励干部们灵活地制定政策，使其更为迅速地适应变化的环境。①

不同寻常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这两次会议上，曾专门讨论过后来在4月中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为主要议程的一个问题：西藏3月中旬发生的反革命叛乱。也许是因为有关材料比较敏感，因此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不能透露；也许是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是在中央军事委员会内部讨论的。不过，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分子们并没有试图去利用这个在此之前国内最为严重的骚乱事件，作为反对他们的政治对手的武器。人们必然会作出这样的猜测：西藏叛乱事件——曾对中印关系，并进而对中苏关系带来严重影响——事实上并没有在中国领导层中引起不合。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藏事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并没有起直接作用。因此，这一事件在本书中只能一笔带过。

从当时的情况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事件来看，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主要决定是在即将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推举刘少奇接替毛担任国家主席。经过两年半的酝酿之后，毛在领导层中退居"二线"的计划现在即将实现。②虽然他仍将暂时保留更为重要的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但从现在起，他开始打算让他的高级同事（特别是刘少奇）在国家事务的处理上承担起越来越大的责任。毛提出这个计划的意图在于培养一个有一定权威的、充满自信的领导集团，使其在他去世后接他的班，以防止苏联在斯大林死后发生的那种权力斗争在中国重演。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51—53页，58—62页。——原注

② 有关毛在这个时候退居第二线的消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证实的，见《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34页。——原注

就毛来说，一下子从整社的中途退出来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他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后来在庐山会议上面对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批评，他不得不维护自己的地位。不过，在这以后，毛有关当时国内政策问题的讲话和论著在数量和篇幅上都急剧减少，这表明有几年时间他曾确实退居到了“二线”。邓小平在1959年以后从来不向他汇报工作，就是一个确实的证据，而不是像后来毛所暗示的那样，是搞独立王国。①

刘少奇升任国家主席后，其家庭的确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孩子们被告诫不要打扰他们无暇休息的父亲。实际上，正如刘的孩子们非常了解的那样，这位新任国家主席已经成了（实际上一直是）一个“废寝忘食的人”，每天在办公室桌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一天不说一句话。②他的妻子王光美曾抱怨说，坐这么久，屁股都“磨破”了③！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刘全天的工作时间，包括参加会议，听汇报、作调查研究，已经够长的了，而且还不断延长时间。在他成为国家主席之后，每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就是上床以后，还要看二、三小时的各种资料④。有一次他说，一个共产党员，“没有比不能工作更痛苦的了”。⑤而且，他正是以此为座右铭的。1956年，他在准备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时，曾连续工作3天3夜。有时只休息两三个小时。在召开重要会议期间，他更是很少休息，总是在工作人员第二天已经起床了，而他自己还未合眼。总而言之，他除了为党工作，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

---

① 详见本书第一卷，附录3。——译者注

② 《红旗飘飘》（20）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1980年3月，第172页。——原注

③④ 同上，第277页。

⑤ 同上，第40页。

在刘的书房里，放着一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按照一位西方学者的说法，该书的主人公是一个“缺乏人情味的坚如磐石的人物，他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作为政治上的价值标准，并按照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冷酷无情的道德标准表达了自己的全部体验。”① 尽管刘对人严肃认真，不苟言笑，但他并非缺乏人情味。不过，他看起来同那个斯大林时代小说中的主人公相像，尽力按照某种政治追求为生活的准则。1959年，刘所在的党支部发现，他和妻子的工资加起来，去掉房租、水电费，以及保育人员的工资，剩下的钱就不多了。他们研究决定作为夜餐费每天多补助他一元钱，按说刘完全有资格拿这元钱，因为他总是工作到深夜。当刘 3 年后发觉这件事后，他坚持每个月从他的工资中扣除一部分，以偿还额外领取的1000多元补助。② 在外地视察期间，刘从不接受礼品，而且还坚持随身带自己的茶叶和廉价香烟。出国访问期间，他总是把自己用剩的外汇上交当地的中国大使馆。

刘特别注意不许自己的家属享受特权。大概是在1959年国庆节期间，在自家的一间他经常主持政治局成员开会的小屋里，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从紧张的日程安排中挤出一点时间开这个会，目的是纠正他的孩子和亲属中存在的想从他升任国家主席中得到好处的错误想法：诸如有的不想当农民想当工人；有的不安心农村，要进城市等等。刘只帮助过一个侄女（她的已故父亲曾为革命作过一些工作），这在这位国家主席的家中是一个特殊的例子③ 。刘严格遵守中央政治局关于公家汽车只能用于公事的规定。他的孩子曾步行或骑车走很远的路去上学，直到后来他才花

---

① 厄尼斯特·杰·西蒙斯：《有组织的作家（1934—1946）》，见海涅德和鲁伯兹编：《苏联文学与苏联革命，1917—1962年》第35页。——原注

② 《红旗飘飘》（20），第231、276页。——原注

③ 同上，第204—205页，263—264页。

钱为他们定做了一辆儿童三轮车。王光美分娩出院，是乘出租车回家的。刘还带头徒步去剧院看戏。[1]

刘还采取措施不让别人对他的孩子搞特殊照顾。在学校，他的孩子都用的是化名[2]。孩子的父亲针对这些正在长大的孩子们的优越感指出，对他们的要求应该比别人更严格。当他的一个女儿分配到地方工作时，她的北京朋友都大为震惊：如果像她这样的都下去，他们怎么能逃脱呢！[3] 虽然刘很严厉，但他很少发脾气。据他的工作人员回忆，只有两次他发了火，那是因为一个孩子要改变专业。但是，据他的前妻所生的女儿刘爱琴的自述透露，他发火主要是恨铁不成钢，是为了使自己的孩子按他确立的完美无缺的准则去生活。[4]

这些准则之一就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刘的伙食十分简单，常常吃剩饭。孩子们的穿着都很俭朴。有一个孩子买了一件贵一点的上衣，被退了回去。刘夏天总是穿着布衬衣、布裤子，而在冬天或在较为正式的场合，他则靠两套旧衣服度过：一套黑呢子制服，一套深灰色华达呢制服，是他“最为象样的衣服”。他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一双他经常穿的旧布鞋，被送去修补时，曾被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取笑，这位工作人员以为它是刘的一位警卫员的。当见到刘的时候，工作人员明显发现他很少说笑，但据说他对他们是十分关心的，这是由于他的妻子王光美常在他身旁暗示他要注意。[5]

刘少奇并不是唯一的一位以生活俭朴，工作勤奋著称的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也以同样的品格而出名。但是，刘的比较

---

① 《红旗飘飘》(20)，第233页，264—265页。——原注

② 作者有误，实际上是孩子在学校从来不用父亲的真名。——译者注

③ 刘爱琴：《女儿的怀念》，第58页。——原注

④ 同上，第63—72页。

⑤ 《红旗飘飘》(20)，第226页、254—256页，270—272页。——原注

冷静的性格和书生气使他给人们一个更为清教徒式的公众形象。他恢复名誉后的一些回忆文章指出，甚至在他的私人生活方面，尽管他有广泛的工作联系，但他没有朋友（彭真也许例外）。我们没有发现他与什么人有类似于周恩来的国务院中那种同志间的感情或元帅们之间的那种友好关系。刘与他的同事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只是正常而谈不上亲密。

刘与毛的关系似乎比较清楚一些。他把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使主席能腾出时间和精力考虑更重要的问题视为自己的责任。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告诉自己的工作人员，如果主席找他，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得立即叫他。由于毛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养成了夜间通宵工作的习惯，这意味着常常要打扰刘本已很少的几个小时的睡眠。另有一个事实同样暗示出刘接受了这样一种从属地位：即使毛信口提到或引用一个典故，刘都急忙去查原著，以深刻理解主席引用这个典故的现实意义①。毛是一位非常自信的领导人，很少作自我批评。而刘即使担任了国家主席，可仍把自己视为党的工具，经常作自我批评。显然，正是刘启发毛提出了一些最为重要的政策，特别像1956年对十大关系的分析便是如此。

现在，在1959年，长年在导师身边勤勤恳恳地工作终于得到了报偿。这位60多岁的首席助手终于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声誉。在官方宣传工具中，他的标准像与毛的大小规格一样，并排出现在公众面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材料揭露说，这一意味深长的照片排列新方式是按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示，并由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具体实施的。周恩来后来说，新华社征求过刘的意见，刘没有表示反对。而且这使毛也不好反对。周暗示说，当刘第一次看到两人的照片并排出现时，应该认识到他已走得太远

① 《红旗飘飘》（20），第181页。——原注

了，但他并没有这样谦虚地下令纠正这一做法。①

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对刘揭露性的材料可以看出，无论毛对自己引退后出现的宣传方式上的变化如何感到不满，可恰恰是他本人以及中共中央一致决定由刘接替他担任国家主席的②。

有一件事是值得注意的，即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上海会议上对毛的攻击。据说，彭元帅批评毛“亲自挂帅”③，说他从1942年延安第一次整风运动起就开始这样做了。毛后来形容上海会议上对彭的批评只不过“吭了几声”，但据彭自己说，他却以强硬的措辞，甚至用“挑拨”这样的词相回敬。④

这一事件令人费解的是，彭德怀元帅为什么在毛正打算辞去国家主席并退居“二线”的时候向这位主席发难。我们知道，彭与毛在30年共事期间的许多场合曾发生过冲突，而且正是彭在1956年建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从新的党章中删掉。如今，是不是彭又怀疑毛引退的诚意？或者，彭提出反对个人挂帅的体制，是由于他觉得这样做损害了政治局常委会的威望，还是由于他反对选择刘作为毛的继承人？⑤

有迹象表明，刘少奇与彭德怀两人基本上属于党内的两翼——政界（组织工作）和军界。这两翼在毛的领导下的联合曾是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的强有力因素。50年代初，高岗就曾企图利用两翼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怨恨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当时他千

---

① 《新闻战线》1967年5月13日，第4页。——原注

② 小册子《新时代的“狂人”》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编印，1967年4月。——原注

③ 丁望主编：《彭德怀问题专辑》香港，明报日刊社出版，1956年，第394页。——原注

④ 《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37页。——原注

⑤ 同上，第103页。

方百计谋求军事将领们对他的支持，以达到取代刘和周恩来而成为毛的继承人的企图。在清洗高岗时，彭德怀曾就与高岗的关系作了自我批评。1959年夏天庐山冲突之后，一个重新搞的调查材料以许多事实确认，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远比迄今所承认的要密切得多①。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可以推测，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天下，但党政人员坐天下的状况极为不满。在庐山会议上，刘对彭德怀的断言一时大为生气，刘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彭本人后来也声称，他在庐山会议上的攻击是直接针对刘的，而并非针对毛的。将这些零散的证据放在一起看，就可以说明，在上海会议上，彭德怀含蓄地对国家主席继任人选的安排表示了不满。

很显然，刘的地位的上升并最终继任国家主席，预示着领导中国的方式将发生变化，将从发挥个人能量的"游击"方式转向有序地动员群众的组织方式。这两种方式的不同曾清楚地反映在毛、刘向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有关大跃进的讲话中。对于那些曾对毛处理1957年整风运动的方式愤愤不平、并对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就过热的大跃进运动进行的指责深为不满的党员干部们来说，这一领导方式的转变预示着一个更有预见性的新型领导的出现。湖南毛家乡的一位市委书记似乎对预料中的事也大为欣慰，他说："毛主席现在年纪大了，毛主席百年以后，少奇同志就是当然的继承人。刘少奇年轻能干，是个大理论家，水平极高……"。此外，刘多年专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这也许使他比毛本人有一个更大的战友圈子。"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常常喜欢将毛的每一个真正的或假想的反对者都归入刘的"集团"。不过，不少材料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某些人，他们原属于党的北方

---

① 《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41页。——原注

局，自30年代以来，就与刘有着亲密合作的记录。到1959年时，这些人已成为党内的重要人物。

但是，刘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斯大林式的人物，他已取得了领导地位，并希望继续保持下去。

刘是在1958年狂热的大跃进之后，再次提出压缩空气的口号的时刻接任国家主席职务的。此时，毛已就人民公社问题倡导了新的方针，首次是在武汉会议上提出的，后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进一步作了强有力的阐述。当然，这一新的方针也对农村以外的其他领域产生了影响。以"全国一盘棋"口号为象征的更有秩序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恢复，意味着党必须将"专"重新提到与"红"差不多同等的位置上。早在1958年9月，毛在视察武汉大学期间就曾重新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武汉会议后不久，周恩来在与一些演员座谈时，对他们建议说，他们上演的戏中党的领导者形象应该是又红又专的①。1959年初，一些在1958年以前倡导的教育观点开始得到恢复。3月，外交部长陈毅在向北京中学生讲话时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并对目前存在的重视生产劳动，轻视学习的倾向表示不满，认为生产劳动和学习都应该同样给予重视②。在更为广泛的文化领域中，周恩来鼓励作家和艺术家要努力使创作题材多样化，不但要有现代题材，而且还要有历史题材③。而陈伯达此时则显得步调不一致，他提倡要厚今薄古④。

另一件与此时的经济发展更直接相关的是中国共产党重新强调原工商业者的技术和经验的重要性。彭真——他此时似乎在主管统一战线工作——称赞资本家积极响应大跃进运动，并主张应

---

① 《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之二，1978年，第404—405页。——原注

② 《新华月报》1980年第8号，第144—145页。——原注

③ 《关于文艺工作的三次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第1—5页。——原注

④ 《科技革命》1967年8月第2期，第20—23页。——原注

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各自的作用①。这项新方针十分符合刘少奇关于中国前途的设想。这年晚些时候，刘在写给中国民主建国会（非共产党的政治党派，成员主要来自工商界，是中国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主任委员、德高望重的黄炎培先生的一封信中，透露了他的目标。他告诉黄说，在过去的10年，中国领导人的精力主要放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即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国有化方面。在官方开始揭露经济上的浮夸风，并对各项生产指标进行削减之后不久写的这封信中，刘承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他接着写道：

> “至于说到今后10年，情形就会不同了。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一些必要的经验，为建设扫清道路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在今后的建设道路上，虽然还要清除一些旧的和新的障碍，但是我们已经造成一种条件，使我们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以主要的精力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会加快建设的速度，使今后10年的建设成就大大超过以往10年……”②

对中国来说不幸的是，刘的这个预言并没有实现。否则的话，在此后的10年结束时升为接班人并向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的可能就是刘少奇，而不是林彪了。

---

① 《摧旧战报》1967年5月25日，第2页，——原注

②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4集，北京化工学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67年4月10日编印，第62—63页。——原注

附　录　1

为人民公社上的混乱名称正名

孔子大师在《论语》一书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有的学者对孔子是否曾说过这段话表示怀疑，不过他们都一致认为，孔子的信徒们特别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所以，"正名"已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在本书的其他地方，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中共领导人对准确使用名称术语的重视。最为著名的例子也许发生在1959年夏天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但中国领导人没有一次在正名问题上像对人民公社的正名这样费力，没有一次正名像在人民公社上遇到这样大的语义混乱。不过，如果知道这种术语的混乱是由于毛本人为了适应实际情况而经常改变立场所造成的，那么，即使古代的儒家们也不会感到惊奇的。具体地说就是因人民公社内部所有制和管理体制问题所造成的。由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上下变动，公社内部不同级的名称就随之改变，因而产生术语混乱问题。对于外国观察家来说，另增加了一层混乱，即中文术语改变没有相应地对官方的外文译名加以变更。

人民公社在语义方面的混乱最初出现于北戴河会议的决议中，该决议建议，在由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人民公社后，原来的合作社就应改为"耕作区"或者"生产队"。这里没有为第

---

① 《四书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明）李贽著，第109页。——译者注

三级的所有制单位或管理机构命名。这一遗漏在公社化过程中被弥补了。但是，由于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本来就很混乱，使得全国人民公社内部的管理体制五花八门：有的公社分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有的分为大队和小队；有的分为大队和中队；有的分为公社指导站和生产队；还有的分为作业区和生产队等。

在武汉会议上，开始着手对名称进行统一。公社下属的两级被命名为管理区（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官方英译名分别是"Production brigade"和"Proauction team"。此后，这两个词成了中国出版的有关人民公社的英文作品以及西方绝大多数中文资料译文中的常用译名。但是在中文中，这两个术语的一致性在两个月后又被破坏了，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还没有官方的译文）中，毛提到了三级所有制，但同时又提到了四级管理，即公社、生产大队或管理区、生产队以及生产小队。

实际上，毛的四级管理的提法并不是一时的疏忽，因为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社的确在公社和它的组成部分——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又增加了一级管理机构。但对于毛的听众来说不幸的是，毛在强调生产队的重要性时，正如他对他们所说的，他指的是武汉会议决议中的生产大队，即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毛肯定清楚，尽管他作了解释，但混乱仍然存在。所以，他在1959年5月15日，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刚刚结束不久就向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出一封信，指出"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说的"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不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应该说，这里说的"队"指的是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澄清了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但仍不能解决一些（也许绝大多数）把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称之为生产大队的公社中存在的名称上的混乱状况。

毛的"四级"的提法没有公开使用，但武汉会议上提出的

“三级”名称在1959年夏末的庐山会议上却发生了变化，第二级改成为“生产队”，第三级改成为“生产小队”。但后来到了1961年4月，又恢复了武汉会议的名称。现将1958年到1961年间有关人民公社下属管理机构的正式中文名称的变化情况概括如下：

			原高级社	
1958年8月	北戴河会议		生产队（耕作区）	
1958年12月	武汉会议		生产大队(管理区)	生产队
1959年2—3月	第二次郑州会议(毛的讲话)	生产大队（管理区）	生产队	生产小队
1959年8月	庐山会议		生产队	生产小队
1961年4月			生产大队	生产队

上表中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即那些没有冠以“大”或“小”限定词的“生产队”究竟指的是哪一级。“生产队”似乎是中国政府对公社下面最为重要的一级机构的称呼（武汉会议的名称也许例外）。在北戴河会议上，这个名称用来指公社唯一的下级单位——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每个人的注意力都直接集中于公社一级的时候，这样做可以认为是必然的。在武汉会议上，这个名称用来指第三级，这样做或许表明了党的领导人的一种愿望，他们想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式将公社的某些管理权移交给下面。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二级（即生产队）现又重新称之为“生产大队”，成为公社中自负盈亏的一级核算单位。它将“管理本地的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和军事事务。”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在公社的领导下，都应有组织生产、建设、财政和福利的“必要”的权力，但生产队被确定为劳动组织的基本单位[1]。这一做法的意义就在于，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了农民对于公社初期大量抽调农村劳动力从事大型水利建设工程，搞“大兵团

[1] 《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献及其分析》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500页。——原注

作战”，以及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任务等做法的不满。过多的强制性劳动任务使得农民不能很好地照料庄稼。同时由于这种劳动没有报酬，更加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对于农民的不满，毛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中以同情的话语给予了反映，使这种不满合法化。但是，在武汉会议上使用不加限定词的“生产队”这一名称，未必就意味着“生产队”已变成为公社管理体制中最为重要的一级单位。

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的是，毛赞同“四级”的提法和以生产队为基础导致了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对有关名称的公开修改，将“生产大队”改成了“生产队”。事实上，也许正是因为毛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不得不解释他所说的“队为基础”的意思，才使得中国当局此时决定使用不加限定词的“生产队”这一名称来命名公社中极为重要的一级单位。因此，当1961年将“生产队”恢复为原来的“生产大队”时，未加限定词的“生产队”只得变成为下一级单位的名称，这样，“队为基础”仍不失为一句适用的话。不过，这句话的英译名必须改成为“team as the basis”。

第三部分

冲　突



第十章

庐山交锋

第一节 感慨的返乡之行

1956年6月25日下午5点44分，毛泽东回到他的家乡韶山冲。这是他阔别32年之后的首次返乡之行。他是由湖南省会长沙驱车而来的。就像往常一样，由公安部长、新近提拔为副总理的罗瑞卿陪同。随行人员还有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徐启文，相邻的湖北省的省委书记王任重。后者的随行使人感到奇怪。而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家中头面人物之一的周立波也在其中，则似乎告诉我们，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将会以永存的、然而乏味的散文长留于后代。

头一个夜晚，韶山的农民们在招待所门前，以欢呼、鼓掌和笑声来迎接毛泽东。进屋坐下，他就听取了有关本地公社的工农业生产、水利建设等各方面情况的简要汇报①。当他被引到经过特殊准备的卧室时，拿出了自己随身带来的卧具②。

那天晚上，毛泽东通宵达旦地批阅文件，深

---

① 《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41页。——原注

② 同上，第247页。

夜，他出来乘凉小憩，和警卫员杨明闲聊起来，询问了杨明的受教育情况。当得知杨明从9岁到15岁在学校念书时，毛说，这情况和他自己正好相同。杨的回答尽管语气含蓄，但内容较为尖刻。他显然知道毛的父亲是富有的，能雇得起帮工。他说："不，那不一样呢，主席！我家没有劳动力，读书是冬、春两季，我没有读好哩。"毛则辩解说，年轻时他也同样要参加劳动。

然后毛询问杨对人民公社的看法。据报道，杨尽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和全面地作了汇报。显然，他的看法中一定含有批评的成分，因为尽管毛听了表示满意，但还得向杨解释说，一旦把问题纠正以后，人民公社的前景会非常光明的①。

第二天，天刚拂晓，毛即穿着雪白的衬衫、足着黄皮鞋，由罗瑞卿、徐启文以及其他人陪同，踏上山路。他先顺道走访了两户农家，喝着茶，询问起那些在他于20年代中期首先举起革命旗帜时曾跟随他的一些人的下落②。在第二户人家里，家长毛霞生满身泥污，刚从田里被召回来，很高兴这位与他同姓的主席在重返旧居之前首先来到他的家——它与毛的旧居仅隔着一个小水塘③。毛霞生后来的回忆并没有说，主席曾嘲笑他水稻每亩收800斤的说法，并估计每亩产量只接近500斤。但《韶山红日照千秋》一书中却记述了这件事，并说毛而后利用这个机会，对毛霞生说，要避免包括浮夸风在内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④。根据这一说法来判断，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庐山会议前夕，这位主席所持的正是"右倾"立场。

---

① 《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44—245页。——原注

② 同上，第242页。

③ 《我们在毛主席身边》，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77年，第200—201页。——原注

④ 同①，第242页。

毛的旧居当年在被国民党占用后，曾受到严重的损害。它在1949年以后的修复工作，得到了晋升中的年轻的该省官员华国锋的特别关照。这时毛环视着堂屋，微笑着对一个向他询问的人说："当年就是这样的"。他站在自己的房里，注视着父母的照片说道，假如在今天的话，那么他们就不致于被疾病过早地夺去生命①。在毛重返旧居的整个期间，他并没有对旧宅已被变成圣地表示任何不安与不快。他似乎不过感到这是很自然的事。也许当时这是没有什么可惊异的。因为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开始小心而又周详地培养起来了。虽然1956年的党章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群众中对毛的崇拜依然如故。他的高级同事，诸如刘少奇和周恩来（他们两人对任何想使自己的家乡成为旅游胜地的企图都害怕地加以拒绝），以及彭德怀，都认为毛的出生地应当成为供人参观的场所②。

毛访问的下一个地方是韶山学校，它座落在毛曾经放过牛的田野里。学校的前身是毛氏私塾。1925年时，毛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曾在那里创办了农民夜校。1953年时，建起了新校舍，这位主席为它题写了校名"韶山学校"。当时只有大约100名学生接受小学教育。1958年，学校建立了初中部，现在已有700多名学生和30多名教师③。

上午10点，毛离开学校去吃了点早餐，然后到田里去听取公社书记的汇报。毛再次表现出有节制的态度，详细分辨事实，打消本地干部的疑虑，指出一年里每亩能增长一、二百斤就算了不起了。他谈到了由于拖拉机的缺乏，需要养好耕牛。同时强调了

---

① 《难忘的记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79年，第6页。——原注

② 关于刘少奇对故居的态度，参见《怀念刘少奇同志》第343、358页。关于周恩来的态度，参见《我们永远怀念周恩来总理》第20、164—165页；《周总理的故事》第138页。关于彭德怀的态度，参见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49页。——原注

③ 《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70页，《难忘的记忆》第10—11页。——原注

林业的重要性。他们还就水利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并且提出下午去看看新落成的本地水库①。

毛这一参观的消息显然迅即传播开来。当他用过午餐，小睡一会，于下午3点到达水库时，堤岸上拥满了欢迎的农民。毛走下水库，浸入水中，开始了他的视察，这可以算得上是以最接近水的方式进行的了。他在水里游了2个小时。不过他是怎么游的，我们并不清楚，因为他告诉那些选派来护卫他的年轻游泳者们说，他不会蝶泳与自由泳。不过那些围观的群众——他们由于不会游泳而谢绝了毛提出的一同下水的建议——却对毛能够一动不动地浮游在水面上的本领有很深的印象②。

可能是在去水库的途中，毛特意去看望了毛福轩烈士——他曾是韶山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的遗孀。后来，在那天晚上，主席邀请她与另一位毛氏烈士的遗孀、毛氏家族的四位男性成员，还有另一些老人、一些革命烈士的亲属，以及当地干部们到他那里作客。毛在一幢四周苍松翠竹环抱的灰砖平房前迎接他们，同每个人一一握手，招呼他们在木凳上就座。7点时，邀请的客人们先后到齐了，毛招呼大家到屋里吃饭。饭菜摆在四张圆餐桌上。主席绕着桌子，为每个人一一祝酒。一位70岁的老人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应着老人的话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谈话中，主席号召客人们对党组织和官员们多提批评意见。如果不敢提，可以写信给他。据报道，他们进行了一次生动的讨论。

席散人归后，毛回到他的卧室。显然，往事的回忆与情感的涌流，使他难以入眠。于是他伏案挥笔，写了这么一首诗：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

① 《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70—271页。——原注

② 同上，第272—273页。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①

在他访问的第二天早晨，毛爬上了附近的山峰，而没有向同行的罗瑞卿及其他随行人员说明他的目的。抵达山峰后，他们才知道来到了毛的双亲的墓地。一位机敏的小伙子临时用松枝、野草编就了一个花圈，送给了主席。毛静静地把它献在坟前，在肃穆的气氛中鞠了一躬。同行者们也仿此鞠了躬②。

墓地之行使毛动了感情。后来，当毛睡过午觉，罗瑞卿来请他启程回长沙时，毛边穿衣服，边对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他并且说，等他再来韶山时，还会再次为父母扫墓③。

那天下午，人群围拢来为毛送行。回长沙途中，他在引起青年时代回忆的地方停了两次，因而这使他延至半夜才抵达长沙的轮渡码头。然而这里仍然有着激动欢呼的人群。毛拨开警卫人员，上前同人们握手④。

第二节 登 庐 山

关于毛是怎样从长沙来到海拔1500多米高的、座落于相邻的

---

① 《韶山红日照千秋》第243、274—275页。
② 《难忘的记忆》第9—10页。——原注
③ 同①，第273—274页。同②，第11页。
④ 同①，第243—244、288页。

江西省的避暑胜地庐山，这是不清楚的。在庐山，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毛在经过激动人心的韶山之行之后，到达庐山时的情绪显然是很好的。这里美丽的风光使他熔铸成了另一首诗：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①

一位在几年后访问了庐山的西方记者，把庐山描述为"一处特别美丽的地方。峰峦巉岩、常青绿树，在平坦的长江平原上崛然拔起……"

"那是一个令人激发起对往昔年代回想的地方。许多世纪以前，诗人和画家们便开始光临此地，寻求灵感。他们伫立在峭壁边沿的小亭阁，凝视着称之为'五老峰'的峰峦。他们就像今天的游人一样，坐在仙人洞里，饮着'一滴泉'，复述着古老的传说：只要饮足了这种水，人们就能长生不老。"②

据这位记者所称，庐山拥有一座足以自豪的"庞大的别墅式的建筑"（大概是蒋介石30年代的夏季疗养地），几十座避暑石屋安卧在绿荫掩映的山坡之间。一些两间卧室的小型别墅，里面还配有年轻的女服务员，似乎是"为某些不同寻常的中国人服务的"。

作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准备，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些令人心旷

---

① 《七律·登庐山（1959年7月1日）》，《毛主席诗词讲解》，第190页。——译者注

② 罗斯·H·门罗：《庐山：中国诗人和政治家的冷静退却》，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国际版周刊）1977年8月1日。——原注

神怡的别墅里举行。毛与他的助手们开了多次会，气氛是融洽欢快的。他整理出了由大跃进的"左"倾思潮所导致的、现在仍有待解决的19个问题，不过他与助手们显然都已看到这些问题已经发现并正在逐步纠正之中，现在需要的是做一些收尾工作，而不同于4个月前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被迫发动猛烈攻击①。

在庐山会议开始进入正式议程后，毛发出了几项指示。他号召每个县以及公社要编纂两本书，一本是关于"好人好事"的，记载那些在1958年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得好，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人的事迹；另一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用于记录那些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②。那些不可避免地要上黑书的人，可能有一种被主席欺骗了的感觉，因为他们的错误就在于过于积极地贯彻他的指示。但毛已经不再支持这种狂热的言语和行动了。他认为管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而现在存在的问题是过活了。为了遏制由于基层干部的盲目性所导致的"半无政府主义"，毛重新提出中央集权，适当收回中央在1958年下放的一些权力，并且谴责了一平二调。③

然而毛的180度转弯（这对他来说并非个别例子）的最明显的证据，还在于他转而拥护经济计划制定者们（他们在1956年曾提出令他恼火的停止跃进的主张）的观点：综合平衡是经济计划的根本。他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平衡。"去年集中力量搞小高炉其他都丢了，这样搞法不行。数量与速度，这两个用于检验大跃进的标准，已被降温了。"宁肯少些，但要好

① 李锐：《怀念田家英》，载《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4号，第172—173页。——原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6月，下册），第275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276页。

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①

此外，毛认为，传统的苏联式的安排经济计划的先后顺序——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应当倒过来，次序改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在下面这一值得注意的段落里，他称赞了陈云（陈云的意见在这几个月一再被毛认真地加以听取）：

> “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许多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应当首先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②

无疑，毛的助手们向他提出了建议，应当让陈云（他并没有来庐山）重新主管财经工作。他们感到，庐山会议将是一个神仙会，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存在的问题将会以理智与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③就像毛自己断定的，前途似乎是光明的。

第三节　黄瓜打锣

随着庐山会议的继续进行，尽管毛和他的助手们都认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发生对抗是不可能的，但国防部长彭德怀（他是一个可以想到的会惹麻烦的人物）也许与他们的想法大相径庭。他不负责经济事务，并且在关于停止1956年的跃进或发动1958年的大跃进的争论中，他都不起任何作用。有一些人可以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6月，下册），第27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71页。作者引文有出入。

③ 李锐：《怀念田家英》，载《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4号第172—173页。——原注

利用这个场合说，“我告诉过你们应当这么做”，特别是陈云或者李富春。后者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贯彻大跃进的方针时，忠诚地压抑着自己的怀疑①。然而彭德怀不属于这些人。

不过，尽管他并不对政府事务负有责任——这种责任使他能够合乎逻辑地发动对大跃进政策的攻击，但仍有一些历史的因素以及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使得彭成为大跃进政策的主要批评者这件事显得并不那么令人奇怪。

本书前面已经提到了某些历史上的因素：如抗日战争以及朝鲜战争期间彭与毛在有关战略问题上的一些争论。近期以来，彭与毛在关于防务政策、军队的现代化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林彪元帅在政治局内地位的逐步上升，对这位元帅来说更是不祥的预兆。但是不论彭如何感到痛苦与担忧，他不是那种不经战斗就屈服的人。这是理解庐山会议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关键。

据彭德怀最早期的一位战友介绍，彭德怀体格健壮，兼有“牛一样结实的身躯和令人敬畏的面孔”。“传统的中国农民的纯朴性，是他的显明的特征。他工作勤勉，能与士兵们长期同甘共苦。”②确实，彭的吃、穿和士兵们一样地简单，甚至在北京他也住在朴素的住宅里。

彭的坚韧性源于他的出身，一个不幸的农民家庭，不断地沦于贫困之中。彭生于1898年，仅读过两年私塾，后来成了一名放牛娃，在十来岁时，当了煤矿工人。此后又回到家中务农。1912年闹饥荒时，他参与组织了反抗当地地主逼租逼债的斗争。当造反失败后，他跑到林区里当了一名搬运泥土的普通劳工。在这之

---

① 参阅《李富春同志对经济计划工作的巨大贡献》（纪念李富春80诞辰），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22日。——原注

② 这是彭德怀30年代的副手之一龚楚的记述。参阅《彭德怀案件1959—1968》第1页。——原注

后成了一名士兵①。

彭德怀是毛泽东旗帜下的最早的军事人员之一，1928年时，他率领数千人加入了毛与朱德在井冈山的革命队伍。大概毛对他的这位湖南老乡的勇敢与忠诚颇具印象，尽管彭并不以将才而著名，但他很快成为毛的圈子里的仅次于朱德的人物。在长征路上，毛曾赠予彭一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②

彭并非仅是酬谢了毛的赞赏。他把胜利归之于毛而不居功，为毛分愁解忧，并且随时准备一旦毛召唤的话，立即丢掉自己的一切③。在毛与彭过去的关系里也存在过紧张与矛盾，但相互尊重肯定是他们之间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指挥官，彭以直率地训斥他的下级而闻名。如同他自己承认的："我这个人爱批评人。"不过根据他在军队里的一位长期共事的战友黄克诚（他也挨过彭的责备）所言，彭的批评丝毫没有整人的意味，因为它们总是公正的，真正为了使人改进的④。此外，如同他的下级所知，也是为庐山会议所证实的，彭决不害怕面对自己的上级。1956年，当苏联领导人米高扬率领苏共代表团来中国，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彭当面质问

① 彭德怀：《往事回忆》，载《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3号第72页；《横刀立马彭将军》，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第6页。——原注

② 《横刀立马彭将军》第13页。——原注

③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出版，第49—51页。——原注

④ 《横刀立马彭将军》第19页。——原注

他，为什么苏联共产党只是在现在才批评斯大林。米高扬显然回答说："我们当时不敢提呀，提了要掉脑袋！"对此彭反驳说："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在朝鲜战争期间的一件事，能够更充分地说明这一点。彭德怀显然对所收到的一些命令感到气愤，因而赶回中国。他跑去找毛，不顾主席的警卫兵的规劝，在毛正在休息的时候，冲进毛的寝室，迅即开始论辩起来。毛不仅在实质性问题上作了让步，而且赞许地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① 当然，毛所指的是没有任何人敢冲进他的房间。

这样，对于彭在1959年春天在上海时乐于批评毛的领导方法，就容易理解了。不过这里仍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彭德怀仅限于批评这个问题。因为后来对于毛来说，生气地宣称彭在庐山会议之前对于大跃进或人民公社一句话都没说过，是相当合理的。此外，那些引起彭提出批评意见的那次实地考察，到庐山会议召开时也已过了6个多月了。

1958年10月，彭重访了西北的省份甘肃，它是在将近10年前他从国民党军队的手中解放出来的②。据彭的警卫员回忆，当彭抵达甘肃时，他为土高炉而鼓舞，从汽车的车窗里指着它们，详述着它们的优越性。这位元帅显然为官方的政策所影响，认为这样可以使农民利用本地的材料来解决农业用铁问题。展望未来，他憧憬着农民可以用它造土地雷、土炸弹③。

当彭看到一大片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的时候，他的得意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他们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位老农，他解释说，这里正在大放钢铁卫星（即试图创造炼钢新纪录），所有强壮劳力都去了，还够不上上头规定的人头指标；因此，上头

① 《横刀立马彭将军》第17—18页。——原注

② 同上，第148页。

③ 《在彭总身边》第69页。——原注

说，各路“大军”都要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

彭焦急地说道：“你们难道不想想，庄稼收不回去，来年大家吃什么？总不能吃钢铁嘛！”这位老农用力地点着头表示同意，然而却率直地说：“是啊，谁不这样说、这样想？可谁顶得住这个风？除非中央派个大干部〔即像你这样有权强行制止的人〕来！”

不过，当彭参观一所步兵学校，发现由于教员们仍紧张地在土高炉边劳动，他们缺乏睡眠，一个个眼睛发红，衣服也像煤烟一样地黑，教学与训练几乎停顿时，他才真正感到震惊。当彭到达的时候，学员们抬着刚刚炼出的“钢铁”跑来欢迎他。他告诉他们说：“我为你们的热情感动。但对你们的领导这样不珍惜你们的热情和干劲，我要打他们的屁股！……假如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军事学校都来搞这个，敌人就会高兴得跳！因为我们不待他们来打，我们自己就垮了！”①

学校招待所的两个服务员也许为彭的讲话所鼓励，壮胆向他诉说了家里的情况：一些房子被拆了，果树也砍了，把木料拿去给“小土炉”当柴烧；烧饭的铁锅已被征用，作为炼钢的原料。那天晚上，彭与一些官员们促膝交谈，他们给他提供了许多可供思考的情况。在他们离开之后，他一直写到深夜才入睡。

在从甘肃回来的路上，夜间经过河南省。他看到到处是土高炉燃烧的火焰，它们闪耀在乡间的夜幕里。在长时间一声不吭地沉思之后，他转身问警卫员：“你说，这个办法能叫我们国家从此不受穷？”这位战士谨慎地保持着缄默，彭就自己作了回答：“不行！这一把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完全不是我们脑子里想的那个东西了！”②

---

① 《在彭总身边》第69—70页。——原注

② 同上，第70—71页。

为什么彭德怀并不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或武昌会议，以及1958年11—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说出自己对土法炼钢的怀疑？根据彭后来的说明，他很迟才收到郑州会议的通知，因而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天，那是某天黄昏后在火车上（也许是开往武昌的）召开的会议，毛在会上讲了话，批评了“共产风”，因为到会者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所以会议时间不长即散。鉴于主席已讲了话，彭感到并不需要他干预。在武昌会议上（这次会议他断断续续地参加了），彭确实在小组会上对关于1958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1万亿斤的预测提出怀疑。当毛选择公布7500亿斤的数字时，彭才赞成了它，尽管仍存有疑问①。

武昌会议之后，彭德怀来到湖南，此行包括访问自己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公社，以及同县的毛的家乡韶山公社；同时还访问了平江县，30年前他曾在这里领导了一次起义（这广泛地被记载在革命史里）；最后访问了株洲。此行对他引起的震动，甚至比1958年的甘肃以及其他地方的视察之行还要大。与毛泽东一样，这也是彭30年来的首次返乡之行，并且同样受到热烈的欢迎。但与毛相比，他不愿意人们对自己的故乡粉饰太平。

在一个大队炼铁厂，彭再次看到被砸烂的炉锅等铁器用作原料，单纯为了生产更多的铁。而炼出的一堆没什么用途的锈铁疙瘩堆放在地上。彭把负责炼铁的干部叫到一边，耐心地向他解释说，这样做完全是得不偿失，就好比黄瓜打锣②。

彭还了解到，为了达到使农民吃集体食堂的目的，私人所有做饭用的锅盆都被没收了。在乌石寨的幸福院里（上了年纪的农民在那儿过着集体生活），彭找到了一些儿时的朋友。他被告知说，公共食堂开始办时，大家都很愿意，因为共产党说这种制度

①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265页。——原注

② 《彭大将军回故乡》，载《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第4号第145页。——原注

可以把他们的伙食包起来。接着他们让他看了下一顿的饭，那是一大锅青菜，里面只有几颗米星星。他们说，这一窘境不是装样子给他看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会来看他们。彭从他们的身体状况可以看出他们所说的话是真实的①。

一位抱着小孩的老人告诉彭："年轻人可以勒勒肚子，老人们可以咬咬牙，娃娃们咧？他们要叫唤呀！"② 彭为幸福院的情况所震惊，他嘲笑了这一名字，说只能把它叫做不饿肚子院。他捐赠了100元钱，以使住在这里的每个老人都能得到一条毯子，弥补一下简陋的卧具③。

这些老人们还告诉彭德怀说，他们能够对付得了天灾，但人为的灾害却是另一码事。彭清楚地感受到，关键的问题是浮夸，尤其是虚报粮食产量。在幸福院的讨论里，他平静地指出，假如乌石的每亩 1 万斤的高产是假的，那就无法指望那些报了更高产量的邻村，能够支援乌石解决吃饭问题。因为亩产万把斤完全是"哄鬼"。他的听者中有些人叹着气，有些人则擦拭着眼泪。还有些人则用自己的经历来印证他的断言，引述了这么一个建议，说是要建立万头猪场，而这里甚至连鸡鸭都没地方喂了。这只怕是吃多了狗肉——发高烧④。

在与一位县委书记的交谈中，这位县委书记承认只有少数高产田亩产才800来斤。彭赞扬了他的诚实，说他自己并不相信别的地方所称的亩产达到8000斤以及更高的说法。这位干部解释说，虚假的数字都是上边层层加码压出来的。假如谁不放卫星——粮食卫星，钢铁产量卫星，或者是吃饭不要钱方面的卫星，那么就有被打成右倾分子的危险。彭严厉地谴责了这种做法，并

①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2页。——原注

② 同上，第73页。

③ 《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第4号第145页。——原注

④ 同上。

且断言，“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①

彭很快就遇到了一位浮夸的大队干部，他宣称该大队亩产达到3000斤，只用妇女儿童搞秋收，青壮年上阵大办钢铁。当彭问周围的农民这是否是真的时，他们都笑了起来，但不置可否，因为他们并不敢与这位干部所说的相左。彭当着他们的面训斥了这位干部，批评他瞎吹，断言说根据他个人的观察，这些农田如果能每亩收上300斤，就不错了。这触发了农民们对“吹牛皮的卫星”和干部说假话现象的纷纷批评，他们表示了对明年会挨饿的担心。彭把那位干部叫到身边，向他解释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大跃进要搞，可不能搞假跃进。如果搞强迫命令，那么群众就会造反②。彭显然没忘记在平江视察时他过去的老战友发出的警告③。

不过干部的浮夸并非是农民不满的唯一原因。幸福院的老人们对吃集体食堂以及过军事化生活也感到不满。视察幸福院后的那天晚上，在与陪同他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月色下的庭院里散步时，彭对什么事都“化”表示怀疑：军事化、集体化、村庄化、水利化、电气化，怎么个“化”法？如果谁要是反对其中的任何一个“化”，那么他会无意中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④。

症结就在这里。人们害怕被惩罚——1957年反右斗争使这种惧怕心理进一步加重了——意味着难于向上级领导报告真相，就像彭自己在幸福院所承认的。这种惧怕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周小舟自己做出的回答。彭问他，“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尽管彭已经表明了对这场运动所造成的后果的不满，然而周并不感到可以批评毛的创议，他只是不置可否地回答，“很难说

---

① 《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第4号第144页。——原注

② 同上，第145页。

③ 同上，第144页。

④ 同上，第145—146页。

呀！”仅是在谈到有关大跃进政策的实施时，他才同意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过热了，缺乏客观性，以及存在浮夸风等①。如果一位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在一位有同感的政治局委员面前尚且感到紧张，那么对于一位基层干部来说，要对他的上级报告令人不快的事实，就别提该有多么恐惧了。

不过，周小舟还是同意由省里发出一道指示，批评大跃进的过火行为。彭则因此许诺他，就像他许诺农民一样，要向毛汇报。然而在给予这个承诺时，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违心的。因为他默默地证实了农民的假定，即毛的政策正在被曲解，毛本人并不可能知道眼下正发生着什么②。

当然，对于彭德怀来说，即使在基层暗示一下毛不仅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产生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对此承担责任，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设想的。这样做的话，他不仅违背了党的纪律，而且还会遇到不可逾越的毛的个人崇拜造成的障碍。即使在自己的家乡，与之交谈的是自己年轻时代的朋友，彭德怀也会发现自己不可能独力铲除毛主义的全能的神话。

这正是彭在以后几个月中面临的两难境地，它确实是毛的所有批评者的窘境：如何把人和神分开，如何把领导人与传奇人物分开？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彭在庐山会议前还犹豫不决的原因。无疑，当彭德怀耳边萦绕着乡亲们的警告离开湖南时，他已决心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些想法在他湖南之行的最后一个不眠之夜里抒就的一首诗里得到表达：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

① 《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第4号第146页。——原注

② 同上，第145页；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3、74页。——原注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我为人民鼓与呼！①

不过，在他此后访问江西和安徽的6个月里，彭并没有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讲话。在他湖南之行结束时，他在株洲恰与薄一波相遇，并且表达了他对粮食征购1200亿斤指标的担心。他认为，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征购900亿斤为宜。薄一波建议彭往北京发电报说明这一事实，并在彭的要求下，代之起草了一份电报，末尾署上了元帅的名字。不过彭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他对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运动的幻想破灭的事情。后来，在上海全会上，他全神贯注于筹划反对西藏叛乱的军事行动，因而不能参加其中的大部分会议（这是他后来所说的）。不过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并不妨碍他就毛的领导方式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他从4月24日至6月13日对苏联、东欧和蒙古的友好访问归来后，他让秘书代他请假不去参加庐山会议，因为他感到很疲倦。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毛泽东打来电话，说服他前去参加会议②。

第四节　彭德怀的试探性出击

公平地说，由于彭德怀不熟悉经济事务，所以在庐山会议之前，他可能对自己所要采取的行动感到局促不安。此外，上一年12月的武汉全会上，由于从高指标上作了部分退却，所以党的领导人中并没有真正的挫败感。甚至在彭去年12月份视察湖南之

① 《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第4号第146页。——原注

② 《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266—267页；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5页。——原注

后，他也只能承认，对基层的实际情况仅仅是走马观花地看了看。不过，在他访问东欧期间，情况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在彭从北京出发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毛就大幅度修改1958年的产量数字发出了指示。在彭返回国内时，进一步地检查核对工作实际上已经结束。在高层领导人中，也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1958年的粮食增产数量被惊人地夸大了。

可以推测，庐山会议上拟定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应付上述事实。假如预测1959年的粮食收成是好的，即使它达不到1958年的水平，党的领导层想必也不会公开修改1958年的粮食产量数字，他们会有意压低1959年超过1958年的增产数字，然后在几年的时间里，逐步使实际的数字与所公布的数字同步起来。

然而，甚至在6月底的时候，一些迹象就已表明，1959年不会有好收成。在东北，从1958年底开始，大部分地区长期干旱，直至1959年6月，旱情仍未结束。这造成了早季作物的减产，并意味着晚季作物的播种成为问题。从5月份开始，水灾影响了大部分省份，广东省尤为严重。在那里，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面色铁青，忍受着高烧的折磨，带领群众投入百年未遇的抗洪斗争中①尽管遇到水灾，一些省份在6月份仍报告说夏季小麦获得了丰收。②但中国领导人对这些省份宣称的比1958年增产10—30%的数字，大概已经持怀疑态度了，因为此时他们已经觉察到了去年的浮夸现象③。总之，在庐山会议召开的时候，丰收的前景已十分暗淡，即使影响秋季收成的干旱才刚刚开始。这种状况使得对

① 有关广东水灾的官方报道，包括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对水灾的估计，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6月21日、23日、25日、27日、7月1日。有关陶铸身体有病的情况，参见赵紫阳：《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载《新华月报》（文献版）1979年第4号第58页。——原注

② 例如《人民日报》1959年6月12日、27日的报道。——原注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7月7日社论。——原注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不满的某些人增强了决心，准备大胆地讲出他们的意见。

按照常规，彭德怀必定不可能看到每天送达农业部和粮食部的有关农业情况的全部报告。但他的国防部为他提供了独特的了解基层群众想法的途径。在解放军的部队里，大部分人的家庭在农村，他们家里抱怨生活困难的来信，在部队里引起了反响。现在我们没有收集到任何有关地方军事指挥官送达国防部的这方面的报告。不过在当彭德怀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报告说，一些地区的情况是严重的，特别是去年秋天彭所视察过的甘肃省今年4月份还宣称自己是余粮省，但现在却承认已成为严重的缺粮省。黄克诚说，如果再抽调军队的运输力量去运送粮食，就要影响西藏的军事行动和全国的备战。不过彭坚持说，还是要想办法支援缺粮地区①。

中国南方寄给海外华侨亲属的信件，详细述说了乡村里相当穷困的状况，这些是彭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已经知道的。粮食定量已经被减少了，据说，乡下的老人每天的配给量只有1到2两，而一位劳动力每月的最高定量是32斤。白薯的价钱是很贵的，食油的供应不足。

彭德怀到达庐山之后随即提出食油短缺的问题。在会议开始后的几天里，参加者按地区划分成几个小组进行讨论，彭属于西北组，这也许因为在中央政府于1954年重组之前，他至少是这一地区的名义上的领导人。7月9日，他在小组会上发言说：

> "农村四个月不供油，事实上办不到，这完全是主观主义。我一回国看到这个电报，就打电话提出意见。"②

---

① 《彭德怀自述》第266—267页；《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37页。——原注

② 《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4页。——原注

其他与会者说，中央当局已经撤回了这个命令。但彭质问他们，是否曾抵制过这样做。彭的这种直率，也许使他在几周以后与毛发生冲突而需要同盟者的时候付出了代价。

7月3日至10日，彭德怀在西北小组讨论中至少发言7次。这些发言反映了他1958年末在基层所观察到的情况。他断言，打破群众饭锅去炼钢铁的做法，是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党之所以能侥幸做成这件事，是由于它在群众中的威信高①。他质问土法炼钢运动的价值："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不过有趣的是,他只是质问而已,并没有谴责它。也许他是从周小舟那里学到了小心谨慎。他批评未经过试验就搞公社化运动和吃饭不要钱的做法。他断定一些公社，包括开路先锋的徐水公社已经垮了。彭抱怨"左"倾主义和浮夸风依然存在，把它们归结为一句他经常说的话就是"头脑发热"②。

在较早的一次小组发言中，彭显然不合时宜地详细述说了自己在军事生涯中所犯的4个大错误。也许，他希望通过表示愿意作自我批评，来消除他直率批评别人所引起的怨恨。特别是他大概预见到毛会作出反应，因为在他作自我批评的这次讲话中，他指出毛对1958年的错误负有责任③。但事实上彭已经犯下了"欺君之大罪"。

在7月3日所作的开场发言中，彭实际上是在指责主席说谎。在谈到他对韶山的视察时，他说尽管这个公社增加了生产，但增产的幅度并非所吹嘘的那样大：

> "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

① 《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2页。——原注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2、3、5页。

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①

由于毛正好在来庐山之前访问过韶山，因而彭的说法意味着在他们两人刚到庐山之后，彭就找毛交谈过。彭尖锐的发言显示出主席曾冷淡地接待了他，这种傲慢的作法一定激怒了以脾气暴躁闻名的国防部长，引发了他在西北小组会上对大跃进的一连串攻击。

7月10日，在所有这些攻击最终结束之后的一天，毛被迫进行回击，尽管不知道是在什么场合上。毛承认，认识不一致正在削弱党内的团结。不过他辩解说，问题的根源在于某些同志不能全面地分析形势。这里，我们看不出他有任何防守的迹象。他驳斥了那些毫无节制的批评者所谓总路线根本不对的看法。不过，此时他指的还不是彭德怀。毛说，应当承认缺点错误，然而，他微笑着说，这不过是10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问题②。

第五节　奇特的一对

在庐山会议开头几天中，尽管有工作上的压力，彭德怀仍是心情愉快的。也许他是因为在经过几个月有违自己个性的压抑后，终于能够讲出自己的意见而高兴。他清晨起床，观赏翻滚的云海，眺望旭日的东升，黄昏时悠闲散步，间或参观历史古迹。有时遇到他的元帅伙伴们，则谈天说笑。

然而，情况突然起了变化。彭开始变得郁郁寡欢，沉思不已。好几个晚上，警卫员为他准备好了洗澡水，但他却没有用过。他不再按习惯服用安眠药，总是一再躺下又起来，不安地在

---

① 《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1页。——原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6月），第277—279页。——译者注

四周踱步，直到夜深还不睡①。

彭的这种不安，可能是由于与一些同事的讨论引起的。几天来，他曾两次与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会面。他们第一次会面是在一次午饭前，周热情地谈论大跃进给湖南省带来的工业生产和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但在两天后的第二次会面时，周的心境则极为不同，他揭露说湖南的粮食产量造了假，并强烈地批评公社搞公共食堂的做法。周只有一次短暂的机会向主席表达了他的不安，他希望彭能和主席谈谈。

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次会议期间，彭与他的政治局同事张闻天住地相邻，交谈的次数较多②。他们是奇特的一对：彭是地道的军人；而张则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通晓几国语言的文人，曾是文学翻译者、党的宣传家和历史学者。20来岁时，他曾在美国工作，并在日本有过短暂的留学，尔后在苏联呆了相当长的时间。1930年，他作为在苏联受训过的一群年轻人的领导者，从莫斯科回国。这群年轻人被他们在国内的那些缺乏正规训练但更富有经验的同事们嘲讽地统称为"28个布尔什维克"。这些人在莫斯科的支持下，接管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然而，与这个著名团体的大部分成员不同，张经常站在毛的一边。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张投了决定性的一票，使中共领导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为一位资深领导人，张接任了总书记的职位，而毛则满意地领导了负责军事事务的三人"小组"。作为总书记，张主持着政治局的工作，一直到他被莫斯科谴责为与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为止。莫斯科的指控给毛提供了一个机会，将张的总书记职务（后来这个职务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免去。不过张仍

① 聂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5—76页。——原注

② 《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36页；聂希珍：《在彭总身边》，第267—268页。——原注

继续在中共党内占有突出的位置。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张开始专注于外交事务，担任了驻苏联的大使，尔后在外交部担任周恩来的主要副手。他仍然保留着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此职是他于1931年首次获得的，在1945年毛所控制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留任。在1956年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在1958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周恩来辞去外交部长职务时，张并未能接任这一位置。在丢了面子的情况下，他甘居下位，与新任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商量，放弃日常事务，去从事有关国际事务的分析研究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所准备的一篇论西方阵营内部的矛盾的分析文章，曾得到毛的赞扬，并批准在庐山会议上分发。不过张与毛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复杂的，在张于1955年被免去他的驻苏大使职务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疏远了许多。

按照彭自己的说法，在1959年春以前，他与张闻天交往很少。作为一种巧合，这年4月下旬，彭和张闻天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在24小时内先后飞往东欧访问，在此之前彭曾在上海全会上指责毛搞“个人挂帅”。此时，张闻天最初对大跃进运动的热情也已经消失，因为在他的南方之行时，他已深切感受到食物短缺所带来的后果。在上海时，他也曾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不是在全会上。4月24日，张同彭一道由莫斯科飞往华沙，并于4月27日和28日再次在波兰首都见面。——这些相聚的机会可能使他们得以简短地交换对中国国内形势的看法，但是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两人几乎肯定亲身体会到苏联人显然不赞成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这大概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原来的看法。

彭6月13日回国后，张去看他，并特别提到毛4月29日的党内通信。张评论到，这封信起了好作用，但同时树立了一种个人作风。换句话说，毛缓和大跃进措施的作法是值得欢迎的，但他

个人发出指示这一方式却是专断的，使人回想起彭在上海批评过的个人挂帅的作法。不出所料，彭对此表示赞同①。

按照彭对他和张的关系的说法，必然得出的结论是，这位国防部长被政治上更为精明的前总书记利用了。张闻天没有政治基础，实际上，他之所以能留在七届和八届中央委员会中，是因为在这之前他放弃了一度具有的唯一支持力量——苏联教育出来的“布尔什维克”②。张一定感到，彭是一个理想的盟友：一名军人，作为一名主要的革命将领和中国驻朝部队总司令受到高度景仰，由于清贫的生活作风受到广泛尊敬。并在解放军和元帅们当中享有显而易见的支持。

两人抵达庐山后，由于住地相邻来往较多。他们都认为，即使压缩了的钢产量指标(1300万吨)和煤产量指标(3.4亿吨)也是实现不了的。张还使彭相信，土法炼钢运动得不偿失。他们都对庐山会议上只能讲好，不能讲坏的气氛不满。认为在政治局会议上缺乏真正的讨论，实际上只是听取毛和其他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张认为毛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彭似乎感到这发生在一个新政权的创建者身上并不奇怪，并把毛同历代王朝的第一个皇帝相比③。

第六节　海瑞——引入歧途的人物？

如果张曾试图通过与彭的谈话，促使这位国防部长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那么他是成功了。但张并不是唯一的鼓动者，毛也

① 《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420页。——原注

② 据毛泽东说，张闻天与留苏派中的代表人物王明的分道扬镳似乎是在中共七大上。但在庐山会议上，这位主席批评张在七大上没有真正地转变自己的立场。——原注

③ 《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30页。——原注

起到了那种作用，尽管可能并非初衷。这里有必要稍微扯远一点。

在庐山时，彭一次又一次在他的住所想起毛在前一年成都会议上关于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做的指示①。更近一些时候，毛曾在1959年3月底举行的上海工作会议上，要求他的同事学习两名一直被中国的史学家赞为宁折不弯的清官和刚直不阿的谏臣的古代儒家官吏：唐朝的魏征(公元580—643年)和明朝的海瑞（公元1515—1587年）。毛像他过去经常做的那样，批评了不敢讲真话的有害工作作风②。后来，在4月初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又谈到这一问题：

> “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讲，有缺点要改进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是有些痛苦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③

毛又一次引用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来阐述他的看法，这次是宋朝的将军岳飞(公元1103—1141年)。岳飞是根据皇帝的谕旨被害死在狱中的，因此对毛的有些听众来说，这个例子的含义必然是含糊不清的，特别是毛还强调，岳飞正是因为被杀头才出名的。④

显然是根据毛的命令，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准备编纂魏征

---

①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5页。——原注

② 《吴晗和〈海瑞罢官〉》，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79年8月，第2、137页。——原注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第89页。——译者注

④ 同上。

和海瑞文集的指示。此外，主管文艺界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还鼓励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写一出关于海瑞的戏，并做出安排向他提供有关材料。由周信芳和两名合作者受命写成的戏于1959年10月1日国庆10周年前夕在上海上演了。戏名叫《海瑞上疏》，讲的是海瑞直接批评皇帝这一最为著名的事件。关于岳飞的一出戏也写了出来。

同时，一位“领导同志”也鼓励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响应毛的指示。吴晗这时是北京市副市长，在30年代曾是中国最卓越的青年史学家。他当时只有20来岁，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助教，但已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明史的文章。后来，这些文章成了必读的参考材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北京各大学的教员逃往西南。吴晗作为昆明西南联大的一名教授度过了战争岁月。在那里他写了一部明太祖的传记，有许多人认为这是“当代中国人写得最好的一部传记”。

正是在这个时期，吴晗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在为报刊撰写的文章中，他借古喻今，巧妙地讽刺国民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指桑骂槐”。抗战之后，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他成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的一名积极成员。这个党派当时寻求一种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中间立场。但是，国民党在内战期间的迫害，迫使他逃往共产党占据的地区，当时他39岁。在那里，他开始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在一份早期自我检查中，他解释了他是如何适应对毛的个人崇拜的。

1949年以后，吴晗作为北京一名著名的“统战”人物，发现自己要参加许多仪式性或代表性的事务，相对来说用于研究历史的时间很少。他的政治作用使他同彭真的交往更多。彭是北京的市长和第一书记，也是政治局的一名高级成员。1957年，即吴晗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年，彭真似乎曾利用这位历史学家在最高层一次关于“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的争论中对毛进行过含蓄的指

责①。1959年，吴晗从他学术研究的“休耕”状态中脱身出来，发表了一系列历史短文，主要是一些通俗读物。他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如何评价“进步”的历史人物，例如曹操、武则天，而最为重要的就是海瑞。

吴晗第一次提到海瑞，是在刊登于1959年6月15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批评说大话的文章中②，那是彭德怀从东欧回来后两天。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吴晗又用显然没有特殊含义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专谈海瑞的文章③。文章的题目是《海瑞骂皇帝》，讲的是这位明朝官吏的著名奏折。根据后来“文化大革命”对吴晗的攻击，可以把这篇文章的大部分看成是对毛含沙射影但很尖锐的谴责。但真是如此吗？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中对吴晗的指责，很大程度上是在文章发表的时机和是否有特定含义上作文章。历史上的海瑞出名不仅因为上疏批评皇帝，还因为他被罢了官。就在这以后不久，彭德怀在庐山上写的《意见书》里含蓄地批评了毛，并被罢了官。这是在1959年的夏末秋初，即吴晗开始就海瑞大作文章的前后。因此，当毛后来认为海瑞是指彭德怀时，看上去似乎讲得通。这很难被看成是巧合。

但是毛和“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几乎从未提到一个关键的事实，即第一个提起海瑞的名字，并鼓励人们注意他和其他历史人物的正是主席本人。此外，根据毛去世后所能获悉的材料，毛要人们注意海瑞那样的人，恰恰是因为他们勇于冒失宠甚至杀头的风险去批评上司——当时的皇帝④。

“文化大革命”中的说法极少提到的第二个事实是，吴晗在得

① 参见本书第1卷。——原注

② 这篇文章题名为《反对繁文》。——译者注

③ 吴晗所用的笔名为：刘勉之。——译者注

④ 《吴晗和〈海瑞罢官〉》第2、137页。——原注

知毛的建议后并非自动要去写海瑞，而是有一位“领导同志”去找他，专门鼓励他去写的①。于是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个“领导同志”是谁？为什么到现在也没有指明他的身份？他是不是一个想利用吴晗攻击毛的人？

很明显，彭真可能是一个会这样做的人，他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是吴晗直接上级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很有可能向吴晗介绍上海工作会议情况的人。毕竟，就在18个月前，彭曾同毛发生过正面冲突。

另一种可能是周扬一类中宣部高级官员，受命找人实施毛的建议。可以想象，可能是一个像张闻天那样具有文化背景知识，完全懂得海瑞的故事可以利用来达到政治目的的领导人。或许是彭德怀本人也未可知，那样就更富于戏剧性，但实在不大可能。

但是如果是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又不点名，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把这件事讲出来，当时足以置人于死地。这也适用于任何当时受到清洗的中国领导人。

这位神秘的“领导同志”似乎也不可能是到这则材料披露出来时——1979年年中——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而受到谴责或黯然失色的人。这就要排除陈伯达、康生那样的人，他们当时倒是关心文化问题的人。如果是他们当中的一个，现在肯定要谴责他要么1959年有意挑唆，要么“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人虚伪，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因此按照逻辑，这位“领导同志”必然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没受冲击，而到1979年出于某种原因也还要保护他的名声的人。在这方面，初看上去只有两个人由于参与文化事务可能去找吴晗，鼓励他写海瑞。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则是毛泽东本人。

---

① 《吴晗和〈海瑞罢官〉》第2、137页。——原注

两人之中周的可能性更大。他同知识分子有着特殊关系，并曾代表毛提出文艺领域中的政策。同时，周至少把自己的一部分作用看成是毛的“总管”，责任是保证这位主席的建议得到执行。一个最异乎寻常的例子是1958年初，他曾同其他几名高级领导人，在去参加成都会议的途中，乘船视察长江，调查如何使毛两年前在《游泳》一诗中提出的修坝建议更为具体化①。然而毛也乐于同知识分子交往，著名学者顺从巴结的态度，对他来说，可能是早年为学术界所轻视的一种迟到的补偿。此外，众所周知，毛曾给予某些知识分子以特殊对待，既有乐善好施的，如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唱和，也有居心叵测的，如他发起的对作家胡风的批判。吴晗本人就曾被这位主席请来，就他撰写的朱元璋传记进行过一次私下谈话。

如果鼓励吴晗研究海瑞的“领导同志”是毛或者周，那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可能点破，而现在讲明也会使人难堪。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位“领导同志”在1965年不开口为吴晗的动机辩护？此外，就这位主席来说，有人可能会作出这样的猜测，毛知道他正为大跃进而受到指责，因此有意提起那些历史人物——其现实含义是不言而喻的——以此来看看有没有人利用他的建议来批评他本人。

关于吴晗最初是受毛或周的推动而去写有关海瑞的文章的假设，也有助于解释这位历史学家这种与他性格不符的莽撞行为：甚至在彭德怀做出榜样之前，他也毫无畏惧之心地发表了一篇可能被认为是对毛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论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实际上已陷入孤立，刘少奇和周恩来都站到了毛一边，这时吴晗又发表了另一篇论海瑞的文章。这次的怂恿者显然是胡乔木——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和高级宣传官员。他告诉吴晗，彭德怀在庐山上提到海瑞的名字时，许多与会者对他一无所

① 《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之三，第5页。——原注

知，因此需要一篇解释文章。就在撤销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决定作出的那一天，即9月17日，吴晗写成了这篇文章，4天之后它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吴晗在文章中写进了一段话，驳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自己看成是海瑞的说法。必须记住，正是在这前后，周信芳的戏《海瑞上疏》上演了。然而，尽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声势越来越大，周信芳和吴晗却并没有因之遭殃。此外，吴晗继续研究海瑞，在尔后的几年中又写了几篇关于这名明朝官吏的文章，并为1962年出版海瑞的文集（这是1959年中宣部推动的一项计划）作了准备[2]。

吴晗似乎根本不可能在1959年6月决定在大跃进问题上向主席挑战。不管吴晗在学术上成就有多大，在政治上，他只是北京市党组织中一员，没有人推动，他不大可能冒这样大的风险。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宣称彭真当时曾这样做过，而且这类说法无论如何是很难使人相信的。党的高层领导成员此时同毛一样热衷于大跃进。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只是后来发生的。

以上所述无疑表明，虽然在60年代初党内赞同彭德怀的呼声甚高的情况下，人们肯定会把1961年2月北京上演吴晗的戏《海瑞罢官》看作是为这位前国防部长鸣冤叫屈（这个问题将在本书最后一卷中论及）。然而，毛大讲海瑞式的人物，神秘的“领导同志”对吴晗明确具体的鼓动，这位历史学家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旁若无人地执意研究海瑞，撰写海瑞文章的人当时都没有受到惩罚，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看，表明至少在最开始，海瑞“问题”并非别有用心，而且毛也是这样认为的。

---

① 这篇文章题名为《论海瑞》。——译者注

② 这部文集名为《海瑞集》（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2月出版。——译者注

第七节　彭德怀的炸弹

吴晗关于海瑞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发表时，不能肯定彭德怀是否读过。但是彭的警卫员证实，当听到毛关于讲真话的指示时，彭感到“异常兴奋”，而且既然他参加了上海会议，他应该听到了毛提及海瑞的名字。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庐山上，有人——可能就是彭——确实提到了海瑞的名字。彭后来说，他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尽管已经采取了措施，但国家计委并没有控制住盲目发展的势头。7月12日傍晚，他把自己想说的话从头到尾想了一遍，但第二天早上他去见毛时，发现毛还睡着。7月13日晚上，这位元帅让他的警卫员给他沏上浓茶后先去睡觉。警卫员建议他应该休息一下，以便精力充沛地参加第二天的会议。彭回答说，小组会帮他理清了思路，现在他要把在基层了解的所有情况整理一下，写成一封信向毛报告。他面前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主席”两个字。彭德怀动手写他致命的《意见书》了。这天晚上，张闻天曾来拜访，彭给他念了部分草稿①。

第二天清晨，彭打完太极拳后找来了他的参谋，交给他一份完整的稿子，让他抄正，后来又让他送到毛办公的地方。从彭激动的手势可以看出，这使他轻松了许多。听到参谋告诉他信已送去，他更松了一口气。彭曾解释说，“有些话会上我不好说，也说不准，都写在这〔封信〕里头了。我有话就要说，说出来就像去掉一块病。”②在意见书的第一段，彭用几乎一样的方式说明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然而毛却不准备像彭的参谋那样满怀同情地接受他的解释。

① 《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36—37页。——原注

②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6页。——原注

彭在信的实质部分的开头，肯定了大跃进的成就，尽管这时国家计委已经调低了指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食和棉花的产量至少增长了30%。“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①

彭认为，某些基建项目投资过大、过急，从而造成困难，并且没能在1959年及时纠正。然而基建项目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会收到效益。只是有些基本建设项目由于物资缺乏而实在无法完成，应该暂时停止。

公社化具有重大意义，将使农民摆脱穷困，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在举行了武昌会议、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之后，所有制方面的混乱基本上已经得到纠正。失业现象也已消除②。

至此，彭讲得很得体，可能是受益于张闻天。尽管他曾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简单人，没有顾忌，然而信的第一部分却很平和、谨慎。正如毛后来说的，特别是第一部分最后一段论及土法炼钢的话讲得很巧妙：

> “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批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③。

正如毛所意识到的，由于把习惯的用法——有得有失——颠倒了过来，使这段话变得更为尖锐，突出了土法炼钢的巨大代价和微不足道的收益。几年后，彭宣称他是按习惯用法写的，即

---

①《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7页。——原注

②同上，第8—9页。

③同上，第9页。

有得有失，但让人家抄错了，变为有失有得。是否心怀恶意，他没去猜测。但是很奇怪，他当年并没有指出这一点，而1981年为了给他平反将《意见书》同他的“自述”一道出版时，印的也是“有失有得”①。

彭击中要害的话是在第二部分：“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又有点“犯上”了，在政治局里，总结是主席的特权。即使是在这里，他一开始也是先肯定一个穷国为了解决巨大的经济困难有必要发动跃进。他承认由于缺乏经验，错误不可避免，但又说，“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这似乎暗示解放军比党和政府更技高一筹②。

据彭说，第一个主要问题是普遍滋长起来的浮夸风，这一点他追溯到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认为这次会议对粮食产量的过高估计造成了一种假象，使人感到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注意力可以转向工业了（这种注意力转移同毛有直接关系，尽管彭没有点明）。然而，大炼钢铁是建筑在肤浅的认识基础上的：

> 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③。

这一段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指出土法炼钢运动造成的全国范围的混乱。必须记住，彭所受的教育、他的经验和所负的职责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做出这种分析。他的意见书所依据的仅仅是他在庐山参加两次国务院会议时收集的材料、陈云在这之前对钢

---

① 《彭德怀自述》，第268、283页。——原注

② 《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9—10页。——原注

③ 同上，第10页。

铁工业所作的分析以及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新华社共同整理的材料——那是在毛当年早些时候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批评了大跃进之后，编纂并散发给中国领导人作为庐山会议的参考材料的。换句话说，彭的意见中并没有任何他自己的独到见解和能使毛或庐山上任何仔细读过材料的人吃惊的东西。

彭就秋收处理不当和某些领导头脑发热，认为共产主义就在眼前所提出的意见也是如此。前一年秋天，正是毛自己在武昌会议上批准了对空想思想的批判。

在毛眼里，彭的罪状必然在于他逐一列举了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造成的所有灾难，然后含蓄而又无庸置疑地把责任归于最终应当承担的人——主席。彭提到了毛的口号，如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两条腿走路（例如土洋并举发展钢铁工业），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说这些口号被误解和滥用。但是庐山上的每个人都知道，口号是扳机，发令枪在毛手中；而彭，尽管他后来矢口否认，应该知道他的信等于是对毛的起诉书。无怪乎他发出那封信时要感到紧张。

此外，彭采取了一种25年来毛一直用于对待别人，而没有人用来对付过他的批评方式。这位元帅把过去12个月当中的“左”的错误归咎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①，这种马克思主义式的谴责所散发出来的味道，或许是张闻天的博学而不是彭德怀的朴实。这一称呼显然来自列宁的“带有无政府主义味道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谴责脱党者时曾用过这一说法。这本书可能是彭读过的为数不多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革命初期，毛本人曾送过他一本此书，上面题着：“中国革命要胜利，这本书不可不看。”②

① 《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11、400页。——原注

② 《横刀立马彭将军》，第9—10页。——原注

总而言之，不管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用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词是谁向他提议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者来说，再没有比这更使人怒不可遏的了：他一生最大的精神成就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现在却被人称为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而指责他的又是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新手①。正如彭不久以后认识到的，毛已进入这样一个阶段：自我批评还可以，别人的批评却很难接受，嘲讽则是无法容忍的。

第八节　毛的反击

彭德怀的信送出之后的事情经过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交代，那封信立即印了出来，并散发给与会者，而毛7月17日才坐下来认真读它。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毛要孤注一掷了。一封私信可以设法躲开，而对一份由一名政治局委员签名的会议文件，则必须公开辩驳，特别是文件以致主席的信的形式写成。但是有证据表明，彭的“交代”是由看押他的红卫兵编造和执意要他写的，为的是把这位元帅对主席的挑战描绘得比实际发生的更有挑衅性。“文化大革命”中在有限范围内传阅的一份同彭德怀事件有关的文件集②中，同《意见书》一道还包括一条以毛的名义发出的指示，说应将它印出发给大家研究，指示的落款日期是7月16日。彭德怀本人在他的“自述”中说，那封信本来并不准备公开，当7月17日会议秘书组开始散发被标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题目的印刷件时，他感到出乎意料。在7月18日的一次小组会上，他请

---

① 彭认为，这个用词曾使毛大为恼怒，见《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12[illegible]页。——原注

② 《光辉的历史文献》，1967年9月出版。——译者注

求收回那封信，然而没有成功。[①]所有这一切表明，毛读了那封信，感到彭除了在小组会上发言外，恐怕也没有把他的观点隐瞒起来，于是决定他必须正面回答这一挑战。

但是这位主席并没有立即反击。他可能是在有意等待，看看彭能得到哪些人的支持。周小舟和7月18日（或19日）上山的黄克诚发表了与彭德怀接近的看法；7月20日，张闻天在会上的一次发言中，就他同彭德怀讨论过的经济问题提出了一些批评，然后，显然又在21日的一次3个小时的发言中继续进行指责。这第二次会张事先没有通知彭，结果这位元帅根本没有参加。事后彭请张当晚派人送来他的讲话稿。张的发言似乎没有在会上散发。

由于无法读到张的发言，自然也无法判断这些发言如何地伤害了毛。然而关键的问题与其说是发言的内容，不如说是从谁嘴里讲出来的。像张闻天这样精明，又没有显而易见的支持集团，在长期无声无息地处于领导层边缘之后，竟然敢于公开向主席挑战，这必然表明他对发言会获得广泛支持抱有充分信心。对毛来说，危险在于彭和张的行动可能迫使某些更难对付的人也起来说话。

担任外长而脱不开身的陈毅从北京给张闻天打了电话，对他表示祝贺和鼓励。6年以后，陈毅以谈虎色变的口吻向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起1959年的形势："国内形势非常紧张，……很多烟囱不冒烟了；工厂没有机器；钱都不知道到哪去了。"[②]因此毫不奇怪，陈希望把问题讨论清楚。毛自己说过："有些同志发生怀疑。"但是这位主席迅速采取行动以避免进一步的连锁反应。张闻天发表马拉松式的发言之后两天，毛就开始了反击。

毛7月23日上午对全会的讲话是一次辉煌的辩论表演，目的是将支持者聚集起来，并吓退彭德怀的同情者。这位主席自我批

---

① 《彭德怀自述》第276页。——原注

② 《文革风云》1967年第10期第12页，1967年第5期第23页。——原注

评的态度使人消除怨气，同时又推卸了责任，表明他不准备把“罪状”都背起来。这有助于使他的合作者相信，他们也需要为自己辩护，同时警告潜在的对手他们面临的任务有多么艰巨。他呼吁保持团结，并隐晦地暗示，如果陷于孤立，他可能成为参孙① 式的人物，把整个党的结构拖垮。

毛通过把批评说成是“一塌糊涂”来集合支持者，并解释说会议3个星期以来他一直保持沉默，这只是因为“越讲得一塌糊涂，越要听。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好久？……我们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毛对此表示同意，并补了一句令人振奋的话，说这种同志是多数，神州不会坠泥，天不会塌下来。②

在这之前毛把批评者比作两年前遭到斥责的主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提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罗隆基，一个同彭德怀有个人关系的人。他在后来的讲话中又提到另一个资产阶级右派，以此表明这种类比不是孤立的题外话，而是稍加掩饰的威胁。如果将大量的批评予以公布，人民将起来推翻党。“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话。”③ 毛的冷嘲热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他决心要使批评成为原则问题，彭的同情者要小心。

毛随后转移话题，提起同年早些时候反“共产风”的运动。毛曾反复把自己说成是一个中间派，他可以长篇大论地说明毛病出在县、社两级干部身上，而且问题很快纠正了。他不必提醒与会者，是他率先批评左的错误。他原本没有必要讲这段插曲，因为彭的指控的要点是，最初建立公社和发动大炼钢铁运动的决定是错的。六中全会以后那一段过程彭没有多讲，他缺少第一手材

① 大力士，圣经中的人物。——译者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95—296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300页。

料。

如果彭德怀有得势的迹象，有些“动摇者”可能也会加入他的行列，毛下面是一段更为明确的对他们的警告。这次毛谈起党内过去发生过的一系列争论，更清楚地暗示他要把彭当作又一次错误“路线”的首领。先是大棒，然后是胡萝卜——呼吁保持团结，给了动摇者们一个方便的借口，使他们能说服自己和同事们同彭分道扬镳，回到毛这一方来。然后毛又提醒那些凭着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最可能支持彭德怀的计划工作者，在大跃进前夕他们的反冒进受到批判时，他对他们是多么宽宏大量。现在，他要求做出回报了。

在清理好战场之后，毛开始论述具体问题，第一个是公社的食堂。很奇怪，彭的《意见书》没有多讲这个问题，尽管他在西北组的发言中简要地提到过打烂私人饭锅的事。毛小心地避免提及采用粗暴手段迫使农民加入集体食堂的作法，他只是宣称他主张自愿参加，然后集中讲食堂的组织问题，这可能是张闻天提出的问题。他淡然地承认存在困难，并说即使有三分之二的公共食堂必须解散他也不会感到吃惊。然而他重申了对公共食堂的信心，并对似乎由科学院组织的一次调查嘲弄了一番，说那次调查注意的只是猪肉和发卡的缺乏。他认为，“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①

最后，毛讲到核心问题：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和大跃进的总路线。在所有问题上他都承认负有责任。

> 1070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9000万人上阵……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02页。——译者注

"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①

毛提到这位倒霉的记者，表明他并不准备把1958年的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在钢的问题上，毛承认他负有决定性的责任，但清楚地说明，这主意是他最欣赏的省级第一书记——上海的柯庆施兜售给他的。大炼钢铁给生产和运输造成的混乱，他归咎于自己的无知，但也要归咎于李富春和国家计委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也要为公社化过快和农业高指标承担一部分责任。此外，毛还说一些省份——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上海——是"左派"，使那些地方领导人认识到他们要站在毛一边，否则就得把他们的错误讲清楚。"同志们"，他说，"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②

毛用他典型的乐观语气做了总结。他提醒听众，马克思也有性急的时候，听众中的一个支持者插话说，列宁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毛坚持认为政治运动不能用经济账来判断，然后接着说：

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的同志都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③

总起来说，毛认为得大于失，而彭无论原话怎么说的，认为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0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05页。

③ 同上。

失大于得。毛承认了大部分错误，这样他同那位元帅之间的冲突就变成了一个判断问题：最后总数是正还是负？毛使他的同事看得很清楚，在就这一问题做出抉择时他们是在彭和他自己之间进行选择，他们的选择将引起重大政治后果，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自己，当然也会影响到整个党。一度，毛似乎准备接受全会的一致意见："你们抓住，可以整我。"① 但在另一段，他又对彭的支持者——元帅和将军们，发出并非旁敲侧击的警告，"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在会议期间的另一个场合，毛讲了一段彭7年后还能逐字背出的话，其威胁的成分更重："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跟彭德怀走，我就得打游击。"③ 毛的最后通牒表明他把彭的挑战看得很重。在这里，毛似乎准备好必要时同国家机构进行一番较量并使之垮台，这正是他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干的。

然而当时没有必要那样做，因为毛当然是正确的。高级军官面对要么是毛要么是即使是彭德怀那样的革命英雄这样严峻的选择时，他们没有其他出路，只有选择主席，特别是刘少奇和周恩来总理显然也站在他一边。将军们一定意识到了，站到彭那边去不仅是向一位革命之父式的人物挑战，而且是向整个党和政府的文人组织挑战，而他们多年来受到的教诲是要对之表示服从。这不是一场他们准备投入的战斗。

彭的不幸在于他所选择的手段。笔不是他熟悉的武器。分析性的一般看法不是他的堡垒。如果在全会上作3个小时发言的不是张闻天而是彭，用简明的语言讲述他了解到的关于大跃进的第一手材料，那效果可能会是戏剧性的。动摇者可能会为他的个人魅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0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00页。

③ 《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121页。——原注

力所倾倒，可以肯定，主席会立即处于不得不招架的地位，而没有机会准备一篇经过精心构思的回答。事实上，彭后来宣称，他写在纸上而不是发言恰恰是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

正如当时发生的那样，毛作为会议的主持人，能使彭实际上无权作出回答。可以理解，毛拒绝承认他的同事提出批评的合法性，并把他打入政治冷宫，这使元帅感到恼火。但是毛公开讲：“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到现在也不放弃。”① 当彭意识到毛是在拍板定案时，他破口大骂：“你在延安骂了我40天的娘，现在庐山才骂了你18天的娘，就不让骂了，不行！”②然而执导这出戏的不是彭，而是另一个更稳操左券的人。幕布毕竟落了下来。等帷幕再度升起来时，上演的已是一出新戏了。

第九节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同毛的冲突使彭的精神受到不可避免的沉重打击。他吃不下饭，少言寡语，躺在床上，两手枕着头，忧郁地凝视着空中。他的警卫员没有看出《意见书》同这种举止之间的联系，听信了医生的话，以为彭病了。但是元帅尖刻地说，“检查什么？我没病。有病，现在也治不成。”最后彭的参谋把事情经过告诉了警卫员，警卫员不明白为什么彭的政治问题不能通过自我批评来解决。的确应该问问。

随后，彭的警卫接到指示，他不能再随意进入会场了。此后彭每次走出会场，脚步都显得一次比一次沉重，原来黑红的脸庞也显得苍白了。每天晚上回来后他就呆在住所，不去看电影了，连每天傍晚的散步习惯也取消了。有些元帅还来看他，但他们在一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98—299页。——译者注

② 《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205页、480页。——原注

起不再是高声大笑，一个个似乎心事重重，坐一阵就走了。最后，彭的警卫终于认识到问题是多么的严重。① 八届八中全会召开了，彭的命运难以逆料。

8月2日，毛宣布八中全会开幕，191名中央委员有147人到会。议程有两项：修改生产指标和解决"路线问题"，即如何处理彭和其他持不同意见者。毛再次巧妙的斟酌用词，强调对手的薄弱之处，避开自己的弱点。

他就修改指标问题所做的简短说明，强调这件事首先提出是在4个月前的七中全会上，给人以此事一直在研究的印象。这样，毛就缩小了在修改后的1958年产量的新数字引起冲击后，现在调低指标的迫切意义。他说，在上海会议上有人"主张改指标，多数不同意"。换句话说，毛当然不是唯一要对坚持那些极其不切实际的指标负责的人，就像他不应为前一年在武汉召开的六中全会上制订的那些指标负责一样。毛把高指标说成是"自己立了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打破，打破不符合实际的指标，如钢、煤、粮、棉等"。② 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就必然要承认1958年的产量被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对此，毛在讲话中丝毫没有提及。然而彭的《意见书》批评的一个主要问题，恰恰是大跃进气氛下养成的吹牛皮说大话的习惯。

在转而谈到他的批评者时，毛表示，他不明白他们所说的人们因为有压力而不敢讲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是利用庐山会议"攻击和破坏总路线吗"？他还进一步指责他们对他9个月来参与确定的反左措施视而不见，然而对他们就大跃进本身提出的批评却只字未提。最后再次呼吁保持团结——"中央全会的团结，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同时含蓄地表示对彭德怀和张闻

---

①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7页。——原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6月），第284页。——译者注

天要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对人有情，对错误的东西应当是无情的，要有深恶痛绝的态度。”①

与这种政治家的姿态形成鲜明对照，毛当天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嘲弄他的进攻，非难他的勇气，冷冰冰地拒绝了他要见一面的请求：

>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自做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同志之著，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②

毛对彭和张向他的权威提出挑战的极度愤懑是在这里，而不是在会议上的讲话中表露出来的。在公开场合，毛采取了一种通情达理的姿态，甚至对国家计委的一名次要官员李仲云表示祝贺，因为他勇于绕过官僚渠道，直接给中央寄送了一封全面而又“切中要害”地批评大跃进期间的计划工作的信。但是李仲云不构成威胁，同彭德怀——他后来说他基本上也是在指责计划制订者——不一样。③

第十节 同苏联有牵连？

毛进行反击的时机是幸运的。国际事件有助于他迫使彭处于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6月），第286页。——译者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05—306页。——译者注

③ 有关彭的这一否认，参见《光辉的历史文献》（1967年9月），第46页。——原注

不利地位。6月20日，就在彭结束东欧之行回国后不久，俄国人背弃了他们在核武器技术方面帮助中国的协定。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就在原子弹样品要按计划启运之前，苏联领导人开了一次会并决定，鉴于中国的“诽谤运动”和“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有必要使他们不再以为“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①这些话听上去像搞错了时间，它们所反映的就像是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的后来阶段所产生的想法。几乎可以肯定，毛在莫斯科的讲话以及台湾海峡的危机，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人的好战性的担心，对1959年的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恐怕决定牺牲已在恶化的同中国的关系，以换取正在出现的同美国人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然后，7月23日，也就是毛对彭和张闻天进行反击的那一天，尼克松副总统为主持在苏联首都举行的第一个美国展览开幕式抵达莫斯科。尽管展览会上，尼克松和赫鲁晓夫在著名的“厨房辩论”中唇枪舌剑，然而这次访问却标志着苏美关系的一次突破，巩固了已经变得明显的缓和趋势，并且成为两个月后赫鲁晓夫周游美国的先兆。赫鲁晓夫的访问是艾森豪威尔7月中建议的，公开宣布是8月3日，那时庐山的中央全会刚刚开始。

这些事件，再加上8月2日尼克松在回国途中访问华沙时受到的热闹一时的欢迎，肯定使毛和他的许多同事恼火。赫鲁晓夫的政策，等于拒绝了中国人对共产主义阵营应该有什么样的全球政策的看法，而在核技术问题上已经导致对中国利益的具体出卖。毫无疑问，这些事件削弱了一贯强调同苏联搞军事和外交合作的彭德怀的地位。

---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第413页。——译者注

然而，赫鲁晓夫还使毛将彭和张闻天搞得名誉扫地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加自然。7月18日，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波兰城市波兹南对建立公社的想法发起尖锐攻击，宣称20年代与这种想法调情的俄国人“不大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①] 显然，其含义是这一指责也适用于50年代的中国人。

在波兰电台随即广播的讲话中，关于公社的这一段话被删掉了；随后在7月21日，苏联和波兰的新闻媒介发出了一个包括对公社攻击的新的讲话文本。赫鲁晓夫的攻击打破了苏联领导集团和新闻媒介6个月的休战状态，而且据一位学者说，发表的方式听上去像是经过非常周密策划的行动。[②]

可以设想，中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将赫鲁晓夫的讲话发回国内。毛对这一天赐良机的反应是，7月29日散发传阅了3份论及这次讲话的材料，其中给予醒目地位的是台湾中央社发自纽约的报道。显然，他希望以此表明公社的批评者向中国的敌人提供了哪些帮助和口实。在一段简短的按语中，毛嘲弄了批评者，表示苏联和中国在公社问题上的实验有相当大的区别。

但是毛似乎感到，他应该比那干得更好。这位主席可以利用赫鲁晓夫的评论唤起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不满情绪，而且由于他过去几年中的指责——例如在成都会议上——苏联的整体形象在中央委员们的心目中肯定受到了损害。然而苏联仍旧是“老大哥”，是共产主义阵营无庸置疑的头，更不用说是中国的主要军事盟友和贸易伙伴了。毛自己承认，武汉全会上对公社作法的某些修改是为了安慰俄国人。因此，一位兼任苏共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苏联领导人对公社的公开指责，哪怕是间接的，也

① 在波兹南省“普拉夫采”农业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赫鲁晓夫言论》第12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2月出版，第369—370页。——译者注

② 扎戈里亚：《中苏分歧（1956—1961）》，第134—135页。《人民日报》未登载赫鲁晓夫的这一攻击性讲话。——原注

不能无动于衷、置若罔闻。

这种考虑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毛在无驳赫鲁晓夫的努力中于8月1日寻求王稼祥——中国的主要苏联问题专家之一——的帮助。王同张闻天一样，是30年代在苏联受训后回来接管中共的"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大概是因为在苏联受过训，又对毛有功，所以在1949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驻莫斯科大使，那时他已再度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成员。

实际上，赫鲁晓夫精确选择的时机帮了倒忙。在集合于庐山的领导人看来，他打破6个月停战状态，对公社进行攻击的讲话恰恰发表于彭德怀发言之后和张闻天发言之前，这恐怕不仅仅是巧合。毕竟，彭和张的进攻也是突如其来的。3个人会不会是串通好的？三架马车中的两个中国人，或者至少是直言不讳得尽人皆知的彭德怀，在最近访问苏联时向赫鲁晓夫透露了他们对公社化和大跃进的不满，或者表现出要在适当场合站出来讲话的倾向？这是否就是苏联外交官为什么千方百计打听庐山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原因？彭几乎可以肯定是无可指责的，在一个中国的国内问题上同外国人串通一气似乎完全不符合他的为人。但是，如果彭转述了毛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公社的批评并表示自己也赞同，那倒是可以想象的。对赫鲁晓夫来说，听到这种信息会是一件开心的事。不管彭到底是怎样同苏联领导人接触的，在庐山会议上人们有理由对此产生怀疑。大概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谴责彭和张的决议①对这一问题只字不提。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传出某些说法，试图表明彭在1959年访苏过程中与赫鲁晓夫打交道时有举止失当的地方。

---

① 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1959年8月16日）。——译者注

第十一节 彭德怀的孤立

国际上对人民公社的批评可能有助于说明，彭德怀在政治局中的文人同事为什么没有设法缓和毛的反击，而这有损于他们的名誉并且最终导致了灾难。在庐山会议的前期，即彭德怀送出他的信之后和毛于7月23日初次反击之前的那段时间，刘少奇和周恩来完全可以对毛进行干预，在保证他们个人的支持的同时，请他在反驳时不要过头。彭无疑要受到责备，但没有必要将他完全打入冷宫。他的批评意见可以简单看作为已过时的、没有现实意义的实话而不予置理。

毛的其他最高级同事，即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中，有两个人不在。陈云在大连休息，没有到会。他后来听说会议情况后的反应是，"彭德怀为什么在这时候写信？显然，他立即意识到，彭德怀的举动可能对他恢复正常经济政策的努力产生消极影响。[①] 邓小平在庐山上打乒乓球时腿部骨折，因此不得不离开。

剩下的两名政治局常委都是元帅，但是不可能设想林彪会为彭德怀说话。在林彪看来一定很清楚，毛选中了他将来接替彭任国防部长，而《意见书》可能会加快接替过程。此外，甚至在建国前林和彭之间就有很深的积怨。最后剩下朱德，他是彭的朋友和棋友，政治局核心中唯一可以争取过来支持彭的人。他说，"不要怕左了，右了的，有什么话说就说出来，我们这些人不说，谁还敢说？"朱本人对公社和食堂也持批评态度，但他却没能左右局势。然而可能是因为他和大多数元帅的反对，最后对彭的处理要比毛可能希望的轻。在通过关于彭和他的"小集团"的中央决议时，朱再次起来干预："他犯了错误，也做了自我检查。这就够

---

① 《打倒反对毛主席的老手陈云》，载《财贸红旗》1967年2月15日。——原注

了。我们现在可以团结他了。"由于鲁莽，朱德不得不交出一份检查。

为什么其他人没有站出来讲话？首先必须假定有些人不愿意在毛发火时顶撞他。

在任何一个缄口不言的与会者身上，这种考虑起了多大作用，只能去猜测了。然而可以妄测一下，刘少奇沉默不语是有更具体的考虑。

在大跃进中，刘一直是毛紧密的支持者。实际上，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就是发动大跃进的主旨讲话。此外，刘默许了公社化运动的发动，并在探索集体生活的可能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到1959年夏天，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对群众生活水平产生的影响，刘看得同彭一样清楚。但是，如果彻底追查1958年事件，并得出"失大于得"的结论，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责任落到刘身上。的确，刘可能意识到，他同毛一样，要对国内灾难性的事件负责，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同毛一样，在庐山会议上指责新闻机关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不负责任地报导领导人的讲话。考虑到这一切，那么7月23日下午，在毛发表了反击讲话之后，刘建议把会议文件收集起来，作为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件散发，就是毫不奇怪的了。①

即使刘不必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彭德怀的挑战如果成功了，也会对他造成领导制度方面的难题。

其次，如果彭德怀成功了，就将使党对国家结构领导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威胁到党的凝聚力。元帅和他在解放军中的部下将被认为和中国的现实联系得更紧，由于通过应征入伍的士兵同基层保持接触，因此更能代表人民的呼声。还可能出现高岗所杜撰的派别分裂：分成以解放军上层为主的红区的党，和

① 《科技战报》1967年6月2日，第8页。——原注

以曾在地下工作的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为主、加上周恩来和抗战期间在重庆工作的文人组成的白区的党

刘少奇支持毛的看法，强调要理解彭德怀在庐山上的活动必须以高岗事件为背景。在庐山上，毛曾措词巧妙地问道："到底是高饶集团还是高彭集团？可能应该说是彭高集团。"[1]尽管刘曾经把彭的品质、觉悟和不摆架子捧到了天上，但在这个关头，他却把这位元帅看成高饶联盟的"余孽"。刘后来甚至说过，彭在庐山上的批评没有错，但作为高饶事件的一分子，他没有权力讲话。毛和刘的说法有多少实际根据还不清楚。

毛对彭反击之后的休会期间，刘下山重访30年前他革命生涯初期到过的地方。他很愉快，陪同他的江西省委的官员[2]注意到了他同以往的区别：平时，少奇同志不喜欢多说话，这时他的话多起来了。"[3]可以把这同毛的秘书的举止对比一下，休会期间他们默默无声、闷闷不乐地在田间散步，心里清楚他们的上司闯下了什么祸。在散步过程中，担任毛的第一秘书——这个职位过去曾由陈伯达占据——的田家英作了一副对联：

四面江山来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4]

周恩来尽管以前同这位国防部长有过争执，但他却没有理由像刘少奇那样害怕对大跃进的批评。不管周如何忠实地参加了对大跃进的指导，他和他的主要经济部长曾在过去反对过"冒进"。如果这一切现在被证明是对的，只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好处。但是毛的威望却是另一个问题。当庐山上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毛的

① 《新北大》1967年8月9日。——原注

② 指方志纯。——译者注

③ 方志纯：《难忘的一天》，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16日。——原注

④ 李锐：《怀念田家英》，载《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4号第173页。——原注

反对者无路可退的时候，他们的论点变得从个人看法出发了。毛被指责为“到了斯大林晚年”，“专横独断”、“好大喜功，偏听偏信”。他“有些像铁托”，谁也不能同他讲话，只有他这个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他“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①

随着庐山会议的进行，站在彭德怀和他的同事一边越来越意味着直接反对毛个人。对于周恩来这样一个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一直追随毛和他的远见卓识的人来说，那样做恐怕政治上不可想象，心理上无法接受。总之，在庐山会议上，周反驳了彭的指责，捍卫了大炼钢铁运动。②

这样，刘少奇的抱负和周恩来的忠诚，使毛得以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将一个重要的革命人物，一个30多年的战友逐出教门，目的恰恰是捍卫他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毛被彭的鲁莽和这种鲁莽涉及的问题激怒，从而放弃了他对主持一个团结的领导层的偏好，结果证明了那种所谓他象斯大林一样专横武断的说法至少有一定道理，而他本来对斯大林的作法是不满的。这是毛第一次在这样的情况下专断地运用个人力量。庐山会议使延安的“圆桌”发生破裂，而“文化大革命”则将把它毁掉了。

第十二节　彭德怀的命运

但是，1959年所发生的这一切依然是很有限度的。奇特的是，彭德怀最初的反应是固执己见，有点天真。他特别感到愤怒的是，尽管有那么多年的同志关系，可毛根本就不见他，向他解释那封信究竟错误何在。但是就在毛公开反击彭的第二天，两位不知名姓的同志和彭进行了两个钟头的谈话，他们强调了那些彭

① 《毛主席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第19页。——原注

② 《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之二，第288页。——原注

德怀已经开始清楚的问题，即那封信已不再是问题的焦点，他应该考虑的是全局，也就是说，对革命事业而言，毛的威信远比彭德怀的命运更为重要。是否公正的问题似乎没有提到。他们劝彭德怀按照这个分析，向中央委员会做一次全面的，实际上是夸大其词的自我批评。这样做之后，绝对不会再使他蒙羞了。不过，彭在军队里的同事，甚至他的许多党内同志平心说来都会对此感到难以容忍。但不管怎么说，报复是不可避免的，彭德怀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把他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并告诉他们，他无法继续担任国防部长了，他要辞去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样就可以回家种地了。他接着说："我给主席作了三条保证：永远不当反革命；不自杀；自食其力。"①在毛看来，这三条保证中不自杀是首要的一条。如果像彭德怀这样一位深孚众望的功臣被迫自杀的话，那么党内、军内势必激起一阵愤慨和反感的浪潮。对毛的威信来说，元帅的自杀将比十几封意见书的打击更为沉重。其次，彭的保证对几天前才到庐山的夫人可能是某种安慰。彭夫人原本是满怀希望来庐山度假的，可迎接她的却是丈夫政治生涯的完结这一令人心碎的消息。②

尽管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说"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谴责他们长期以来进行着分裂党的活动，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决议只解除了这个集团成员的行政职务，而没有变动他们在党内的职务。这样，彭德怀丢掉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但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头衔依然保留。张闻天则被罢免了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但依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彭张反党集团的另两名主要成员黄克

①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78页。彭的自我批评，见《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31—38页；关于他写自我批评的情况，见《彭德怀自述》第276—278页。——原注

② 同上，第108页。

诚和周小舟也分别被撤消了总参谋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但依然担任中央委员的职务。[①]黄克诚、周小舟曾与彭德怀谈过话，这给他们与彭张结党提供了情节上的可信性。黄与周的真正罪行可能是为彭德怀在庐山的言行提供了某些素材。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从庐山回到北京，危机已经过去，他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清晨起来打太极拳；傍晚时分到户外散步，吃睡都有规律了。他的警卫员注意到的唯一变化是他已经戒了的烟又开始抽起来了。

9月9日，彭给毛写了一封短信，再次承认了他的错误，并要求允许他去学习或者去一个人民公社参加劳动。毛对这封信的语气颇感快慰，他指示在各级党组织中传阅这封信。但他以彭年事高为由拒绝了他到公社参加劳动的要求。学习，间或去工厂、农村搞些调查研究就成了彭的自新之路。[②]

10月，彭最终搬出了他在中南海（那儿住着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寓所，迁入破旧的吴家花园。该址位于北京北郊圆明园内，是个有围墙的院子。他将在这里度过以后的6年。离开中南海之前，他上交了自己的元帅服、狐皮大衣、地毯以及装饰房间的字画等。大概他随身带走的只有书籍，他说他将像农民一样过简朴的生活。他拒绝了给他配备的护士和一般勤杂人员。从那时开始，他亲自动手扫地、缝洗自己的衣服。他只留下了自己的警卫员。[③]

起初，生活似乎很寂寞。彭的夫人浦安修，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家看望彭。彭的邻居只有一些农民住户，开始院门口的哨兵不让他们接触彭，直到彭

---

① 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以"摘要"的形式发表出来。见《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第39—44页。——原注

②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81页。——原注

③ 同上，第81—82、84页。

威胁说要给毛写信，这才“解禁”。① 但是彭自己却劝阻为政治局委员做保健工作的医生傅连暲来看他，彭说：“我这里是是非之地，今后你不要来了，谢谢！”傅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后来他去问周恩来：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为什么会被搞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据说当时总理含着泪说道：“历史就是历史，它是无情的，不会向什么人献媚，你应该记住，最公正的是人民！”政治上还很幼稚的傅连暲到底还是不明所以。②

与些同时，彭全力以赴建起一个小型实验农场。他砍掉花丛，栽上果树，种上小麦和瓜果蔬菜；他带人把原有的小水塘挖深，养了鱼，种上藕，还买了小猪、小鸡、小鸭。他试用了报纸上和电台里介绍的各种各样农业技术方法，以便看看这些宣传是否货真价实。而他常常又是十分诚恳地向当地农民请教，以致于在他身份暴露之前，有人问他是否来自农科所。

当农民得知他的来历后，更经常地出入他的门庭。有一次，一位母亲把她那生病的孩子抱来请彭看，显然她相信，彭只要把手放在孩子头上就能消灾去病。彭喜欢用中南海送来的影片招待他的农民朋友。在粮食极缺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他还把不留姓名的人送来的许多食品分给他的农民朋友和警卫人员。③

但是彭德怀的主要活动是学习，对于一个迄今为止并未读过很多书的人来说，这是生活方式上的一个根本转折。从中南海离去时他带了20箱各种类型的书籍，一本也不愿丢。这些书全堆放在他的新住所的家具上。他还从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那

①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84、91页。——原注

② 贺诚：《从基督教徒到优秀共产党员的傅连暲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3月6日。译载于华盛顿联合出版研究中心档案第77卷968号第15页。英译文所说的周恩来“含着泪”我猜想这不可能是因为喜悦而流泪。——原注《人民日报》原文并没有说“总理‘含着泪，说道”，而只是“总理委婉地说：……”。——译者注

③ 同①，第82、86—90、91—92、94—95页。——原注

里搞到许多书，有时去高级党校听课。彭还仔细研读中央、国务院的各种重要文件，以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是可以继续收到这些文件的。由于这样的身份，他还被邀请出席国庆及其他正式的庆祝活动，但他从来都是拒绝参加的。①

对张闻天来说，他是一个比彭更习惯于脑力劳动的人。但最初一个时期，还不允许他有发挥创造性才智的机会。8月18日，在离开庐山之前，张闻天给毛写了封告别信，信中暗示主席还没有宽容他，不见他，没给他指明前途出路。毛很欣赏这封信中那种自我批评的口吻，并在当天就批示把这封信印发给所有与会者。在9月份召开的一次外事会议上，陈毅也宣称张的态度比彭要好。或许，陈毅对于自己曾经怂恿过张闻天而感到内疚吧。② 但是，只是在张的不懈努力活动之后，他终于在196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一名研究人员。其后张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上。后来，他的同事称赞他：勤奋、博学、谦逊。③

至于所谓的"彭德怀集团"的另一名成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则完全销声匿迹了。只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70年代末，他的情况才被透露出来④。他的继任者是邻省湖北的第二书记张平化，但长期的受益者却是一个还不出名的湖南地方干部华国锋。根据张平化后来的说法，在庐山会议上，毛亲自提名华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这个说法在1977年华国锋作为党的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处于其权力和影响的顶峰时广为流传。⑤ 如果说毛确实

---

① 景希珍：《在彭总身边》，第106—107、109页。——原注

② 《东方红战报》1967年6月15日第80号第6页。（这个材料中将外事会议的年代误写为1957年。）——原注

③ 孙冶方等：《严谨的治学态度》，载《新华月报》1967年第8号第18页——原注

④ 《新华月报》1979年第5号第63—64页。——原注

⑤ 参见《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73页。——原注

关心一个级别较低的地方官员的前途的话，那么有人可能会推想华的晋升与彭德怀事件之间有某种联系：或许华向这位主席提供了元帅在韶山的活动以及彭与周小舟交往的情况，这对主席有所帮助。

不过在当时，华国锋的晋升只是小事一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一职，会给这位忠实而又平凡的官员提供一个使他从此青云直上，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班人的台阶。庐山会议后，政治上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这次会议对人民解放军的冲击。

第十三节　庐山会议对人民解放军的冲击

对人民解放军不得不小心从事，因为一位革命英雄的失宠可不是寻常的事情。的确，如果彭德怀像后来所宣称的那样，果真卷入了高岗事件，那么他当时为什么没有受到严厉批判？一个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指责一位凯旋而归的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员，这在政治上讲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因此，在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名义于9月17日签署由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正式命令之前，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上，毛不得不向高级干部们解释最高统帅部里的种种变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从8月底一直延续到10月份。毛及其支持者必须向部队里的那些持怀疑态度和仍打抱不平的领导干部做出解答的问题，也就是他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并由陈伯达在几个星期之后写的一篇为解除彭国防部长职务的决定辩护的文章中进一步说明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像彭德怀这样的人，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却变成祸首？"①

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对上面的问题作了回

① 《光辉的历史文献》（1967年9月），第22页。——原注

答：彭德怀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仅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引用了彭在30年代所发表的言论和文章，并把这些材料的复制件分发给与会者，以此来作为彭德怀元帅持有资产阶级观点的证据，并借此来支持自己的论断。毛指出，彭坚持“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并忌讳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划分“左”和“右”①。毛甚至极不恰当地拿彭德怀与非共产党人士孙中山作比较，认为彭德怀的革命热情不如孙中山。②当然，为了令人信服，毛还不得不证明他对彭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并不是在庐山会议上才突然觉察到的：在给与会者分发的文件中有一封毛于1943年写的批示信，这封信批评了彭就民主教育所作的一次谈话。

像在庐山会议上一样，毛极力嘲笑了那些对大跃进吹毛求疵的批评，如抱怨妇女的发夹以及雨伞之类的日用品短缺等。他还强调在庐山会议之前的几次会议上，彭并没有吭声。鉴于他的听众的情况，毛特别强调，要想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必须有“铁的纪律”来维护团结。毛再次猛烈抨击了彭德怀与苏联的“勾搭”，不过，在所能见到的讲话内容中，毛小心暗示的很多，而详细说明的事例却甚少：

> “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我们不许可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组织，挑起一部分人来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们也不许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拨。”③

然而，比上面这些论据更为重要的大概是彭本人在庐山会议受到批判之后的表面上的顺从。前面提到的他于9月9日写的悔过信就是明证。毛批示把这封信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的参加者，同时还附上自己那显得宽宏大量的评论：如果彭德怀能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12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16页。

③ 同上，第316页。

继续赤诚相见，不再有大的动摇，他就会“立地成佛”，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仅在一个问题上彭德怀拒不合作。他坚决否认有所谓阴谋反对毛泽东并“篡党夺权”的“军事俱乐部”（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毛写给张闻天的信件里）存在。按照彭后来的说法，当时给他施加压力要他承认此事，无非是要逼供成招。但是当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某些人（大概是受了林彪的教唆），嘲笑他顽固不化，叫嚷“不要再欺骗我们了”时，彭大发脾气，拍案而起反击道：“开除我的党籍，把我拉出去枪毙了吧！但是你们中究竟那个是这个‘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①

从他读了陈伯达给毛的一封信和发表在党内刊物《内部参考》（9月）上的3篇有关经济的文章后所做的札记可以看出，尽管他承认了一些事情，但他仍然确信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在10月10日的札记中，彭嘲讽了那种颇费苦心地想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中，找出证据来证明大跃进并未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平衡受到破坏的做法。他评论道：

> “这些专家同志和陈伯达同志，我相信他们的动机都是纯良的。可是睁着眼睛硬不看事实，任性地凭主观想象出发，带着放大镜去找合于自己主观愿望的材料，总想客观事物会照着他们的主观愿望，可是它偏不听话，它照着自己的规律运动和发展。”②

由于现在不再受到用婉转辞令说出他的看法的那种需要的约束，彭的言辞甚至比他在庐山会议时更为严厉。他认为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导致农畜被大肆屠宰。“农村的劳动生产热情立即下降，农村人口盲目外流，造成当时社会现象混乱……”有人说，农村公社化是一个早产儿，“据我看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③

① 《彭德怀自述》第278—279页。——原注

② 《彭德怀的一篇札记》，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15—16页。——原注

③ 同上，第18页。

由于大炼钢铁运动，农民无法收割所有的农作物，这导致了"无法估计"的破坏和损失。就其自身来说，"全民性的炼钢，实际上是一个普遍性的大破坏。损伤人民元气的破坏，要有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恢复……。"①

这些评论直到20多年后才问世。但是即使彭本人公开表示了诚恳态度，毛似乎也已不可能得到"其他元帅们的支持。例如，后来受托主持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贺龙，就没有遵照中央的指示起草一篇反彭的讲话。②至少有一个军区的司令员对彭的撤职公开表示不安。③毛在其讲话中只能引用一位元帅——刘伯承——的话，刘显然曾主张彭"要脱胎换骨"。这大概是对彭的忠告。

然而，彭德怀的免职并非是将军们不满的唯一原因。如同他们的老首长一样，他们似乎也不赞成提升刘少奇。刘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为不久前改变政策的作法辩护说，不左不右绝对正确的领导是没有的。④制定政策确实就像乘飞机去莫斯科，先朝一个方向飞，然后再拐向另一个方向。⑤很可能就是在这次讲话中，刘说了如下维护毛的领导（同时也是维护他逐渐扩大的权力）的一段话：

> "过去历次大的革命群众运动，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而毛主席领导的运动，尚且有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如果是其他人领导的，是不是可能会有更多的缺点和错误呢？我看更加可能。现在毛主席健在，也还发生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的缺点和错误，如果毛主席不在了，不是更有

① 《彭德怀的一篇札记》，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18页。——原注

② 《反党篡军分子贺龙的滔天罪行》，载《体育战线》1967年1月28日。

③ 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参见《二钢红旗》（武汉），1967年8月22日第38期。——原注

④ 刘的这句话被"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材料所引用，例如：参见《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证选编》。——原注

⑤ 《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第36页。——原注

可能吗？”①

刘似乎不仅注意维护毛的一系列做法，而且还维护对他的崇拜。他论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无产阶级”的威信不如“资产阶级”的威信高；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领导人陈独秀的威信也比不上孙中山；甚至毛的威望也不比蒋介石的高。② 言下之意就是40年代刘和其他人树立对毛的个人崇拜是政治上的需要。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年前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但安进而指出，不再需要人为地提高毛的威望了。刘似乎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在庐山会议上建议说，已经到了禁止喊“万岁”，禁止唱《东方红》这个歌的时候了。③

但安子文和刘少奇讲话的背景是非常不相同的。安子文是在党的八大期间讲这番话的，意图是为了解释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的理由。这是中国人对苏联集团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所作出的一个反应。而对于刘少奇来说，在1959年，他不得不向军队一再申明，他不赞同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对军委扩大会议的参加者说，过去他曾积极提倡对毛的个人崇拜，而现在他提倡搞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彭德怀的接替者林彪的个人崇拜。④换句话说，他赞同提倡集体领导。他还含蓄地暗示自己身上很少有专制的领导作风，他说，无论谁，毛也好，他本人也好，林彪也好，有了错误都是可以批评，可以反对的。

---

① 见《刘少奇的反动言论》。另一种可能是，刘的这段话是他于8月24日或者更早的时候在庐山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原注

② 同上，第3页。

③ 《毛泽东思想照妖镜下的两个赫鲁晓夫》，载《斗批改》1967年5月15日。——原注

④ 《新时代的狂人》第11页。——原注

但刘并非完全采取守势。他反驳了所谓他仅仅是一个身上带有高岗异端邪说气味的城市知识分子，明显影射。他反驳说，毛也是城市知识分子，卡斯特罗以及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的领导人本·贝拉也都是如此。他宣称，甚至在座的同僚们也是城市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且，当着这些与会者的面，他准备维护自己的权力：

"当毛主席有别的事情或有病的时候，中央决定要我代理他的职务，我自己也认为可以代理，而且我代理比别人代理也不见得怎样不好，在这种时候，我是不推辞的。"①

刘的讲话并没能把与会者争取过来，但对他来说幸运的是，毛和林彪都站在他一边，而且当时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他的提升，而是彭的贬职。在与会者中，林彪理所当然成为毛的主要支持者，他在人民解放军中挥舞着大棒，以此证明他的提升是正确的。在9月11日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他坚决支持毛对彭德怀的强硬处理：

"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原则，就是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我们党其所以朝气勃勃，所以不腐化，就是因为我们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②

林彪指责彭德怀犯了五个路线错误，说彭历来左右摇摆，都是被野心所驱使。当着彭的面，林警告说："把你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才能改好。"林彪用来为这个强硬的论断辩护的一个理由是，如果不粉碎这位元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万一主席百年之后，"那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这

①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编印，1967年第109—110页。——译者注

② 《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年8月），第56页。——译者注

个颇为费解的论证在庐山上显然很有分量。①它似乎暗示，如果不完全把彭德怀搞下去，那他对于领导阶层将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者，或至少对那些反对刘少奇的人来说是一个代言人。

鉴于解放军对庐山会议的决议反应不那么热情，人们也许对下面的做法就不会感到吃惊了：毛和林感到不但要用目前军事领导阶层之外的人取代总参谋长黄克诚（黄被指控为彭的主要同谋），而且要撤换其他一些将领，因为他们与被撤职的国防部长的关系很可能影响他们对继任者的忠诚和信赖。

新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有一些有利因素。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只是军队里资历较深的政委，但自1949年来，他作为公安部长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他还同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这大概为他了解并对付军队里潜在的不满情绪提供了方便。终于，他的特殊生涯使他成为一个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领导能力于一身的理想人选，而这正是彭一直试图做到的。

免职或调离的其他高级将领还有：洪学智、李达、肖克和邓华。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将军于10月24日被免职。他曾在朝鲜战争中担任彭德怀手下的后勤司令员，在接替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部长之前，他在黄手下任副部长。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李达和肖克两位将军都被降到了不那么重要的岗位：李达成了老司令员贺龙元帅领导的国家体委副主任，而肖克则成了其长征时期的老战友王震的部下，担任了农垦部副部长。他们两人都因与彭德怀有密切关系而受到牵连。邓华将军是沈阳军区司令员，在朝鲜战争中是彭的两个副司令员之一，此时他被调到四川担任一个很不重要的职务。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邓华、洪学智和肖克将军也都曾与林彪共过事，作为彭德怀在朝鲜战争中指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的邓、洪所率部队原来曾属于林彪的第四野战军。

---

① 《林副主席关于彭德怀问题的谈话》（摘要），载《革命造反报》1967年11月25日。——原注

1959年9月，军委任命了4名新的国防部副部长，不难看出，这些职务的接替者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陈庚曾是朝鲜战争中的另一位副司令员，他的提升是为了安慰那场战争中的退役军人，因为他们对于清洗彭和邓华显然是很不满的。已是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从2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是林彪的亲密合作者，林彪之子后来在空军中出任高职或许并非偶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虽然与林彪是湖北同乡，但他们之间并无明显的联系。第四位副部长粟裕曾任总参谋长，1958年台湾海峡危急之后被黄克诚取代。粟裕的提升可能是想暗示他上次的下台是彭和黄的阴谋，以此赢得一位重要而卓越的军事指挥员的感激之情。新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经历鲜为人知，但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他似乎曾任职于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新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也是湖北人，但与林彪也没有明显的联系。

陈庚于1961年去世。刘亚楼则于1965年，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几个月去世。但是作为这场动乱的一个结果，其他3位——陈锡联、邱会作和许世友，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入了中央政治局。邱会作于1971年随林彪一齐倒台；陈锡联则由于以前与“四人帮”的关系和1976年邓小平第二次蒙难时他所扮演的角色，也于1980年下了台；许世友在保护邓中出过力，至此书写作时，他仍保住了其政治局委员的职位。尽管粟裕有了新的头衔，但在60年代初所起的作用较小，这也许说明了他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军人和中央委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文化大革命”之后幸存下来的原因。

可见，彭对大跃进的反对正好给毛提供了一个推行他长期以来早有准备的计划——让林彪负责军队事务——的机会。同时，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运动以及有关“军事俱乐部”的传闻，也给林彪提供了一个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组织最高军事指挥部的正当理由。此外，由于彭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击使林彪并没有因

取代彭而在他的同僚中引起憎恶。

第十四节　新任国防部长

在这一系列职务的平稳替换中，新任国防部长林彪是最值得注意的。他出身于华中地区湖北省的一个小地主家庭，与其他许多老资格的同僚相比，他受过较为完整的教育。1925年，他受反帝示威运动的激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就为他进入广州附近的黄埔军校奠定了基础。黄埔军校是一个在苏联帮助和中共支持下，由蒋介石训练军官的场所。军官将被派到军队中去，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从事统一中国的大业。林成为蒋的北伐军的一个营长。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之后，林的部队成为了朱德领导的一部分，后来又在井冈山与毛汇合。

根据西方研究林彪的主要专家在林彪死之前所写的著作的说法，他大致被描述为：

> "平静、含蓄、寡言、沉着、不易激动、谨慎和机敏。工作非常努力，有时为此而影响睡眠。他很善于学习，一方面间接地通过书本学习，同时也直接地通过亲身体验学习。在工作中他喜欢埋头于具体的事情并追根到底，一旦开始某件事，就力求有个结果。同时，他显然并不是那种处在周围人们的赞扬声中的一个"知名人物"，他喜欢在幕后工作，在多数情况下通过电话和手令，或者把官员们叫到他的住处发布指示，而不去参加会议。①

毫无疑问，多年来林很少露面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身体欠佳，长征的严酷损害了他的身体、此外，1938年春，在山西省境内靠近长

---

① 鲁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传记》(第2卷 1950—1971)，第148页。—— 原注

城的平型关，他取得了最著名的抗日大捷，几个月后，他负了伤而不得不离开前线。后来一年里，虽然报导说他已恢复健康，可他还是赴莫斯科就医并且在苏联呆了3年。1942年回国之后，他与周恩来一起同国民党人打交道，或从事高层外交。内战开始之际，他又回到了前线，指挥后来改称为第四野战军的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中国的最南端。很显然这场紧张的战争给他虚弱的体质又施加了过重的负担。1950年，他没有随他的部队去朝鲜。1951年底，他的身体又一次明显地变坏——据报导是患了肺结核和溃疡——而且一直到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才公开露面。

毛不顾有关林的这种虚弱的身体状况的报道，仍选择他掌管人民解放军。然而，有趣的是，在这位年轻的元帅开始他1949年以后闪烁的政治提升之前，主席就已在1953年小心地要林彻底检查身体。这势必得出两种结论：首先，还没有任何别的人能像林彪那样具有毛所信赖的胜任那个角色的才干。更确切地说，毛感到林彪能恢复对人民解放军的必要程度的政治控制和决策。确实如其所望，林彪上任伊始，即着手这项工作。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劝同僚们学习毛的著作，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建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①紧接着的下一个月，在他的关于共产党胜利10周年纪念的文章中，林彪断言：

> "军队的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十分重要，是万万放松不得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是我军几十年来在革命实践中所证明的真理……我们的军队是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不做好，其他一切工作就都无从谈起。"②

---

① 《红色宣传兵》1967年5月25日。——原注

② 《辉煌的十年》（上册），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59年12月出版，第58—59页。——原注

第二，毛大概觉得恢复对军队的政治控制非常紧迫，以致使他准备在一个早有记录的健康状况很差的人身上，冒险来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众所周知，从一开始从事革命生涯起，毛就始终强调对军队的政治控制工作。更重要的是，他清楚地记得，1935年1月对共产党军权的掌握使他成功地获得了党的领导权。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之后，由于他的地位，他负责了军委的日常工作，从彭和毛的关系来看，这意味着党的主席已不再认为自己能够真正地控制军队了。的确，后来据说彭曾想取消中央军委。由林取代彭，毛明显地感觉到他又掌握了军权。

第十五节 大跃进的复活

彭德怀的罢免和解放军领导机构的改组并没有解决大跃进带来的、迫使这位元帅大声疾呼的诸多经济问题。相反，这场清洗成了经济更加混乱的直接原因。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1958年政策的正确性，以证明它对批评者所采取的纪律处置是正确的。于是，一度开始了的紧缩计划又不继续实行了。不过，政府公开承认在1958年所实行的政策下，出现了大量夸大的统计数字。在八届八中全会公报中，1958年的工农业生产的统计数字都作了修改。粮食产量从原来的37500万吨改为25000万吨，棉花产量从335万吨改为210万吨，钢产量从1108万吨改为800万吨（据估计，其余308万吨是土法生产的，质量低劣）。这些数字的降低，迫使政府对1959年的产量指标作了相应的调整：粮食产量从原计划的52500万吨降到27500万吨，棉花从500万吨降到231万吨，钢材从1800万吨降到1200万吨。

统计数字的这种大幅度压缩也许是新闻界此时强烈要求发起新的跃进的原因，这就使得采用1958年的做法几乎成为必然的事。尽管庐山会议作出了赞同紧缩计划的决议，但在会议之后就立

即发动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显然会使干部们感到恐慌，不敢贯彻过去9个月中采取的紧缩计划。

这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再次为大跃进政策辩护的运动，是毛本人在庐山发起的。在一个关于湖南某公社恢复公共食堂的批语中，他写道：

> “教训是：不应该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就属于这一类”。①

几天后，在对另一份文件的批示中，毛把那位在某县下令解散集体食堂的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又一件批示中，他表扬辽宁省雷厉风行开展“反右倾鼓干劲”的做法，并号召其他省向辽宁学习。在庐山会议结束之前，他指示将一本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册子印发给与会者，并在前言中写道：“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遵照毛的指示，这场斗争在几周之内便展开了。在全国各地省级会议上，“相当多的属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高级干部”被揭露出来。

公开的反右倾运动开始于8月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它引用毛1955年的讲话，以较低的调子批评了暗中破坏生产运动的右倾思想。③第二天，该报再次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社论，它宣称，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6月），第288页。——译者注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第93页。——译者注

③ 《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载《人民日报》1959年8月6日。——原注

不批判右倾思想，就不能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动员起来，与自然灾害做斗争，取得秋季大丰收。社论说：

> "还有少数干部在克服了主观主义的毛病和强迫命令的作风以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于在大跃进中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组织领导生产运动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增产技术措施，也不去积极推行，放松了领导。"①

此刻，那些记得毛在1955年的讲话而又比较敏感的干部们，可能已认识到新的经济压力正在形成。但直到8月26日以后《人民日报》相继刊登了庐山会议公报以及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国人民才知道了有关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性，至少对党员来说，这个措词暗示着问题已不仅仅是泄气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当然也意味着，如果不响应新的生产号召，将严重危害一个干部的政治前途。9月17日公开宣布罢免彭德怀和他的同僚就是一个明确的警告。不过，当时并不需要把他们公开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种指责只是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出现的）。

接着，反击右倾的斗争开始以重申大跃进的重要成就的形式进行。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人民公社万岁》的长篇社论，该文以挑战性的语调结束。这对任何一个怀疑这种组织形式的人都是一个凶兆：

> "任凭国内外敌对势力怎样咒骂和破坏，任凭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怎样指责和反对，任凭严重的自然灾害怎样袭击，人民公社都没有垮台，我们因此也有权利说，它将永不会垮台……。"②

---

① 《战胜灾害，力争丰收》，载《人民日报》1959年8月7日。——原注

② 《人民公社万岁》1959年8月29日。——译者注

3天之后,《人民日报》转向对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唱赞歌了。它富有诗意地宣布,"如今大大小小的钢铁厂和炼铁基点遍布全国各省,铁水滚滚,钢花四溅"。[①] 9月中旬,该报又反驳了那种大跃进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几天之后又声称公共食堂——这大概是使彭德怀最为恼火的所谓创举——"前途无量"。

但是,在这反复渲染的背后,也承认了某些实际问题。庐山会议公报承认农村的炼钢运动影响了农业丰收。而且还认识到,在不能保证农业丰收的年景里,决不能忽视劳动力缺乏这一问题。它建议今后"所有土钢的生产,应由各地方按照具体情况自行决定,自产自用,不再列入国家计划。"[②] 陈云的工作并不是完全无用的。

1959年10月1日,中国领导人为庆祝国庆10周年纷纷撰写文章,这进一步加强了报刊赞美大跃进的大合唱,并通过文章中有关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使其增添了新的力量。正当许多像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这样的高级领导人静观这些问题的时候,两位均为政治局委员的省委第一书记,站出来极力为群众性的工业生产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辩护。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过去曾因首先提出群众性炼钢运动的建议而受到毛的赏识。此时他著文驳斥所谓大跃进运动会使工业生产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谬论"。声称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就在于无视人民群众在生产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继续提醒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实质上是反对党的总路线,因为党的总路线的出发点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力量。

曾在庐山会议上批评过彭德怀的四川领导人李井泉更是旗帜

① 《"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人民日报》1959年9月1日社论。——原注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人民日报》1959年8月27日。——译者注

鲜明地为人民公社辩护。他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所谓人民公社办早了的胡说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也是完全违背客观事实的”；[①]解散公共食堂是“十分错误的”。[②]他说：根据1958年中央北戴河会议决议的精神：

> “我们完全有根据地设想，在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大部分地区的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可能办到的。在这个任务实现以后，人民公社将进一步担当起由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③]

这一号召的结果是：春天才归还给群众私人使用的土地，到秋天时又被收归集体了。

这下该轮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以雄辩的口才为大跃进说话了：如果要想把干部和农民因疲劳而失去的那种劳动热情真正激发出来，就需要再次发起新的跃进。陶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革命坚定性”，在革命建设的年代仍然是需要的。他论证说，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虽然不是一场流血的战争，但却是一个更深刻、更广泛、更持久的斗争过程。与革命的坚定性相反的是革命的动摇性，这从那些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心的人身上表现出来。他嘲笑他们是“四平八稳”论者，经不住一点紧张；他们是以老爷式的态度来对待革命群众运动，在放手发动群众过程中似乎是不能出一点偏差的。他们也有一点要搞社会主义的愿望，但又不愿付出一点点代价；当他们遇到某些具体困难时便唉声叹气，裹足不前；他们可以因为暂时买不到一斤猪肉、一块肥皂，便闭上眼睛，看

① 《辉煌的十年》第27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78页。

③ 同上，第281页。

不到社会主义的光明远景。陶说道：

> “我们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一定要有像岩石一般的坚定。想想那海岸边的岩石吧！你看它们，有的矗立着，有的蹲伏着，有的指向青天，有的面向大海。它们是什么时候就在那里了呢！它们曾经经过多少次狂风暴雨的侵袭，它们曾经忍受了多少遍惊涛骇浪的冲击呵？……但是它们屹然不动。当风雨过后，当浪潮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海边，指向青天，面对大海……我们应该学习岩石的坚定。”①

不错，这个党在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面前确实屹然不动。大跃进又继续了，问题也越来越多，结局必然是一场灾难。

---

① 陶铸：《革命的坚定性》，《人民日报》1959年9月2日。——原注

第四部分

失　败

第十一章

中苏裂痕的出现

第一节　中印边境问题

1959年9月对彭德怀的清洗是通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前哨战，而同月晚些时候尼基塔·赫鲁晓夫对中国的访问，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参加中国10周年国庆大典，赫鲁晓夫于9月30日到达北京机场。正像他对前来迎接他的表情严肃的中国领导人所说的那样，"我访问美利坚合众国回到莫斯科以后，立刻就到你们这里来了，简直就是从一架飞机跨到另一架飞机上"。[①] 赫鲁晓夫当着他的中国主人的面，正在兜售他的和平共处方针——他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就是这一方针的最高体现。但他可能意识到他只是白费力气。几年后他回忆说：

> "我们必须承认，1959年中印之间爆发了战争以后，对于飞往北京我是丝毫不抱热情的。我知道中国人会按照礼节来安排对我的正式欢迎，但我并不期望他们会像1954年我第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13集（1959年9—12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8月出版，第277页。——译者注

一次访问北京时那样的兄弟般的好意来迎接我。由于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这种热情已不复存在，它已被冷遇所代替，而这种冷遇，我一到北京就感觉到了”。①

赫鲁晓夫强调中印边境争端是有理由的。一年后，中国人公开透露，他们对苏联采取的全方位全球战略的警觉日益增加。苏联对北京和新德里之间逐步升级的争吵的态度，是这个战略的一个具体表现，这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在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印关系是热乎的。两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周恩来进行了互访，周恩来访问新德里时受到热烈欢迎，人们高呼“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1954年签署了一项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协定解决了有关印度从英国继承下来的在西藏进行贸易和享有其他权利的一些问题。不幸的是，在条约公布实施时，双方都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机会对印度——西藏边界进行准确划定。②

对于东段的边界线中印双方是有争议的，但本质上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印度方面坚持边界已由他们从英国人继承下来的麦克马洪线划定。北京认为，麦克马洪线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任何一届中国中央政府都从未承认过，但周恩来表示中国准备承认现实，维持边界现状。他的态度暗示这种设想，即精确的边界线应该经过谈判并在一项条约中正式确定下来，但他没有清楚地把这一点说明。就尼赫鲁而论，他似乎宁愿让沉睡的边界躺在那里。他的假定是，只要周恩来不敦促这个问题的解决，便可以合理地推断中国接受了印度的边界线。

---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405页。——译者注

②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北京，三联书店，1971年5月，第94—96页。——译者注

1956年底周恩来访问新德里期间，他没有提出进行边界会谈来签订一项边界条约，这同尼赫鲁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一样是可以得到解释的。中印边界麦克马洪线的那一段边界线本来或许能比较容易解决，但周可能预料到解决西段的困难，两国出版的地图表明对该段边界的大片领土主权问题有意见分歧。当时，中国差不多已经修建一条从新疆通往西藏西部的公路，其中有100多英里要穿过印度声称拥有主权的阿克赛钦地区。这条道路对中国与西藏的联系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部分原因是由于从四川翻越高山进入西藏东部的那条公路非常艰险，更重要的原因是西藏康巴族叛乱首先叫嚷的就是要切断川藏公路。如果周坦率地承认修筑公路的活动和中国对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的需要，可能会促使尼赫鲁同意放弃这块印度巡逻兵从未深入过的贫瘠荒凉地区。实际上，印度对这一地区只不过是有一点绘制地图的兴趣而已。但周恩来像尼赫鲁一样，可能认为没有必要惹出对方认为不存在的问题。假如尼赫鲁提出反对意见，并通过派遣军队来维护印度的权利的话，那么结果就可能给中国人在道路修建阶段带来麻烦。其实，印度政府只是从中国出版的地图上才发现了这条公路的存在，最后在1958年7月派巡逻部队进入该地区。这种发现的方式使得后来多次有关边界谈判的战功成了问题，而印中双方皆有伤亡的武装冲突则标志着谈判的失败。

公路的发现使尼赫鲁感到震惊，这促使他采取更为武断的政策——派遣巡逻部队向整个边界推进。而印度舆论对1959年春发生的西藏叛乱事件的反应以及随后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影响，更坚定了尼赫鲁的决心。在同一时间，中国军队也在向边界推进，以便切断西藏逃亡者和反叛者的通路。8月25日，当一支印度巡逻队在朗久地区麦克马洪线中国一侧建立一个哨所时，双方发生了交火，印度士兵一死一伤，正是这一事件最终导致边界争端第一次公开化，并迫使苏联对此采取公开的立场。

第二节　塔斯社声明

按照中方的说法，中国在9月6日向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简要介绍了朗久事件的经过。虽然中国的陈述显然包括对印度政策的评价，这种评价与苏联对该国的看法不相一致，但第一印象是苏联没有理由认为不该接受中国方面的解释。中国宣称，这一事件是印度政府挑起的，是为了反华反共，并告诉俄国人不要被“正在竭力利用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尼赫鲁所欺骗。

9月9日上午，苏联代办向中国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塔斯社声明的副本，这个声明第二天就要发表。这大概就是苏联声明起草人后来所说的莫斯科通过“外交和其他渠道将自己的立场事先通知中国政府”的时机。[①]声明称这次事件是“令人遗憾的”，并指出，苏联将维护与中国（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伟大原则基础上）和印度（遵守和平共处的思想）的友好关系，声明说，苏联领导人表示相信，“两国政府将会解决业已产生的误会……”。[②]

塔斯社声明明显地保持中立。采取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的主要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声明的前半部分实际上没有谈论事件本身，而是谈论这一事件在西方产生的影响。声明特别宣称这一事件已被人利用，特别是被美国国内那些试图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阻碍缓和紧张局势、使形势复杂化的那些人所利用。4年后，俄国人指责中国在1959年与印度发生的武装冲突是以破坏和平共处为目的的。

---

① 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4月出版，第146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译者注

② 同上，第146页。

赫鲁晓夫后来的回忆录清楚地表明，他是带着急切和紧张的复杂心情期待着他的美国之行的。当时的苏联新闻报道表明，赫鲁晓夫把他的美国之行看成是苏联历史和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对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和美国并驾齐驱，共同主宰国际事务的明确认可。此外，赫鲁晓夫清楚地知道美苏之间避免核战争的重要性，正像他告诉一群美国州长和后来在1959年夏天告诉一批苏联听众的那样：

> "我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其他国家发生战争，可以加以制止；但是假如在美国和我国之间爆发战争，谁也不能够制止，这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①

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来说，因为中印边界争端这样完全不相关的因素来破坏他的美国之行，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如果莫斯科发表一份支持中国的声明，可以预料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敌视，他会受到相当的冷遇；如果莫斯科不发表声明，那么人们会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质问赫鲁晓夫对中印争端的态度。因此需要一个中立声明，赫鲁晓夫期望能够通过这个声明把事情搁置起来，至少等他的美国之行结束后再说。

以上提出的理由必定可以解释苏联不顾中国苦口婆心的劝说而公开发表塔斯社声明的做法，据中国方面的说法（俄国人从未公开过这个事件的细节），9日上午，中国方面看到塔斯社声明后，便立刻表示宁愿苏联对边境问题不要发表任何评论。当天下午，中国试图使苏联改变态度，给苏联代办看了周恩来最近写给尼赫鲁的一封信的副本，信上落款是前一天的日期。当天晚上，中国通知苏联代办，他们现在已经公开发表了那封信，并强烈要求苏联政府考虑周恩来阐明的立场，不要发表塔斯社声明。

① 埃德沃尔特·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哈蒙斯沃斯，企鹅图书出版公司，1963年出版，第85页。——原注

在这个时间发表周的信，大概是因为印度在9月7日发表了关于边界争端的白皮书。两国总理的信件来往是1958年12月尼赫鲁首先开始的，周回了一封信，然后尼赫鲁1959年3月22日又写了一封信。印度白皮书披露了这些细节，并强调过了6个月没有得到周的回信这个事实（西藏叛乱和达赖喇嘛逃亡到印度正是在这6个月期间发生的），因此要求与中国总理再次通信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相反，《人民日报》却以《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为题对白皮书进行了批判性地评论，而周恩来却仍然保持沉默①。然而，当时的情势表明需要作出答复。中国必须让外界看到它和印度一样正在严肃认真地对待边境冲突。因此，周写了那封信，并在9月11日召开了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来讨论这次争端。但这也很可能是中国方面获悉苏联正在考虑发表一项声明，因此希望通过公开周恩来耽搁很久的复信来阻止塔斯社声明的发表。

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周的复信及其迅速发表都没有获得预期效果。苏联方面并没有推迟发表塔斯社声明，以便留有时间考虑中国刚刚采取的外交行动，而且甚至没有等到10日，便于中国广播周恩来的信件之后不到6小时的9日晚上提前发表了这一声明。他们大概希望以此取代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就塔斯社声明进行任何高级别的外交会谈，因为这种会谈会使苏联人的动机暴露无遗，处于困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所做的只能是在9月13日向苏联发出照会，宣称："塔斯社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和苏联在中印边界事件中立场是不一致的，印度资产阶级、美英帝国主义对此简直是兴高采烈，拍手称快"。②

赫鲁晓夫的花招没有奏效。在美国访问期间，他不能够回避诸如美国参议员等就苏联对华政策向他提出的质询，而艾森豪威

① 《人民日报》1959年5月6日。——原注

② 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第147页。——译者注

尔则公开否认了这位苏联总理所谓两国政府首脑曾同意不讨论第三国问题的托辞。然而很清楚，在戴维营会谈中，赫鲁晓夫对中国问题简直避而不谈，但即便如此也无助于他。访美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赫脱说：只要苏联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那么他对中国的行为就应该负一定的责任。① 在10月底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愤怒地拒绝了这个建议。② 赫鲁晓夫对赫脱大为恼火，这无疑是由于他想起了在北京访问期间与中国领导人在中印边境问题上的争论。赫鲁晓夫已感到他没有能力影响中国，更不用说像这位国务卿暗示的那样去约束中国的行动了。

第三节　赫鲁晓夫在北京

尽管已预感无法说服中国人，个性鲜明的赫鲁晓夫在北京还是慷慨陈词。在他到达的当天晚上举行的盛大国庆宴会上，他对他的东道主讲了三件事：他相信艾森豪威尔想要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局势；和平共处是列宁早已赞许的；尽管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但绝不能通过武力来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③ 在这样的重要场合和客人面前，毛泽东没有公开表态是一种异常现象。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毛在随后举行的私下会谈中实际上也扮演了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中方的主谈判对手是外交部长陈毅，在关键的 8 月份，据推测他一直在参与处理有关中印边界问题，而当时他的政治局的同事们都在庐山秘密开会，因此他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

---

① 《纽约时报》1959年10月7日。——原注

② 同上。

③ 《在[illegible]国国庆宴会上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日。——译者注

双方争执发生在10月2日。中方出席会谈的阵容令人生畏，主要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第二号人物彭真、陈毅、以及书记处中的苏联问题专家王稼祥。赫鲁晓夫的主要助手是苏联的主要理论家苏斯洛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根据4年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简要报道，中方在会谈中就中印边境冲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谴责印度挑起事端，并认为“向印度反动派一味迁就是绝对不行的”。赫鲁晓夫对中方的详细说明根本不予理睬，只坚持认为“开枪打死人是错误的”。

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对当时的回忆是非常生动的：

> “这一次，中国方面决定放出陈毅来攻击我。谈判一下子就激昂和紧张起来。陈毅是极其粗鲁的。我不知道他的粗鲁是有意的政治行动，还是一种性格特征。”①

也许陈毅的同事们选他作发言人正是因为在所有的人当中，他最像赫鲁晓夫，性急、直率，因此最适合与赫鲁晓夫吵架式的辩论风格较量。②

赫鲁晓夫在对他们冲突的描述中写到，陈毅“开口就问：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一个声明？”——这表明北京对莫斯科在边境争端问题上公开采取中立立场十分恼火。陈毅说道，尼赫鲁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的苏联有义务支持中国。赫鲁晓夫回答说，尼赫鲁是进步的、反帝的领导人，边界争端无论如何都不值得打仗，特别是这个边界在几十年前就已确定了的。陈毅跳起来反驳说，这片领土于法于理都是属于中国的，

---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466页。——译者注

② 有关赫鲁晓夫的辩论才能，参见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第250—251页。有关陈毅的性格，参见《陈毅讲话集》。——原注

尽管英帝统治期间被英国人占领。而且中国需要这片领土（显然是为了修筑公路）。赫鲁晓夫又一次站在印度一边，要求中国人设身处地为尼赫鲁想一想，就会理解他为什么把中国控制的西藏"看作为对印度构成威胁的地方"。这种争论的语言很难使他的对手心服。实际上，赫鲁晓夫根本不相信中国人对中印边境冲突本身的陈述。① 9个月后，当边境流血事件进一步加剧时，他在布加勒斯特告诉彭真："我知道什么是战争，既然印度人被杀，这就意味着中国人进攻了印度"。②

在陈毅提出忠告之后，中国对苏联在中印争端中的中立主义的立场一连发了几份抗议照会，在1959年12月10日—1960年1月30日期间，有6份照会送到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手中。苏联方面在一份落款日期为2月6日的答复中，谴责中国对待印度的态度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赫鲁晓夫在退休数年之后回顾这次争端时说："我认为毛挑起中印冲突正是为了把苏联拖进去。他想把我们置于除了支持他以外别无选择的境地，他想成为决定我们该做什么的人"。③事实上，没有迹象表明，1959年秋中国方面的举动是如此不择手段的，但赫鲁晓夫的苦思冥想确实反映了一种无知和猜疑交集的心态。这正是当时两国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写照。多疑的毒瘤正在蚕食着中苏联盟的躯体。

在赫鲁晓夫方面，他指责中国人好战，口是心非和民族主义。他自称不能够理解中国国内许多方针政策的逻辑，如"百花齐放"，大跃进等。他一定更担心有朝一日这些方针政策在东欧国家引起共鸣。的确，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曾描述了为把一贯极端忠诚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从他们自己的大跃进边缘拉回来所作的努

---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467页。——译者注

② 吉廷斯：《中苏论战概观，1963—1967》第115页。——原注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471页。——译者注

力。

在中国方面，他们怀疑赫鲁晓夫正在出卖他们，为了苏联的利益而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中印边境问题不是唯一的问题。苏联对台湾的立场也激怒了中国人。在美国，赫鲁晓夫在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协定上没有把台湾问题排除在外。当他在北京时，这位苏联总理私下认为台湾问题既能用军事手段解决，也能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莫斯科后来声称，他只不过说了中国人自己在向台湾表示友好时（1956—1957）已经做过的事情，即愿意与国民党人组成新的统一战线政府，让蒋介石在这一政府中担任一个高级职位。

这种有点诡诈的辩解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苏联人清楚地意识到1957年以来，中国已改变了对台湾的政策。由于华盛顿坚持认为苏联应对中国的行动负一部分责任，赫鲁晓夫显然急于避免台湾海峡出现任何会对苏美关系产生影响的危机。根据中国对私下会谈发表的比较详细的报道——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对此只字未提——这位苏联总理说：

> 台湾问题在国际局势中是一个热点。由于美国支持台湾，便会造成大战临近的气氛；苏联所主张的是创造一切条件，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消灭战争。①

中国的反应是强硬而明确的，其态度实际上早就表示过。在10月1日的国庆典礼上，也就是赫鲁晓夫和陈毅之间发生对抗的前一天，国防部长林彪说：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的领土、领空和领海主权的完整，必须受到尊重，中国人民以这种方法或者那种方法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完全统一祖国的愿望，一定要

① 吉廷斯：《中苏论战概观，1963—1967》第118页。——原注

得到实现。外国不得干涉。”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尽管莫斯科恳求，但中国政府不准备在领土完整问题上让步。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诉诸武力。

中国公众显然对赫鲁晓夫准备以“戴维营精神”“支持”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大国的领袖的做法，表现出明显的担忧和愤怒。一年后，邓小平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上说：

> “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作了不得体的赞颂，他在公开场合说艾森豪威尔得到美国人民的全力支持，这决不能用所谓外交礼仪的理由来给予辩护或谅解的。”②

赫鲁晓夫访美之后，他在世界事务中对列宁主义的忠诚已在中国人心中产生了怀疑。

第四节 北京作痛苦的重新评价

在下半年的时间里，中国领导人开始研究赫鲁晓夫在北京同他们私人会谈时所主张的和平共处的观点，对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中国的民族利益将带来的影响。在1959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中国人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使分析更加深入。接着在1960年初举行的一系列高级会议上——1月的上海会议、2月的广州会议、3月的杭州会议——进行了辩论。随后在4月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起了大论战。

在1959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报刊评论主要是针对业已加强的美国的军事活动、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实力以及美国在老挝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重要地位。北京在分析美国战略时说：华盛顿

① 《人民日报》1959年10月2日。——原注

②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87页。——原注

作出的和平姿态与其所作所为是相矛盾的，实际上是在施放“战争烟幕”或是“为其侵略政策施加伪装”，其真正的目的是弥补导弹的不足，巩固其世界范围的军事联盟和军事基地的体系，增强进行局部战争的能力。一位西方分析家评论说，中国报刊的报道似乎是蓄意过分夸大对中国的威胁，并暗示由于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和第三世界的有利形势而得到加强的苏联集团的强大地位，有可能因为冒失的行为而丧失。①

中国人的分析有两个关键的论点：第一个是，帝国主义者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敌对是不可调和的：“总之，人们从这些铁的事实可以看到，尽管美国外交政策有某些策略上的变化，但美国的基本政策仍然是依赖两套策略（一是积极为战争作准备，另一套是打出和平的幌子），两套策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破坏社会主义”。第二个论点是，与赫鲁晓夫的论证相反，中国认为大多数的美国领导人反对而不是赞成和平共处。②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人反复引用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评价：

> “‘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会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③

如果说中国人对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向还抱有希望的话，那么他们在赫鲁晓夫10月31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作正式报告之后便马上醒悟过来了。这位苏联总理强有力地重申了他的和平共处方针，认为西方普遍的看法是力量对比意味着现在必须消除战争。在论证“为和平而作出相互的让步”时，他声称这并不是放

① 哈尔彭：《共产主义的中国》第18—20页。——原注

② 同上，第20—21页。

③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0页。——译者注

弃原则，而仅仅是仿效列宁1918年与德国签定布列斯特和约时所采取的灵活性。赫鲁晓夫还提到托洛茨基“冒险主义者”对这一条约的反对，这似乎是在暗示应该把毛归入信奉异端的那类人。苏联总理列举国际形势真正缓和下来的证据，显然是打算要反驳中国关于帝国主义者在施放“烟幕”的断言。与北京更直接有关的是，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在中印边境争端中——在他访华之后，又有一些人在双方冲突中伤亡——将继续保持中立。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对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亲自宣布支持戴高乐总统的停火建议。他的动机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在明年春访问法国之前改善法苏关系。但对于仍在猛烈谴责戴高乐计划的中国人来说，这只不过是赫鲁晓夫准备为了讨好西方而背叛朋友和盟友的罪证。

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在12月 1 日举行的匈牙利党代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对毛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更直接、但仍然有所掩饰的攻击：“如果我们骄傲自大起来，如果我们在自己领导中犯错误，如果我们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学说，那么，这些错误就会被共产主义的敌人所利用，1956年的情况就是这样”①。很明显这是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又一指责。关于国际事务，赫鲁晓夫坚决主张要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基础上保持一致。“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②很明显，他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应该保持一致，并由莫斯科决定。在会议幕后，赫鲁晓夫显然对中国人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批评。

北京对赫鲁晓夫要求团结的呼吁却置之不理。陈毅只勉强同意这样一点：一旦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上取得优势，帝国主义就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13集（1959年9—12月），第451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52页。

有可能和平退出历史舞台，显然这一天还远着呢！[①]邓小平在1959年12月的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要求持续地批判苏联，而不是进行一次一般性的攻击。[②]此时，中国对国际问题所做的公开评价与莫斯科的评价分歧更加明显，这尤其反映在双方对艾森豪威尔1960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的评价上。而且，中国人表示他们无意把自己的外交政策抵押在俄国人身上。他们正式表示欢迎赫鲁晓夫1960年1月14日提出的全面裁军的建议，认为这是苏联争取和平的真诚愿望的有力证明和苏联威力无比强大的具体表明。但不到一个星期，即1月21日，在听完外交部长陈毅就裁军问题所作的报告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庄严声明："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当然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③]

也许由于对苏联的观点越来越感到担心，中国人从1960年1月开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阵线组织，如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国际学生联合会中为自己的观点进行游说。这时，刘少奇本人则对西方把中国说成是革命的马列主义，而把苏联说成是保守的马列主义，以此来扩大中苏之间裂痕的企图表示关注。但有可能产生这种效果的并不是西方发表的文章，而是中国的行动和论战。也是在1月份，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讨论外交问题，据推测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这正是中国方面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之后发生的第一次大论战中所阐明的。

---

① 见陈毅1959年12月27日在一个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东方红战报》1967年6月15日第45期第4页。——原注

② 《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论摘编》，首都红代会人大三红批刘邓第一支队编印，1967年4月第60页。——原注

③ 《人民日报》1960年1月16日、22日。——译者注

第五节　华沙条约组织会议

直到今天，1960年2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最高级会议仍笼罩着神秘的气氛。有证据表明，苏联人曾希望能阻止中国方面出席，在会议就要举行之前还没有通知中国方面；同时，他们以出席农业会议为借口把东欧领导人请到了莫斯科。不管苏联人如何策划，中国人还是获悉了召开会议的消息（也许是从阿尔巴尼亚那里获得的，阿不久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结成了联盟），并决定行使权力，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这次会议。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式受到邀请。他们挑选一些"苏联通"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成员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央委员伍修权，他们俩人都在苏联呆过几年，代表团的第三位成员是当时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①

他们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3人小组，能够在可以预料到的不利条件下应付自如。

此次华沙条约国会议的目的是批准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方针和裁军建议，这正好赶在此后几个月内他将和西方政治家的一系列会晤、特别是春天在巴黎举行的"四巨头"首脑会晤和夏天艾森豪威尔对苏联的回访之前。与会代表"一致的共同的希望是：美国总统访苏能使苏美两国关系在友好和合作的道路上有进一步的发展，这将是保证世界和平牢不可破的一个重要保证"。②

中国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目的是要在这个重要讲坛上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莫斯科的东欧集团面前阐述自己的观点。由于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华沙条约国甚至没有提及

① 康生30年代曾在莫斯科呆了大约4年，伍修权自1926年到1931年也生活在莫斯科。——原注

② 《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载《人民日报》1960年2月6日。——译者注

这个发言，更不用说发表）和《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中国予以发表）都阐述了同样具体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在当年晚些时候发生的中苏论战中则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因此，对两者进行比较是大为必要的。

《宣言》的调子相当温和、乐观，而康生的讲话则强硬、悲观。《宣言》没有提“美帝国主义”，而康生的讲话却多次提到。《宣言》提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强西德军国主义，但又补充说，“与会者表示相信，西德复仇主义者的计划不会得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现今的盟国的支持”。① 相比之下，康生的讲话则认为，“加紧复活西德军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 虽然《宣言》在康生谴责的地方进行了指责，但遗憾多于愤怒。

《宣言》援引 4 条证据来为其乐观基调辩护；康生的讲话则对其中的 3 条置之不理，而把第 4 条论据——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看成是华盛顿被迫作出的毫无意义的姿态。康生承认紧张局势出现了某些和缓的趋势，但他把这归功于得到和平民主力量、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支持的无比强大和坚强团结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斗争的结果。

《宣言》所强调的主题也即是赫鲁晓夫和平共处总方针所告诉人们的：核战争无疑将导致战争双方巨大的毁灭，而不单单是帝国主义者一方。康生讲话的重要内容则是关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这是康生用来为中国拒绝遵守没有它参加起草的任何国际协议进行辩护的理由。华盛顿乐意与莫斯科打交道而同时把北京排斥在外（旷日持久的中美大使级会谈除外）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不同成员国采取区别对待的政

① 《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人民日报》1960年2月6日。——译者注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同志在华沙条约国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0年2月6日。——译者注

策，这使中国人大为不快。赫鲁晓夫欣然同意这种作法，是他在中国首都受到冷遇的主要原因。

赫鲁晓夫受到冷遇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公开场合愈加喜欢嘲笑毛泽东。据报道，在华沙条约国会议结束后举行的宴会上，他把中国党的这位主席描绘成一位"怪癖老人，活像一只旧鞋子，只能摆在角落里让人观赏"。①

到此时，莫斯科与北京在有关国际事务的分析和社会主义阵营所要采取的方针上的相互对立，已众所周知了。双方的政策分歧日渐加深。然而，在华沙条约国会议结束后仅仅10天，两国首都就举行了盛大集会，隆重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0周年，就仿佛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在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庆祝宴会上，刘少奇举杯祝贺两国人民"伟大持久和牢不可破的亲密友谊"，朱德对苏联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所提供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不过，潜在的问题还是表露了出来，朱德提到将1957年莫斯科宣言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基础，而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却强调了社会主义与和平之不可分离以及最近发表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在寻求和平共处过程中的重要性。②

或许朱德有所节制，因为他是苏联大使馆的客人。在中方举行的纪念条约签定10周年的宴会上，外交部长陈毅当然无所顾忌地重申了中国对全球局势的严峻分析，尽管在私下他似乎显得较为理智，暗示说假如中国拥有核武器的话，达成一项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是可能的。

第六节　中国的孤立

大概就在这些周年庆祝活动刚刚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立刻

① 塔蒂：《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第46页。——原注

② 《人民日报》1960年2月15日。——译者注

又举行了一次有关外交事务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广州召开的。据推测讨论了华沙条约国会议，并就如何采取最为适宜的对策作出了决定。接下来的一个月，在杭州召开了第三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估计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领导人通过了将在4月份发表的论战文章的草稿（或正文）。

尽管这些论战文章充满了自信的语调，但毛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却表明，至少他的一部分同事对中国越来越陷入孤立感到忧虑。毛的讲话题为《关于反华问题》，里面包含着他特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他所想像出来的统计数字之上的。他认为，中国的敌人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大概指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他说：

> “以上三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假定说100个人中有10个人反对我们，全世界27亿人口中，不过只有2.7亿人反对我们。而有24.3亿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①

毛继续说，只要中国的经济搞好的话，反华活动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他用有点令人吃惊的语言援引了俄国的例子：“我们有苏联的先进经验可资借鉴，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反苏的人都没有好结果”。②可是尽管有历史的教训，毛仍打算领导中国共产党来反对苏联。

毛的这番评论——刘持相似的观点——是配合中国在巴基斯坦举办的展览会开幕而作出的。由于目前中国与邻国及近邻国家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16—317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17页。

发生了争端，反华情绪当然主要存在于亚洲。毛谈到的反华活动的间歇就是北京采取步骤调解这些争端的结果。

至于印度，周恩来总理早在1959年11月 7 日写的一封信中就建议与尼赫鲁举行最高级会谈，这封信的语气比中国早些时候的通信要友好得多。尼赫鲁起初给予拒绝，最后还是同意了，但要求周到新德里来。周总理于1960年 2 月26日接受了邀请，访问日期后来定在 4 月中旬。

与此同时，中国迅速采取行动解决与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1月，中国接待了缅甸总理奈温将军；3月接待了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先生。两位总理的访问均达成了边界协定，虽然中缅最后分界线的划定留给一个联合委员会去解决。中国和缅甸还签署了一项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为尼泊尔提供了总共约 1 亿卢比的援助。在与缅甸签署协定之后，中国的宣传媒介显然在质问印度："在中国和缅甸之间能够出现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够同样出现在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呢？"①

中国在亚洲的另一个大的争端出现在它与印度尼西亚之间，这是由雅加达政府1959年 5 月作出华侨不得从事农村贸易的决定而引起的。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同年10月对中国的访问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据当时印度尼西亚的消息来源披露，陈毅与苏班德里约的会谈就如同这位中国外长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一样激烈，尽管有证据表明陈毅的确了解华侨问题的历史渊源和华侨适应殖民统治结束后东南亚现实的需要。② 但不管怎样，1 个月后，大批华侨被赶出家门和商店，货物被没收，一些人遭毒打，另一些人被关进监狱。其后进行的新的外交活动导致北京在12月终于同意互换1955年签订的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批准书。与此同时，中

① 《亚洲国家团结友好的新范例》，载《人民日报》1960年2月1日社论——译者注

② 《文草风云》1967年第8号第39页。——原注

国主动为那些不愿再继续留在印尼的华侨提供庇护，有10多万人接受安排，乘中国船只撤离印尼回国。

如上所述，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争端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中国人蛮横无礼的结果。不过，此时中国的外交行为确实已表现出强硬的特征，这是中国发动大跃进运动之后普遍出现的一种好战情绪的反映。此外，中国人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攻击也没有改善他们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形象，因为许多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与铁托有密切的联系。1959年底和1960年初北京采取的更通融的方式表明，他们已意识到自万隆会议以来，周恩来纯熟的亚洲外交所获得的成果正在丧失掉。而这是在中国与苏联即将进行的对抗和与美国的继续对抗正需要朋友的时候。在中国人看来，艾森豪威尔1959年12月对印度的访问和赫鲁晓夫1960年对印度和印尼的访问是反华势力结盟的前兆。必须制止这种事态的发展。

中国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发展自己与外界的联系。这不大可能是一种巧合：3月19日，北京举行盛大群众集会，庆祝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的成立，不到一个月，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又在4月12日成立，一位中国工会的重要官员刘长胜担任会长。5月，在周恩来与尼赫鲁边界谈判失败之后，毛接见了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4批代表团，以改善中国同第三世界的政治关系。毛向客人们强调，他们的共同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只有团结和斗争才能打败它。①

中国政府担心仍然在继续进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会使北京所作的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许诺引起第三世界的质问和莫斯科的嘲弄，因此，有意为会谈设置障碍。3月中旬，也就是中共中央召开有关评价华沙条约国会议的影响的广州会议之后大约两个星期，两名天主教主教，一名美国人，一名中国人，突然在上海受

① 《毛泽东同志五月上旬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谈话》，《红旗》1960年第10期第1页。——原注

到审判。中国人名叫龚品梅，被指控犯有严重的叛国罪，被判处终身监禁，另有13名中国天主教徒也受到审判，分别被判处5—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而美国的华理柱[①]（共产党革命后拒绝回国）受到的指控是指挥龚的“反革命叛国集团”，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华理柱和龚在此之前已在监狱里关了几年，[②]而选定在这个特别的时间进行审判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中国企图在对赫鲁晓夫和平共处方针进行第一次论战之前摆出反美的姿态。这种姿态肯定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根据一位参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历史学家的说法：“华盛顿极为恼火，大使级会谈严重受挫，这一事件使华盛顿怀疑继续进行大使级会谈是否还有任何实际意义。”[③]

第七节　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日的论战

中国把196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日作为重点指责苏联对外政策的时机。总共有4篇抨击文章，其中一篇为《人民日报》社论，它列举了最近发生的37件事例，证明“尽管在戴维营会议以后，尽管在东西方最高级会谈的前夜，我们看不出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有任何实质的改变，看不出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本人所执行的政策有任何实质的改变”。[④]毫无疑问，刊登在《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未署名的长文是当时中国方面最重要的论战文章。该文题为《列宁主义万岁》，它把论战从具体的政策问题提到了意识形态的原则高度。

在这篇文章中，中国人终于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

---

① 即詹姆士·爱德华·沃尔什。——译者注

② 龚品梅于1955年被捕；华理柱于1958年被捕。——译者注

③ 扬：《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谈判》第227页。——原注

④ 《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人民日报》1960年4月22日社论。——译者注

的新观点进行了反驳；此时，中国人终于感到有必要把毛在1957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为了不惹是生非而对莫斯科宣言中一些问题所作的让步，置之一旁了。这些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革命或改良问题。

这篇文章——肯定是由毛最后定稿的①——认为列宁关于这些问题的论点在今天仍然是正确而适用的。不论是西方帝国主义者，还是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没有改变他们的本性；像核武器这样“技术进步的一些具体情况”的存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竞争的特点。战争依然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制度，在帝国主义制度和剥削阶级死亡以前，这样性质或那样性质的战争，总还是会出现的。”②

文章指出，从列宁开始，共产党就主张和平共处，但是经验表明，帝国主义最终将抛弃和平而发动战争。正确的办法是两手策略并用：“一手是揭穿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一手是“准备在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时候，用正义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的不义战争”。③

文章认为，和平共处只适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共产党人应该参加议会斗争，但不应该迷信只是资产阶级专政装饰品的议会制度。正象列宁指出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是列宁这些论断的最好的事实的见证者。“请大家根据历史上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一切血淋淋的事实，想想老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谓‘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一连篇的鬼话吧！”“和平

① 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是这篇文章的起草人之一。——原注

②③ 《红旗》1960年第8期第16页。——译者注

过渡”正如列宁所论证的，是“非常罕见的机会”。①

文章在大量援引列宁的话的同时，还不时地对铁托（活该受讥的对象，但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的代号）进行嘲笑。南斯拉夫人因为“无耻地”把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艾森豪威尔叫做是‘消除冷战和建立持久和平及不同政治制度间和平竞赛的奠基人’”而受到谴责；赫鲁晓夫在访问北京期间曾提出了类似的主张。②

文章对莫斯科和北京在印度问题上的对立立场也作了含蓄的暗示。“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在不是国外敌人侵略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军队越出国境”。③在非共产党国家，资产阶级完全可以“除了在必要时采取解散议会的办法以外，还能够采取公开或幕后的各种把戏，使议会中原来第一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变成少数派，或是使工人阶级政党纵使能够在选举中得到比以前更多的选票，而却减少了议会的席位……。第二次大战后欧洲和亚洲各国的经验又对这一点再作了新的证明。”④在这里，中国显然记得尼赫鲁曾解散了世界上第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并具有重大意义的共产党政府——喀拉拉邦政府。

《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以强烈的感情暗示了近年来中苏对外政策上的具体分歧，但它的理论纲领更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和深远的意义。中国人第一次在维护他们为社会主义阵营制定原则的权利。在此之前，可以把中国的理论分析或者解释为仅仅是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进行讨论（例如1956年发表的两篇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文章⑤），或者解释为仅仅是与中国有关（如毛1957年

① 《红旗》1960年第8期第20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6页。

③ 同上，第18页。

④ 同上，第24页。

⑤ 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译者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而搪塞过去。但到这时，中国正在承担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工作——分析新时代的特征和对全球的阶级斗争作出推断。如果不受到挑战的话，北京将接替莫斯科成为马列主义正统学说的中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罗马。因此，赫鲁晓夫不得不出来应战。

第八节　中国方面在北京的游说和在布加勒斯特的恫吓

对赫鲁晓夫来说，不幸的是，他既不享有个人威望，也没有知识权威，使他能够令人信服地对如毛所暗示的那种马克思和列宁的正统学说提出挑战。苏联理论界对《列宁主义万岁》的公开反应是软弱无力的，这大概是因为承担此项任务的是苏联领导层中一个不很重要的人物奥托·库西宁，他只是以列宁时代的老战士的资格，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而且也仅仅是求助于引用列宁著作中的一些句子（这些引语同样很好地被中国人所利用）和列宁遗孀的回忆——伟大的革命家列宁曾预言："将有一天，战争的破坏性将变得如此巨大，以致它根本成为不可能。"① 苏联坚持核战争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的观点给库西宁的讲话以一种道义上的吸引力，而这是北京的冷酷推断所缺少的。但苏联的理论家们并没有为库西宁提供理性的分析，以使其感情化的观点变成为教义。结果，库西宁的讲话大部分是苏联政策，特别是苏联对非洲和亚洲的非共产党国家政策的实用主义的辩护。在苏联理论出现贫困的同时，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又受到沉重的打击：紧接着在苏联领空击落一架美国U—2侦察机之后，赫鲁

① 库西宁：《列宁思想的实现——在莫斯科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纪念会上所作的报告》，载《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文集》（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342页。——译者注

晓夫被迫放弃了巴黎四国首脑会议。在北京，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的行动表示欢迎。由于艾森豪威尔为U—2飞机事件承担个人责任提高了美国总统而不是苏联领导人的信誉，中国人一定会为此感到高兴。1960年5月，赫鲁晓夫看来在理论和实践的论战中都输给了中国人。

中国人掌握了主动权。6月5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的为共产党国家所控制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大会上，中国人用令其他共产党国家感到惊讶的激烈方式为他们的观点进行游说，中国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副主席刘长胜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的即使在帝国主义仍然存在的条件下，也可以消除战争的观点斥责为幻想。① 中国代表团召集与会的共产党代表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目的在于改变世界工联理事会的现行政策。在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明确谴责了现代修正主义，谴责的对象显然是赫鲁晓夫。中国人在发表纪念列宁诞辰的一系列文章之后紧接着又在这种场合采取如此的行动，很可能使他们失去了克里姆林宫内那些赞同他们对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进行批判但不准备让出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的鹰派人物的同情。

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结束后的几天里，中国可以宣称在维护自己的观点方面又一次取得了胜利。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好斗的学生支持下举行的反对延长日美安全条约的街头暴力示威，迫使日本政府要求推迟艾森豪威尔即将进行的对日访问。尽管日本议会批准了新的日美安全条约，但此后不久岸信介首相就被迫辞职。这是革命斗争比议会道路更有战斗力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鉴于这些情况，苏联试图利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的机会，含沙射影地对中国的极端主义进行

---

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在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载《人民日报》1960年6月9日。——译者注

攻击，但这种攻击显得不痛不痒。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只好发起了猛烈的反击。

5月12日，也就是他们得悉巴黎首脑会议即将流产的前夕，苏联领导人邀请毛去莫斯科，毛拒绝接受邀请。在6月初，苏共中央建议执政的共产党利用定于那个月20日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就首脑会议流产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中国不赞成匆忙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也不赞成把非执政的共产党排除在外。最后，两国中央委员会都同意应该举行一个包括所有共产党参加的大会（该会于11月在莫斯科举行），布加勒斯特会议可以作为初步交换意见的机会。

在罗马尼亚党代会公开会议上，赫鲁晓夫和主要的兄弟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彭真又一次详述了人们熟知的苏中关于和平、战争和革命的论点。幕后，一场激烈的对抗正在酝酿之中。苏联代表系统地向兄弟党作了有关中苏争论的简要介绍，并散发了落款为6月21日的长达80页的《通知书》，指责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错误观点和非同志式的活动（特别是最近发表的纪念列宁的文章和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上的反苏游说）。俄国人第一次试图维护他们理论上的统治地位，但由于这个文件至今没有公开发表，它的权威性如何还无法作出评价。

布加勒斯特大会的秘密会议从6月24日开始，一直延续到26日才结束。据报道，彭真对苏联游说之后出笼的一连串反华讲演大为吃惊，但他镇定自若，据理驳斥。更为有效的是，他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向代表们散发了又一份长达80页的苏共私下给中共的信件。信中“恫吓和刻薄”的语调和《通知书》中的据理论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破坏了后者的政治家的风度。

中国人采取旨在提醒其他共产党人注意苏联共产党与兄弟党交往的实际情况的聪明之举，大大激怒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随后上台发言，他“抛弃了讲道理的论争方式，甚至撕去对分歧作

明智分析的一切伪装，开始了他那激烈的长篇演讲，通篇纯粹是个人攻击的字眼”。① 按照中国人的记述，这位苏共领袖“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据另一材料说，赫鲁晓夫指责中国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对苏共采取了这一方式）。② 中國人没有提到赫鲁晓夫对毛指名道姓的攻击，赫鲁晓夫曾说毛“实际上是又一个斯大林，只顾自己的利益，脱离现代世界实际编造理论”；这位中国党领袖已经变成了“极左派和极端的教条主义者，真正的左倾修正主义者”。③ 赫鲁晓夫还提到彭德怀事件，并明确暗示，彭德怀是由于向苏联谈了他对大跃进的看法而被解职的。彭是一个“好朋友”，而他，赫鲁晓夫愿意挂他的像。

赫鲁晓夫的恫吓显然没有吓倒彭真，据报道，他对对方的回敬要比这位苏联领导人的“格调要高得多，而且真正抓住了要害”。根据赫鲁晓夫在美苏戴维营会谈后和在巴黎最高级会议上形成鲜明对比的行为，彭真谴责他对帝国主义大国忽褒忽贬。更重要的是，彭真被授权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一项声明，谴责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行为和“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声明说：

> “他在实际上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看成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在这次会谈中，他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屈服”。④

---

①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04—106页。——原注

②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86页。——译者注

③ 同①，第107页。

④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116页。——译者注

中国的声明表示不同意会议公报中的部分内容，但也坚决表示了共产党团结一致的愿望。中国人后来宣称，“为了顾全大局”，彭真在公报上签了字。①

第九节　俄国人撤走

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与彭真发生对抗之后，完全不顾什么大局了。7月13日—16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在最后一天听取了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报告。报告人是弗罗尔·科兹洛夫，然而这位资历较深的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安排他做报告大概是为了向中国人表明，苏联领导层在反对他们时是团结一致的，尽管科兹洛夫是苏联共产党主席团中一位著名的反西方的鹰派人物。同时也向中国人表明，苏共中央及时地“完全赞同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这项活动中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当月晚些时候，苏联的理论权威苏斯洛夫在向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党员作有关这次全会的报告时明确说，由于中国人的好战政策，今后双方的关系将仅仅维持在国与国的基础上，如果今年年底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不能解决争执，将公开宣布友好关系破裂。而更为迅速的行动是苏共中央全会显然批准了主席团作出的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建议。苏联方面于7月16日就此事照会中国外交部（根据苏联和中国双方的资料），并立即采取了行动。据后来的报道，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化学家米哈依尔·科洛契科（当时正在边远城市昆明的一个冶金和陶瓷研究所）于7月16日收到了召回电报。②

俄国人从未公布从中国撤走专家的决定，但中国让所有即将撤离的苏联专家看了苏联给北京的照会全文。这个照会解释了作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87页——译者注

② 科洛契科：《一位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65页。——原注

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主要是：中国人不听从苏联技术专家的意见，并且常常对此加以蔑视；中国人为苏联专家人为地制造了难以容忍的事情，暗中监视他们，搜查他们的私人物品，私拆他们的邮件，有些苏联专家受到骚扰，甚至受到殴打。所以，全部苏联顾问要在7、8月间撤走。① 7月31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收到了中国的答复，答复逐条地否认了苏联方面的指控，并把这些指控说成是"令人不可思议而又无益的行为，如同捕风捉影一般"。②

苏联的决定似乎不但使中国人而且也使苏联专家们自己都全然不知所措。科洛契科收到中国科学院转来的召回电报，要求他紧急回到莫斯科的研究所去，这个消息使不知底细的科洛契科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他在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还被告知说他可以呆到12月份。科洛契科也知道，在9月以前，是苏联科学院的"淡季"，"即使你打着灯笼，在整个莫斯科也找不到一位科学家。"③

科洛契科在3月份一到达中国就意识到中国人与苏联专家之间存在着紧张气氛，这在1958年他第一次来这儿工作期间是不曾有过的。④ 一个月后，他和其他外国专家参加了一个会议，在会上，一位老资格的省级党的官员给当地的其他干部讲解了《列宁主义万岁》一文。讲话结束后(科洛契科实际上什么也没听懂)，每一位苏联专家都得到了这篇文章的俄文本。后来，所有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均被本国大使馆询问是否拿到过这份具有异端邪说的文件。科洛契科并不把这场外交上的风波归咎于这篇文章的内容，"这篇文章很容易被当作荒谬的东西而置之不理。但实际上它是中国政府公开提出与苏联不同的观点的首次尝试"⑤。尽管如

---

① 科洛契科：《一位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177—178页。——原注

② 同上，第178页。

③ 同上，第164—165页。

④ 同上，第122—123页、105—112页、154—156页、159页。

⑤ 同上，第146—148页。

此，“五一”庆祝活动还是按照往常的礼仪进行的。①

尽管收到了撤走的电报，科洛契科仍真诚地希望在离开之前完成手头的工作，结果，他目睹了苏联外交官在完成迅速撤走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任务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在与驻北京的大使馆一连几次电话谈话以后，大使馆仍重申并强制命令他整理行装，立刻撤离。科洛契科感到不能再拖延了，在参加了中国同事为他举行的感人的告别会后，他于7月28日飞往北京。

在中国首都，一位苏联外交官告诉科洛契科，苏联政府每个星期已增加两次北京——莫斯科的列车。目前大约还有1500名苏联专家和2500名家属在中国，他们必须在8月底撤离，科洛契科本人被要求在8月4日或5日撤走，他又一次设法拖延，以便为他的中国主人写一份关于中国自然科学的综合报告，实际上他是在8月13日才离开北京回国的。

在北京的最后几天里，科洛契科听取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对专家中的党员所作的关于撤离专家的说明。苏联大使批评了中国的国内政策——百花齐放和人民公社——不过他集中攻击的则是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侵略印度的愚蠢行径；“为了少数小商人”的利益而恶化与印尼的关系；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的不必要的恶化和对阿尔巴尼亚的过分友好；在第三世界人民中间进行反苏宣传；中国对美国威胁的许多自相矛盾的分析等。他特别猛烈谴责了中国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的行为。总之，中国正在企图接管世界革命的领导权，尽管它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实践方面并不精通。苏联专家的撤走就是为了迫使中国人重新考虑他们的行动并有可能改变他们的政策。

中国没有显示出突然改变主意的迹象，但直到最后他们仍然以礼相待。据科洛契科记述，他的中国同事甚至比往常表现出更

---

① 科洛契科：《一位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152—154页。——原注

大的热情。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还为即将撤离的专家举行了宴会。在宴会上，他感谢专家们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并祝他们回国后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则提醒中国人不要忘记莫斯科曾给予中国60亿卢布，派遣过1万名顾问。一位苏联代表接着就这个问题概括地说了一句："我们为你们干了这么多，可你们仍然不满足"。①

根据科洛契科的说法，这种情绪并没有引起苏联国内绝大多数专家或科学家的共鸣，至少在这些圈子内的人们认为，撤走专家有损苏联的利益。原因显而易见。当时有1390名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除了撤走专家，苏联还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的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苏联专家的撤离，使中国许多"重要的设计和科学研究计划不得不中止，一些正在施工的建筑工程不得不暂停，一些正在进行试生产的工厂和矿山不能按期投入生产"。②周恩来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苏联专家的撤离对海军建设的影响。根据后来中国人痛苦的估计，苏联的行动使中国的发展蒙受"巨大的损失"。刘少奇大概不是唯一的对苏联专家的撤走表示忧虑，并主张转向西方来补偿这次破坏带来的损失的中国领导人。但直到刘失宠和逝世之后，这个建议才有可能被采纳。

且不说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如果苏联相信自己的预言：中国的政策将会带来灾难。那么在灾难到来之时，他们应该让苏联专家留在那里，帮助中国收拾崩溃的烂摊子。那时，苏联专家就会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反之，中国就能把经济困难的责任部分地推到苏联专家的撤离上。

当时，即使苏联对中国虐待苏联专家的指责部分是真实的——如科洛契科指出的那样——，但这成千上万的苏联公民却是

① 科洛契科：《一位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137—138页。——原注

② 吉廷斯：《中苏论战概观，1963—1967年》第140页。——原注

苏联政府获取有关中国政府各部的政策、工厂情况、边远地区的生活水平、科学研究的状况、中国一般的生活条件等情报的重要来源。由于撤走专家，俄国人获取情报的途径降到了一般外交使团都享有的水平，而这恰恰是在他们对中国人的行为感到惊慌，渴望获取这个巨大邻国越来越多的情报的时候。

但是，专家撤离具有更深的感情的和象征的意义。不管中苏之间的合作关系怎样的不完美，这1万名苏联专家在华几年的工作是在人力资源方面对中国发展的巨大援助。同时，中国欠苏联的债务是巨大的，所以，陈毅在为苏联专家举行的最后的晚宴上表达的感激之情是真诚的。但是债务很快还清了，这种感激之情也因中苏关系的完结消失了。

或许同样重要的，即使不太明显的是，苏联的行动破坏了两国管理部门中层干部、工业及知识界的优秀分子之间通过在一起工作发展起来难以计数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对将来改善已恶化的政治关系本会大有帮助。而且，苏联人削弱了他们的主要支持者——苏联培养的经济计划工作者、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中国权力阶层中的地位。他们与苏联人建立的特殊关系不仅不再是职位提升的资本，而且日益成为受怀疑的原因，以致许多人只好重新改学英语转行。

如果苏联领导人在1960年7月中旬就已经断定与中国的全面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或许是他们所希望的，那么苏联专家的撤离迟早都会发生。但如果苏联是由于对中国的行为（中国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作为是使苏联人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感到愤怒并为了使北京醒悟过来而采取这样的行动，那么，他们完全错误地判断了中国人的心理。专家撤离的结果无疑将激发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强毛走自己的路的决心，并将使那些以前本来感到毛对苏联逼得太紧的中国领导人都团结在他的旗帜下。在8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把苏联的观点概括为坚持要求中

国人彻底否定他们的国内政策。即使本国那些大跃进的反对者也很少有人会同意这种羞辱性的条件。

如此看来，苏联专家的撤离也许比中苏在关于对美国和印度的政策上的争执更为重要。特别是在巴黎首脑会议流产之后，尽管两国的政策可以改变，妥协可以达成；但依附于中苏联盟的人际关系已永远不可能再恢复了。因此可以说，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对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挑战，以及苏联撤走专家破坏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是1960年中苏由重大的政策争执演变为无情地扩大裂痕的两个决定性事件。

然而，中国人暂且还能分清轻重缓急。陈毅在8月1日的外事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主要敌人仍然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或许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陈毅私下承认一些美国领导人意识到了缓和紧张局势的需要。在同年与莫斯科争论期间，中国人却从未公开接受这个论点：陈的态度是，中国当然希望和平共处，但目的是要利用和平共处来消灭帝国主义，就像帝国主义希望利用和平共处来消灭社会主义一样。①

第十节　莫斯科会议

1960年9月10日，中国共产党正式对苏联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散发的《通知书》作出答复。中国的答复信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苏共和中共团结的思想基础应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1957年莫斯科宣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平等、同志式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上；中共和苏共在一切重大的共同有关问题上，都应

① 《文革风云》1967年第9期第42页。—— 原注

当"充分协商，从容讨论"。"在必要的时候"，应该把双方的意见提供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避免有任何足以破坏两党、两国团结的言论和行动，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为了在11月份召开的莫斯科会议上制定一个可作为所有共产党共同遵循的行动纲领的文件，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上述原则共同进行磋商。①中国拒绝接受据说是由俄国人提出的把曾在共产党内运用过的民主集中制也运用到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建议：

> "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根据多数或少数来判断的。真理终究是真理。一时的多数，终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终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错误。"②

根据其他方面的报道，中国正是在这封长信里第一次将争论追溯到苏共二十大——在这次会上，俄国人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所起的积极作用，并提出了和平过渡的理论，这两个问题都没有经过与其他党协商。中国还利用这个机会披露出他们在1956年曾劝告俄国人不要对波兰使用武力，但支持其在匈牙利使用武力。这封信也提醒俄国人不要忘了中苏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的争论和毛在会议宣言签字前曾坚持的修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这封信是试图使争论恢复到《列宁主义万岁》一文所提出的基本原则上去。当时曾有"一段小插曲"。赫鲁晓夫嘲笑毛把美国比作"纸老虎"，但中国方面在信中指出，列宁亲口说过"英法帝国主义是个泥足巨人"。③（这一论据特别有说服力，因此，苏联《真理报》最后不得不在1962年12月就"纸老虎"和"泥足巨人"之间的区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119—120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62页。

③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82页。——译者注

别作出解释)。

这封信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以苏联最有权威的理论家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9月10日—20日进行的激烈而毫无结果的讨论的概要。中国获悉赫鲁晓夫在8月份曾试图唆使阿尔巴尼亚加入反华集团，这可能促使中国方面在会谈中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会谈结束后，中国代表团显然已回国，但为出席10月1日开始的由26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又返回莫斯科。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为在11月(与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同时)举行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起草一份宣言。这个筹备会一直开到10月20日。会议在宣言草案的绝大部分内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仍有一些主要问题未解决。中国反对苏联提出的有关“个人崇拜”的条款，并得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很显然，苏联提出这个条款不但是为了反对它原来的目标斯大林，而且也是为了用作反对毛的一个武器。中国还反对在最后文件中批判“派别”活动(苏联显然是指诸如中国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为他们自己的观点进行游说之类的事情)，这得到更多的党——日本共产党、北朝鲜劳动党、印尼共产党、越南共产党和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支持。

赫鲁晓夫在参加了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回国后，甚至把已经达成协议的问题也推翻了。坚持要删掉经过仔细推敲的协议中的某些内容。在起草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举行的宴会上，当这位苏联领导人本人与中国党的总书记激烈地交换意见时，气氛更加紧张了。这样，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87个政党中的81个政党的领导人下个月在莫斯科开会时，起草一份全体代表意见一致的文件将是他们所面临的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而早些时候举行的两次更为适宜的会议上都没能就此取得一致意见。

中国代表团的阵容是很强的。毛在可能丢面子的情形下显然宁愿谨慎一些，因此让刘少奇率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会议，尽管刘

有不少家庭问题与苏联有牵连：1960年10月，刘的一个内弟叛逃苏联。他的儿子刘允斌同年与其俄国妻子离异；另一个儿子刘允若于1960年6月结束在苏联的学习回国后，对中国的生活条件表示不满，说他正爱着一位俄国姑娘，想去看她，甚至要求同参加会议的父亲一起去莫斯科。为了避免在机场发生窘人的事件，刘禁止他家庭中的任何人到机场为他送行。

陪同刘前往苏联的成员中大部分是这年早些时候中苏发生对抗时高举中国理论大旗的人。他们是邓小平、彭真、康生、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他作为代表是出乎意料的）、宣传部长陆定一（他作为代表则是意料之中的），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北京主要的"日本问题专家"廖承志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他们两人都在国际共产党阵线组织中作了大量工作。挑选他们作代表表明，北京觉得有必要在莫斯科对非执政的共产党做工作。总之，代表团由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2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另外5名中共中央委员组成。

中国是仅有的5个不是由最高领导人率领的代表团之一。尽管从世界各地云集到莫斯科的都是老资格的共产主义者，但绝大部分代表团还是受到俄国人的怀疑。因此，在不开会的时候也尽量限制代表们出门，显然是要防止同第三党讨论莫斯科与北京的争执。如同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时那样，苏联共产党的密使就在双边的基础上加紧游说兄弟党的代表。

所有的代表团都收到了俄国人散发的会议声明草案的副本，这份草案包括了筹备会议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内容。同时，代表们还收到了苏联主要理论家苏斯洛夫的一篇评论。评论概述了在一些理论问题上，特别是在有关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以及个人崇拜等问题上存在的主要分歧。会议开幕的前几天，苏联共产党散发了一封落款为11月5日的127页的长信，作为对中国共产党9月10日信件的答复。在信中，俄国人试图反驳中国人对他们总的外

交政策，特别是对赫鲁晓夫本人的具体攻击。

大会于11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圣乔治大厅举行，除星期日休会外，会议一般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2点，休息2小时后，大会继续举行，一直到深夜。会议的大部分时间被那些来自小国的党的领导人的发言所占据，这些发言大多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他们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人面前表现自己。在33次会议上共有108位代表发了言。

赫鲁晓夫的讲话正式拉开了大会的帷幕，他有所克制地重申了苏联的立场。然后，苏斯洛夫介绍了声明草案，声称这个草案如被采用作为大会讨论的基础文件，本身就是一项成就。但这种说理性的争论气氛是虚假的，不久就被许多非执政的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所进行的攻击所打破。他们中的许多代表来自第三世界，这使得曾把这些代表团看作自己天然盟友的中国代表感到十分难堪。

据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说，会上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当今时代的特征；战争与和平问题；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问题。11月14日，在大会期间以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发言人身份出现的邓小平用强硬的措词回敬了对中国党的立场的批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声称中国方面从未认为世界大战或者任何意义上的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认为帝国主义的存在使得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假如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甚至是核战争，共产党人就有责任加以阻止。因此，谈论裁军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和平共处只能作为共产党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

谈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邓重申了中国的观点，认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举了印度的例子，说它表明了资产阶级领导人是如何倾向于向右摇摆，而接近帝国主义的。然而，邓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并不全盘否定苏共二十大作出的各项决

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准则问题上，邓再次提出了《列宁主义万岁》中包含的挑战：苏联共产党没有权力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定规则。邓问道：

> "苏共中央究竟是根据什么一种超党的章程提出这样一种组织原则〔少数应该服从多数〕来的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各共产党和工人党曾经通过这样一种超党的章程呢？"①

然而，尽管邓拚命维护中共为自己观点进行辩护的权利，但中国代表也非常赞同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要有一个领头的党，而这个角色只能由苏联党担任。由于毛的坚持，俄国人曾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同意继续担当这个角色，但在1960年的会议上，俄国人放弃了这个角色，他们也许预料到中国人希望有一天接替他们取得这种领导地位。

邓讲话后的第二天，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多列士企图向这种"分裂主义"行为应战。他直率地说，"如果可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搞小集团或派别的话，那么将不再会有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了"；中国人混淆了"对正在讨论的问题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同大多数党已否决其观点后仍散布其错误观点的'权利'"。多列士大胆触及了一个苏共的支持者普遍碰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中国共产党引用列宁的话来描述当今世界的特征时所引出的。他问道，"我们当今的世界仍然是列宁撰写他的论帝国主义的杰作时所看到的那个世界吗"？他的回答是断然的"不"字。他论述的理由是，在列宁的时代，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而今天，帝国主义不仅受到非常发达的苏联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而且受到以前为其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际工人运动以及世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363页。——译者注

界和平运动的挑战；因此，当今的时代不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是"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和巩固的时代……"。他说：

"看不到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坚持列宁半个世纪前所作的解释，继续认为帝国主义是决定性的势力，就会丧失现实判断力，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①

多列士的语气带有一种傲慢的自信，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站在胜利者一边向一个更有威望的对手挑战。但他并没有使用辱骂的手段。可是在11月16日阿尔巴尼亚党的领导人恩维尔·霍查进行了反苏谩骂之后，苏联的支持者有了一个能够发泄怒火的替罪羊，他们一定认为攻击霍查也就是攻击中国人。霍查在大会一开始就挫败了苏联方面为争取他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他在讲话时猛烈抨击赫鲁晓夫，指责他的欺骗与愚蠢行为，并谴责苏联企图利用阿尔巴尼亚的自然灾害迫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就范。霍查揭露说，"当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挨饿时，苏联的耗子也有吃的，而他们提供的一点点粮食也要求阿尔巴尼亚用黄金付款"②。霍查的讲话被波兰党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说成是"令人作呕的、可耻的、强盗般的、不负责任的攻击"③。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团团长隆哥声称，"我们实在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谴责霍查的指控和批评，但尽管如此，我们还要深入地谴责这位阿尔巴尼亚人，因为霍查的攻击'卑鄙到了极点'，他使用了'欺骗手法'"。"在我们大家看来，这位阿尔巴尼亚代表的行为越是蒙上朋友加兄弟的圆滑保证的面具，就越发令人作呕，因为他在讲话中使用了只适合于阶

---

① 达林主编：《国际共产主义的多样化：文献记录》（1961—1963年）第832页。——原注

②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31—132页。——原注

③ 同上，第113页。

级敌人的侮辱性的称呼和措词”。①

但隆哥主要关心的大概是为赫鲁晓夫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论点进行辩护，因为这是意共政策的核心：

> 我们的中国同志要求我们证明哪个国家正在用这种方式取得进步。我们可以自信地回答，我们意共自己长期以来就是按照这个信念来行动的，这个信念最适合意大利的形势。到目前为止，它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最近的两次党代表大会上……我们准确地确定了我们的民主方式，即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这是一种人民群众民主斗争的方式，其目的是通过改变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实际对比来改变意大利议会中的权力平衡，进而改变国家的政治领导权力。②

隆哥坚定不移地捍卫意共路线的举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所面临的困境。一些（也可能很多）兄弟党的代表团一定感到中共对苏共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正是他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但大多数非执政党对自己国内形势的评估，更接近于赫鲁晓夫的分析而不是毛的论点。要是支持中共的立场，那将意味着在政治生活上的自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能期望赢得同盟者，虽然他们的马列主义的论证极为纯洁和完整。

或许正是由于邓小平认识到争论是无益之事，才使得他在11月24日的第二次发言中对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进行了刻薄的人身攻击。按邓的说法，苏联第一书记的讲话大部分内容是含沙射影地攻击毛。“赫鲁晓夫显然像往常一样，一直在口若悬河地讲些连

---

① 达林主编：《国际共产主义的多样化：文献记录》(1961—1963年)，第848—850页。——原注

② 同上，第855页。

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的东西"。① 邓大概认为没有必要再像他第一次发言时那样详细地为毛辩护了。说到哥穆尔卡——他曾含蓄地把中国称作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小集团主义者、派别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分裂主义者——邓说，他用"庸俗、粗野的抨击污蔑了阿尔巴尼亚"。②

中共总书记的第二次发言是这个第二天将要结束的大会的最后一件大事。冗长乏味的会议期间偶或出现了几次高潮，也出现了一些插曲。然而这次会议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因为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主要观点上谁都不愿意作出让步。现在的问题是：能否为了维持公开的表面上的团结而拼凑成一个妥协的文件？

这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在北京的毛泽东以及其他同事之间在策略上或许有过分歧。当中共代表团开会讨论如果苏联共产党拒绝删去大会声明中中国所不能接受的条款，中国将采取什么行动时，刘少奇显然建议签署最后声明，但中国方面同时发表一份解释性声明。毛则打电报指示代表团，在不导致关系破裂的前提下，尽力删除那些与中国观点不一致的条款。然而，即使"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带偏见的人也没说过代表团打算向苏共投降，或者毛本来宁愿关系破裂也不愿意签署声明。

尽管中国代表团表面上十分执拗，但他们，包括毛在内，显然认定，在这个时候乃至今后几个世纪，分裂主义者都将招致憎恨，这对他们的事业将产生反作用。尽管会议最后表决的结果有分歧，但中国无疑处于极少数地位，因为只有几个党给予他们全力支持。其他代表团，特别是印度代表团，对刘和他的同事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求接受妥协方案。因此，中国人表示，只要考虑中国方面的意见，作出一定的让步——显然是指删去对分裂主

① 克兰克肖：《新的冷战：莫斯科与北京》，第133页。

② 同上。

义的指责——他们就同意在会议结束后在一份经过精心推敲过的会议声明上签字。但在签字时，刘少奇声明，他仍不同意保留在声明中的某些条款，这是他最初建议使用的一种策略。根据中国后来的报道，中国代表团似乎同毛3年前一样，不得不在有关苏共二十大（在这次会议上修正了和平与战争的经典理论，发起了对个人崇拜的攻击）的评价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作了让步。但这次让步同毛1957年的让步有很大的不同，在1960年的声明中，苏共代表坚决主张对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有专门的条款，进行明确的论述；而1957年的宣言并没有这样做。彭真——他显然是声明起草委员会中的首席中国代表——最后得到指示，接受这一条款。这个事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用来攻击他和刘少奇以及邓小平。不过，在俄国人可能为了对毛进行挖苦而坚持这一条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主席的批准，中共代表似乎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一要求，而且，假如毛责怪中共代表团作出的让步严重损害了他的形象，他更不可能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到机场迎接刘少奇和同机回国的其他代表了。

在克里姆林宫长达两个星期争论的所有其他主要问题上，对苏联系统提出的每一个条款，中国的解释性声明都作了附注。这样做意味着任何一方都可以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对这个声明的内容作不同的解释。中苏为了装璜门面的休战，牺牲了共同的意识形态和联合行动纲领。但这种局面也只持续了不到一年。

但是此刻中苏之间还保持着令人愉快的气氛。苏共和中共两个代表团的领导人彼此紧挨在一起让记者拍照，俄国人面带微笑，中国人则大多面无表情。不过，后来证明只有中国领导人愿意让本国人民目睹这种兄弟和睦的"证据"。

在声明上签字之后，刘少奇作了一次短暂的友好访问，参观了明斯克和基辅。12月14日，陈毅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做报告说，当前的重点是与美国作斗争，而不是准备和苏联分裂，苏共

中央的威信必须加以维护。在争执濒临破裂的情况下，中国人似乎热衷于表现其致力于中苏友好的愿望。假如北京希望在未来的论战中得到更多盟友的话，十分重要的是要让人看出自己是诚挚地赞成与苏共友好的，只是由于苏联人的错误和攻击，才不得不采取对抗的立场。

回顾1959年初秋以来的这段历史，是有可能弄清中苏关系由争端走向彻底破裂的大部分重要因素的。苏联对中印边境争端的态度和莫斯科似乎不顾中国利益而对美国实行和平共处的方针，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人向苏联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定规则的权力提出挑战，激怒了苏联领导人。中国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的行动和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都使双方认为对方背叛了自己。

由于1959—1960年中苏论战中的两个因素对此后几年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那些国内事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有必要谈谈。第一个因素是赫鲁晓夫的作用。他的苏联同事似乎在大部分时间里允许他为所欲为，结果，苏共第一书记的挑衅性方式和侮辱性的言论逐渐代表了整个苏联对中国和毛个人的态度。这样，在关键时刻——1959年9—10月在北京，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和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双方的争吵更为加剧了。

中国似乎日益感到赫鲁晓夫——此人的政策、态度、行为——是中苏争执的根本原因。据说，当刘少奇在81国党的会议结束后与赫鲁晓夫见面时，甚至向这位苏联领导人建议，应该从中苏问题的火线上撤下来，以便为改善两国关系留有余地。这一点有助于说明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为什么中国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来看看中苏关系是否可以挽回，即使当时北京的论战已发展到了诅咒整个苏联制度的地步。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的作用问题有助于解释60年代初期为什么毛泽东对共产主义国家领导的性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性问题日益着迷。这种迷恋，正像我们

将看到的那样，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把双方的争执提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这当然增加了分歧的严重性，使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达成一致更加困难。随着争端的恶化，中国的理论分析从苏联对外政策的错误性质扩展到这些错误的根源上去，这是合乎逻辑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把这些根源追溯到苏联社会的蜕化变质，这促使毛深思这种蜕化变质对中国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正是他对此作出的反应。

第十二章

大跃进的结束

第一节 刘少奇的海南学习讨论会

由于中苏论战，中国的领导人便忽略了1960年间的内政，翌年初，毛泽东也承认了这一点。高级领导人和党的宣传干部将国内重大事务搁在一边，为下一轮的中苏论战作准备。外交事务成为1960年6次中央会议的专门议题，大概也是其他一些中央会议的主要议题。中央书记处的两位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彭真，从6月到12月初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间或回到北京，他们大概也要花费大量时间与同事就有关中苏争端进行磋商。政治局1/4的真正在职的委员都卷入了莫斯科长达月余之久的81国党代表会议。①

然而，随着庐山斗争的结束，这种对内政的忽略倒也并未出事。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倒是激励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在1959年末和1960年初格外注意起了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不幸的是，希望证明彭德怀有错的心理使他们未能在此基

① 除彭德怀和张闻天外（他们两人所受的屈辱使他们在政治局里只是徒有其名），此时政治局内还有24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原注

础上制订更明智的经济政策，后来，毛、刘以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都承认了这一点。

1959年11月，刘少奇为了减轻战争年代留下的肩肘炎带来的不堪忍受的折磨，来到海南岛休养。当时，毛曾要求其同事们学习政治经济学，用以武装自己的头脑，解决大跃进中的问题。因此，刘便随身带来了数卷第3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时毛也正在读这本书。刘决定利用他不得已的休假举办一个经济学学习讨论会。参加者有他自己，夫人王光美，他的秘书、医生、护士、警卫，还有陶铸和广东省的其他省委领导。①

刘还邀请《资本论》的译者王学文，国家经委副主任薛暮桥（他已被解除兼任的国家计委副主任和国家统计局局长两职）做"教授"。薛被邀请来做"教授"是引人注意的，因为他的解职通常被猜测是对他在大跃进期间的统计工作中推行专家路线的惩罚，也可能是由于他为薄一波起草了一份拟在庐山会议的发言中讲到的有关经济缺点和错误的提纲。"文化大革命"中对薛暮桥的批判并未解释他被免职的原因。但据毛逝世后发表的一个材料透露，他曾因写过一个有关"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内部"文稿（或许就是给薄一波的报告）而挨批。薛的观点可能与陈云相似，但他在表达上却更加直率。由于庐山会议后公布的1958年生产产量的统计数字作了屈辱的下降，因此，薛大概也不得不辞职，对国家统计局准许公布1958年产量的浮夸数字承担责任，尽管这对薛来说是不公平的。显然，他受到了严厉申斥。不过，如果他犯的是与"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政治性错误的话，很难想象刘少奇会邀请他去海南岛。"文化大革命"中曾指控刘在海南伙同薛

---

① 《红旗飘飘》（20），第182—183页；薛暮桥：《怀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同志》，载《红旗》1980年第10期第9页；《怀念刘少奇同志》第375页。——原注

精心策划了一个反毛的经济计划，[1]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此时的刘少奇完全有理由争取毛对其新近赢得的高位的支持。很有可能是，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听取薛的观点，为他在大跃进之后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中转向作了准备。

学习讨论会于11月10日开始，刘少奇对此十分认真。他常常把学习比作“逆水行舟，不进则退”。[2]因此，他在海南时常常工作到次日凌晨，当他发现护士总是等着给他进行睡前治疗时，便建议她按正常时间休息，等他准备休息时再让警卫员叫她。可就是在治疗时，刘少奇也仍然是手不释卷。[3]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海南学习讨论会的材料更多的是谈论刘少奇的道德情操，而不是其思想认识上的变化。从这些材料中我们知道，他曾生气地拒绝了在11月24日为他61岁生日特地准备的食物和蛋糕，因为党中央作出过规定，不许政治局成员搞生日庆宴。而涉及到理论上的东西只有他在学习讨论会上的一段插话，他表示不赞成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搞的那种用实物支付干部部分工资的制度所带来的某些荒唐现象。[4]（而毛却热衷于这种“供给制”，将其作为消灭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手段。）

据说，薛暮桥将学习讨论会的记录分送给孙冶方和其他经济学家，并打算以海南学习讨论会为基础编写一本题为《论社会主义经济》的书，但未能如愿，这大概是因为毛发表了他自己阅读苏联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写的笔记。不管怎么说，“文化大革命”后，来自经济学家们的论述表明，刘少奇就是从这个时

① 《挖出50年代的经济黑线和它的后台老板——刘少奇》，《卫东》1967年6月15日。——原注

② 《怀念刘少奇同志》，第375页。——原注

③ 《红旗飘飘》（20），第247—249页。——原注

④ 同上，第183页。

候起开始重视经济工作中的客观规律，①这也许是从这个时候起他经常与这些经济学家们磋商的缘故。②

正是在海南岛的这段日子里，刘写信给黄炎培，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进行经济建设将是60年代的主要任务。但当时他仍然没有说明如何完成这一建设任务，而只是明确地期望过去的工商业者能积极地参加这个建设，并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毛泽东的经济研究

差不多与刘少奇在海南岛举办学习讨论会同时，毛也正在自学这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的读书笔记中到处可见对当时苏联关于暴力革命、和平过渡及战争等观点的批评，这些批评将在列宁诞辰纪念日的论战文章中正式予以概述。但就整个读书笔记来看，毛主要关注的是使他本人的经济思想跳出这本苏联正统教科书的框框，以便引导他的同事沿着他们正在痛苦探索的中国道路前进。

毛强调了对苏联模式的不满和中国与苏联模式的不同之处。他说："全国解放初期，我们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③

针对苏联教科书中那种严格规定经济阶段，即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可规定的目标的理论，毛提出了他自己关于世界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

---

① 参考宫晓集：《管理经济必须尊重客观规律》，载《经济管理》1980年第4期第2—3页。——原注

② 参考孙冶方：《重视理论，提倡民主，尊重科学》，载《经济研究》1980年第4期第7—8页。——原注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395页。——译者注

"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407页）"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共产主义可能要经过许多不同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了吗？……"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根据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这一总的观点来看经济发展问题，毛认为，苏联的教科书"似乎并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的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都没有，这是不能设想的。任何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形的，螺旋式的"②。在重提他喜欢的题目——方法论问题时，毛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他说：

"平衡是相对的，否则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普遍的规律，这个普遍的规律难道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吗？应当说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适用这个规律。矛盾、斗争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计划工作中的各种平衡也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③

这显然是毛用以说明大跃进起伏之必然性的哲学依据。而且正如人们所预料到的那样，毛的读书笔记中的许多评论反映的是他在庐山会议之后、新的跃进开始之前的观点，而不是他在1959年上半年曾赞同的比较保守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能够迅速实现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37—339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50页。

③ 同上，第365页。

工业化。尽管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点，毛似乎感到困惑，但他在另一段话中则断言，如果要赶上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就必须搞突击性的计划①；群众创造了人民公社，应该加以扩大②；积极性和群众运动——"事在人为"③——是最重要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不可取，否则资本主义就成了"不可战胜的了！"④他说：

> "应该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不能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这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革命的兴趣和热情呢？"⑤

当毛在1959年春重申陈云当时提到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名言时，他只是表现了一种谨慎的附和。然而，在有关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他一改1959年4月的做法，增加了一个限定语："但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这极大地削弱了原句的力度。

毫不奇怪，毛从意识形态方面对苏联的教科书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没有强调上层建筑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中的作用。更有趣的是，在论述价值规律的问题时，毛很坦率地承认，彭德怀对群众性炼钢运动的批评是正确的——得不偿失——而且从一种局部的、短期的经济观念来看，整个大跃进是不合算的："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因为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36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71页。

③ 同上，第372页。

④ 同上，第358页。

⑤ 同上，第386页。

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我们的速度。"①

令人失望的是，毛对当时和将来的政策所谈甚少。不过，他反复重申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这与苏联教科书中只强调优先发展工业的观点形成了对比。毛估计，在1960年，90%的钢材将用于重工业，其余10%用于农业。② 他还强调各省要尽量各搞一套，自力更生。

毛急于提出讨论的一个重要政策问题是如何解决人口问题——并不是如何控制人口增长率，而是如何处理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比例过高的问题。美国农业人口只占13%，相比之下，中国农业人口高达80%。必须在农村大办工业——这显然是大跃进的一个关键因素——以避免农村人口拥入城市。毛提出的一个政策问题是："我们是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还是略高于城市？"（此时，只有德高望重的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不顾周恩来善意的劝诫，大胆地一再坚持，必须控制中国的人口规模。他费尽苦心却遭到严厉批判，并失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

无论中国人口增长率有多高，毛在1960年3月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仍明确表明，他对中国将取得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存有一些幻想。尽管当时他的眼光放得更远了一些，因而更有把握地考虑未来。他宣称，到本世纪末，中国有希望达到人均1吨钢；即使假定从1960年到2000年之间人口数量不变，这也意味着钢产量要达到6.5亿吨钢，这是一个完全不现实的数字。他还预计，到200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达到人均1到2吨。同样，即使按照在此期间人口毫不增长这一不可能的假定，这也意味着要生产6.5亿吨到13亿吨粮食。根据1958年和1959年被迫压低的粮食统计数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36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74页。

字，毛所预测的数字简直大得无法理解。

然而，侥幸的是，中苏论战的严重危机使毛丢开了当时对经济一时的兴趣。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之后的12个月中，他发表的唯一涉及农村政策的具体指示是1959年10月11日写的关于养猪的一封信。但是，他已经勾画出了一个总体政策，作为党在庐山会议之后所要遵循的指南。

第三节　以农业为基础

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时，毛便迫切地提出了农业机械化问题。后来，在1959年4月，他又宣称："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10年时间，4年以内小解决，7年以内中解决，10年以内大解决。"① 在1959年至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将必须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各省、各地、各县都应设立农具研究所，发明和试制新式农具。随后在庐山会议上，毛在谈到经济发展的优先顺序时又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他急切要求成立农业机械部。这个部确实很快就成立起来了，由陈正人主管该部的工作。

10月，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在一篇文章中为开展农业技术改造运动的必要性辩护。他说，这不仅是由于需要更多的粮棉，更重要的是，大跃进已使中国从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变成为一个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国家。他以河北一公社②为例，这个公社1958年曾以18958名劳动力而自豪，但那年秋天，近2000名农民进了城市的工厂，还有2000名农民由农业转向社办工业。虽然后者的一部分在1959年春又重操旧业——这大概反映了农村中大炼钢

① 《党内通信》，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93页。——译者注

② 指河北宁津县红光人民公社。——译者注

铁运动的逐渐停止——但这个公社仍感到劳力不足①。这当然只是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导致了城镇劳动力由1957年的900多万上升到1958年2500多万，到1959年时达到2850多万。

作为农业主管的谭震林后来从另一角度详细阐明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农村的劳动力总数，包括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是2.3亿多个，折合成全劳动力是2亿多一点。对于16亿亩的总耕地面积来说，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足足8亩。而且，20%的劳动力将用于水利建设工程——它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曾占用了近7000多万人。同时，谭震林还估计，农副业占用了将近3000万个劳动力，社办工业占用了500万人，集体福利事业也占用了将近1500万人。因此，目前担负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实际上只有50%多一点，即1亿多人，平均每人负担耕地约15亩左右。如果按每个劳动力每年能做劳动工日300个计算（这已经打得很足了），每亩耕地平均只有20个左右劳动日，如果按播种面积计算，每亩只有14—15个劳动日，依靠现有工具，如果要全面贯彻“八字宪法”，一亩地15个劳动日是不够的。②谭震林指出，根本的出路是实现农业机械化。而且他也重申了毛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提出的4年以内小解决，7年以内中解决，10年以内大解决的计划。③

新的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明确地说明了上述3个阶段的任务。他透露，全国的机耕面积仅占总耕地面积的5%，并指出，4年内小解决将包括耕种和牧业的小规模机械化，以及农田排灌的“基本”机械化。在7年内，随着农业机械工业的逐步发展，

① 谭一波：《为加速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伟大任务而奋斗》，载《红旗》1959年第20期第24—25页。——原注

② 谭震林：《关于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若干问题》，载《红旗》1960年第6期第4页。——原注

③ 同上，第3页。

将有可能使全国一半以上地区实现机械化。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全国范围内将基本上实现机械化和相当程度的电气化了。①

然而，尽管农业机械化政策在庐山会议之后的数月中立即得到详细阐述和执行，但直到1960年，一项更基本的国策，即"以农业为基础，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结合"。才由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人民日报》1960年元旦一篇总结1959年的经济成就和提出新的一年的任务的文章中宣布出来。推迟宣布这一基本政策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不希望使干部们在集中精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为贯彻新政策而顾此失彼。不管怎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在1959年底结束了，这可能是因为领导层感到，开展一项积极的、正面的教育运动比一场反对不同意见，因而会导致专门挑剌的批判运动更有利于推动1960年的跃进。此外，领导层也许还认为在推出新的经济政策之前，最好给干部们一个喘息的机会，以克服因浮夸的统计数字所造成的余悸。②

也许正因为如此，李富春把"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说成是一个"突出的"新政策，并指出，"有的同志"对这项新政策感到不满，他们认为迅速发展农业是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不相容的。他接着深入说明了工农业发展的相互补充作用，以便努力消除斯大林式的正统的工业化模式的阴影。

李富春在他的文章中宣布，1956年党的八大第一次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在1958—1959年头两年内就已经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因此，可以在今后3年中把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大大提高"。当然，李富春并未冒失地对此加以具体说明。他还宣称，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所提出的工业指标也已经完成

① 陈正人：《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造》，载《红旗》1960年第4期第6页。——原注

② 李富春：《迎接1960年的新跃进》，载《人民日报》1960年1月1日。——原注

——例如，钢产量达到1300万吨以上，超过计划 100 万吨——但他对农业不甚乐观，因为农业遇到了“几十年来少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1/3 以上。根据李自己的表述方式，他似乎暗示1959年粮食产量大约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确定指标的2.5亿吨左右，而不是八届八中全会所确定的 2.75 亿吨的指标。但 3 周后官方公布的数字却是 2.705 亿吨，它并不比八届八中全会确定的指标少多少。数年后才知道，这些数字都是虚假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富春强调指出，1960年的跃进应该高速度地按比例地进行。但是，他的文章的标题——《迎接1960年的新跃进》和他文章的总的精神只能促使干部们相信，新的一年将继续坚持庐山会议所重新肯定的大跃进的态度和方法。李富春还强调了“大规模”群众建设运动的重要性，号召所有重工业各部门要进行规模巨大的基本建设，并要求各个企业继续开展反右倾斗争。文学作品也反映了李富春所说的新的跃进。著名作家沙汀在196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你追我赶》中描写了两个生产大队之间为争夺每月一评的放“卫星”奖而展开的竞赛活动。真正来说，正是这种竞赛方式导致了浮夸风的出现，而这正是农民曾向彭德怀反映的。沙汀在小说中描述道：

> “自从开展竞赛以来，人们的干劲愈来愈大，荣誉心也更强了。在月终评比这种规模较大的场合，如果哪一个管理区评比垮了，有的人还特别不好受。今年春天，石门因为在评比中一下从“飞机”垮到“牛车”，邓大娘就气得哭过。可是龙唯灵却充满信心地鼓励她道：“咋兴哭啊？爬起来又干嘛！”……①

石门示范大队党支部书记龙唯灵的话使人不由地想起了1958

① 《人民文学》1960年第10月号第13页。——译者注

年大跃进高潮的情景：

> “他用洪亮的嗓音不断地同干部们谈着下一段的工作计划，满口兵家术语：‘据点’、‘战线’、‘集中火力’等等。他没有打过仗，但他懂得，他们是在同大自然作斗争。自从大跃进以来，实际所有农村干部，几乎都是这样谈庄稼生产的。”①

像开路先锋河南省的吴芝圃那样较左的省委第一书记，鼓励现实生活中的“龙唯灵”恢复对人民公社的信心，使他们相信人民公社的力量要比过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能够有“更大地抵抗自然灾害和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威力”。②吴芝圃作为《红旗》杂志撰稿人重新露面，本身也是形势变化的一个信号。吴可以说是大跃进高潮中最为刚愎自用的省委领导，但他在1959年中却一直谨慎地避免给党的这份刊物投稿——也可能投稿被主编陈伯达弃置不用——在1960年也仅偶然地有一、二篇文章在党刊上发表。这也是他最后的作品。因为大跃进后期岁月的气氛对吴芝圃这类人是不适合的，况且，他本人也被撤职。但在1960年元旦，吴芝圃仍可以撰文吹嘘河南集体主义的成就：有29.8%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免费伙食供给制；46.9%实行了免费粮食供给制；19.1%实行了基本口粮供给制和口粮半供给制；4.2%实行了工资加照顾的制度。在社员分配总额中免费供给部分总计占40%。吴芝圃指出，一般说来，全国供给制度只占公社社员总收入的20%至30%，这一事实反映了吴芝圃力求使河南再放“卫星”的程度。

吴芝圃列举了某生产大队实行包工包产到户这一“两条道路

---

① 《人民文学》1960年第10月号第10页。——译者注

② 吴芝圃：《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载《红旗》1960年第1期第14页。——原注

斗争中突出的事例”，它说明了像吴这号人在1959年上半年退却时所处的不利地位。① 作家王汶石在一篇反映1959年秋庐山会议之后在某山村出现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小说中，也极其生动地描写了这同样的情节：

> “他们在生产上又实行包产到户，反对集体化运动，使一部分社员资本主义思想大抬头，只顾作投机生意；队里的秋田，草长得比庄稼高，也不去锄。这还不够，彦子玉一伙人，又打算把大农具和牲畜分配到户，固定使用。”②

在现实生活中，河南省展开的反击则表现得过火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无疑是为反击彭德怀和右倾机会主义叫好的材料也表明了这一点。这些材料承认，1959年秋的河南，好的干部都被错误地定为“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后任刘建勋“罪大恶极”，他把这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说成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弄得人人自危，父母之间和夫妻之间都不敢交谈”。③ 根据“文化大革命”之后一份材料的说法，这场运动使河南人民遭受了“更加严重的困难”。另一份材料提到，1960年河南因高征购粮食导致爆发了严重的信阳事件。④ 刘少奇在1960年4月视察河南时，曾力图使吴芝圃和他的同事们现实一些，并警告不要过低估计困难和实行极端平均主义。但鉴于河南后来的困难，他的话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陶铸在1961年末回忆这段时期时说到：

---

① 吴芝圃：《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载《红旗》1960年第1期。——原注

② 《新任队长彦三》，见《风雪之夜》（王汶石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11月出版，第320页。——译者注

③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两面派刘建勋的罪行事实》1967年3月12日。——原注

④ 《少奇同志，河南人民怀念你！》，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21日第2版；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作经济工作》第55页。——原注

在1959年3月以前，主席就发现，我们刮"共产风"，而应该搞三级所有。如果我们当时这样做了，今日的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我们取得经验的时间也会短一些，付出的代价也会小一些。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庐山会议上出了个彭德怀元帅。从此，反"左"倾运动变成了一场反右派运动。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然而，直到1960年头几个月，尽管到处充满了展开新的跃进的好战气氛，但粮食情况正在明显恶化。5月，一位对中国富有同情心并善于提出批评的苏联科学顾问米哈依尔·科洛契科注意到：

"众所周知，每个成年人每月的肉定量有2两多一点，官方动员人们自愿放弃这点可怜的配给，以便供应给那些从事强体力劳动的工人。大家也都知道，面粉和大米的定量也已减少，而且在南方某些地区，大米定量已部分或全部为杂粮所替代。1958年曾在北京市场上敞开供应的糖果和面包，也仅在高级饭店的小卖部才能买到。蔬菜、水果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棉织品的配给额也几乎削减了一半。"②

正是这种局面导致某些省级官员向中央领导送食品，例如，周恩来曾收到一些鱼，不过他责令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批评了这些好心干部的行为，指出这样做会使他这样地位的人享受特殊待遇和特权。③据报道，刘少奇在这方面也要求很严，他一直注意遵守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党的高级干部规定的生活费用标准。

---

① 《中国大陆报刊便览》第4200号第9页。——原注

② 科洛契科：《一位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159页。——原注

③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3辑）第35页；《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之二，第442页。——原注

当时，高层领导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2元4角，唯一允许的补充是自家生产的食物。刘的秘书们便在中南海内刘的住宅中的办公室旁边种植了蔬菜；刘还亲自和他的警卫员一起种了豆角。住在近旁的朱德与妻子则据说以种南瓜见长。①

尽管中国领导人亲自品尝了日常生活的艰辛，但他们仍坚持向第三个跃进之年的目标冲击。也许他们认为这年春季出现的食物短缺是1959年恶劣气候造成的，并希望1960年的好运会使国家恢复1958年后期那种短暂的富足生活。总之，3月29日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要求粮棉增产10%，生猪头数增长35%，这很可能反映了毛头年秋天的意愿。

而且，此次全国人大会议还重新拣起了《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此给予重新肯定和正式采纳。这次通过的纲要与以前的草案相比，仅有一处明显的变化，在要消灭的四害中，害虫取代了麻雀；这乃是纠正1958年所犯的大肆捕捉麻雀的灾难性错误，因为它使本应为麻雀所抑制的虫害得以泛滥。然而，正式定稿的这个纲要却没有反映农村中出现的农业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这一重大变化，所以，纲要显得有点过时。似乎正是由于政治局决定在第三个跃进之年树起一面旗子，所以才将这个纲要搬了出来。但是已没有人有耐心根据1958—1959年声称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组织建设成就去修订这一纲要了，因为人们对它的信心已严重地动摇了。

第四节　城市人民公社

在城市中，新的跃进的主要象征是城市人民公社。早在1958年，城市便进行了成立人民公社的一些试点，但在年底的党的八

① 《红旗飘飘》(20)，第196—197页。——原注

届六中全会上，这一新生事物又受到了冷落。城市居民对此的普遍反对显然是其受到冷落的一个原因。但庐山会议之后，这一反对便不起作用了。

根据组织核心的不同，城市人民公社以三种模式建立起来：以工厂为核心组织；以政府部门或学校为核心组织；或者以居民区为核心建立。每个公社规模大小不一，一般为2至3万人。就象论证农村人民公社一样，宣传人员也论证说，这种新的组织形式的优点在于合理地动员新的劳动力，尤其是通过办公共食堂和幼儿园使妇女劳动力解放出来，开办利用边角废料的小“工厂”，作为大工厂的补充，或者生产一些日用品。公社关心的范围包括极其广泛的福利和服务事业。部分工资可以用免费供给实物的方式支付。与乡村不同的是，城市人民公社的范围经常打乱城市原来的行政区划，如果这种试验继续一个较长的时期的话就会带来问题。

城市人民公社与农村人民公社相同的是：它们都被一种抒情诗式的词句描绘成可以解决其成员经济、社会、个人的种种问题的组织形式。即便传统的婆媳矛盾也能通过它消除。1958年，自然是在河南省省会郑州最早建立起了城市人民公社，在其中的一个公社里，人们写了3万首诗歌来赞颂这个新的组织。其中的一首这样写道：

人民公社一枝花，
花开一朵香万家，
团结生产笑哈哈，
人人都把公社夸。
党的领导真是好，
公社就是神通大。①

---

① 引自《红旗——一个城市人民公社》，载《中国建设》1960年7月号。——原注

第五节 鞍钢宪法

城市的左倾情绪并不仅仅表现在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上，它已渗透到工业战线，这当然要直接归咎于毛。庐山会议期间，座落在东北工业省份辽宁的中国主要钢铁生产中心鞍山钢铁公司的干部便提出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主张大跃进的报告，并提出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毛本人也非常高兴地以此作为在彭德怀尖锐攻击大跃进后不久进行回击的有力武器。这个报告立即被电话通告全国各地，以支持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毛指示鞍钢："要全力以赴反对右倾主义的错误；现在正是时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后来，他又特别表扬了辽宁省贯彻这一精神的速度。

然而，新的跃进的主帅仍然是钢铁。尽管土高炉生产已基本抛弃，但1960年钢产量指标依然增加了37%。增产措施是将"小土群"的钢铁厂改变成"小洋群"的钢铁厂；换言之，在可能的地区巩固和提高小高炉的生产水平，不行的话就以比较现代化的设备来替换。根据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在1960年4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一方法就"像是东方刚刚升起的一轮红日，朝气勃勃，有着无可限量的光明前途"。根据他的统计，1959年小土群、小洋群两类钢铁厂生产的铁矿石占全国总产量的1/2。钢铁"小洋群"除以大批生铁调给重点企业以外，还直接供应了地方工业和农村约400万吨的生铁、钢和钢材。根据王鹤寿的说法，这类工厂生产的钢铁质量已足以用来制造播种机、锯板机、"土车床"等工农业机械以及板车、镐、铁锤、锹、犁铧和耙。①

---

① 王鹤寿：《更高地举起钢铁"小洋群"的红旗——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的发言》，载《新华月报》，1960年第10号第67—68页。——译者注

王鹤寿承认，这种完全使用手工劳动的工厂，生产效率不是很高，但他否认这些小厂只是权宜之计。他说，"数以千计"的这类小厂仍然不够，今后数年内要继续发动群众，新建更多的土洋结合的"小土群"和"小洋群"。①但从1958年的经验和庐山会议的决议来看，这位部长所期待的又一个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看来是不大可能的。的确，这样的运动并未发生，不过王鹤寿利用这种新的气氛挽回了头年夏天与陈云交锋时失去的面子。

王鹤寿并没有把他对群众运动的热心局限在小钢铁厂。他还对大型企业大谈"大洋群"的方针。为了使钢铁建设和生产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大型钢铁企业必须更加努力地"破除迷信，思想解放；大搞群众运动"。②

王鹤寿的建议似乎直接受到毛3周前关于鞍山钢铁公司今后发展问题谈话的启发。当地的市政府当初已提出了一个工业企业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这个报告所建议的管理体制大概完全不同于当时鞍钢所实行的传统的管理体制——鞍钢是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为模式的。新的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是：加强党的领导，政治统帅；大搞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或者说，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过时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相互合作。这是一项强有力的技术革命。毛在3月22日谈到这一点时，把这种新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说它已"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③在其他场合，毛还写道：要破除对"马钢宪法"的"迷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当一部分批判是针对"走资派"，尤其是薄一波的，罪名是他压制了鞍钢宪法，而以"工业七十

---

① 王鹤寿：《更高地举起钢铁"小洋群"的红旗——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的发言》，载《新华月报》，1960年第10号第68页。——译者注

② 同上。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249页。——原注

条”(1961年底颁布)取而代之。而实情似乎并不是这回事，它恰恰反映出当时对中苏论战的过份热心导致了对国内事务的忽视，毛后来也承认这一点。在毛赞扬鞍钢宪法之后，《人民日报》便准备了几篇评论文章，以宣传它的基本原则。但由于该报主编吴冷西当时正忙于准备将于列宁诞辰纪念日与莫斯科论战的稿件，故没有考虑发表这些宣传文章。6月在上海的机械工业会议上，吴冷西曾请邓小平就如何宣传鞍钢宪法作指示，邓表示，此事尚不紧要，现在大家都集中精力反对苏修。他还明确补充道，不管怎样，这个宪法本身还存在某些问题。至于邓小平心里指什么问题，不得而知。但假如邓小平有所指，例如，反对工业战线上的群众运动，那么吴冷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交代必将如数抖落。此外，有证据表明，即使没有推广鞍钢“模式”，但党的干部们仍十分清楚在其他领域发扬它的基本精神的意义。

陶铸称赞了汕头的一家摄影化学材料厂，① 并把它的成就归功于工人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和反对片面强调物质刺激。他强调指出，这个工厂的突出成就是在没有专家的情况下取得的。干部、职工的“冲天干劲”使他们能够成功地取得技术上的突破。②中国主要钢铁中心之一的包头钢铁公司党委书记陈守中则强调了政治挂帅和放手发动群众的重要性。③同时，周恩来也赞许大庆油田把鞍钢原则变成实践。④

但是，7—8月间苏联专家的突然撤走和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迫使中国领导人对工业政策作了重新估计。鞍钢宪法无疑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牺牲品。而且，“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任何材料

---

① 指汕头市公元摄影化学厂。——译者注

② 陶铸：《关于领导厂矿企业的几个问题》，载《红旗》1960年第12期。——原注

③ 陈守中：《包头钢铁公司的多种经营》，载《红旗》1960年第17期第34—35页。——原注

④ 《我们永远怀念周总理》第13—14页。——原注

表明毛在1961年的困难时期曾为保留“鞍钢宪法”而作出过努力。

第六节 托拉斯

另一个政策建议是刘6月10日在上海机械工业现场会上提出来的，他号召组织工业托拉斯。但紧接着在苏联撤走专家之后，一直到1963—1964年，这个建议就不再提起，毫无结果。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因为提出这一建议而大受攻击，但最初的建议是否完全违背毛自己当时的想法，不甚清楚。刘的原话是：“要组织托拉斯，综合性公司，联合经营。这些都是生产关系的改进。”① 在1958年9月大跃进的高潮时，毛在武汉也曾表示，像武汉钢铁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毛觉得，武钢除了生产多种钢铁产品之外，还可以生产机器和化工产品，并从事建筑工业。他还明显以农村人民公社为模式，认为这样的大型企业还可以有一点农、商、学、兵（大概指民兵）。②

前面引述过的包头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的文章表明，他们严肃认真地执行和贯彻毛的这一指示。而他及时地强调在大型现代化企业中搞群众运动的重要性，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显示包钢是如何忠实地贯彻毛的上述指示的。

毛和刘都提到过的联合企业，与仅仅为刘所提出的托拉斯是不同的，前者是横向联合的模式，即毛式联合企业；后者是纵向联合的模式。这种托拉斯后来在60年代发展到将整个工业和销售部门加以统一管理。但并没有任何重要的理由说明，托拉斯这种纵向联合为什么不能够包括毛在1958年9月倡导的综合性联合企

① 《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36页。——原注

② 《红旗》1960年第17期第31页。——原注

业的那些部门，因为一个钢厂是可以管理一个为其供应原料的煤矿的。同样也没有重要的理由说明，横向联合企业为何比纵向联合企业更无产阶级化。最后，从“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或别的材料中都找不到证据表明，毛在刘1960年首次提出组织托拉斯这一建议后曾给予批评。毛很可能还很支持这个建议。至于后来在60年代他是否仍持这样的态度，尚有待于在本书最后一卷加以研究。

第七节　安抚资本家

尽管中共1959年末到1960年初在城市和工业方面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是偏左，但在一个重要方面，党表现了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而且后来也确实被说成是左倾。这就是中共对于工商业者的政策。1956年，工商业者的资本被赎买，其企业转变成公私合营的公司。“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明确暗示，毛本人赞成并实施了这一新的政策，而刘少奇则是主要的代言人，并在后来为此而受到批判。

刘少奇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当毛和周恩来被资本家们看成为试图修补中国共产党和党外人士之间裂痕的国家领导人时，刘却可能更多地被视为典型的共产党高级官员，他主要关心的是保证党的意识形态的纯洁和维护党员的利益。可悲的是，甚至在刘成为国家主席后，他那谨言慎行的天性更使他显得冷漠。在1966年的厄运中，他的下台也只被看成是党内的事，而与国家无关。但也正因为他与非党人士有一定的距离，故他在1960年初对党外人士作出的许诺似乎就比诸如周恩来等人的言辞更令人可信。

由于前几年自身的经历，中国资产阶级此时仍处于忧虑不安之中。1957年，他们有些人响应毛的号召，对党进行批评，结果被

打成右派。1958年，当共产党以群众运动为法宝去发展经济时，他们实际上被晾在一边。1959年，他们忧心忡忡地目击了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经济工作中的右倾思潮的批判。根据与他们联系最密切的党的干部——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后来的说法，“他们思想动荡不安，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产生怀疑，特别害怕党内整风和反右倾会延伸到党外，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反右斗争。”①

刘少奇在庐山会议后试图安抚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举动是召集最高国务会议。最高国务会议是按照宪法建立的由国家主席召集党内外人士一起讨论国家重大事务的实体。毛曾以此作为工具，向党外人士通报共产党的决策，以提醒他们注意即将出现的变化。刘担任国家主席之后的第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于1959年8月24日举行，周恩来首先向与会者简要介绍了对经济计划进行的修改和反对右倾的必要性。接着刘广泛介绍了国内外基本形势。但由于刘的这一举动是不明确的，在党外人士眼中，刘、毛依然如故，毛仍然具有绝对的权威。因此，仅仅过了3周，毛不得不再次召开一个同类人员参加的专门会议，就与上次会议同样的议题交换意见。

刘试图安抚资产阶级的第二个举动是他于11月29日写信给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工商界人士组成的党派之一）主席黄炎培。除了说明在第二个10年他将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经济发展不是意识形态的改变上之外，他还表示坚信，只要绝大多数工商业者“采取老实的承认事实的态度”，“并主观上能够加以努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就一定能够改变思想。②

如果不清除工商界的忧虑情绪，将会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很大

① 李维汉：《刘少奇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10日。——原注

②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第4集，第63—64页。——原注

的损失。因为，此时中国共产党在毛的带领下，正集中精力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虽然实行发动“群众”的路线，但新的跃进的重要特征是号召将“土”工业变为现代工业。而这一重点转变取得成功的关键便是资产阶级实业家和技术人员的帮助。因此，在刘写了上述致黄炎培的信两周之后，可能是在李维汉的鼓动下，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另一个重要的工商界人士的组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于1959年12月16日开幕，在1960年2月19日至21日的正式会议上通过一个经预备会议讨论而起草的文件后闭幕，历时2个月。

起初，会议开得不大顺利，“不少代表心情紧张，口袋里装着发言稿，准备在大会上一拥护、二检讨，争取过关”。因此，大概是李维汉提出将两个会合并，并实行“三自方针”和“三不主义”，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和自己解决问题；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但针对“工商界的思想顾虑”，刘少奇也亲自出来重申了李维汉以及统战部试图传达的信息。

2月21日，刘少奇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待资本家的工作和进步。他说：“到1962年取消定息还有3年。这3年内要好好做工作，采取积极态度，采取一些积极措施。”① 据另一份材料，他曾说，由于资本家正逐渐向党靠拢，党也应当向他们靠得更近一些。②

第二天，刘接见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常委。从李维汉后来的记述看，刘在会见时的谈话的主要内容似乎是在作“交易”：工商业者应该“愿自我改造和为人民服务”，而国家应该“包工商界物质生活福利”。③

---

①③ 李维汉：《刘少奇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10日。——原注

② 《八一八战报》1967年4月21日第8版。——原注

当工商界人士在1956年被迫参加公私合营企业时，给他们的“甜头”是：从1956年至1962年的7年中他们可以领取定息。在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一些胆大的人曾提出定息应延长至12年，但遭到斥责。从所能见到的刘在政治局会议上的简短讲话来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过，在说明这一点的同时，刘也暗示了重新考虑的可能性：

> 定息取消以后怎么办？我们还没有想，工商业者现在就想了，这也难怪，因为对他们是切身问题。这个问题，毛主席有过指示，7年定息，到1962年取消，必要时可以留个尾巴。现在还是这句话。至于尾巴多大多长，我们还未研究，你们可以想想，我们也可想想，时间还来得及。……真有困难，总要解决。①

与定息问题相联系的是工商业者的高薪问题。从刘的讲话来看，他的一些听众显然希望能提高他们的薪金，以弥补他们的资本被赎买的损失。但刘使他们丢掉了幻想。他说：“一部分人原来的高薪不减，也不好再增加”。他所作的许诺只是，由于工作变动而减薪的将会得到很好解决。关于工商业者的退休金问题，虽然国家尚未正式作出规定，但刘保证国家对所有参加合作经营的工商业者都将照顾到底。当时采用的一个“临时”办法是：不能工作的工商界人士可退休，薪水照发。目前暂时按此办法处理。

刘一再奉劝工商界人士相信党的政策。他说：“不论老、病或有其他困难，国家都负责到底，包到底，这点请各位放心。具体办法还要议。总之是照顾到底，不要担心。”

而共产党所希望的报偿是工商界人士能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继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主义。他们必须使

---

①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9月编印，第146页。——译者注

个人的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一切服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刘功利主义的信条。在讲到一个他深信不疑的个人信念时，刘指出，只有忠实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个人利益才能得到长期的最好保障。

由于刘的讲话里并没有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将会对工商界实行一种新的政策，因此，人们只能推测，刘和李维汉采取的友善姿态是再次明确地向工商界人士作出保证：他们不会成为反右倾运动的对象。尽管没有向他们许诺在1962年以后继续领取定息，但李维汉私下表示，定息的取消至少将使工商界人士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的说法，刘少奇确实在1960年指示李维汉拟订一份到1962年摘掉资本家帽子的计划。刘显然不期望一大批改造过的工商界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自己的内弟、工商业家王光英说，这样做将有损于他们对外的影响。[①] 刘的意思大概是，在中国，如果共产党人和资本家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以及国家的利益进行合作，那么它的国家形象比起苏联所显示的铁板一块的一党制国家形象对国外更有吸引力。

即使在工商界人士面前没有共产党员招牌的诱惑，他们仍得到了足够的鼓励，推动他们纷纷向国家和基层提出自己一方的任务。而且，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也在激励下向毛发了致敬电，以一种祈祷般的语言说道：

> “对于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党和您〕给予严正的教导和恳切的帮助，使我们能够不断地提高认识，增加信心，破资立社，继续前进。敬爱的毛主席，党和您像父母一样地爱护我们，像师长一样地教育我们，我们实在没有适当的语言可以用来表达我们对党和您的感激和爱戴的心情……我们为伟大祖国的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而欢呼。我

① 《刘少奇资料汇编》第1集第111页。——原注

们为自己能够和全国人民一道享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天比一天美好的生活而庆幸。我们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①

这些言辞大概是致信者宽慰自己的一种方式，也表明毛和中国共产党在1960年初博得了工商业者的感激。在苏联专家撤走后，旧中国的资本家的专门技能将变得更加重要。但是，假如中国共产党等到那时才作出高姿态的话，其作用就会大大减小。

第八节 教育改革

中国工商界人士的焦虑与共产党对他们相对温和的方式之间的对比，说明了大跃进末年中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精神分裂症"。1958年反复加温的狂热症从1959年上半年起便与持续出现的现实主义混合在一起。这一混合导致了1960年复杂、混乱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仅在经济领域存在，在文化领域也十分明显。

在教育界，1959年初的向右摆意味着重新强调教育质量。在1959年1月召开的一个马拉松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承认：由于"狂热、鲁莽和笨拙的思想方法"，在1958年的教育"大"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他说："大跃进中的文教工作究竟怎样呢？总的来说，有一个大的跃进。具体地说，有的方面跃进了，有的方面没有跃进，有的方面甚至倒退了"。②陆定一强调教育要改良而不是要改革，要提高而不是要降低，要培养尖子。教育部长杨秀峰在1959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

①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向毛主席致敬电》，载《人民日报》1960年3月1日。——译者注

② 《过去十七年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载《教育革命》1967年5月6日。——原注

道，中小学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提高基本学科的教学质量，扎扎实实地打好文化科学知识的基础”，①同年后期，陆定一又告诉各省文教干部，在某些地方，宁可不办小学，也不要那种简陋的小学。

1959年1至3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显地鼓励了教育界的反思，而反思的结果便是1960年的教育改革方案。尽管庐山会议和新的跃进表明了新的姿态，但教学质量问题仍然受到重视。在1960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时，陆定一和杨秀峰都承认，自1949年以来，数学和外语的教学水平已下降。事实上，“尤其是在中学数、理、化课程中，有不少是19世纪以前的陈旧东西，缺乏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内容。”并提出改变这一局面的方法。

尽管这两位教育改革的支持者在发言中都强调了教育质量，但改革本身却可能适得其反。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将现在的中小学12年一贯制改为10年一贯制。各方面进行的试验都已证明了采用这一新制度的可行性，北师大甚至认为可以采用9年一贯制。然而，虽然削短2—3年学制，但陆定一断言，仍有可能将中学毕业程度提高到大致相当于现在大学一年级的水平。

教育改革方案背后的动机反映了大跃进中经济出现的失调现象。由于小型工业的恶性膨胀以及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使得中国经济计划制订者们继续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困难。而教育改革的目的便是想加快在校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速度。陆定一坦率地说明了这一情况：

> “为什么我们主张‘十年左右’呢？因为儿童从六七岁入学，到十六七岁就是全劳动力了。……我们现在的全日制高中学生，都是全劳动力。因而不能招得过多。要想再多

① 杨秀峰：《教育事业的深刻革命和空前发展》，载《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11号第82页。——译者注

就会过多地占用全劳动力。"①

但是，如果经济建设要求缩短学制的学生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从逻辑上说就意味着，缩短的教学周期大多数将转嫁给课堂教育。而这就意味着要减少1958年教育改革措施所规定的体力劳动的课时。在1959年初，小学生平均每周劳动4小时，初中生平均每周6小时，高中生则为8小时，武汉会议退却后，领导人都开始意识到学校引入体力劳动可能已影响了教学质量，因此又提醒师生们，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学习。

然而，在庐山会议发起新的跃进之后，这些告诫统统被抛在脑后。中国领导人重新肯定了他们对大跃进价值的认可。1959年10月，刘少奇期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期望工厂培养自己的大学生、教师、技术人员和干部。1960年2月，陆定一谈到了大跃进中兴办的农业中学的衰亡，但他认为，它们将被全日制中学取代，在这种学校里，劳动和教育将不可分离地结合起来。而且，他和杨秀峰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汇报时说道，学校需要增加体力劳动而不是相反。课堂教学的减少将由课外的家庭作业来弥补。

庐山会议之后进行的新的跃进对教育领域的另一个影响是，它提高了大学中工农子弟的比例。在北京大学六届学生中，工农子弟所占的比例为61%。苏联化学家科洛契科偶然碰见了一位曾作过昆明科学院清洁工的16岁的姑娘，她现在已成为昆明冶金陶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她把许多时间都花在与男同事一块玩球上。在一所地方师范学院，科洛契科参观了有机化学专业的新生班，看到学生们正在一边学习，一边亲手编写他们的教材。

毛要求取消奖学金和学位制，以免教授们在这些工农子弟学生面前凭此装腔作势，摆架子。据科洛契科1960年上半年的考

① 《教育必须提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的发言》载《新华半月刊》1960年第8期第33页。——译者注

察，这种危险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的一位高级研究人员，正带着他的研究所的40名工作人员办猪场。虽然与1958年相比有更多的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和实验，“但总的来说，事实上还是一个人的学历、职务越高，他花费在会议上的时间就越多。”①在北京地质学院，科洛契科发现实验室人员在星期一的上午进行政治学习，而迄今为止，这类学习一直都安排在周末。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不会使用那些闲置着的设备。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整个科学研究的现状是极其糟糕的。②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分子却对1960年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的浪潮大加赞颂。后来，他们还把整个大跃进的3年称之为“伟大的教育革命”时期。

第九节　意识形态的逆流

在庐山会议之后，意识形态领域虽然看上去并不存在多么大的冲突，但那些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头头的人已开始上阵，表明自己的立场了。争论的焦点则是对毛泽东思想及其著作的态度。

在党的八大期间，中共政治局一致同意从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党的宣传工作者得到指示，要求只提“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提“毛泽东思想”。庐山会议决定大学毛的著作，使这个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作出这样的决定大概是为了抵制彭德怀的影响，并迎接将于该年秋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1960年1月，显然是经过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准，中宣部批发了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的提法问题的请示》，仍坚持1956年确定的立场。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看法是：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要时时都使用它。③

① 科洛契科：《一位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第130—131页。——原注

② 同上，第176页。

③ 《胡耀邦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录》，载《青年战线》1967年6月1日。——原注

实际上，毛泽东著作的学习活动由于著作印数不足而受到影响，因为纸张供应紧张，要优先保证学校教材用纸。

两个月后，中宣部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份报告告诫人们不要把毛泽东著作庸俗化。报告引用的一个例子是，有人把卫生工作的成就与毛的著作联系在一起。一名乒乓球运动员撰写的一篇学习毛主席著作如何帮助他赢得比赛胜利的文章，也由于同样原因而受到谭震林等人的批评。(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篇文章却受到赞誉。)

刘少奇告诫人们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归功于毛的著作，并指示“毛泽东思想”一词不应在对外宣传中使用。当北京市委的某些热心者把毛欢呼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当今世界革命的导师时，彭真也表示了类似的冷静态度，并认为，政治经济学和帝国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列宁已经讲过了，无需再论了。①陆定一解释了为什么不能提毛泽东思想超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②

康生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大概在1957年前后接替刘少奇分管中央高级党校的工作。庐山会议后，他除了鼓动党校撰写反击彭德怀的文章外，还一再极力主张党校以学习毛的著作代替学习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③早在1958年就把毛泽东思想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最高峰的康生，此时在党校似乎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校长杨献珍正由于发表了怀疑大跃进的言论而失宠。

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主要鼓吹者是国防部长林彪。在1960年中期，他曾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极力推行毛的“三八作风”(据说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反对这样做)。大力主张建立民兵武装，与其前任彭德怀完全唱反调。

---

①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1967年6月16日。——原注

② 《陆定一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言论》第2、3页。——原注

③ 杨献珍：《党校建设的鼓舞者和指导者——怀念刘少奇同志》载《红旗》1980年第7期第22页。又见《红旗》1980年第18期第23页。——原注

但林彪在这一舞台上最突出的活动是在9至10月，在这期间他主持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此时他负责该机构的工作——的一次扩大会议，并发表了一篇欢呼《毛泽东选集》第4卷问世的重要文章①。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于9月14日到10月20日召开，这是在林彪获得国防部长新职后进行了长达1年的摸底之后举行的。会上，他制定了力图建立新型的现代化军队的原则，有关他以这种原则建设现代化军队的过程将在本书最后一卷中加以考察。在1960年，我们只论述他制订的一些主要原则。这即：

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证。"正像毛泽东所说的，它是"我军的生命线"。在政治工作领域，有四个问题是相互有密切关系的。第一是武器和人的关系，对此，林彪说道：

> "武器和人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搞，但更要重视人的作用。精神的原子弹，即人的思想觉悟、人的勇敢，这比物质的原子弹强得多，有用得多，而且这只有我们办得到，我们的敌人是办不到的，因而这是我们专有的，是帝国主义无法同我们比赛的。"②

第二条是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做好了，各种工作就都能做好。政治工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第三是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思想工作是重点；第四是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也要，但重要的是活的思想。③

---

①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载《红旗》1960年第19期。——译者注

②③ 《林彪元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就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所作的重要指示》，载《人民日报》1960年10月8日。——译者注

当时有关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报导并没有反映出他对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赞颂，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份材料却透露，在这次会上，林彪将毛泽东思想称誉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①] 陆定一曾指示宣传人员不要使用这类夸颂之辞，故林彪的这句话当时没有公开，但即使如此，也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如果要在人民解放军中强调思想政治工作，那么，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在军事方面的论述甚少，则只有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而林彪对《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的评论则更是打消了在这一点上的任何疑问。

林彪这篇文章的标题——《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强调了全文的主题。文章追述了内战的历程，指出毛在每一个转折关头所制订的战略战术都是英明正确的——并明确地向俄国人暗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同时，林彪评述说，《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的出版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它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大国中的胜利。”[②] 他显然是针对他的高级同事，同时也是针对俄国人以及其他外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如下的论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从而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反对形形色色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我们当前重要的战斗任务”。[③]

有趣的是，北京发表的林彪文章的英文稿中，上述论断中的“思想”一词并未像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予以大写，这可能是因为刘少奇曾指示对外宣传不用此词的原因。尽管林的文章中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在其他《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的评论

---

① 《彻底清算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第 2 页。——原注

② 《红旗》1960年第19期第12页。

③ 同上。

者中引起了混乱，有些人仅提“毛主席著作”，也有些人提到了“毛泽东思想”。但他已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一来，他就把1956年作出的、并在1960年初再次重申的规定抛在了一边，正式向他的同事们宣告，他将与毛共命运。这位元帅的所作所为显然得到了主席的赞赏：

> “四个第一〔即四个关系〕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①

毛——林联盟从此开始形成。

第十节 农业灾害

然而，到1960年秋，中国出现了比林彪的野心和对毛泽东著作的正确称谓更为紧迫、更为令领导人担忧的事情。这个国家正遭受着一场近百年来没有过的严重自然灾害。这场灾害远远超过1959年的灾害，并且由于它是在1959年受灾后继续发生的，因此灾情就更加严重。到1960年底，全国有9亿亩农田受到程度不同的灾害，占总耕地面积一半以上。其中有一部分农田遭到重灾，甚至有的农田因灾害特别严重而没有收成。

这场灾害持续了数月之久。灾情最为严重的是旱灾。全国除西藏、新疆外，其余各省、自治区都先后发生了程度不等的干旱，受旱农田达6亿亩。有13个省、区曾在春夏两季连续遭到干旱，受旱地区中以华北的河北、河南、山东和山西等省最为严重，那儿有60%的农田受灾，时间长达6—7个月以上。在春旱和夏旱最

① «大比武是罗瑞卿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暴露»，载«人民日报»1967年8月28日。——原注

严重的时候，山东省境内的12条主要河流中，有8条河断流，在3月和6月有40多天，黄河下游有些河段人可以涉水过河。

山东还连续遭受波及12个省的台风和洪涝灾害的袭击。除山东外，受灾最重的还有东北三省和沿海的广东、福建、江苏等省。辽宁省东部地区更遭遇了当地水文记录上从来未有过的特大洪水灾害。

旱灾的出现自不必说了，水涝灾害则主要是由于频繁、强烈的台风引起的。这年台风在中国登陆的次数，是50年来台风在中国大陆登陆次数最多的一年，从6月到10月共有11次，而且登陆台风过境时间都很长，一般长达10小时左右，最长的达20个小时以上。

而且，大自然另外还搞了个恶作剧。这年台风登陆后不像以往那样向西北方移动，而是向北直上。这样由于没有高山峻岭削减风速，不仅强度更大，而且也减少了西部的降雨量。继旱涝之后，病虫灾又接踵而来。

7月，中国领导人如同1959年那样①，在北戴河，而不是晦气的庐山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夏季工作会议。但会议气氛与两年前迥然不同，充满着一片紧缩声。正是在这个时候，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提出了第一个将有可能结束新的跃进的建议，他倡导采取“调整、巩固、提高”的方针。但北戴河会议似乎对这项建议无动于衷，也许毛尚不准备面对又一场退却，也可能领导层正专注于中苏论战而无暇顾及经济问题。然而，8月底李富春在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又一次提出了这一建议。周总理表示同意，并增加了二个字“充实”，成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②

秋天，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据说陈云在会上对全国的经济困境作了一个精辟的分析，并得到总理的完

① 作者有误，应是1958年。1959年召开的是庐山会议。——译者注

② 顾卓新等：《李富春同志对经济计划工作的重要贡献》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22日。——原注

全同意。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先念在陈云和毛泽东之间开始更倾向于前者的分析。但是，尽管经济紧缩政策符合所有经济计划制订者的意愿，但它还必须由毛以及与他观点相同的人认可。这一点由周恩来和李富春不无艰难地办到了。当时，由于毛、刘和邓小平专注于莫斯科会议，周恩来和其他经济计划制订者便恢复了对经济的实际控制。

对此，毛泽东除了表示同意外别无选择。如同在1959年春那样，他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而不顾一切地力图防止大跃进的愚蠢行为加剧自然造成的灾难。10月27日，他批示表示同意受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山西所采取的从工业战线抽调110万人回乡，并动员一切可能的劳动力来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正如毛泽东所承认的那样：

"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目前农业战线劳动力太少和劳动力太弱的状况，那么所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就会成为空话，人是每天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办教育，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没有粮食一事无成。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

接着，他发出了如下的重要指示："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抽调尽可能多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迅速改变当前劳动力不足的严重形势"。[①] 这个指示传达到了各个省委，但其中一个有趣的方面是，毛认可的是山西已经自行实施了3个月的方针。这也许说明了中苏论战如何使毛不能专注于国内令人绝望的紧迫事态。但它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

---

① 《批准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思想万岁》（未注明出版者和出版时间）第358页。——译者注

省这样自行其事？很可能毛的通告并不是一个指示，而只是事后的认可。

其次是恢复对农民的物质刺激，公社集体化的高潮再次退却。尽管毛本人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曾反对平均主义，而且，上海会议和庐山会议也批准了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所有制单位，但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却鼓励了像吴芝圃那样的人故态复萌，从而强化了公社的特权，而削弱了生产大队、小队的利益。就是像谭震林这样的权威人士也承认，“五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的重新抬头，已经造成了公社的巨大损失。9月，毛泽东给政治局常委会的同事们写了一个便函，重申了他早先在郑州会议上的立场，主张以大队而不是管理区为基本所有制单位和核算单位。毛的便函推动中共中央于11月3日颁布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十二条紧急指示①。这个指示似乎也只不过重申了1959年整社时已经作出的决定，但是，如果实际上没有出现1959年的那种局面的话，显然不需要作出这样的指示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坚决反对一平二调，这也是毛18个月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的战斗口号。遵循毛的便函的精神，同时也可能是由于1960年农业的严峻形势，中央的紧急指示决定将土地的基本所有权下放给生产大队，有些甚至交给生产队。大部分的集体收入分给农民。允许农民有自留地，并从事有利于自己的副业活动。批准恢复农村集市，农民可以在这里出售自己的产品。适当的劳逸结合又一次成为干部们关注的重点，男社员每月放假4天，女社员每月放假6天。

这样，大跃进在1960年正式结束了。一个恢复经济的长征开始了。在这条道路上，将会不时地出现自然和人为的逆流。目标

① 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0年11月3日）。——译者注

是把经济恢复到有条件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程度，这个目标本将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达到。到那个时候，大跃进的精神和方法将只是往事而已。至此，毛泽东的第二次大胆的试验结束了。

结束语

第一节 大跃进的得失

大跃进不是热热闹闹而是凄迷哀婉地结束的。没有举行群众大会，没有人发表讲话，没有散发文件。事实上从未宣布过大跃进已经过去。而只能从《红旗》杂志1961年元旦社论作出这样的推论。①那篇社论将1958年至1960年说成是大跃进的3年。此时，这份杂志号召的不是实现一个新的跃进，而是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奋勇前进——这只是用语的不同，然而具有重大意义。

没有哪个政府喜欢承认失败。在推出一项全新的政策时，往往施放烟幕，宣称被放弃的政策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1961年1月，中共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列举了一系列成就，主要是工业方面的。公报宣称，中国的钢产量从世界第九位上升到第六位，煤产量已从

① 社论题名为：《在总路线的伟大旗帜下前进》，《红旗》1961年第1期第1页。——译者注

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大大加强",机床的拥有量比1957年增长了一倍以上,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也翻了一番还多,工业总产值以每年40%以上的速度递增,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率提高一倍以上。

只是在20年以后,才公布了中国人对大跃进的更为客观的评价,那是在毛去世之后,在最后一批"文化大革命"分子被清洗、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和"实事求是"成为格言之后。

大跃进期间的确实现了工业高速发展,然而代价巨大。根据官方材料,1958年至1960年间,重工业增长230%。仅1958年一年,由于大炼钢铁运动,冶金工业的投资就几乎增长了两倍,整个重工业的投资增长了一倍以上。由于资金积累率从1957年的24.9%提高到1958年33.9%,重工业的产值明显增长了78.8%。对重工业进行高额投资的结果,是减少了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而普遍的高投资的结果是消费下降。尽管农业减产,1959年又重复了1958年的作法,使资本积累率达到43.8%的"破坏性的"水平。由于领导人力图"勉强维持"钢的指标,经济失调现象在

农轻重投资在基建投资总额中的比重(%)

表一:

部门	一五期间 1953—1957 (年均)	1958	1959	1960
农业	7.8	10.5	10.5	13.0
轻工业	5.9	7.3	5.2	4.0
重工业	46.5	57.0	56.7	55.3
其中:冶金工业	10.14	17.68	16.13	13.16

1960年进一步加剧。① 投资率高达39.6%,再次超过1958年的水

平。投资政策上的畸形情况可以从表一中看出②：

主要的受益者是钢铁工业，产量从1957年的535万吨，提高到1960年大跃进结束时的1800万吨。按照中国方面一项分析的说法，工业的高指标是通过"强化开采"(煤的产量从1957年的1.30亿吨提高到1960年的3.90亿吨)"超负荷运转"实现的③。3年大跃进期间的钢产量中有不少是由"小土群"、"小高炉"炼出来的，几乎都要用"大洋炉"重炼。"成本极高、质量极差，是难以为继的不实在的'高峰'。所以，生产不得不压缩，大大影响以钢为原料的机器工业和不少基建工程项目。"④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

表二：

(单位：百万人)	1957	1958	1959	1960
重工业企业职工 a	4.5	17.5	14.18	15.72
重工业劳动者 a	5.57	35.5		
非农业人口	106.18	122.1		
城镇人口	99.49	107.21		6
农村劳动力	192.0	151.0		192.0

注：a.重工业企业职工指在现代工业企业中工作的人；重工业劳动者则包括参加大炼钢铁运动的人。

b.谭震林在1960年初采用的数字为2亿。

① 参见杨坚白、李学曾：《论我国农轻重关系的历史经验》，《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原注

② 《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原注

③ 刘国光、王向明：《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第12页。——原注

④ 骆耕漠：《关于我国计划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曲折过程的分析》，《经济研究》1981年第2期，第43页。——原注

钢产量下降到700万吨。国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高了8.7%，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下降了5.4%。轻工业由于严重缺乏资金，从1960年起连续3年处于衰退状态。那种规模的投资在人力方面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见表二）。①

大批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镇，从农业转向工业。这一转移在1958年还不显得太严重，那年风调雨顺，农业增产。但即使是那一年，由于过分夸大收成和建立“吃饭不要钱”的食堂，结果造成粮食“消费狂潮”，动用了前两三年积累起来的存粮。而且，那些参加炼钢的人还增加了定量。1959年，气候恶化，由于头一年减少了20%的农业劳动力，所以根本无法对付出现的困境。1957年平均每个农民种8.8亩地，这时要种11亩。而且同期耕畜急剧下降——估计是成立公社时因为担心没收而大量宰杀，劳动强度更大了。尽管大跃进期间工业供应给农业的生产资料（拖拉机、化肥等）增加了一倍，但仍无法弥补由于劳动力减少给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损失，因为那些生产资料“质量不好，品种、规格不对路，实效小”。②

这样，自然灾害和劳力短缺对农业造成严重影响就是毫不奇怪的了。1959年冬天，特别是1960年和1961年普遍出现了“饥荒”。现在，大跃进年份的粮食产量已经公布，表三比较了实际产量和当时宣布的产量。中国方面还透露，1958年的2亿吨的实际产量是什么时候得出来的。据经济学家薛暮桥说，数字是1961年“证实”的，即粮食已被吃掉两年之后。

显然，1956至1957年达到的生活水平尔后下降了，直到1965年才恢复到大跃进前的水平。表四列出大跃进期间粮食定量水平：

---

① 杨坚白、李学曾：《论我国农轻重关系的历史经验》，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原注

② 同上。

表三： 粮食产量(百万吨)

	1957	1958	1959	1960
公布产量(不包括大豆)	185.0	250.0	270.5	～
实际产量(不包括大豆)	185.0	～	～	136.2
公布产量(包括大豆)	195.05	260.05	281.55	～
实际产量(包括大豆)	195.05	200.0	170.0	143.5

表四：

粮食定量	1957	1958	1959	1960
公斤／人	203.0	198.0	186.5	163.5

农民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政府从农民那里征购供应膨胀的城市人口的粮食，不是以实际产量而是以当时宣布的产量为基数的。尽管供销售的农产品约相当于农业总产量的15%到20%，然而政府收购的粮食有许多年份超过20%，有几年超过25%，而在产量急剧下降的1959年甚至高达28%。在农村，尽管劳动强度很大，很多地区口粮不到200公斤，少数地区还达不到150公斤。"让农民在半饥半饱状态中劳动生产，怎么可能调动起来积极性呢？"①

1960年，农民的状况通过他们在解放军服役的子弟气愤的话语传了出来：②

…………

毛主席住在北京。他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的吗？收了那么多粮食，都到哪去了？

① 杨坚白、李学曾：《论我国农轻重关系的历史经验》，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原注

② 下面的话引自郑吉士：《中国红军的政治》第13页。——原注

是毛主席下的命令让老百姓吃菜吗？维修中南海的工人每月有60斤定量还说没劲干活，可农民只吃菜和红薯，没有粮食。

城里有的是粮食，而且供应的尽是细粮，乡下供应的则尽是粗粮……就连病人也只能吃红薯。工人吃大米白面，为什么村里日子那么难过？”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面这些话在广东省的一个县意味着什么被披露出来：2万人被饿死。

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回顾这些冷酷的日月时，谴责的语气是严厉的。现在成为他们那一行元老的薛暮桥曾讲述了大跃进的“巨大的浪费和失调”。孙冶方把大跃进说成是“对社会主义的破坏”。曾经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骆耕漠说过，“大跃进一时变成大跃退”。①

统计数字证实了这些论断。1960至1965年间，10万家企业关闭。大约2000万人——到1961年春还有1000万人——离开城市去帮忙挽救农业方面的灾难。目前对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全部损失的估计是1000亿元，几乎相当于一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0亿元)的两倍。将一五同二五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更充分一些：

表五：②　　平均年增长率(%)

	一五(1953—1957)	二五(1958—1962)
国民收入	8.9	3.1
工业生产(产值)	18.0	3.8
农业生产(产值)	4.5	-4.3
工农业生产(产值)	10.9	0.6

① 骆耕漠：《关于我国计划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曲折过程的分析》，载《经济研究》1981年第2期第44页。——原注

② 《经济研究》1980年第1期第24—25页。——原注

第二节 为什么会有大跃进？

中共中央于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很有分寸的语言对大跃进作了解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原文如此，与决议原文有出入——译注）。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决议”指出，人民群众发挥了积极性，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①

谭震林——在大跃进期间曾支持过毛的一位领导同志——曾这样说：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们开始骄傲了，不谨慎了”，“一味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做文章、找出路”——这大概是指建立人民公社，“热衷”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优势”，未能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和完善按劳分配。②

薄一波也讲到毛和其他中央、地方的官员，“包括我自己在内”，如何变得“不谨慎了，滋长了骄傲和急于求成的情绪”。

---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9页。——译者注

② 谭震林：《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乘胜前进》，《红旗》1981年第13期第56页。——原注

毛在北戴河提出公社化的建议后，“由于没有正确地估计形势，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结果来了个大冒进，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普遍地泛滥起来……应当公道地说，对于1958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要纠正的。”然而这时发生了庐山的事件。①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开始，庐山会议一切正常：

> 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②

骆耕漠认为，1957年和1959年的反右浪潮使党内外不少人怕说真话，只报喜，不报忧——“统计数字和典型调查报告开始失去严肃性，对当时农村中的口粮不足的真情起了掩饰作用”。当年曾争论，造成“挫折”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人民公社化及其对生产力和农民积极性的影响，还是自然灾害。“现在回头来总结，是‘人事’为主，‘天时’为次。”③

---

①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献给党诞生的六十周年》，《红旗》1981年第13期第66页。——原注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9页。——译者注

③ 骆耕漠：《关于我国计划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曲折过程的分析》，载《经济研究》1981年第2期第42页。——原注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在经济工作中如此灾难性地偏向重工业？早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本人不就强调了农业和轻工业的极端重要性并要求增加对它们的投资吗？党不是在1960年就宣布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政策吗？毛病出在哪里？薄一波现在承认，“我们搞重工业的人劲头太大了，有点压人”，① 实际上承认了“文化大革命”中有关他1959年到1960年间过分鼓吹重工业的指责是对的。两位中国经济学家说：“问题的症结在于片面地突出重工业已成为一种习惯势力。这种势力比党的方针和指导思想远为强大。”② 尽管要让重工业为其他经济部门服务，实际上重工业只考虑自己。或许，毛从未完全接受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经济思想，那些思想看上去不像他自己的。

第三节 毛泽东的因素

所有中国人事后的评价都是站得住脚的。它们反映了那些在冷酷岁月中生活并担任领导的中国人亲身经历过的痛苦事实。但是在1981年6月，中国领导人不可能对大跃进的一个方面完全开诚布公，这就是毛的因素。即使对前主席批评态度最强烈的人也不愿意看到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错误在北京重演：剥去谢世领导人那么多面纱，从而使党和事业受到威胁。除此之外，中共上层的派别政治也要求作出妥协。

当然，大跃进归根结底要由毛负责，这是明确无疑的。但是如果接受6月决议③ 的说法，他只是发动大跃进的一群人中的为首

①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献给党诞生的六十周年》，载《红旗》1981年第13期第65页。——原注

② 杨坚白、李学曾：《论我国农轻重关系的历史经验》，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原注

③ 即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译者注

者。然而任何没有被北京的政治需要搞得裹足不前的人必然从史实中得出结论：没有毛，就不会有大跃进；没有毛，就不会有人民公社；没有毛，就不会有大炼钢铁；没有毛，就不会有大跃进的复活。

毛可能要求过注重客观条件，但是要求夸大成绩的正是他走火入邪的愿望：要实现惊天动地的进步。毛可能警告过不要超越社会主义阶段，但导致"五风"① 和公社前期的极左行为的，恰恰是他要立即重塑社会的迫切愿望。毛可能在口头上重视农业，但把中国抛入由钢（在50年代，钢还是在国际上称雄的标志）作统帅的大规模工业热潮的，正是他超过苏联和美国的梦想。尽管毛一贯主张治病救人，然而沿着通向灾难的路线重新发动大跃进的，正如关于党史问题的决议② 所承认的那样，正是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腰斩、刘少奇、谭震林、薄一波和其他许多人只是事后的"从犯"。

大跃进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在任何发展中国家，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那里的人民应该认识到他们不必逆来顺受、无所作为地处于自然的枷锁之下。毛坚持不懈地宣传这一思想。毛就像一个大声疾呼地振奋起一班新兵的士气，将他们引入新世界的军士长，将中国人民激励起来。尽管肯定有许多农民从动辄发火的基层干部那儿接受指标时，经验使他们持有怀疑态度，但无疑也有很多人由于想到他们可以通过一次巨大的努力摆脱贫困的束缚而欢欣鼓舞。然而大跃进的过火作法及其最终崩溃，可能使不那么富于韧性的人一蹶不振，对经济发展失去热情。

毛的同事似乎被毛的想象力所左右。他们曾为再造中国进行

① "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瞎指挥风。——译者注

② 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译者注

了一场革命。在长征中将他们引向胜利的人，现在告诉他们经过一小段冲刺就可以到达乌托邦，这并不是地平线以外虚无飘渺的马克思主义极乐世界，而是就在眼前，在中国的田野上和工厂里，建立一个社会纯洁、经济强大、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新国家。骆耕漠坦率地承认，就连他这样的经济学家，也被冲昏了头脑：

> 当时有不少同志忧虑粮食这样大幅度增产，如果不相当大量出口，就连大建国家储备仓库也难赶上，想用以后减少粮食耕地面积，改种经济作物以至增添农村绿化面积来平衡。这类美好的长期远景规划，我个人当时也相当向往，现在想来是很天真的。①

然而当时又有谁会提醒普罗米修斯，自然可以驯服但不能任意蹂躏，人类可以搬山但不能制造奇迹，政治革命可以在10年甚至一天中成功，而精神革命却要几个世纪。由于毛个人在他的同事中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是在庐山会议上证明了的)，有谁会对他说个“不”字，——周恩来，可能；陈云，肯定；彭德怀，只是事后；总之很少。

那么刘少奇呢？他是个小心谨慎、埋头苦干的人，轻易冒险在他看来是完全不可取的。他固守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对毛主义的自发主义理应不屑一顾。他具有执著追求理想的形象，理应回避大跃进中那种浮夸的作法。但是刘同毛具有共同的目标，他曾参与塑造作为工具的党，动员群众的方法也是他所熟知的。共同主持一场经济上的突破。还有什么方法比这更能使在1957年整风中受到批评的党恢复自己的威望。如果他或者毛的任何同事有过疑问，他们中大多数可以这样安慰自己：主席在最重大的

---

① 骆耕漠：《关于我国计划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曲折过程的分析》，载《经济研究》1981年第2期第42页。——原注

问题上都是正确的，也许这次也不例外。如果说那些没人强迫他们去相信的外国人，包括应该看得更清楚的经济学家，都可能被大跃进的欢欣所裹挟，那么陶醉于实现它的前景的中国人为什么不会呢？

有些人可能还记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他们基本上是坐在安乐椅中的理论家，是从未想到中国会比他们老家德国先爆发革命的外国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已经去世，而毛就在这儿，放射出他许诺将改造经济基础的精神力量。

当然，还有苏联顾问，他们的确表示不赞同。但他们也是外国人，在中国人眼里，他们粗野、傲慢。他们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然而却抢掠本国农民，搞糟了自己的农业，他们管理工业的方法表明他们对发动群众一无所知。此外，如果中国走上苏联的道路，几乎注定要永远做一个追随者，而不是引导者。这肯定同中国领导人关于理想未来的景象不相符，特别是当时苏联的外交政策正在损害中国的利益。

那么毛自己呢？他是否也为自己的想象力所裹挟？在一种意义上，这一问题是荒谬的，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毛无法摆脱立刻实现惊天动地的进步的念头。他同刘不一样，喜欢乱，前面引用他批评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一句话反映了他的个性——"'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此外，他似乎对能够显示力量感到振奋。薄一波说，当毛听说2000万人返回农村后不止一次感叹："2000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①

然而尽管毛有自己的梦想，他也有灵敏的政治嗅觉。这是他

---

①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献给党诞生的六十周年》，载《红旗》1981年第13期第66—67页。——原注

为什么如同六中全会决议①所说的那样于1958年秋发起退却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只有毛敢于决定退却。)1959年春天，他嗅到了危险，命令进一步后退。

如果像薄一波说的那样，他不准备完全放弃大跃进的政策，那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彭德怀是对的。然而，毛已经准备好捍卫自己。1960年6月，在总结执政10年的工作时他写道：

> 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作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②

最终，毛颇有风度地作出让步。大跃进是中共在“文化大革命”前经历的最严重的创伤。然而1960年大跃进结束时，并不像1957年毛的自由化试验结束时在他同刘和彭真之间发生冲突那样，发生过毛与他的同事之间的冲突。可能是因为那些能够把大跃进的失败作为政治资本的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从未表现出向他的个人地位和权威挑战的意向。

这样，毛退到二线去“舔他的伤口”——1961年这一年，在1月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以后，他似乎很少讲话——让刘和其他同事去收拾残局。对党员们来说，一定像是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正在开始，尽管这个时代不那么令人振奋，但较少盲动，比较沉闷但也更稳重。

---

① 即：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译者注

② 《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译者注

结果，由于毛对他的同事们所选择的走出大跃进后的萧条局面的措施感到不满，对自己的威信和权威下降感到愤怒。最为重要的是，随着中苏分歧的恶化，他对革命蜕化变质问题越来越担心，这一切使他大步重返政治舞台。大动乱的到来，将是本书最后一卷的主题